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宋任穷回忆录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前　　言

四、五年前，解放军出版社的同志约我写回忆录。他说：你参加革命的时间长，应当为党史、军史留下一点史料，并借此缅怀先烈，教育后代。我当时没有写回忆录的打算，婉言谢绝了。党的十四大以后，我完全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想起这位同志的话，觉得有道理。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多年来，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辉煌的，举世瞩目。但是，我们犯的错误也相当严重，使我们的事业遭受过大的挫折。我们这些参加党比较早的老同志，趁脑子还清楚的时候，把以往的主要经历如实地记录下来，确是我们的责任。至于写出来后，能不能起到出版社同志上面提到的那些要求，只有读者来评说了。

于是，遂请几位同志帮忙，由我口述，请他们整理成文字，并查阅一部分历史档案，写出初稿，再经我审阅修改后定稿，因此，如有记忆失误和评述不当之处，均由我负责。

这本回忆录，从我青少年时期接受革命启蒙教育走上革命道路起，写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对这四十年的经历，不是作全面的记述，而是有重点的追忆。对某个时期、某个地区、某个部门，一般只着重回忆某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对有些事或简略提过，或没有提及。因此，这本回忆录，严格说来，只是我的回忆片断。

作者简介

湖南浏阳人。1926 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党。曾任区农会委员长，县工农义勇队中队党代表。参加秋收起义后，任红军连党代表，团、师政委。长征中任干部团政委，到陕北后，任红 28 军政委、军长。1937 年后，任 129 师政治部副主任，东进纵队政委，冀南军区司令员、政委，平原军区司令员，平原分局代理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二纵政委，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部长，豫皖苏分局书记兼华野副政委。1949 年后，历任南京市委副书记，云南省委书记，西南局副书记，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第二、第三、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东北局第一书记，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组织部部长。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后补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后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副主任。

宋任究回忆录

第一章　农村大革命的洗礼

1909 年，我出生在湖南浏阳西乡冲和区德化小团（小团相当于现在的乡）的乌石城村，原名宋韵琴，又名宋绍梧。祖辈都是地主，到祖父一辈家庭开始破落。到父亲宋国珍这一辈，家境日益贫寒。母亲姓邱，排行第二，都叫她二姑娘。外祖父家原来比较有钱，后来也破落了。父亲因家庭经济窘迫，曾打算把田地和房屋都卖掉。母亲坚决反对，她说家里还有那么多口人要吃饭哩。由于母亲的坚持，留下了几亩田、几间房屋和一小块茶油山和柴山，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我排行最小，上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

大哥宋骏臣，从小被一位近亲指定要去做继孙。按当地的习惯，长子一般是不过继的。由于家庭经济拈据，又是近亲指定要，就过继过去了。他家里生活比较富裕，有二、三百亩地，至少是个中地主。我大哥上过大学的法政系，家里订了上海的《申报》、《大公报》以及湖南出版的报纸。他经常向我们讲起苏联十月革命的情况，还讲起过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等。大革命时期我大哥曾以开明士绅的身份积极支持农民运动。1927 年马日事变，后反动派反攻倒算，地方反动派捅了他几十梭镖，死得很惨。解放后，当地政府将他定为烈士，并把他的事迹载入《浏阳县革命烈士英名册》。摘要摘录于后：“宋骏臣，又名绍松，生于 1891 年 1 月。金江书院结业后，考入湖北武昌中华大学法政系。后出任浏阳金江高小校董，兼任葛家乡小学校长。1926 年，宋骏臣加入国民党，担任冲和区党部执委，积极发动教师举办平民学校，宣传革命道理。冲和区农协成立时，他积极支持胞弟宋任穷担任区农协委员长。‘马日事变’后，宋骏臣在马家湾战斗中不幸被捕。敌人将宋骏臣五花大绑，在押送途中，恶霸×××示意将宋骏臣处死。×××大吼：‘宋骏臣跪下！’但这位刚强的汉子就是不跪，横眉怒目，×××用扁担猛击其腰，宋骏臣倒地高呼：‘打倒土豪劣绅！’‘农民运动万岁！’刽子手×××残忍地用梭镖连刺他的颈背和腹部。顿时，鲜血四溅，宋骏臣壮烈牺牲，时年 37 岁。”

二哥宋骅臣读过一两年书，因无力继续上学，被送到冲和区所在地的枨冲镇上舅舅开的店里当学徒。他工作之余继续自学，字写得不错，还能记帐，不久当了店员。一九二七年晚些时候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农民运动并做开明人士的工作。他后来患胸膜炎病逝。

姐姐宋绍椿，在区的女子职业学校读过一年多的书。嫁到一户比较有钱的人家里，过门后常受虐待，日子过得很苦。

我们家里的田，主要靠三哥宋瑞庭耕作。他敦厚、勤劳、节俭，日夜劳作，从无怨言，也从来没见他发过脾气。因三哥一人种田收入菲薄，入不敷出，父亲在家里开了个小柜台，卖油、盐、酒、纸张以及海带、粉条、自己做的松花蛋等杂货，小本经营，赚不了多少钱。家庭经济状况相当于当地贫农的水平。　1960 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他还在农村，那时农村的生活很苦，可他从不向我们提任何要求。当我得悉他患上浮肿病后急忙寄两盒针剂回去，可药尚未寄到，他已去世了。想起此事，我至今仍后悔不已。

我小时候上过几天初级小学，主要是读私塾。先上当地的私塾，那位教师比较开明，算术课除教珠算外还教笔算。后来到我大哥家，同他的两个孩子一起继续读私塾，主要学《四书》、《幼学琼林》、《古文观止》等。1922

年，我十三岁那年，大哥让我和他的两个孩子一起报考金江高级小学（学制三年）。三人都考上了，同编在第十一班。

金江高小——革命的摇篮；
陈昌、夏明翰——启蒙的老师

金江高等小学的前身为金江书院，建立于 1874 年，是当时浏阳八大书院之一。 1898 年戊戌变法时，清政府下令废科举，办学堂，金江书院改名为金江两等小学堂，分高等小学和初等小学。1907 年改为金江高等小学堂。1911 年辛亥革命后，学堂改为学校。

我入学时，校长是黄谱笙，他思想进步，接受和支持新生事物，邀请陈昌（又名陈章甫）、夏明翰、付昌钰、陈作为、陈清河、潘介堂等到校任教。这些人中，除付昌钰是新民学会会员外，其余都是共产党员。陈昌、夏明翰等教师在讲课时，经常结合课文传播革命思想，向学生历数帝国主义列强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侵略我国，欺凌和压迫我国人民的种种罪行，从中日甲午战争、中俄瑷珲条约、八国联军侵略我国、日本强迫签订 21 条，帝国主义用炮舰政策迫使我割地赔款，强行设立租界，一直讲到军阀政府贪官污吏的腐败无能。有一堂课专门讲“五一”节的来历和意义，讲美国芝加哥工人罢工，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还兴奋地向学生介绍苏联革命取得成功的情况，讲工人要同农民联合起来推翻压迫阶级。他们的讲课，事实充分，道理透彻，感情丰富，富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每逢红五月，陈昌等老师还带领全校师生到普迹镇街上游行示威，我们举着小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反对不平等条约等口号。这些进步教师的谆谆教导激发了我们的爱国热情，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燃起了革命的火花，使我们开始懂得了中国要摆脱贫困，不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欺侮，独立富强起来，必须唤起民众，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

陈昌、夏明翰等老师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他们在师生必经之处悬挂了一块写着《劳工神圣》四个大字的匾额，并将十多亩校田改为农场，组织师生劳动，带领师生将周围的一块荒地开辟为环校马路。陈昌自编了一首修路歌，大家边劳动边唱。据我的记忆，歌词大意是：

修我们的马路，
贯彻我们的精神，
怕什么寒和暑，雨和风，
拿起我们的锄头、铲子，快来做工。
怕什么高和低，土和石，
凡阻碍我们的，就要把它铲平！
大家起来，做一个真正的劳工。

陈昌、夏明翰等老师在教学方法上采用启发式，注重诱导，启发学生的思维，多让学生自己领会，自己练习。譬如作文题，有时由老师出，有时在老师的启发下由学生自己选题。老师把比较好的作文张贴出来，作为学生自我教育和互相启发的一种形式。我写过一篇《打倒省长赵恒惕》的自选题作文，控诉和鞭鞑了这个作恶多端的北洋军阀在湖南的代理人，发出了打倒赵恒惕的呼声，受到老师的赞赏，并张贴出来。写这类题材作文的，不止我一个。由于老师思想进步，又有黄谱签校长的支持，学生们都敢写敢讲，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1924 年，浏阳反动当局为了打击金江高小的进步力量，遏止其广泛的革

命影响，威逼黄谱笙校长辞职，委派思想反动的邱培钧任校长，迫使陈昌、夏明翰等老师离校，并开除了几名进步学生，学校笼罩在一片恐怖的烟雾里。进步师生纷纷提出抗议，学生举行罢课。校长认为我是为组织罢课“摇鹅毛扇”的，要开除我。其实，当时我年纪还小，是出过一点主意，但根本谈不上起了“摇鹅毛扇”的作用。由于我大哥出面同邱培钧周旋，我才没有被开除。

1922 年到 1925 年，我在金江高小这座革命摇篮里接受了革命的启蒙教育，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为我日后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并使我终生受益。大革命时期，有一批毕业于金江高小的学生，如陈昌的两个弟弟陈安古、陈安怀和熊振华等，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为革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88 年 5 月，我去湖南时，怀着感激和思念之情，专程回到母校看望。当年的金江学校仍在原址，现已更名为浏阳七中。会议室里陈列的反映光荣校史的实物、资料，引起了我对这座革命摇篮的美好回忆，使我仿佛又回到了六、七十年前那一段极有意义又富有激情的学校生活。

1950 年，我在毛泽东同志处谈到陈昌、夏明翰时，我告诉他陈、夏是我的老师。毛泽东对陈、夏的评价很高，说陈昌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两人关系很好，在一起时朝夕相处，分别后常有书信往来。他称赞陈是一位出色的宣传鼓动家。在组织进步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和蔡和森共同把陈留下来在国内为革命培育人才。不幸，陈昌于 1928 年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我们还谈到，陈昌的两个弟弟陈安古和陈安怀也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个在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一个在广东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牺牲。毛泽东还告诉我，不久前他收到陈昌女儿的来信，他亲笔复信，勉励她进步并照顾好母亲，他从稿费中拿出三百元汇给陈昌家属以作生活补助。据我所知，毛泽东资助过不少烈士的遗属和后代。毛泽东还谈起夏明翰是湖南第三师范学校的，尽管不在一个学校，但相互之间也有些往来。

我金江高小毕业后，很希望到长沙上中学，但一人半年的学费和伙食费要四、五十块大洋，家庭无力供养。曾想到长沙的中学谋个校役之类的差事，一面干活，一面听课，也曾想到长沙的纺织厂做工，经过各方面的联系，都没有成功，只得在家闲住一段时间。

曹锟贿选的那年冬天，二哥宋驿臣在区团防局当庶务，令各区造名册。经二哥介绍，到区团防局抄名册，除管饭外还给了十多块钱，我都交出补贴家用。第二年，我想找一个教书的工作。冲和区街上的忠恕小学，由于学生多，原有两个教员忙不过来，正要补请一个教员。经二哥介绍，我到这所小学帮助教书。学校只给饭钱，不另付报酬。我在舅舅家搭火，把结余的饭钱十元零五角全部交给家里，这对家庭有相当的帮助。一次，具劝学所一位巡视员到忠恕小学听课，回去后对区劝学所的负责人宋子枚讲：三个教员中，年龄最小的那个教得最好，他用的启发式，不是灌输法，有培养前途。我在忠恕小学时，学着金江高小老师们的做法，多启发学生自己思考，态度比较耐心，学生比我小不了几岁，我常常和他们打成一片，一起踢毽子、打球等，因此反映比较好。巡视员对我的评价传出去以后，我教书的名声就比较好了，1926 年我便成为本地一个小学的正式教员。

中共浏阳县委成立

相继成立县总工会、农民协会和共青团委

浏阳县的具总工会和县农民协会于 1926 年的 8 月和 9 月相继成立。8 月 12 日，在县城曾子庙召开的全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告浏阳县总工会的成立，选举县泥木工会委员长朱建盛为总工会委员长。不久，朱建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参加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1929 年 9 月在保卫井冈山黄洋界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 35 岁。1926 年 9 月上旬，在县城文庙召开的浏阳县的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县农民协会，选举罗纳川为委员长。罗纳川是平江人，后任浏阳工农义勇队参谋长。罗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牺牲。县农民协会成立后，立即派人分赴各区指导工作，帮助建立区、乡的农民协会。

中共浏阳县委和共青团浏阳县委，分别于 1926 年的 10 月和 1927 年的 2 月成立。在成立县委前，浏阳的共产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都称作为特别支部。中共浏阳县委是 1926 年 10 月在县城文庙秘密召开的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成立的。会议选举潘心源为县委书记，张侃（组织部长）、张启魁（宣传部长）、郭起（工人部长）、罗纳川（农民部长）、黄颐（妇女部长）、于汉雯（秘书长）为委员。浏阳县第一次团代表会于 1927 年 2 月在县城的澄中高小举行，由蔡邦友主持。会议宣告团县委成立，并选举徐骐为书记，蔡邦友为宣传部长，邹敬萍为组织部长。

浏阳县妇女运动的兴起也比较早，妇女界的领导人有宋克若、陈昌甫（团省委书记田波扬的爱人）、邵振维、邹园华等。1927 年 2 月在县城礼乐局召开全县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由省妇女运动特派员黄颐主持。黄颐是长沙县金井人，曾担任过省党部的妇女部长。经过选举，黄颐任浏阳县妇女联合会委员长，宋克若为副委员长。

加入 C·Y 和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6 年暑假期间，金江高小时的同班同学熊振华从长沙的长郡中学回到浏阳家里，约我交谈。当听到我对旧社会种种弊端怀有强烈不满后，对我讲：只不满现状是不够的，而要行动起来，并带动更多的人一起行动起来，革旧社会的命。经过多次交谈后，他向我谈到，现在有一个以反对旧社会，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宗旨的革命组织，叫 C·Y，即共产主义青年团。接着向我介绍了 C·Y 的性质和组织纪律，问我愿意不愿意参加，他愿意作我的介绍人。我听后感到兴奋，说愿意参加，并表示了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决心。不久，他通知我说，长沙方面已批准我加入 C·Y，嘱我先在当地从事农民运动，如何过组织生活，以后再通知我。从此，我便一面教书，一面从事农民运动。有一位叫刘少龄的人从长沙回浏阳，我们相遇后谈得很投机。他向我宣传一些革命道理，说要革命，一个人不行，许多人团结在一起才有力量，譬如，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几十根筷子捆在一起就折不断，搞革命要有坚强的组织领导。当他知道我已由熊振华介绍加入 C·Y 以后说，他同熊振华很熟，可以立即通知他将我的组织关系转到浏阳。

1926 年秋，浏阳县农民协会副委员长王德吾（共产党员）来到冲和区所在地帐冲，筹建区农民协会。他找许多人谈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以确定区农民协会委员长人选。我向他推荐区劝学所的宋子枚，我说此人不错，是合适人选。王德吾问我愿不愿当。我说，如果要我当，我也愿意。听说宋子枚向他推荐我，说他年龄大了，不如我出任合适。之后，王德吾召开区各界人士座谈会，工人、农民、学校、劝学所、团防局等各方面都有代表参加，

共数十人。经过协商研究，正式确定我任区农民协会委员长。从此，我辞去了教书的职务，全力从事农民协会的工作。此时，由于我 C·Y 的组织关系尚未转到浏阳，县农协召集各区农协委员长开会时，我只能参加公开会议，而不能参加党的秘密会议。当我的组织关系转到浏阳后，便开始参加党主持召开的秘密会议，同时在浏阳县城孔庙内第一次参加 C·Y 的组织生活会议。为了便于公开活动，更好地开展农民工作，组织决定我同时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冲和区分部的宣传委员。区分部的主任委员是国民党右派，叫胡征吾。

与此同时，省农民协会特派员欧阳晖受县委委派，到冲和区筹建党的区委。他对我讲，区委人手太少不行，建议我由 C·Y 转党。我听后高兴地答应了。由欧阳晖向县委写报告，县委批准我转入党，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让我兼任区共青团的特支书记。当时，党、团员的人数很少，我们积极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优秀分子中发展党、团员。区劝学所的宋子枚就是此时被发展入党的，我二哥宋骅臣也在晚些时候被吸收入党。发展党员是很严格的。深夜，人们都睡了，关上门，在墙上挂一面党旗，新党员在党旗前举行简单而又隆重的入党仪式。人人都要念誓词，前面几句的大意是：革命，遵守纪律，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后面两句我记得最清楚，是“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入党的事，对任何人都不能讲，包括自己的父母和妻儿。入党前后也读一部分马列主义的书，我读过的有《唯物史观》、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中共冲和区委成立时，区委书记欧阳晖，组织委员宋于臣，我任宣传委员。

积极参加农村大革命

减租减息退押，分田分地真忙

1926 年到 1927 年，在北伐战争和全国革命形势的推动下，湖南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在湖南，浏阳又是群众发动得最为广泛、斗争最为激烈的县份之一。谈到当时湖南农运，往往有平（江）、浏（阳）、醴（陵）之称。

1926 年 7 月，作为北伐军先头部队的叶挺独立团到达浏阳，继又有程潜率北伐军第六军过此。当传来叶挺独立团进抵长沙的消息时，浏阳人民就奔走相告，热烈盼望北伐军早日到来。7 月 24 日，叶挺独立团由醴陵进入浏阳，人民群众像迎接久别的亲人一样，欢迎北伐军。群众一见到这支面貌全新、士气高昂的军队，非常兴奋，革命情绪十分高涨，向北伐军送茶送水、赠送慰劳品的人群络绎不绝，还为北伐军当向导带路、挑东西等。北伐军入城的当晚，在县城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群众代表向北伐军赠送了“革命先锋”的锦旗。叶挺团长代表北伐军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感谢浏阳人民的欢迎和支持。次日，大街上张贴告示，要求全城商民对北伐军“须得平价出售，毋得高抬时价，致失军民携手之意。”北伐军纪律严明，尊重当地风俗，维护群众利益，不乱拿群众一针一线。北伐军在浏阳作短暂停留后，经浏阳的东乡到平江。群众被北伐军严明的纪律和革命的精神所感动，含泪送别北伐军。北伐军给浏阳人民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教育课。农民运动支持了北伐军，北伐军又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湖南省委和浏阳县委对农民运动的兴起十分重视，省农协派特派员到各县进行指导，潘心源、罗纳川、张启龙、欧阳晖、慕容楚强等许多同志都是以省农协特派员身份到各地开展工作的。县农民协会召集各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开会听取汇报，交流经验。在浏阳，我所在的西乡反动势力比较大，一贯

敌视农民群众、狠毒狡诈的反动分子张梅村一伙就主要在西乡普安区所在地的普迹一带活动。其他乡，特别是东乡和北乡农民运动的兴起比较早，农民协会的工作也搞得好。我担任西乡冲和区农协委员长后，对如何开展工作，开始心里没有数。我们一方面学习其他乡的做法和经验，一方面走访农民群众，同农民主要是佃农和半自耕农商量，农民协会首先应当做哪几件事情？其实，当时并不懂得什么大道理，而是农民运动的实践教育我们遇事一定要同群众商量，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是农民运动逼着我们这样做的。

他们说，租金太重，不堪负担，要减租。当时，浏阳的地主豪绅对农民收的租率很高，一般为 60%，有的竟高达 70%。农民辛勤劳动所得的收获，自己只能得到 30%—40%。农民们说，利息太高，还不起，要减息。贫苦农民由于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常常要向地主借债。地主便乘人之危，重利盘剥。一般收年息 3 分到 5 分，即年初借 10 元，按 5 分息计算，年底须还 15 元。借谷的则实行“借一还二”，即春荒时借谷一石，到新谷成熟时要还二石。农民们还说，租地收押金，不合理，要退押。当时，农民租地主的田所收的押金往往比租金还多，这是压在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贫苦农民为了交付押金，常常被迫典当、出卖家产和牲畜，或借高利贷。到新谷上场，既要交租，又要还贷，自己所剩无几。调查了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后，我们区农民协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减租、减息、退押”（有的地方减押）。此时，几乎全体农民都组织在农民协会之中，农民运动势不可挡，昔日威风不可一世的地主劣绅们对于农民协会提出的要求，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

减租、减息、退押成功后，农民扬眉吐气，农民协会的威信进一步提高了。下一步搞什么呢？我们又去同农民商量。农民提出这样一些要求：一、修路。他们说路太窄的要加宽，太弯曲的要取直，太坏的要修整。二、清理大而富有饲堂的族产。当时这些祠堂的族产帐目混乱，被一些人任意挥霍以至贪污，农民意见很大。农民还提出一个问题：在地主的田和农民的田之间种的一些大树挡住农民田的阳光，影响收成，应当砍掉。农民协会照农民提出的上述要求进行工作，农民很高兴。到 1927 年，农民开始提出了分田的要求。在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地方开展了分田运动，首先丈量土地，接着按人口和劳动力平分土地，在地里插竹牌作为标杆，写上分给那个农民的名字。在基础不大好的地方，分田运动并没有开展起来。随着农民运动的不断深入，农民的觉悟日益提高，他们提出为了保卫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农民协会缴了民团的枪，并将其改造为农民自卫军。1927 年上半年，县总工会、农民协会、妇联等群众团体出面联合召开全县民众大会，到会的有数十万之众，许多人带着梭镖，有的背着步枪，威武庄严，声势很大。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我们自己还加了打倒资本家的口号，当时还认为县委有点右，其实是我们幼稚，不懂得政策。大会通过决定缴了县警卫队的枪，其起因是县警卫队队长唐秉忠私自放走了民愤极大的西乡劣绅张梅村。群众严厉责问唐秉忠，并要求县长肖骧下令处决唐秉忠。肖骧是国民党右派，对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一直采取对抗态度，此时他竭力狡辩，但慑于群众压力，不得不下令枪毙了唐秉忠。群众认为肖骧和唐秉忠是一伙的，不能再继续当县长，立即罢免了他的县长职务，选举县总工会妇女部长邵振维担任县政务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县长）。我们根据省政府提出的意见，把肖骧押往长沙，交省政府查处。这就是浏阳轰动一时的“驱肖运动”。

邵振维是浏阳北乡人。 1925 年，由潘心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 8 月，在浏阳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妇女部长。1927 年 2 月，被增补为中共例阳县委委员。她当选为浏阳县长时，年仅 21 岁。她是浏阳第一位真正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女县长，也是当时全国第一位共产党员女县长。马日事变后，邵振维被反动派逮捕，惨遭毒刑，但她坚贞不屈，毫不动摇。反动派遂对她下毒手。临刑前，她已奄奄一息，仍高呼“共产党万岁！”邵振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她是浏阳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国妇女的骄傲。

毛泽东同志于 1927 年初在湖南实地考察一个多月后，热情讴歌和高度评价了湖南的农民运动，批评了党内党外对待农民运动的错误观点。毛泽东称赞湖南的农民运动是“空前的农村大革命”，说农民在几个月内就做到了“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迹。”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是我们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

当时我是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各方面都不成熟。在党、团组织的引导下，在轰轰烈烈、急风暴雨式的农民运动中接

受了革命的洗礼和锻炼。

自卫队员“反水”，侥幸脱险，告别家人去部队

1927 年 5 月 21 日，许克祥率三十五师一个团，在湖南长沙袭击并解散了省工会和省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这就是“马日事变”。何键、许克祥一伙在湖南进行血腥镇压，他们“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人”。地方反动势力纷纷进行反攻倒算。被杀害的不仅是共产党员，还杀害了非党的进步群众以及无辜人民，如接替我担任冲和区农民协会委员长的宋菊溪并不是党员，也惨遭杀害。甚至有些剪了巴巴头的妇女，也被无辜地杀了。白色恐怖笼罩湖南全省。

此时，县委将欧阳晖从区委调到县里工作，让我留在冲和区坚持。欧阳晖把全区的党员名册留下来交给我，团员名册就由我掌握，还有农民自卫队的十多杆枪。在由民团改为自卫队以后，我们虽然进行了一些工作，发展了个别的党员，也派一些进步的农民进去，但是总的来说对这支武装的改造抓得不紧，领导权没有真正掌握在我们手里，普迹的张梅村同冲和区原民团队长孙玉衡暗里串通一起，由他们策划在班长池明德操纵下，十多名自卫队员“反水”了。一天，吃完晚饭后我刚从区农民协会出来，门外已布置了岗哨，他们把其他人都放过了就是不让我走，让我折回去。我说为什么？他们不由分说地把我捆绑起来，我问他们这又是为什么？他们蛮不讲理地说，不用问为什么，枪毙了你再说。后又改说不枪毙也可以，你去给我们十几个弟兄搞伙食钱来。我问要多少？他们说要一大笔钱。此时，我身上有全区党、团员的名册，一直在暗中盘算，怎样才能保证这两份名单不落到他们手里。万一他们要搜身，可就麻烦了。为了应付他们，我说好吧，我设法去借钱。他们押着我走了好几家商店，都推说没有钱。后来，找到一家姓徐的杂货铺老板，我向他保证日后由农民协会如数还清，他才答应借了五十块大洋。这些人拿到钱后，押送我过浏阳河，在一个向小冲方向去的路上找了个人家住下过夜。我在里面睡，他们在外面看守。我放下帐子，睡在床上用尿把党、团员名册弄湿，揉碎，趁晚上起来小便时扔进了尿桶。这下，我才放心了。

第二天早上，他们押着我回原区农民协会驻地，但不敢在此地住，把我

押到八角亭。这是一块高地，大哥家曾在这里住过，我过去也曾在此处读过一两年私塾。当时，虽然“马日事变”已经发生，但是浏阳县农民运动的形势仍然对我们比较有利，全国也并未完全被反动势力所控制，他们尚不敢轻易向我下毒手。我对他们讲，你们不能总是把我关在屋里，也让我出去活动活动。他们答应了。几次外出散步，我都返回了，他们放松了对我的戒备。一次外出散步，我趁他们不备，猛地跑到山下，摆脱了这些人。到哪里去呢？回家不行，到舅舅家也不行，他们一定会到这些地方去找我，早就考虑要到一个他们意想不到的去处才安全，这个地方就是我姐夫的姐姐付骏三的家，这家过去很有钱，他们不知我有这个关系，想必他们不会找到这里来。吃了晚饭，未敢久留，就离开了。为了避免被人发现，我绕道十多里从一个不易被人察觉的渡口过了浏阳河，偷偷回到家里。我对父母亲和三哥说，我回来只能向你们告别一下，马上就得离开，越快越好，不然有危险。他们见情况紧急，虽然不忍，也不好挽留。我就从此长期离开了家。

我只身一人往县城赶，天快亮时离县城还有十多里路。此地一个乡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叫何明，为人很好。一到这里，我就感到安全了。在何明家吃罢早饭，赶到县城。先到县农民协会找到欧阳晖和罗纳川，请他们向县委报告。不久，他们告诉我：你的情况县委都知道了，你休息一段时间，等待县委分配工作。此时，平（江）、浏（阳）、醴（陵）等十多个县准备攻打长沙的农民军已经奉命撤回。县委决定分配我到军队工作。

以枪杆子对枪杆子，
参加浏阳工农义勇队

浏阳工农义勇队是 1927 年 3 月正式成立的。此前，有农民自卫队，这是农民协会的自卫武装，也是党领导下的一支人民武装，以大刀、梭镖为武器。其主要成员是贫苦农民，他们受压迫深，反抗精神强，很有战斗力。此外，还有 1926 年 10 月就成立的工人纠察队，这是浏阳最早的全县性的革命武装组织，也很有战斗力，武器开始也是大刀、梭镖、棍棒一类，后来补充了少数枪支。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共浏阳县委深感必须进一步加强武装建设，把全县的工农武装统一起来，以适应未来斗争的需要。于是，在县委的周密部署下，采取速战速决的办法，收缴了全县各团防局的 700 余支枪，初步解决了所需的武器问题。浏阳工农义勇队就是以上述两支革命武装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部分旧民团的人经过改编也加入了工农义勇队。成立时，总共不到一千人。不久，被编为湖南工农义勇队第四团队，团队长苏先骏，党代表潘心源，参谋长罗纳川，下设三个大队，九个中队，另有一个直属特务连，连长是原县总工会主席朱建盛。我被分配到一大队二中队任党代表。工农义勇队这支武装的存在，对反动势力是严重的威胁，对广大人民群众是强有力的支持。

“马日事变”后，西乡普安区普迹镇以张梅村为首的反动武装很嚣张，县委决定派原省工会特派员戴仙岳同志（湖南叙浦县人）率一小股部队前去。一进普迹镇即遭张梅村反动武装包围，除个别同志脱险外，大部分英勇牺牲，戴仙岳同志也在这次行动中英勇献身。

一大队二中队由团部派驻在浏阳北乡北盛仓区，对付反动武装的前哨部队。后调我们去打西乡张梅村的反动武装。在离我家不远的马家湾，我二中队和反动武装备占一个山头对峙，都打了枪，但没有大的交火。这是我第一次打仗。我大哥宋骏臣就是在马家湾战斗后被敌人杀害的。这次交火后，我

二中队仍返回北乡原驻地。

“马日事变”后，武汉汪精卫政府与蒋介石反动政府同流合污，共同实行坚决的反共政策，党中央决定，浏阳工农义勇队同平江工农义勇队一起赶去参加南昌起义。

第二章　风展红旗上井冈

南昌起义前夕，我们湖南工农义勇队第四团队和平江县一个团队一起赶向南昌。我们浏阳这个团，一千多人，几百枝枪，三个大队（营），九个中队（连），有一个指挥部，由余洒度统一指挥这两个团队。我在浏阳那个团队的团部搞宣传队。那时，很讲究宣传鼓动；到一地，都要开群众大会，讲话，写标语等。

八月一日以后，我们才赶到南昌附近的德安县涂家埠车站。此时，天快黑了。地下党派人赶来通知我们，说已经起义了，部队向南走了，你们不要进南昌了，赶紧撤离这个地方，下一步如何行动；你们自己决定。我们当即向奉新、上高方向撤离。走了几十里路，在途中露营，如何继续行动，两个团的意见不一致。平江的想回平江，我们部队则希望向浏 阳方向行动，于是，就分开走了。我们走了几天，到江西的铜鼓县，该县同湖南的浏阳县交界，团部不知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带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江西国民党省政府想拉我们，我们也想利用他们，当时部队连日行军需要修整，同时也得筹饷、补充武器弹药，于是，我们原则上同意改编为江西省防军独立旅（混成旅）的一个团，暂驻铜鼓县，我们可以筹饷，要武器，但有个条件：听编不听调。

在铜鼓，主要是训练部队，我调到团部当文书。潘心源离开部队到湖南找党的关系。

这时，江西省委派来一个人同我们联系上了。县委要派人去南昌向江西省委请示我们的行动。其他同志去不了，团党委的组织委员张启龙同志找我谈话说决定派我去。当时我只有十八岁，让我跟着省委来的同志一起去。那人的年龄比我大，是搞秘密交通的，有地下工作经验，名字记不起来了。进南昌时，我们遇到警察，他就主动去问路，大大方方的。这样，警察就不来盘问我们了。这使我学到一点做秘密工作的经验。

在南昌，由江西省委安排，住到修水县委书记父亲（在省政府当一等秘书）的姘头家里，等待省委指示。我那时从未进过大城市，连县城也没到过。这次到南昌，感到很新奇，我们每天去街上看一看。几乎天天都有杀共产党人的布告。马日事变后，湖南屠杀革命党人很厉害，“宁可杀错一千，不可漏掉一个”。几天后，省委派人来了，找我去。省委书记是汪泽楷，此人以后与彭述之一起成为托陈取消派。我向他报告了情况。在场的还有一个湖南人，叫刘士奇，可能也是江西省委委员。汪泽楷听后让我赶快离开南昌。他说他们要发传单搞活动，让我在行动前离开，并要我们的部队南下，从铜鼓向莲花县、宁冈县行动，那里有党领导的武装，有枪，到那里再说，“我给你写封信带着”，信是密写的，还是那个人和我一起走。他让我带一百元袁大头路费，把我吓着了，太重，有危险。那人说，无论如何你要带六十元，没有就会行动不方便。后来，修水县委书记的父亲来了，问我哪里人，我说浏阳人。还问夏斗寅部队到过浏阳没有？我说到过。他说：“那好，如果你遇到什么事情被抓起来，给我来个电报，我可以证明你父亲是我的朋友，是我在夏斗寅部队时的朋友，你是来看我的。”

国民党的一批人准备盘问我们两个人，那时我们请的轿子恰恰还没到茶铺时，行程就已经满了。我们两个人步行到茶铺。他们见我们就问：“你们看到后边有两顶轿子吗？”老交通很机灵，随口就答：“正在后面，快到了。”真玄，差一点就出了事情。摆脱了这些人的盘查，我们赶快走了。

第一次见毛泽东
毛委员率部向湘赣边界转移

从这里，我与省委的交通员分手了。我去铜鼓，他到别处还有其它任务。我走到铜鼓县的一个小镇子上，进一个饭店，不让住，换了一家，又不让住。到最后一家，店主告诉我：“挨户团交待了，对没有行李的人要查，不能留宿。”我说：“正好，请他们负责人来，我是去县政府会朋友的，向江西省政府打个电话问一问，省政府是否有我这个人。”店主见此情景，就说：“算了，算了，别找了。这事我们办吧，不必麻烦他们了。”我住下了。这事就这样镇住了。

我接着向铜鼓县城走。一打听，我们的部队已向南走了，我赶快去追部队。毛委员到铜鼓时我没有在。赶上部队后，欧阳晖高兴地告诉我：潘心源从安源接来了毛委员，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经过缤密部署，统一领导驻在修水、安源、铜鼓的工农革命武装和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胜利地举行了秋收起义。让我赶紧把省委的意见向毛委员报告。

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振奋，并渴望见到毛泽东。当我走进毛泽东住处的时候，他健步迎上来，亲切地拉着我的手。毛泽东身材修长，一身布衣布裤，目光炯炯，镇定自若，细心地听我的汇报。我把省委负责同志的意见详细地向毛委员作了汇报，把省委的密信交给他，把剩下的银元、铜板一个不留，全部交公。毛委员听完汇报，看完密信，仰天沉思了一会儿，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我讲：你一路辛苦了，你的任务完成了，回团部休息去吧。

毛泽东等领导的秋收起义，是继“八一”南昌起义后，我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在革命低潮时期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的又一次有力反击。在攻打长沙的战斗中，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各路起义军先后遭受严重挫折。9 月 19 日，前敌委员会在浏阳文家市举行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在这个关乎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表现出一位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他坚决反对少数同志提出的继续攻打大城市的错误主张，认为在当时情况下这样做是很不适当的，并明确指出，在敌强我弱，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均有敌人重兵把守的情况下，起义部队应当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转移，在那里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前敌委员会多数同志拥护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九月下旬，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离开文家市，朝西南向湘赣边界转移。

兵败芦溪，三湾改编，
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莲花县，遇到敌人拂晓袭击，在芦溪打了一仗。由于我们开始打仗不多，缺乏作战经验，伤亡失散人员较多。总指挥卢德铭同志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毛委员对战斗中伤亡的同志，特别是对卢德铭同志的英勇牺牲深表惋惜。1927 年 9 月，部队从芦溪经莲花县到达永新的三湾，部队就在这里进行了改编。

三湾改编时，前敌委员会决定对保留下来不及千人的部队进行改编，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实行官兵平等。三湾改编，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它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

端。

三湾改编后的团长是陈浩。苏先骏没有当上团长，不大满意，到了宁冈，便要求到白区去工作。毛委员批准他走了。苏先骏后来叛变了革命，郭亮同志的被捕和牺牲，就是他告的密。1930 年彭德怀、滕代远同志领导的部队第一次打进长沙，抓住了这个叛徒，把他枪毙了。

改编后的团下设一、三营，团部还有一个特务连，没有第二营。三营营长是张子清，营党代表似为李运启。秋收起义中浏阳的那个团，主要编在三营第七连。七连连长叫程紫峰，党代表欧阳健。我在三营七连当文书。七连有两文个书。除了我以外，还有高自立。八连党代表是相岳斌。九连连长是王良，党代表是罗荣桓。

三湾改编后，各级士兵委员会陆续建立起来了。它是由选举产生的，首先在党内酝酿（当时党员还是秘密的），然后在全体军人大会上选举产生。营士兵委员会则先由各连产生若干代表，然后再由三个连的代表选举产生。团士兵委员会的建立，也是这个程序。士兵委员会不设什么机构，也没有专职人员，只是遇事在一起开会研究。它的工作，一是搞政治民主，那时来自旧军队的军官不少，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还存在，有的相当严重。士兵委员会同这种旧习气作斗争。二是搞经济民主，参与管理经济，管理伙食，把伙食搞好，按时结帐，分伙食尾子。营、团士兵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放在连里，因为连是基础。党的支部和党代表，都把抓士兵委员会，作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参加了打遂川的战斗。这一仗打得很漂亮。拿下遂川后，部队在遂川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原三营营长张子清调出当团长了，由伍中豪接任三营营长，营没有设党代表。伍中豪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是一位儒将，很能打仗，还喜欢作诗。平日爱喝酒，酒兴浓时，便诗兴大发。他拿到分的伙食尾子，便喊警卫员上街打酒。打来的酒，他三口两口就喝完了，又喊警卫员去打酒。警卫员说，你的伙食尾子全打了酒了，哪里还有钱去打酒？

我的名字宋任穷就是在打遂川后的那个春节，伍中豪喝酒时为我改的。他一边喝酒一边念着我的名字：“宋韵琴，宋韵琴。这个名字不好，像个女人的名字，改了吧！”接着他念念有词地在嗓子眼里转着：“宋韵琴，宋韵琴，宋任穷”，突然停住了，说：“就叫宋任穷吧！”于是，我的名字就由宋韵琴改成宋任穷了，一直沿用至今。那时，改名字很简单，不用批准，只要在花名册上把名字改过来就行了，后来，有人传说，我的名字是毛泽东改的，这是误传。

我从七连调到营部当文书，主要任务是抄写营部起草的文件。当时营部只有十几、二十个人，没有支部，只有党小组。我任营部的党小组长。有一个副营长姓陈，平江人，是在遂川城发展入党的。营部还有个副官姓徐，一个书记官，还有传令兵、炊事员、司号长（管三个连的三名号兵，团部称司号官）。团部设在遂川城的天主教堂里，营部在城内的一间民房里。毛泽东同志也住在遂川城里。

不久，部队又从遂川返回来打宁冈新城。这次战斗很干脆，全歼敌人一个营，国民党的县长都被我们抓到了。这次我在后面搞伤兵工作。在战斗中，营长伍中豪身先士卒，带头爬城，负了伤。

打茶陵以后，毛泽东同志在一次党员积极分子会议上作报告说，陈独秀犯了右倾错误。当时，对我们震动很大，因为陈独秀当过中央总书记，这时

才知道他是一个犯了大错误的人。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好几百人，时间大约是在 1927 年底或 1928 年初，即在我调到袁文才、王佐部队工作之前。

随毛泽东上井冈山

在袁文才、王佐部任连党代表

在当时，究竟把革命根据地建在哪里，事关重大。毛泽东调查了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的整个罗霄山脉，认为北段不如中段可进可守，且北段离政治都会太近；南段虽地势比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中段地势好，党的组织、群众基础等方面也比较好，而且远离大城市，敌人的统治力量比其他地方薄弱，敌人没有正规的地方部队。毛泽东确认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是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好地方。同时还了解到此地有袁文才部（汪泽楷讲的宁冈有一支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就是指袁部）和王佐部两支农民革命武装。

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经三湾改编后，在毛委员率领下向井冈山挺进。当时湖南、江西边界各县的党组织全被敌人破坏，剩下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也都在各地进行隐蔽斗争，仅存的两支农民革命武装就是袁文才部和王佐部。袁部驻在井冈山脚下的茅坪一带，王佐部驻在井冈山腹地，各有几百人和 60 余支枪，在井冈山地区很有影响。我们要在井冈

山站住脚，建立革命根据地，扩大工农武装力量，必须团结这两支武装。

参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都是当地的贫苦农民，不少人在大革命时期就受到过党的影响，他们同国民党反动政

府和豪绅地主阶级有深刻的矛盾，因而有很强的反抗精神。

他们平时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比较守纪律，专打土豪，劫富济贫，不侵犯群众利益，因此受到井冈山老百姓的拥护和保护。群众经常为他们通风报信，敌人的暗探很难从老百姓那里探到关于袁、王部队的情况。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候，

他们还在山上掩护过避难的共产党员。

在宁冈古城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由毛泽东主持，认真分析了袁文才、王佐部的情况，决定首先加强袁文才部党的力量和政治工作，并通过袁文才争取团结王佐部，事实证

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那种认为袁、王的部队是土匪武装，主张武力消灭的意见，是错误的。同时也应当指出，这两支部队，特别是王佐部由于长年住在山区，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缺乏有力的政治工作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比较模糊，存在着浓厚的绿林

习气和许多封建落后的东西。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帮助改造的。

古城会议不久，毛泽东会见了袁文才。袁文才中等身材，长得很文静，像个知识分子的样子。他在永新一中读书时就听到过有关共产主义的宣传，因而要求进步，向往革命，参加过学生运动，在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于 1926 年底或 1927 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把宁冈的农民自卫军拉到井冈山，为党保存了一支革命武装，那时袁文才部已有党的组织。毛泽东向袁文才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革命的道路和前途，充分肯定了袁部反抗豪绅地主阶级的革命精神，并决定赠送 100 多支枪给他们。袁文才听了非常兴奋，他虽然为人高傲，但对毛泽东十分佩服，并为毛泽东诚恳合作的态度所感动。次日，袁文才带领部队和当地群众热烈欢迎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从此，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

下安了家。之后，袁文才一再要求我们派干部到其部队工作。第一批派到袁部的是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人，分别担任连、徘长，帮助他们进行军政训练，清除少数不良分子。毛泽东也亲自到茅坪领导练兵。经过几个月的训练，袁部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

王佐又名王云辉，个子不高，有一身好武艺，枪法也很好。他是裁缝出身，家境贫寒，没有什么文化，个性很强，由于不堪军阀、土豪的剥削压迫，在井冈山组织了一支农民武装队伍。王佐和袁文才是拜把兄弟，关系密切，山上山下互相呼应，互相帮助。王佐信服袁文才。袁投身革命，入了党，对王佐影响很大。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初期，王佐对我们还有戒心。当时，王还不是党员，他的部队里也没有党的组织。在最初的一个时期，我们没有向王佐部派干部，使其维持原来的状况。同时，通过袁文才以及我们在袁部队里的工作来影响王佐。后来，王佐从袁文才那里了解到毛泽东派人到袁部帮助训练，使部队面貌为之一新等情况，逐渐消除了疑虑，欢迎毛泽东派干部到他的部队工作。1928 年元月，毛泽东派何长工到王佐部任党代表。何长工做了许多工作，并且派我们的武装帮助王佐除掉了他最大的仇敌——那个勾结官府、欺压贫民的永新地主武装靖卫团团总尹道一。毛泽东也多次跟王佐讲革命道理，循循善诱地进行教育。王很敬仰毛泽东，称他为最有学问的人，并常引用毛泽东的话教育战士。经过我们的工作，王佐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1928 年 2 月，袁文才、王佐两部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为副团长，贺敏学为团党委书记，何长工为团党代表。党从第一团派去一批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从此，袁文才、王佐部正式成为我党直接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

朱德、毛泽东会师后，第二团改编为红四军第三十二团，成为工农红军的主力之一。下辖两个营，团长袁文才兼一营营长，副团长王佐兼二营营长，陈东日任参谋长。谭梓生为团政治机关秘书长，高静山为组织科长，张际春为宣传科长。高静山、张际春和陈东日原来都是宜章县委的。我和曹里怀调到宣传科任干事。还将参加过湘南暴动的部分同志分别补充到两个营里。袁文才、王佐对这些外来的同志一概表示欢迎，采取团结合作的态度，相处融洽。

袁文才的一营有一、二两个连。一连连长徐彦刚，党代表房灿，是井冈山下酃县人。二连连长龙普霖，安徽望江县人，后来在苏区逃跑了。我在宣传科工作不久就调到二连任党代表。王佐的二营有四、五两个连，连排长大多是王佐的老部下，只有三排长是党员。四连连长李清贤，五连连长刁飞林。李清贤、刁飞杯二人和王佐的关系很深，王佐有什么事都同他们商量。后来，我调到四连当党代表，五连党代表是段辉唐，黄埔军校的学生。

在我调到王佐营时，就有了营党代表，第一任是肖万侠，遂川人，原是遂川县委委员。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同王佐的关系比较好。遂川县委为改造王佐部做了不少工作。第二任营党代表是康健，湖南新化人，原在三十一团团部任书记官。

党代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和进行政治工作。当时党员身份不公开。我们积极培养和发展政治觉悟高的士兵和基层干部入党，做到每个班都有党员。后来，像刁飞林、李清贤这样的军事骨干也提高了政治觉悟，入了党。我们开设政治课和文化课，讲解工农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宣传为劳苦大众求

解放的思想，还帮助文盲识字，提高战士的文化水平。并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公布伙食帐目，禁止打骂士兵等，使袁文才、王佐部原来的一些不良习气慢慢得到了改变。这些做法，得到绝大多数士兵的拥护，袁文才、王佐也都积极支持。在茨坪，王佐还把二营营部的两间房子主动腾给红四军后方留守处使用，当时的留守处主任是叶重开，湖北人。

我在王佐营任党委干事时，秘密交通把一份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送到井冈山工农红军总前委。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毛委员接到后，让秘书处立即找人抄清，秘书处经过研究决定由我完成这项任务。这份决议原写在很薄很窄的竹纸上，（竹纸是以竹子为原料特制的，可以折叠易于携带便于藏匿）字很端正，但字体很小，是蝇头小楷。接到任务后，我立即认认真真地用正楷腾清了一份。毛委员过目后，即请谭政、欧阳毅、孙开础等同志刻蜡板油印出来，向大家传达。现在看来，六大虽然也有缺点，但它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把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确定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把“左”倾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对以后党的工作产生了深远的积极的影响。

后来，我听说袁文才、王佐被错杀，感到十分痛惜。袁文才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党员，王佐也在 1928 年入党，他们帮助红军在井冈山落脚，并主动要求红军派干部去帮助他们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也很尊重派去的干部。我们在其部队发展党员，进行党的政治工作，建立士兵委员会等，都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持。经过党的教育以及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袁文才、王佐经历了许多次战斗，作战勇敢，逐渐成长为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他们虽有缺点错误，但不坚持错误，仍不失为优秀的共产党员、杰出的红军指挥员。袁文才、王佐二人被错杀，是左倾错误的恶果，应引为深刻教训。1950 年，袁、王被迫认为烈士。我们永远怀念这两位对建立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革命先烈。

时隔五十九年，于 1988 年 5 月，我重返井冈山，怀着追往忆昔的心情遍访当年战斗过的地方，瞻仰革命先烈的陵园，还专门看望了袁文才、王佐两位烈士的后代，王佐同志的儿子那年已经六十七岁了。

第三章　下井冈，风雪山路长

朱德、毛泽东会师后，又与彭德怀、滕代远同志率领的红五军会师。彭德怀上井冈山不久，便要把山中的重要哨口统统察看一遍。王佐派我陪彭德怀去通向湖南酃县的一个哨口，往返四五十里路。他穿着草鞋，背上一个包袱，一匹马和几个传令兵。一路上我们边走边谈。他问我是哪里人，怎么出来的？我告诉他，我在家乡搞农民运动，后来，参加浏阳工农义勇队，秋收起义后上了井冈山。他还问了王佐部队的情况。我把我所了解的关于王佐本人和王佐部队的情况如实向他作了反映。一路上四、五十里路，他一直没有骑马，只在察看哨所时休息了一阵，没有一点架子，还自己背包袱，我对他油然产生一种敬仰之情。

毛泽东、朱德、陈毅率主力转移闽赣边区
彭德怀、滕代远领兵下井冈

在周围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在毛委员的领导下，井冈山的斗争坚持下来了。但光有井冈山根据地不行，要向外发展。那么，究竟向哪里发展呢？是向广东发展，还是向江西发展？当时根本没有电台，连报纸也很难看到。到了县城，收集报纸了解情况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当时，了解到的情况是：湘南有何键，是地头蛇；广东的粤系是国民党嫡系武装，力量较强；江西倒是个薄弱环节，朱培德是云南人，江西部队又大多不是本地的，本地只有一些地主武装。因此，大家认为，相机向赣南、粤、闽边界发展比较有利。红四军总前委研究决定，井冈山只留下彭德怀的五军，红四军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转移，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实践证明：毛泽东决定上井冈山是伟大的，后决定分兵下井冈山同样是伟大的。当时的中国是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下的半殖民地，他们在中国培植各自的势力。他们互相之间有矛盾，我们就有可能利用这些矛盾，在党和群众的基础比较好，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毛泽东选择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建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在敌我力量发生变化的新情况下，毛泽东审时度势，又决定分一部分红军主力下井冈山向外发展，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也是完全正确的。

我到毛委员那里要求随部队一起下井冈山。毛委员开始答应了，说“可以”。以后，好些人都要求下山，这样就不好办了。于是，毛委员对我说：你还是留在井冈山坚持斗争，不要下山了。

1928 年冬，敌人开始重兵围剿井冈山根据地，敌人在黄洋界等地攻得很厉害，黄洋界失守了。我们的连守在通往遂川县的下庄哨所。下一步如何办？彭德怀用担架把受了伤的张子清请来，滕代远等也到会了。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一致认为，在敌人力量数倍于我的态势上，如果死守，与敌人硬拼，势必使我们受到更大损失。从革命的长远利益考虑，为了保存实力，应当尽快主动撤离，去开辟新的根据地。王佐也主张离开。于是作出了撤离井冈山的决定。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当时，五军总共不到一千人。但后方部队大，服装厂、留守处、总医院等，还有一批伤员。彭德怀、滕代远决定，将湘南籍战士临时组成一个连，指定由康健和我负责，还给了我们一个名义，叫五军特务连。行进时，特务连断后，作后卫。

彭德怀、滕代远率部下山时，正下大雪，走了一天一夜。王佐路熟，选了一条很少有人走过的路。因下雪，人们刚走过去，脚印又被大雪盖住了。

路很难走。遇到独木桥，马过不去，就把马丢了。山也陡得很，常常坐着向下溜。我们一天一晚没有吃饭，没有休息。到遂川大汾，敌人发现了我们，并在两边设下了埋伏。枪响了，前边部队走了，炊事员也走过去了，只有医院和后方留守处以及我们特务连被断在了后面。这时，只好由我们特务连来指挥。康健、我和医院的政委商量，由我们连先掩护部队上山再说。敌人未来追。此时，医院负责人和一部分湘籍战士主张回湘南打游击，我和康健则主张追部队。经过争论，意见未能统一。于是，部队分成两路，一部分朝湘南走，我和康健带着不足一个连的兵绕过敌人继续追赶寻找大部队。那几日，我们几乎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有一天，我们在山上走了一个晚上，天亮时，突然发现我们前方有一股国民党的部队，大概是去追击我们大部队的。敌人同时也发现了我们。两军对垒，打了一场遭遇战。我们的部队由于连日行军，饥饿、疲劳，又是临时凑合起来的，步调不够一致，队伍也不大听指挥，没有什么战斗力。结果，死的死，伤的伤，散的散。尽管我和党代表康健始终在一起，也不能控制局面。队伍被敌人打散了。最后，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康健、我、一位姓苏的司务长（衡阳人）。

战斗中与队伍失散
失战友，历经磨难

我们三个，每人一支手枪、一支步枪，还有些子弹。我们躲过敌人，走出了包围圈。去哪里呢？据调查，附近有一个地方群众基础较好。于是，朝那个方向走去，走了一天一晚上，天快亮了，找到一户人家。一位老人家对我们很好，让我们住下，休息，吃饭，还找个地方把枪藏起来。我与党代表住一处，苏司务长住在另一处。一两天，我们住在这里的风声就传出去了。

在艰苦的环境里与敌人进行斗争，养成了我们对异常情况有一种敏锐的反映。那天早晨，天刚刚亮，突然听到一群狗叫声。我们立即感到情况不对。狗咬军人的叫声与咬老百姓的叫声是不一样的。咬军队时发出的“汪汪”声虽然很狂，但那声音里免不了带着几分害怕和畏惧，而且是众狗相互壮胆似地遥相呼应地一齐乱吼。当时，我们判断是军队来了。于是立即起床，刚一出来，就碰上国民党军队。他们开枪了。我向山上跑，康健往山沟里跑。我们三个人就这样被敌人冲散了。那时我只有二十岁，只顾拼命地往山上跑。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赶，可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不知道往哪里去？没有人商量，也不知道与什么人联系。我急得无所适从，可急又有什么用呢？我想回村里看一看，又怕出问题。正在我急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发现山沟里有一缕青烟，我便悄悄地向青烟升起的地方摸去。下去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党代表康健蹲在那里烤火取暖。一见他，我喜出望外，高兴极了。我埋怨他说：“你点火多危险！”我们急忙把火给熄灭了。我俩商量，不能回头，唯一的出路还是去找部队。

我们休息了一会儿，找到了一家老百姓，买了点饭吃，想住一晚再走。可是，这家老百姓不同意留我们。我们也不愿意连累他们，便不顾疲劳地向前继续走去，指望前面能有个借宿处。可是，一直走到黄昏，也不见一户人家，倒是有一间无人居住的堆草房。我俩便钻了进去。我们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冻得直发抖，想烧点草烤烤衣服。可是，草也是湿的，点不着，身上带的几根火柴也用完了。又累又饿，再也走不动了，只好呆在屋子里，两个人依偎在一起，坐了整整一个晚上，硬是用我们俩的体温把各自的棉衣烘了个半干。第二天起来，又继续在雪地上走了一天。因为有了前一天的教训，我

们一路上多拣了些干柴禾，碰上人便多要几根火柴。听人说，那边山上有野兽，我们烧点干柴禾，野兽见到火光，便不敢来了。

我们到了一个比较有钱的人家。我们便编了一套事先准备好的话，对他们说，我们是出来做买卖的，被人抢了，现在想借地方休息休息。实际上人家看得出来我们是当兵的。正巧赶上那家人闺女出嫁，我们找去时，他们正在宴请宾客。人逢喜事，总是好施乐行善的。那家人客客气气地招待了我们一顿。我们睡了一觉醒来，康健的脚肿得无法落地了。我一看，是冻伤了，已经发了炎。我们请求主人让我们住一宿，主人表示为难，说世道乱，家里不好住。我们没有办法，谢过主人，付了大洋，又继续上路了。

我下决心背着康健走。背一阵，放下休息一会儿再背。走了十几里，精疲力尽，实在背不动了。路上碰到个老百姓，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怎么回事。我还是说，出来做买卖，被人抢了。由于天冷，康健的脚冻坏了。那人很同情我们，并说，脚可以治。我问：“是否可以到你家去？”他说不方便，但答应带我们到山上的一个人家住下来，还可以给我们送药。那是一个造纸棚，很少有人来往。后来主人来了，我们说是做买卖的，脚冻坏了，想先借住一下，把脚治好。主人允许了。住了一个礼拜，康健的脚伤有所好转，要求再住几天，人家不准。我们付了钱，就走了。身上带的钱全部用光了，怎么办？康健有点鹿茸，到药铺卖了几块钱，买了一斤肉，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临走时，房东问我们要什么？我们只要了两根棍子、篮子、碗，准备讨饭，以乞讨为掩护，继续找部队。

老康开始坐在地上，用两只手撑着向前移，以后拄着双拐，把脚吊着走。不敢穿军装棉衣，虽然天气寒冷，我们只穿着条单裤子，外面罩一件单长袍。就这样，我俩咬着牙，一直走到上犹。在上犹，碰到一个要饭老头，姓吴。我们想，这样年轻轻的要饭，没有掩护不行，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为了找个掩护，我们决定拜这个老头为师，找了一块红纸，包上几块钱给了吴老头，算是拜了师。跟着老头要饭，要来的分一部分给他。那时候，要饭也有好几个行当，不只一家，还分派。叫上面的人称师太、师祖、师傅。有许多行话，如狗称为“皮条子”，人称“马子”，碗叫“莲花子”。我们学了一阵子，还逐渐要到个小铁锅，一个竹筒子，油、盐这一套东西也渐渐有了。之后，我们讨来便自己做，比过去卫生一些。

到了赣州，那里驻守着国民党一个旅，我们不敢进城。我们到处打听我们的部队在哪里。可是，怎么也打听不到下落。我们住在一个烧过砖的旧窑里。康健有肺病，得想办法弄点钱给他抓中药。那时，有人找要饭的去摇橹，从赣州江边放木排到峡江。没涨水时管饭，涨水时摇橹。我们俩都报名去摇橹。到了峡江，两个人合起来搞了七、八块现洋，上岸找中药铺、找医生，为康治肺病。医生不好找，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个医生。他不大愿意管，只简单地问一问病情，马马虎虎地开了个药方。我们买了药，每天熬；我出去再要点米做饭，想治好他的病再走。就这样吃了几天药，但康健的病情一直未见好转。每天晚上我都问问他的情况。有一天，天快要亮的时候，我隐约地听到他哼了几声，便急忙唤他。他不吭声……

他死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他死了。可他的确是死了。失去了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我难过极了，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可又不敢放声大哭，我呜咽着……

我只得按当时的习惯找到那里的慈善组织，恳求他们把康健埋了。我把

剩下的几块钱也全给了他们，立了个碑，怀着沉重的心情向战友最后道了别，仍然带着乞讨的工具继续找党找部队。

反动势力猖獗，一年之间连失三位亲人

历尽了千辛万苦，仍然没有找到部队。相依为命的战友也去世了，下面的路还怎么走呢？这样漫无目标地继续找下去是不行了。于是，决定先回家去，等打听到消息后再想办法。

峡江与我家只是一县之隔，过了文家市就是我的家乡了。主意定了，我便一路乞讨往家里走。走到万载附近，碰到两个玩蛇的人。身无分文，总得糊口吃饭吧，于是便拜了这两个玩蛇人为师。每天的任务是给蛇喂食，给蛇洗澡。开始接触到蛇还是很害怕的，不小心便有可能被蛇咬了。可蛇这种小动物还是很有灵性的，时间长了，渐渐的与蛇混熟了，它也不咬我了，而且十分听话。我本想弄点蛇药再走。可 是师父说得等一年以后才能交蛇药给我。时间太长我不能等了。便谎称家里有个姐姐，生活很困难，我要早些回家去看看，个把月就回来。见师父没有说什么，我就自己走了。

我带着一条蛇向家乡方向走。一路上，也得亏了这条蛇，否则我很难通过敌人的盘查。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讨饭的聚在一块歇息。有个保安队来了要盘查。不知为什么，敌人觉得我不太像要饭的，便要强行搜查我的包。我说，你们不要乱动，他们不听，反而更怀疑我，可他们把手伸进包里去，突然抓出一条蛇，吓的吱哇乱叫。

回到家里，三哥说，这条蛇是你的救命恩人，应该把它放生了。于是，我们便一起把那条蛇放到了我家屋后的山上去了。

那时候，红军撤走了，国民党的反动势力十分猖獗，到处捕人，抓共产党，清剿红军。每天都有人被抓、被枪毙。听说，有一家，因有共产党嫌疑，除了一个孩子和老太太幸免外，其他统统被国民党给杀害了。在白色恐怖下，我不敢走明路，白天目标太大，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天走进自己的家门，只好赶在三更半夜才去敲门。家里的房门关闭的紧紧的，敲了半天，三哥才把门打开。一见是我回来了，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抱着我便痛哭流涕。原来我离家不到一年的时间，家里发生极其悲惨的事，我接连失去了三个亲人。三哥哭着向我诉说：妈妈去世了，大哥惨遭敌人的杀害，二哥也死了。……

这个不幸的消息，对我如同是雪上加霜，部队没有找到，如今回来又家破人亡，这个世道对我来说真是太不公道了。我痛苦到了极点，悲恸地痛哭了一场。我暗暗下定了决心，一定要为大哥报仇，让九泉之下的亲人死也瞑目，我一定要坚持革命，一定要找到共产党，回到红军的队伍里。然而目前唯一的办法是弄清情况，等待时机。

我们家靠在山边上，是个独立的院房。过去有一个规矩，女人的房子别人是绝对不进的。就这样，我一直躲在原先母亲住的房间里，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这段日子，我与家里人一起做花炮引线，挣点钱勉强维持着生活。同时，我注意的打听着，哪里有共产党活动的消息。那时间里，由于敌人丧心病狂的杀戮红军，杀害共产党，党的活动很少，许多党组织被破坏了。我也东躲西藏在亲戚们家里，但到哪里也不敢多住，那时谁家的日子都很困难，都不好过，到哪里我都自带粮食。

后来，我终于打听到熊振华在广东，在军队里当连长，便决定到广州去找找他。心想，即使找不到熊振华，也可以找到宋克若，人家告诉我宋克若随着她的女婿去了广东。

要去广州，首先得准备一身衣服。家里哪有钱呢，我讨饭回到家里，分文没有，带回来的只是一身又脏又臭又破烂的衣服和满身的虱。第二是没有路费。那时借钱很不容易，费了很大的周折，向一个皮匠（原来也是党员，后来不干了）借了二十块现大洋。半夜起身，乘天没有亮便悄悄地离开了村庄，我一个人又一次离开了这个饱尽沧桑的家。

路上还算顺利。坐了一小段汽车，主要是走路，当时火车还不通。我同一批盐贩子一路走着，到了乐昌，住在一家盐店里。我说要去韶关到广州，他们说蒋桂正在打仗，过不去。有人出主意让我到上海坐船去广州。哪里有钱去坐船呢？结果，我只好又往回返，想去郴州一带找关系。

到湘南找到了过去参加过暴动的一个知识分子。一问，才知道我们的党现在没什么活动了。快过春节了，我身上钱又不多了。于是我买了几双线袜、几条毛巾，提着篮子做小买卖，用这作掩护，边走边打听关系。每天只赚一两毛钱，刚够吃饭。

走来走去，找不到关系。有一次，在一个饭店里，一位老太太说我不像个做买卖的，而好像是搞什么特别事情的。我看她也好像是过去搞过革命活动的人，便反过来向她打听过去参加湘南暴动的人的情况。她也说现在找不到什么人了，都不活动了。

我继续往回返。到了醴陵，碰巧遇到国民党部队招兵，是唐云山独立十五旅。因为程子华同志从这个部队里拖走近一个团，兵员减少了。我灵机一动：跟着他们，与红军打仗时我可以想法找到部队；而且眼前吃饭问题也可以解决了。

我找到一家茶馆，吃了点东西，好好想了想：用什么名字？用原来的名字是不行了，用现在改了的名字也不行！是否要保人？要的话，怎么办？……

我进了招兵的旅馆，老板问我要什么房间，我说是报名当兵的。他就把我介绍给了招兵的。招兵的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答叫宋固。他约摸我有点文化吧，就收下了我。一两天后我便作为国民党新招的兵随他们出发了。

到长沙停了一个晚上，洗了澡。又到武昌。我被编在左旗，独立十五旅第一团第一营第二连第七班，我们搞了一个多月的新兵训练。并在这里过的春节。

我学生出身，基础还好：立正、稍息，比一般新兵作得好些；还代士兵们写家信，与大家的关系处得比较好。

许多人怕去河南，听到传说要去河南，开小差的不少。从武昌到汉口上船后，又听说去九江，我心里很高兴。如果能与红军交上火，我便有机会找到自己的部队。

我们经九江到南昌，我更加高兴。后来我们的车又一直开到新淦（今新干）县，正式宣布要“打共匪”。

一进根据地，就看到红军的布告，署名是军长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还有“穷人不打穷人”等标语。看了这些标语，我心里砰砰直跳，十分激动。

头一天，在水南，红军三个纵队把国民党部队的第一团消灭了，一团残余部队向我所在的敌二团靠拢。快到中午时，敌二团出发准备打仗。我们营长同团长的关系特别好，因此，被作为预备队，打仗在后头。排长见我还机灵，有文化，要我给他当传令兵，这样便比较自由，当时我二十一岁。

快天黑了，部队被消灭得差不多了，眼看红军就要上来。我所在的国民

党部队慌忙缴枪、逃散。乘乱时，我对十多个残兵说：“我在红军有熟人，你们跟着我，保证生命安全”。于是，我就组织这些人向山上走，准备去向红军缴枪；我一边走一面向这些人做红军的宣传工作。那些人起初有些怕。我说：不用怕，保险不杀。走近时，有红军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立即回答说是缴枪的。我立即带着前去的人把枪缴了，子弹也全交了。

重新找到红军找到党
老战友再度重逢

这部分部队恰恰是红军的第三十一团。我们走近时正见到高自立站在高处给红军战士讲话。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情绪，对着高自立大声的喊着：“高自立！”“你是哪一个”因为我来的突然，又穿着国民党兵的军服，他一下子没能认出我。

“我是宋任穷”

“老兄，你这是怎么搞的？！”高自立这才认清站在他面前的我，十分惊讶。

“我是带人交枪来了。”于是我便把自己的遭遇以及从井冈山与部队失散后，如何寻找部队到为什么当国民党兵的情况，一一向他作了汇报。他兴奋的把我领到七支队，这个支队便是我以前在过的七连，原连长周昆现任大队长，欧阳健任政治委员。我们三个老战友又见面了，故友重逢，真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当晚，我们三个便住在一起，那时大家都在山上露营。我们都很激动，我十分委屈地向他们讲述了与他们失散后的遭遇，他们也详细地给我讲古田会议的精神，以及我们分别以后队伍是如何打仗的等等。那夜，我们三个人谁也没有一点睡意，整整谈了一夜。

后来，部队开了俘虏兵大会，大会由政治部主任主持，朱德军长讲了话，也安排俘虏兵代表讲话。当时，组织上经研究决定，让我这次也作为俘虏兵代表在大会上发言。那时国民党军队的兵大多是被抓夫的贫苦农民。经过工作，不少俘虏兵提高了觉悟，表示愿意反戈一击，留下当红军。

第二天，他们又送我去纵队政治部。到了那里，我的熟人更多了，孙开础、邓华、谭政等。张际春、罗瑞卿听说我回来，都纷纷来看我。后来向党组织我把自己离队后的一切情况详详细细地作了汇报，讲了井冈山失败后失去联络的经过，请求审查。审查也不难，可以向我带过来的十多个人，调查我在国民党部队里的表现；另外，从井冈山下来的原来部队的同志，好多现在也都还在。

孙开础负责审查。他说先工作，让我到宣传科当干事。谭政任科长。过了一段，谭政调任政治部主任，我代科长，下设三个支队宣传队。

审查了一个多月，孙开础找我谈话，说已经审查清楚。不久，就恢复了我的党籍。

又过了几天，组织上又决定调我到三纵队第九支队二十五大队当政治委员。这正是浏阳出来的队伍。到那里，班排长与我原来就熟，我带过来的一些俘虏也在那儿。当时上级还专门派人向部队介绍我的情况。因为当时我们部队里补充的俘虏兵不少，怕他们对我不服气。来介绍的人反复的说明我是当年的老红军了，在井冈山就参加了红军的队伍，那些俘虏兵才服气了。

九支队的支队长是张宗逊，政治委员是朱良才。原来同我一起出来参加革命的人都在支队（营）、纵队（团）一级，而我还在连一级。他们对我都很关心。在这里打了几仗。此时，立三路线开始了，提出打南昌、打长沙。

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大队都比较能打仗。打长沙前，三纵队改为十二军，军长伍中豪，政委是谭震林。一纵队改为第四军，军长林彪，政委是罗荣桓。在打长沙的路上，打安福县战斗中，伍中豪牺牲了。副军长罗炳辉接任军长。

1930 年打开吉安后，我调到三十五师一〇四团。这是个小团，团长粟裕，我任政委。粟裕同志比我年长，政治、军事方面都强，也能团结人，我们合作得很好。后来，粟裕调任师参谋长，石金山接任团长。

1931 年底，在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影响下，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的率领下，于江西宁都举行起义。起主要作用的是赵博生。他在二十六路军当参谋长，没有什么权，还不如一个军长；蒋介石还想利用同共产党的红军作战之机消灭或削弱这些杂牌军；同时这些人也有抗日要求。那时，赵博生已经是共产党员，二十六军中也有了共产党支部，有刘振亚、王铭武、袁血卒同志等十多名党员。赵、董牵头，季振同联络团长黄中岳参加，一万七千多人起义。没有季振同的作用，就不可能把部队全部拉出来。季振同是有很大功劳的。后来改编成第五军团，军团长是季振同，董振堂任副军团长，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共三个军。

五军团这次暴动，是人数最多的一次。1930 年程子华在湖北领导阳新、大冶暴动，那次才一千人左右，过来后成立了八军。上海党中央《红旗》上称作“模范兵变第一声”。而宁都暴动，一下子过来一万七千多人，而且武器好，能打仗。

后来，季振同、黄中岳二人因有通敌的嫌疑被免了职，董振堂任五军团的军团长，肖劲光任政治委员。十五军是季振同、黄中岳的老底子，左权任军长，我调到那里任四十四师一三〇团政治委员，团长是刘振亚。

毛泽东天才的军事指挥艺术

粉碎蒋介石的三次“围剿”

1930 年 10 月，蒋介石调集 10 万军队，在江西省长鲁涤平指挥下，对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的红一方面军进行了第一次“围剿”。敌人低估了红军力量，想“长驱直入，分进合击”一举歼灭红军。总前委会一致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我红军大踏步战略撤退，使进剿之敌三次扑空。待敌人疲惫不堪时，我则实行反击，五天打了两个胜仗，歼敌上万人，活捉了国民党“围剿”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

第二次“围剿”，是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指挥发兵 20 万，敌人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办法。敌我双方对峙很久。我红一方面军以优势兵力，先打弱敌，从富田打开缺口，然后由西向东，各个击破。对战斗力比较弱的公秉藩、王金钰两个师进行包围歼灭。我军横扫七百里，歼敌三万多，从富田一直打到建宁。这一仗打得非常艰苦，也打得非常好。我率领的三十五师一〇五团的任务是带一部电台，从敌人后边绕上去。

取得了两次反“围剿”的胜利之后，蒋介石气急败坏，亲任“围剿”军总司令，开始了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以非常快的速度长驱直入；我们没有估计到他们会来得这么快。毛泽东在黎川召开前委扩大会，除军团长、政治委员以外，要一个基层干部参加，组织上决定派我去。我作为团政治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会议确定继续采用游击战的办法同敌人周旋。我们熟悉地形，处在暗处，敌人到了陌生地段，处在明处。要利用这个优势，避实就虚地同敌兜圈子，相机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这次“围剿”，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加上广东的蒋光鼐、蔡廷揩

诸部，一下子插到我们的苏区。毛主席指挥打了几个圈子，在兴国的高兴圩、老营盘等地歼敌四万三千余人，缴枪两万余支。当时已成立了一军团（辖四军、十二军）、三军团（辖三军、五军、六军）。在高兴圩，一军团首长让我团抢上一个山头，占领山下小河中的一个亭子，把敌人切断；以便一、三军团主力分别在高兴圩、两营盘歼灭敌人。

我们跑步上山；敌人也在从另一面上山。团长石金山带领我们四个连在山上与敌人打了个遭遇战。我们集中火力一下子，把敌人压了下去。这时，团长牺牲了。我立即下命令：一连长代理团长。可打了一阵子一连长又负了伤；二连长接着上。后来二连长也负伤了。三连是预备队。我说，三连长不能上，我自己兼连长，继续打。

天快黑了，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只有消灭这股子敌人，保住阵地，才能下去。为此，我把机枪连布置好，作为正面主力；让三连采取两面包抄的办法压下去。三连执行了命令，我们从两面压下去。那次战斗敌人除少部分逃跑外，基本被消灭了。三连最后也只剩下十八个人，干部只留下一名副排长。我还记得，这位副排长姓邓。尽管伤亡很大，可我们完成了战斗任务，巩固了前沿阵地。

这是很硬的一仗，没有全部消灭敌人，倒牺牲了我们十一师师长曾士娥。

这一仗后，我们撤离阵地休息，敌人又尾追过来。我们熟悉地形，处在暗处；他们在明处。我们看得见他，他却看不到我们。我们一会在这儿，一会在那儿，转了几下。最后在兴国的一个地方我们消灭了韩德勤一个师。到此，第三次“围剿”基本粉碎了。

三次“围剿”期间，在上海的党中央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代表团到苏区。这是中央到苏区的第一个代表团。上级决定这个代表团在第三次“围剿”中随我所在的三十五师一起行动。

博古、李德排斥毛泽东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三次反“围剿”后，博古这些人来了，中央召开了第六届五中全会，会上博古、李德排斥毛泽东，不让他指挥军队，只让毛泽东同志当个苏维埃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张闻天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军队由博古和李德亲自指挥。

五中全会后，毛泽东同志就离开部队，去搞社会调查

了。军队的事他不再过问。四次反“围剿”，还是毛主席的那一套打法，所以打得还是好的。歼敌五十二、五十九师，俘虏敌师长陈士义。

到了五次反“围剿”，就不行了。博古、李德用自己的一套来指挥打仗，他们首先批判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是“游击主义”，当时批罗明路线，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其实都是为了整毛泽东同志。他们要打正规战，把许多好的东西都作为“游击主义”来批，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说得一无是处；说什么军队哪里有“打仗、发动群众、筹款”这三大任务？军队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打仗；他们还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寸土必争”。针对敌人的“堡垒战”，毛泽东同志主张打到敌人后边去，使敌人堡垒不起作用；但他们却要搞“短促突击”，以堡垒对堡垒，打阵地战。五次反“围剿”中，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博古、李德则认为这是第三条道路，不是革命的。毛主席当时主张联合蔡廷锴、蒋光鼐反蒋，并

主张红军打出去到赣东与方志敏策应，都没有得到支持。那时，我已调到五军团第十三师任政治委员，陈伯钧是师长。我们五军团有三个师，除我们十三师外，还有十四师，师长程子华；十五师，师长肖华，是少共国际师。我们十三师是主力师。

博古在苏区搞所谓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撤了我十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调任五军团政治部民运部长。同时被撤的还有十三师政治部主任赖传珠同志，他被调到一军团任一个团的政治委员。我任五军团民运部长后，没有警卫员了，我此时正好手腕脱臼，行动处事都很不方便。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为人很好，他有两位警卫员，我每次外出时他总是让给我一位，他还帮助我解决了不少的困难。

第四章　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 年，我从五军团调到瑞金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学习。这个科是训练军队高级干部的，学员不多，不过一、二十人。现在记得的有程子华、张宗逊、郭天民、杜中美、袁良辉等同志。长征开始前夕，成立红军干部团，我被调到该团工作。

长征开始，成立红军干部团；突破四道封锁线

1934 年 10 月，我一方面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长征。出发前夕，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所红军干部学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这四所学校是：红军大学（又名赫西斯大学，以在广州起义时牺牲的苏联赫西斯烈士的名字命名）；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又名彭杨步兵学校，为纪念彭湃、杨殷二烈士而命名）；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又名公略步兵学校，为纪念黄公略烈士而命名）；特科学校。中央军委任命原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同志为红军干部团团长，我为政治委员。参谋长是钟伟剑同志，遵义会议以后为毕士梯同志，又名杨林，朝鲜人。干部团下设四个营和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

按照原来四所学校的性质，彭杨、公略两所步兵学校编成三个步兵营，一营、二营培养连排长干部；三营培养连政治指导员；四营是特科学校编成的特科营，培养炮兵、工程兵、机枪干部；红军大学编成上级干部队，培养营团军政干部。四个营的干部是：一营营长李荣，政治委员丁秋生；二营营长黄彦斌，政治委员苏启胜；三营营长林芳英，政治委员罗贵波；四营营长韦国清，政治委员黄金山。上干队长肖劲光，政治委员余泽鸿。四个营和上于队都设有军事教员、政治教员和文化教员若干人。全团共一千多人。

干部团随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行动，归叶剑英同志直接指挥。我们这个团的学员都是从部队选调上来的、有战斗经验的班排长以上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保卫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必要时也参加一些战斗。因此，我们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尽量利用行军宿营或部队修整的间隙，对干部进行训练。如进行过遭遇战、伏击战、强渡江河、穿插迂回、袭击等军事科目的训练。由于连续行军疲劳和战斗频繁、紧张，这种训练时断时续。可以说，干部团既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所培训红军党政干部的学校，长征途中陆续为部队输送了一批干部。遵义会议以后，部队进行了整编，中央把一些老同志送到干部团，由我们保护和照顾。如董必武、徐特立两位老同志，还有成仿吾、冯雪峰、李一氓等同志都到了干部团。毛泽东同志对陈赓同志和我讲：对董老、徐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

董老和徐老年纪比我们大得多，长征途中和大家一样同甘共苦，他们很少骑马，经常把马让给伤病员骑。徐老还常常照顾他的警卫员。大家对这几位老同志都十分尊敬、关心和爱戴。每次行军、宿营，我们都要认真检查，看看董、徐二老和其他几位同志到了没有，伺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如何等。

长征开始时，中央后勤队伍非常庞大，携带了大批行李、辎重，包括修械所、印刷所、X 光机医疗器械，还有不能用的大炮等，“坛坛罐罐”很多，活像大搬家。这些都由干部团等部队负责警卫、掩护。蒋介石得知红军转移，即调集粤、湘、桂、黔各省地方军和一部分中央军对我进行围追堵截，在湘

粤边界、湘南、湘江附近连设四道封锁线，企图全歼我军。在数十万敌人穷追不舍下，这种大搬家式的行军，不仅使干部团，而且几乎使所有战斗部队都变成了掩护队。部队庞大、累赘，行军速度缓慢，一天走不了多少路。为了隐蔽，经常夜行军，走山路。山间小道婉蜒崎岖，部队拥挤不堪，我们沿途处处被动挨打。疲惫、饥饿以及接连不断地与敌人战斗周旋，对我军是严峻的考验。就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广大红军英勇奋战，边走边打，从福建、江西出发，经广东、湖南，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于 1934 年 12 月初渡过湘江，到达广西境内。过湘江时，我军同敌人打了一个大仗，八军团被切断了，没有渡过湘江，伤亡很大，几乎全部损失了。在王明错误路线影响下，我军离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才短短三个月，已折损过半。

这时，毛泽东同志极力主张断然放弃长征出发时的原定计划，即一方面军到湘西与贺龙、任弼时、肖克同志率领的二、六军团会合。因为蒋介石已经觉察到我们的意图，调集了十几万大军等候在湘西。毛泽东同志主张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决定向川黔边境挺进。这样，可把十几万敌人甩在湘西，红军才能摆脱险境。这时，我军紧缩编制，丢掉了不必要的辎重，对主力部队进行了充实。这样做，我军有了转机，接连攻占了贵州东部的许多县城，于一九三四年底抵达乌江南岸。

架浮桥，强渡乌江；
遵义会议——历史的里程碑

干部团在贵州黎平休整后，经锦屏、施秉、黄平等县，跟随中央军委纵队抵达乌江南岸。在猴场附近举行了联欢晚会，迎接 1935 年元旦。次日，由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政治委员杨成武同志率领部队强渡乌江，准备抵贵州北部后，夺取遵义、桐梓。干部团奉命派出特科营工兵连参加搭浮桥渡乌江的任务。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江，两岸高山望不到顶。陈赓、韦国清同志亲自率领特科营工兵连，星夜急行军六十里，赶到江界河渡口，砍竹、伐木、扎竹排。由于乌江水深流急，河底石头大而光滑，桥桩难以固定，几次被急流冲走。工兵教员谭希林和何涤宙同志，对架桥很有经验，他们想了不少办法，最后用竹篓装石头，两个竹篓上下扣住，中间用硬木架成十字，捆绑结实后沉入河底，以此代锚，才固定住了浮桥。经过紧张战斗，终于克服了器材缺，工具少，军情急，时间紧的种种困难，把浮桥架到了乌江对岸。我中央纵队和各军团迅速渡过乌江，直下遵义。

在遵义，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会议对几乎断送革命和红军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进行了批判，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接着，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王稼祥同志从革命不断受挫中逐渐认清了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危害，对之产生了强烈不满。在遵义会议上，稼祥同志旗帜鲜明地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在关键时刻立了功。记得我军再次攻克遵义后，部队稍作休整，中央军委在天主教堂内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正式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那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志都来到会场，由张闻天同志传达。同志们听了传达后，一扫过去的疑虑和不满情

绪。个个称快，同声赞好！有的甚至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对吃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苦头的红军指战员们，这是激动人心的大喜事。从此，红军长征才从千难万险中找出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这时处在历史转折关头的红军，士气之高昂，信心之坚定，是前所未有的。

为了尽快摆脱几十万敌军从四面八方对我红军的围追堵截，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红一方面军展开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我军避实就虚，声东击西，仗打得非常机动灵活，经常出奇制胜。为了打乱敌人的部署，调动敌人，我们四渡赤水，围贵阳、逼昆明，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使他们对我们的去向捉摸不定，被我们调遣得团团转。这时，我们已经开始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

激战土城，再克遵义

四渡赤水期间，干部团直接参加打了两个仗。一个是在一渡赤水之前打土城，一个是在二渡赤水之后再克遵义。

前一个土城之战是恶仗。土城位于贵州西北部的赤水河畔。遵义会议以后，中央即决定红一方面军向黔川边境集中，准备在四川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汇合。这时，敌人为了阻止我军入川渡江，调集滇、川、湘、黔和蒋嫡系部队约二十万人，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企图歼灭我军。

1935 年 1 月 28 日，我军由遵义附近进抵贵州西北部的赤水一带。在土城枫村坝、青岗坡与敌人发生激战。首先由三军团、五军团投入战斗。当天中午，战斗异常激烈，干部团奉命增援，整个战斗由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同志亲自指挥，我们的对手是敌四川王牌军郭勋祺部和潘佐部，他们有六个团的兵力，装备精良，弹药充足，又依托坚固工事，占据有利地形，后援部队也上得快。在我军猛烈攻击下，敌一部被击溃。但是敌居高临下，我们只能仰攻。陈赓同志令特科营重机枪进行掩护，我团学员端着步枪向上冲锋。敌人打过来，我们打过去，有时同敌人进行肉搏战，打得十分激烈和艰苦。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干部团的同志们打得很勇猛、顽强，眼看攻到了郭勋祺的指挥部附近，但又被敌增援部队的炮火压了下来。我团又发动了几次进攻，均未奏效。一直打到黄昏，一军团一部来参战，但我阵地已经缩小，我军难以展开战斗。正在敌我僵持不下、难解难分之际，朱德总司令亲临战场视察，觉得再打下去对我不利，立即命令我军后撤。当天深夜，我军一渡赤水河，向南开往四川边境古蔺一带，暂时甩掉了敌人。

敌人怕我军向北抢渡长江，长江南岸沿线各城镇和渡口，早已陈重兵把守，被我甩在赤水河东岸的郭勋祺等部迅速追了过来。我军硬打不利，即由四川古蔺、叙水一带，移师转向云南东北部。阴历大年三十，我们到达云南扎西。除夕夜晚，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下了一夜，山山岭岭、沟沟壑壑，全被大雪覆盖。我军在扎西一带稍作休整。

这时，干部团上干队的政治委员余泽鸿同志，由中央决定调到四川开展游击战争。他是四川省长宁县人，曾在上海作地下工作。一九二九年，任党中央秘书长。我们在扎西分手后，他先后担任中共川南特委宣传部长、川南游击队政治部主任和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政治委员。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不幸牺牲，时年三十二岁。余泽鸿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我们都很怀念他。

干部团参加的后一个仗是再克遵义。我军到扎西后，遵义附近敌人兵力薄弱，我军又二渡赤水河，进占贵州桐梓县。中央军委指示，“坚决消灭娄

山关之敌，乘胜克遵义城”，并指示夺取娄山关，是“开展战局的关键”，“对野战军顺利转移至关重要。”

娄山关是遵义的北大门，位于娄山之巅，四面群山如剑，是川黔交通的险关要道。我三军团第十三团和一军团第一团攻克娄山关，击溃附近之敌。这天，我干部团奉命由桐梓出发，一天走了一百二十里，由上干队接替三军团十三团扼守娄山关。我团其余全部奔赴遵义城西南，与一、三、五军团一起，对蒋军周浑元部以及吴奇伟两个师展开激战。敌一部固守遵义城古羔咀西南端制高点老鸦山。在老鸦山战斗中，三军团十团张宗逊团长负伤，钟伟剑参谋长牺牲，只有黄克诚政委一人在指挥战斗。陈赓团长和我带着干部团刚进入阵地，便顶着打。我们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配合十团消灭了一部分敌人，敌残部撤退，我军夺取了老鸦山。一、三、五军团主力歼灭了遵义城内外的敌人，敌残部溃逃。遵义被我第二次攻克。这一仗俘虏敌人三千余人，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是长征以来遵义会议以后打得最漂亮、战果最大的一次胜仗。

土城战斗和再克遵义的战斗，打得都很激烈。在土城战斗中干部团损失不小，伤亡百十来人，令人十分痛惜。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有个优良传统，一向非常爱护干部，重视培养、训练干部。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是这样，在长征途中也是这样。红军干部团的成立，就体现了这种优良传统。以后，我就干部团在土城战斗中的伤亡较大一事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我说：“干部团的学员都是连排以上干部，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这样使用代价太大了。”毛泽东同志同意我的意见，非常惋惜地说：“对啊，对干部团的学员用是要用的，但这样用不行。以后要注意哩！”

四渡赤水，南渡乌江；急行 40 里，重架乌江浮桥

1935 年 3 月中旬，干部团在贵州茅台附近三渡赤水时，担任渡河两岸的警戒、掩护任务。我们按中央军委指示，先派出一个营到河西，掩护中央军委渡河后的行动安全。全军渡河后，我们即随中央军委行动。这时敌人向川南集中，以为我们要北渡长江，我们却改变以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来了个出敌不意，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了。渡乌江时，我们干部团走在后面，三营担任守乌江浮桥的任务，并按照指示，等待殿后主力五军团过江后即拆桥。当我们知道五军团已从另一渡口过江后，得到中央军委一位参谋拆浮桥的口头命令，把浮桥拆了。我们行军四十里到了宿营地。陈赓同志和我向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汇报了拆桥的事，朱德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也在场。他们听后十分焦急，把我们严厉地批评了一顿。

朱德总司令很少发脾气，这次很恼火地说：岂有此理！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五军团过江了，可是罗炳辉同志率领的九军团在后面，还没有过江呀！怎么能拆浮桥呢？这么大的行动，不请示报告，怎么就把浮桥拆了呢？

陈赓同志和我以及在场的三营政治委员罗贵波同志当即表示接受批评，并请示如何补救。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和刘参谋长指示我们，马上返回江边，重新架起浮桥。我们坚决保证，在天亮以前一定要把浮桥架好。

朱总司令说：桥架好后交给九军团，他们过河后拆桥。如果明天早晨七时九军团还不来，你们就拆桥。

我们连饭也顾不得吃，我带着干部团三营和工兵连，连走带跑四十里，急行军返回乌江边，天已经黑了。除少数人做饭外，其余的同志们砍竹伐木，

重新架设浮桥。经过紧张突击，在天亮以前终于把浮桥又架了起来。我们眼巴巴等到七点，互相对了对表，核准确实是七点了，九军团还没有来，我们便拆了浮桥。大家虽然忙碌一夜未合眼，又连续行军作战，十分疲劳，但丝毫不敢耽误。我赶紧带着三营和工兵连拼命追赶已经走远了的队伍，追了两三天才追上。后来才知道，由于当时不断行军打仗，敌情变化快，部队无法停下来架线进行电台联络，中央军委一时和九军团联系不上。九军团为了迷惑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过江，和敌人周旋，未能赶来渡乌江。取得联系后，中央军委电令他们留在江北作为特别游击支队，转战黔西、滇东北一带，以后在云南会泽、巧家一带渡过金沙江与大部队会合。

甩敌人，强渡金沙江
巧伪装，枪占皎平波

我红军主力渡过乌江后，为了迷惑敌人，曾虚张声势，佯攻贵阳，掉转头又直逼昆明，目的是调动敌军远离金沙江，准备挥戈渡金沙江北上。敌军乖乖地听我调遣，蒋介石坐镇贵阳，麇集了邻近数省的敌军，连滇军也赶来驰援。我主力却由贵阳以东神速掉头向西，与东来援贵滇军背向对进。四月下旬，我军进至昆明城下，国民党云南方面，因滇军主力东调，十分惊慌，只好以民团守城。

在向云南进军的路上，毛泽东同志的工作十分繁忙，很疲劳，为了多睡一会儿觉，他经常走在后面，不少时间同干部团一起行动。有几天连续下雨，有时大雨滂沱，河水浊浪滚滚，汹涌澎湃。毛泽东同志骑在马上，在雨中徐徐而行。他有些忧虑，对陈赓同志和我说：现在，我们先后把敌人的主力吸引到了贵阳和昆明，这便于我们采取突然行动，神速地抢占金沙江渡口，全军渡过金沙江，把敌人甩得远远的。这几天的雨下得不好啊！河水上涨，怕要影响我们渡江哩！

这时，我们才知道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我军甩掉敌人，抢渡金沙江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当时，国民党已集中七十个团以上的兵力向我追击，而金沙江两岸敌兵空虚。我们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决策很拥护，对毛泽东同志用兵的高超艺术十分钦佩。北上抗日，这是我们久有的热切愿望。这一愿望不久就能实现，曙光在前，我们心情激动，精神振奋。

那些天，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亲自研究渡江计划，并亲自进行指挥。

4 月 29 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的指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我主力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立即挥戈北指，分兵左、中、右三路，平行向金沙江急进。一军团在左，经武定、元谋抢占龙街渡；三军团在右，抢占洪门渡；中央军委纵队居中，抢占皎平渡。五军团仍然殿后掩护。

五月二日，中央军委总司令部指示：令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率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带电台一部，“赶于四号上午到皎平渡架桥”；三军团十三团，“亦限四号上午赶到洪门口架桥”；一军团先头团，“限四号午前到达”龙街，并伪装成敌军抢占渡河点两岸，抢获全部渡船。

皎平渡位于四川会理县和云南元谋县交界的地方，是金沙江的重要渡口之一。干部团的同志们知道，这一仗至关重要，是关系我军安危的一次战斗。我们刚赶到云南禄劝县北部的一个小山村里，周恩来副主席和刘伯承参谋长一起来到干部团，非常详细、具体地部署我团抢渡皎平渡的计划。周恩来同志在指示中，除了强调有利条件外，也指出了种种困难，甚至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假如在抢占渡口后，我军后续部队跟不上，渡口又被敌人占

去，那么，渡过江去的先头部队就会被切断，那就要准备独立作战，打一段时间的游击，以后再设法取得联系。为加强对抢渡金沙江战斗的领导，由刘伯承同志担任先遣司令，直接指挥干部团。

我和陈质同志商量，以三营为先遣营。该营营长林芳英，政治委员罗贵波，副营长霍海源，共三个连加一个工兵连。我同刘伯承同志一起随先遣营行动，任务是当天急行军一百六十里，用一切办法抢占皎平渡渡口，消灭驻守敌人，迅速收集沿江船只，组织架桥，以便后续部队强渡。陈赓同志率两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和上于队为后梯队，当天，行军百里左右，即在中途宿营，保持体力，准备第二天渡江后继续前进。他们的任务是抢占渡口以北四十里的通安州，消灭四川西昌、会理方向可能来犯之敌，掩护中央直属部队和五军团渡江。当天，干部团全体指战员集合，我们向部队做了简短、有力的政治动员，要求大家保证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意图，以及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坚决完成任务。同志们都清楚这次战斗对我军生死攸关，一致表示将不惜牺牲，去夺取胜利。

先遣营和后梯队同时出发。为了争取时间，出敌不意，先遣营一律去掉帽徽等红军标记，伪装成国民党部队，爬山越岭，强度急行军。对于沿途遇到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和民团等，都全部应付过去，不予理睬，留待后续部队去消灭他们。这样既可以尽快抢占渡口，又可以保持我军行动秘密，不被敌人察觉。因此，沿途行军精神集中，行动神速，没有战斗。

傍晚，我们到达离江岸渡口五、六十里处，这个地方叫沙老树，在这里稍作休息。路不好走，想找个响导。我们三营战士佯称国民党军队，抓到了一个肥头大耳的大胖子。

“你是干什么的？”我三营战士问他。

他说：“我是区公所的。靖卫团（地主武装）的团总让我到江边送命令，为了防备共军过江，把渡船都烧掉。”

这个情报很重要。三营马上派人把这个大胖子送到刘伯承同志和我这里。大胖子向刘伯承同志鞠了一躬，毕恭毕敬地说：“长官，从哪里来？我是区公所秘书。”

伯承同志说：“红军快来了，我们要赶到江那边去！”

大胖子说：“红军虽然离这里还远，为了防备红军在这一带渡江，我刚接到上级一纸命令，把我区沿江所有船只全部迅速烧掉，以免被红军利用。”

我们急忙问：“烧船的命令发下去了没有？”“船烧掉了没有？”

他说：“没有。我正要去江边办理这件事，命令还在我手里哩。”

我们问清了情况后，就明白告诉他：我们就是红军，现在就要船。并且严正警告他：“要是渡口少了一只船，拿你是问！”

这个胖家伙霎时大惊失色，呆若木鸡。我们命令部队押着他一起走。

当地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军队恨之入骨，我们稍做工作，便纷纷主动向我们提供情况，给了我们许多帮助。从他们口中，我们得知，渡口对岸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队驻守，只有一处收税的关卡叫厘金局，还有一个保安队，不过几十条枪。这样，一个连的兵力就足以收拾他们了，过多部队反而施展不开。群众还告诉我们，皎平渡渡口南岸正停着两只木船。

当时，决定三营一个连为先遣连（先遣连连长是肖应棠同志，他在抢渡金沙江的战斗中表现很勇敢，是有功的。肖应棠在以前的回忆录中说先遣连属二营，这是他记忆有误）。我和罗贵波同志都清楚地记得，先遣营是三营，

而不是二营。刘伯承同志立即命令先遣连轻装前进，猛扑江岸，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船只，控制渡口，强行渡江；三营的其余两个连和工兵连就地做饭，随后迅速跟进。

我马上派罗贵波和霍海源同志率先遣连直扑江边。约半夜十二点，他们抢占渡口成功。立即利用找来的两只船，把一个排送到江北岸。因为我军行动神速、隐蔽，敌人完全没有料到来得这么快，因此毫无准备。我先遣连渡过金沙江到对岸厘金局时，里面正在砰砰啪啪打麻将。当地群众领头去叫门，说是来纳税的；他们正玩得热闹，有人吆喝道：深更半夜来纳税，不开门，明天再来！

群众向来十分痛恨厘金局，上去一脚把门踢开。我们的人进去，缴了保安队的枪，没收了厘金局的全部税款，完全控制了渡口两岸。我军干净利索地抢占了皎平渡渡口，无一伤亡。

得到先遣连胜利占领渡口、消灭敌人的报告时，刘伯承总参谋长同我正骑在马上，在黑夜里行进。他一边走，一边极其兴奋地对我说：同志们今天走的这个路程是一百六十里。这样难走的山路，又是黑夜，人一天怎么能走这样的一百六十里哪？可是，我们走到了，不仅走到了，还过了一条江，打了一个胜仗，消灭了敌人！其所以能够如此，靠什么？主要靠政治，靠同志们的高度政治觉悟，靠我们的党，靠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靠群众。没有这些，就根本做不到！你说是吧？

我同意地点点头，回答说“是这样”。

刘伯承同志讲这些话的时候，高兴的神情，愉快的语调，表现出他对党，对红军广大指战员和劳动群众的极其深厚的感情。刘伯承同志的作风非常深入细致。他对先遣营的整个行动，从作战计划，途中找向导，直到很小的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到，布置得很周密。这对先遣连以及整个先遣营胜利完成任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这次袭击金沙江皎平渡渡口的成功，还归功于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英勇无畏，归功于当地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和有力支援。

我们边走边谈，很快到了皎平渡渡口，这时天已经亮了。我们除了向通安州方向派出前哨连执行警戒任务外，便立即一面继续收集船只，一面准备架桥。金沙江江面虽不很宽，但水深流急，既不能徒步涉水，又无法架桥，只能乘船过江。当时只夺得两条船，哪里够用呢！寻找船只成为我们的后续部队能否渡江的关键。我们发动群众赶快收集沿江船只。在群众帮助下，我三营在二、三十里的江岸边，文找到了四只破船，我们好高兴啊！马上组织人力进行了修理，连同原来渡口的两只，一共有六只船。这时，我们向朱德总司令发电报告：“皎平渡有船六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以后经仔细寻找，我们又得船一只，共有七只。以后全军就靠这七只船渡过了金沙江。

皎平渡口七条船
渡过红军数万兵

干部团先遣营夺取金沙江皎平渡渡口是艰苦紧张的。陈赓同志率领的干部团后梯队主力夺取皎平渡以北四十里的通安州，既要由宿营地赶到江边，又要接着渡金沙江，过江后又强行军奔赴通安州，同敌人打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也是极其艰苦、紧张的。

通安州是一个不大的山地街镇，它居高临下，形势险要，占据这个高地，就可以直接控制住皎平渡渡口。当时，通过电报我们已经知道，进袭金沙江

的另外两个渡口——龙街渡和洪门渡的船只都被敌人烧掉，那里江面较宽，又有敌机轰炸，无法架桥，我军不能从这两个渡口渡江。全军都将由皎平渡渡江。因此，夺取通安州成为保护全军安全渡江的关键一战。

刘伯承同志和我是清晨到达金沙江畔的，陈赓同志率领干部团后梯队主力由宿营地赶到江边已是中午。

刘伯承同志命令：不惜一切牺牲，必须坚决把通安州拿下来，保证掩护全军安全渡江。

这时，我们还没有搞到七只船，为了迅速奔袭通安州，部队来不及休息，便立即组织分批抢渡。干部团除留先遣营守渡口外，大部分主力部队由陈虚同志指挥，渡江后强行军向通安州进发。

从江边到通安州，只有一条很陡很窄的山问小路，盘旋在悬崖峭壁上，有一段路面仅能容一人通过，一面临深谷，一面靠绝壁。陈赓同志带领干部团在进占通安州的中途，遇到一些零星敌人袭扰。敌人在山头上向我部队不时打冷枪，并推大石头往下砸，冲在前面的同志，有的中弹牺牲，有的被大石头砸伤。后面的同志机警地贴着峭壁、死角躲闪跃进，终于冲了上去。一到通安州，便与刚从西昌、会理方向赶来的国民党军队遭遇，敌人有一个旅共两个团和一个迫击炮连，由旅长刘元塘亲自指挥，而我军只有一个团，敌我兵力悬殊。双方都力图抢占通安州。于是，在通安州山顶小镇上，打了一场极其激烈的遭遇战。前头部队一打响，刘伯承同志估计到形势严重，立即命令我带先遣营三营全部，火速赶到通安州，同我团主力一起战斗。

刘伯承同志再一次强调说：这是一次关系重大的战斗，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敌人，占领通安州，保证全军顺利渡江。

任务重大、紧急，我们跑步，奋力前进，黄昏时分赶到那里，敌我双方正在激战，对峙着。陈赓、肖劲光、毕士梯同志都正在紧张指挥战斗。

毕士梯同志对我说：仗打得很大，刚才已打到街上去了，我们缴获了敌人的迫击炮。因敌我兵力悬殊，我们刚刚退了出来，敌人还没有消灭。

我传达了刘伯承同志的命令、陈赓同志和我再一次对于部团的同志们进行了政治动员。同志们斗志昂扬，纷纷表示死也要拿下通安州。由于敌人正面为开阔地，火力强，我们不便正面进攻。于是，我们决定二营在正面佯攻，把一、三营调到右翼包抄迂回，攻击敌人的左侧。全团上下行动迅速，坚决英勇，经过拼命争夺，我们占领了小高地，连续向敌冲锋，终于消灭了大部分敌人，生俘敌人官兵也相当多。敌人残部不支，向会理县城逃审，入夜，我军占领了通安州。

通安州战斗是皎平渡战斗的继续，这两个互相联系的战斗是一个战役。这个战役的全胜，为我一方面军安全渡江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我们占领通安州后，全团便在街上住下，掩护全军渡江。中央军委对我们干部团胜利完成抢渡金沙江的任务很满意，予以通令嘉奖。第二天，全团开了庆功大会。

我红军除少数部队从其他地方渡江外，大部约几万人都要靠七条船从皎平渡渡口渡江，组织任务十分紧迫繁重。为了加强对大军过江的组织领导，5月5日，中央军委组成以陈云同志为司令员、蔡树藩同志为政治委员的渡江指挥部，统一指挥全军渡江。

当天，朱德总司令来电指示：敌八日有到皎平渡的可能，为了避免被敌隔断或被敌两岸夹击的危险，部队务必不顾疲劳，兼程前进，“必须紧接过渡不得问断”。五日军委纵队已渡完，三军团“必须六号拂晓前开始赶到河

边渡河，限六号夜渡完”，“七、八两日为一、五军团赶来渡河时间”。

在渡江指挥部的指挥下，全军利用七只船，昼夜抢渡，秩序井然。晚上烧柴火和点汽灯，金沙江两岸灯火通明。江两岸高山耸立，是个狭长地带，敌机进不来，只能在高空飞来飞去，盲目丢几颗炸弹，并不影响我军渡江。虽然滇军跟在红军后头追，但因有五军团殿后，在顶着打，还有九军团在迷惑敌人，掩护我大部队过江。因此，经过几天几夜的连续抢渡，红一方面军的大部人马都从皎平渡过了江。

巧渡金沙江这一壮举，成为古今中外军事史上的奇迹。红军全部渡江以后，敌人的大队人马赶到金沙江南岸，渡江船只已被我全部烧毁，他们只好望江兴叹，徒呼奈何！他们所得到的仅仅是几只烂草鞋！我红军宣传队还为此编了一个叫《烂草鞋》的戏，在部队演出过。这个戏，热情歌颂了我军的机智勇敢和大无畏的革命乐观精神，尽情嘲笑了敌人的愚蠢和怯懦！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扼守安顺场，抢夺泸定桥
大部队强渡大渡河

干部团在通安、会理稍事休整后，继续北上，朝大渡河方向前进。国民党曾狂妄断言：红军过得了金沙江，过不了大渡河，共产党必踏石达开的复辙，会全军覆灭。

大渡河江面虽不很宽，但是水流湍急，河床里由上游冲下来的大石头很多，河里的漩涡一个接着一个，河水翻腾着，咆哮着滚滚流去，比金沙江凶险得多。两岸没有堤，沿河两岸一百多里全是悬崖峭壁，很少有老百姓居住。只是沿着河边有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其他地方几乎没有路。安顺场是大渡河的一个重要渡口，无法架桥，找到的几只船又太破旧，难以很快修复。为了抢时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果断决定沿江而上，抢渡泸定桥。毛泽东同志的部署是：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同志率领，从安顺场继续渡河，再沿河东岸北上；一军团二师和五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率领，从安顺场出发沿河西岸北上，两面夹河而进，夺取泸定桥。安顺场距泸定桥三百多里，中央军委要求我们的部队三天以内一定赶到。在大渡河东西两岸的红军，日夜兼程向泸定桥疾进，夜里打着火把行军。

5 月下旬，一军团首先抢占安顺场阵地，并对敌人实行警戒。26 日，中央军委命令我干部团接替大渡河沿河被我主力的部队占领的几个地方，担任警戒任务。五月二十七日，我团由洗马姑，经老雅贤、小水溪，开往安顺场方向，接替第一团在老铺子的警戒任务。经老雅贤留一个营，接替第六团的一个营在该处的警戒任务；经小水溪留警卫排，接替第二团一个连的任务，并接收、监护警戒任务所在地附近的大渡河船只，掩护已经渡过大渡河的一军团北上。我团留三营于河南岸守安顺场渡口，其余主力从安顺场过江，接过杨得志同志领导的那个团的防，扼守渡口。杨得志同志率部随刘伯承、聂荣臻同志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策应西岸北上的大部队攻占泸定桥。安顺场是个小镇，背靠峻巍的营盘山，面对咆哮奔腾的大渡河，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翼王石达开，就全部覆没在这里。我们干部团在这里坚持了两天，守住了安顺场和沿河接过来的警戒阵地。我主力部队抢渡泸定桥成功，大部队胜利过了大渡河。国民党断言我们要做石达开第二的妄想破产了！我们在完成掩护、堵住追兵的任务后，于三十日黄昏出发，追赶主力部队，向四川天全、芦山

前进。

六月翻越夹金山，
踏出雪山一条路

四川天全、芦山那一段更艰苦了。那里到处是灌木丛林和茂盛的杂草，有的地方还得通过原始森林。原始森林里因树木茂密，又有葛藤缠绕，我们边开路边前进。根本没有路，以后的所谓路，都是我们红军数万人的脚探着走出来的。过了宝兴，就看到高耸入云的大雪山，那就是有名的夹金山，海拔四、五千米，这是我们长征路上翻越的第一座雪山。那时是六月，山下天气很热，大家只穿一身单衣。可是，山上常年积雪，寒气袭人，又山高缺氧，爬山十分困难。行军时，有人先在前面探路，在路的两旁插上路标，否则，掉到雪谷里就出不来了。爬山时，大家互相关心，互相鼓励。宣传鼓动工作做得生动活泼，大大激励了同志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山上此起彼落，不时有人在喊：

“快走啊！”

“要走好！踩着前面的脚印走！”

不要坐下去呀！”

“走啊，不要停啊！”

“小心雪谷，不要掉进去啊！”

“同志们啊！鼓足劲儿来，一口气冲过这一段，翻过山去就好了啊！”

“啊……”

这些鼓动性极强的喊话声，回荡在夹金山山顶和峡谷，给同志们以力量和信心。大家冷得浑身发抖，张口喘着粗气，一步步艰难地往山上爬。不能停留，更不能坐下，因为一坐下，可能冻僵而死，永远起不来了。有的同志身体病弱，歪歪斜斜抉要倒下了，大家上前扶一把，这位同志得救了，革命又多了一个人的力量。这喊话声已过去整整五十多年了，每当回忆起红军长征过雪山的情景时，仿佛重新听到这喊声在耳边回响，心里总是热乎乎的。

许多经过长征的同志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们党的政治鼓动工作是非常有力量的。每当遇到一种困难，甚至看来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经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许多常人不敢想象的事，我们都迎刃而解了。还有一条，我们善于依靠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这对我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当时可能做到的物质准备，去战胜困难，取得胜利大有好处。我们在过雪山前，就曾向当地群众详细询问了雪山上的情况和过雪山时的注意事项，大家有了思想准备。当时不可能搞到棉衣，也没有御寒暖身的酒，就披上毛毯，煮些辣椒汤，每人准备一根拐杖等。越过雪山，天气果然又暖和起来。我们继续向北前进。

两大红军主力会师懋功

一、四方面军亲密如兄弟

1935 年 6 月 17 日，我们到达四川懋功，红军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是全军指战员盼望已久的事了，如今变成了现实，大家那个高兴劲儿，那样热烈的场面，真是感人，令人难忘。两个方面军的同志们互相体谅、关心、帮助，非常亲热。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显得很疲惫，吃的穿的都比较困难。四方面军人比我们多，物资也多，他们从各方面主动帮助我们。李先念同志当时任四方面军三十军政治委员，他率三十军和九军一部在懋功迎接我们。三十军的同志们一见到我们，就拿出很多吃的用的东西送给我们，

对我们热情帮助，关怀备至，还招待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这 两支红军部队，亲如兄弟的无产阶级友爱团结精神，是难以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

陈赓同志原来在四方面军工作过，早在鄂豫皖苏区就同张国焘的“ 左 ”倾冒险主义领导作过斗争，在上海治伤时还向中央揭露过张国焘的问题，因此，张国焘很恨他。这次见面后，张国焘问陈赓同志：一、四方面军两相比较，各有哪些长处和短处？

陈赓同志是个很直率的人，从不模棱两可，隐讳自己的观点。他说：我在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干过，依我看，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好。四方面军能打仗，干部、战士的战斗作风好，一方面军除了能打仗外，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比四方面军做得好一些。

张国焘听了很不高兴，要整陈赓同志。张国焘的为人，由此可见一斑。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华活动，并与国民党亲日派加强了勾结。我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响应，有力地打击了蒋介石坚持内战的反动政策。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很有利。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定红军继续北上，以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这一决策，得到全党全军的热烈拥护。窃据四方面军主要领导职位的张国焘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惯耍阴谋，野心很大。他把四方面军视为己有，自恃人多，兵强马壮，看到一方面军经过长征苦战，实力消耗很大，瞧不起一方面军，便向党伸手争权。1935 年 6 月 26 日，在会师后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上，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当面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但一返回营地，便在军内散布谎言，挑拨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歪曲党中央北上抗日的主张，并借口所谓“ 组织问题 ”、“ 统一指挥 ”问题故意拖延四方面军北上行动。八月初，中央又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肯定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正确性。会议前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对张国焘进行了说服教育。张国焘表面同意中央的方针，但实际上坚持错误，对抗中央的决定，继续反对北上坚持要南下，背地里大搞危害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阴谋活动。

毛儿盖会议后，党中央决定部队分左右两路北上。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右路，包括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在左路，包括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和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干部团随党中央在右路。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决定干部团同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改编成新的红军学校。红军学校的校长是倪志亮，政治委员是何畏，教育长是李特，政治部主任是刘少奇。由于张国焘要整陈赓，陈赓同志无法在红军学校工作，被调到一军团任师长。这时，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等几位老同志都到红军学校政治部工作。干部团编成红军学校的特科团，代理团长是韦国清同志，我任政治委员。下辖四个科：骑兵科，科长苏进；工兵科，科长谭希林；炮兵科，科长冯达飞；机关枪科，科长王智涛。

红军学校编在右路军。我们是从四川卓克基，经马尔康、梭磨、马塘、打鼓到达毛儿盖的。这一带是藏民区，一切都与内地不同。红军进入这里之前，由于反动派的欺骗和威胁，驱使老百姓弃家逃走，我们像到了无人区，到处找不到入，吃粮成了大问题。我们饿着肚子住在喇嘛寺。地里的麦子正在灌浆，还没有成熟，无法收割。我们常常每天只吃二、三两青稞，主要靠

挖野菜和豌豆苗充饥。一有机会碰到老百姓，就立即展开工作，反复讲政策，作解释，解除他们对红军的疑虑。我们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在有的地方还帮助他们建立了革命政权。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情况大不同了，藏民们对我们依依不舍，不仅卖粮食给我们，还组织运粮队为红军送粮食。

1935 年 7 月在懋功，有这样一件事，就是中央军委政治部指示干部团为肖劲光同志平反，恢复其党籍。根据上级指示，由干部团总支书记方强同志召开总支会议，为劲光同志的冤案彻底平反，并代表组织和劲光同志谈了话。肖劲光同志遭受冤枉，被开除出党是 1934 年 1 月的事。当时他在中央苏区任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个军区是由建（宁）黎（川）泰（宁）警备区发展起来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一进中央苏区，就搞什么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路线。肖劲光同志被诬为罗明路线在红军中的代表人物之一，黎川失守和浒湾失利本来是王明左倾盲动军事路线的结果，却被毫无根据的说成是肖劲光同志推行罗明路线的结果。因此，他遭到严重打击。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肖劲光同志五年监禁徒刑，并开除其党籍。由于毛泽东等同志坚决反对，劲光同志被关押一个月以后，即调到红军大学任教，教战术和政治两门课。长征开始，劲光同志任上干队队长。劲光同志虽蒙不白之冤，但他一直忠心耿耿，积极工作。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为他平反，深得人心。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到毛儿盖时，让上干队的党支部讨论了取消肖劲光同志的处分问题，通过了恢复肖劲光同志党籍的决定。　1935 年 8 月，中央军委调肖劲光同志到三军团任参谋长。

友情暖心克服艰难
七无七夜穿过大草地

8 月下旬，我们干部团随右路军先走四川松潘，又北行四十里，进入了杳无人烟、禽兽罕见的草地。过草地时，天气变化无常，或晴或阴说下雨就下雨，一般到下午 3 点到 4 点左右便不能行走。最难走的是沼泽地，只能踩着草根走，若陷入泥潭，便越陷越深，难以自拔，甚至没顶牺牲。我们就在这样的草地上走了七天七夜。大家穿着老羊皮，每天只吃三两粮，一两片烤羊肉干，主要靠吃青苗。能吃到青稞就是最好的饭了。有一天，董必武同志来了，我们用手指抓一点干炒青稞给他，算是最好的招待了。我们以班为单位自己找柴禾，晚上铺在地上就是床。当时最重要的生活用品是一个脸盆，烧水、煮饭、洗脸、洗脚，都用它。有的地区有原始森林，在靠近森林的地方露营，上面用布张起篷子，把布的四角用绳子拴在树上，人就在下面睡觉。一晚上都烧着火烤，仍然很冷。为了取暖，有的两人背靠背睡，第二天早上，或者一个人死了，或者两个人都死了。过草地时牺牲了不少同志。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中，吃得少，消耗大，个个瘦骨嶙峋，又要连续行军，有时还要打个小仗，身体太弱的，实在支持不了。炮兵连有一位班长病了，用担架抬着他，我跟在他后面，也抬了一阵。他说：“无论如何不要再抬我了，我已经不行了，你们要多保持体力，胜利还要靠你们啊！”他把随身带着的粮食、牛肉干、毛毯都拿出来给我们，要我们继续往前走。他用微弱的声音对我们说：“你们走吧，别管我了，这点东西也许还能救活别人。”说完这话不久，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种壮烈情景，使人感到心酸，令人肃然起敬！数十年过去了，还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有一两天，经过一片草地，什么树也没有，我们要带着柴禾行军。

过草地七天中，我们没有看到一间房子。后来到班佑附近，第一次见到

牛屎房子，这是用树木架起来，牛屎糊的墙，这是牧民放牧临时住的。右路军经过艰苦行军，穿过草地，到达四川西北部的巴西地区。

我们一些负责同志行军时骑马。看见前面掉队的同志就下来让他们骑，一匹马可以骑两个人。许多领导干部都是这样做的。我们红军讲阶级友爱，官兵平等，干部关心战士，帮助和体贴同志，这是我们政治思想工作的好传统，这比做长篇大论的空洞报告有力得多。抗战时期，我曾在敌后遇到长征时干部团的一个学员，他一见到我就问：“你还认识不认识我？”

我说：“记不得名字了。”

他很生气他说：“长征时我在于部团，那时我病了，走不动路，还是你用马把我驮过来的。”

我对他说：“同志，这种情况差不多天天都有啊。哪能都记得呢？”

干部团里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负责司令部总务工作的危拱之同志。长征途中的总务工作是很繁重、很辛苦的。部队一到宿营地，拱之同志忙着安排大家的吃、住，安顿病号，招呼大家烧热水洗脚等。部队出发前，她督促检查同志们打扫驻地，上好门板，归还借来的东西，做好各项善后工作。记得在过草地时，我的马丢了，驮在马上的粮食和全部生活用品也随着丢失了，拱之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从其他同志那里为我匀了一份，帮助我渡过了难关。她还在百忙中为我织了一条毛线围巾。拱之同志对干部团其他同志的照顾也是满腔热忱、无微不至的。拱之同志缠过足，但是由于马匹少，在整个长征途中，她从来没有骑过马，完全靠一双“解放脚”一步一步地走完了两万五千里。拱之同志不愧为一位革命女杰。拱之同志一生几经坎坷，但始终革命意志坚定，忘我地、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着。一九七三年，拱之同志不幸病逝。人民将永远纪念这位革命的老大姐。

长征途中，我有个勤务员，叫王道全。他是江西人，才十几岁，行军时除了背自己的行李、每人必须携带的粮食以及驳壳枪和子弹以外，还要提着办公用的马灯和脸盆等其他物品，这对于一个年纪不大的孩子来说，负担是够沉重的了”但一到宿营地，他就忙着找我们两个人睡觉的门板和禾草，还要烧热水洗脚解乏，完全忘了自己的疲劳。第二天出发前，他总是按照部队规定的“八项注意”，把借来的门板上好，捆好禾草放回原处，把驻地清扫干净。天天如此，从不马虎。他虽然是勤务员，实际上还主动担负着警卫员的任务。在工作上，从来不计较份内份外，不论哪位负责同志有事。如当时的团长陈赓同志或其他负责同志有事要办，他都主动去干，大家都喜欢他。

粉碎张国焘阴谋，
继续北上，红军胜利到达陕甘宁

不久，左路军主力也到达四川阿坝地区。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陈昌浩同志走在前面。张国焘顽固地认为北上不行，主张再过一次草地往南返，到天全、芦山一带发展。他到阿坝后就按兵不动。党中央经过讨论，决定还是北上。

张国焘一意孤行，对中央的多次决定拒不执行，擅自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并且打电报给中央，荒谬地要右路军也重新过草地南下。党中央曾几次去电，指出只有北上才是出路，只有北上才能使红军得到发展，才能在全国范围内扭转革命所遭受的挫折，才能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的迅速到来。张国焘却悍然不顾。他还密电陈昌浩，企图裹胁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全部南下。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同志同张国焘的阴谋进行了勇敢机智的斗争，

为党立了大功。徐向前同志对张国焘的阴谋很愤慨，说：“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怎么说也不能打。”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采取果断措施，率领一、三军团和红军学校连夜出发，继续北上，避免发生武装冲突，迅速脱离险境。

不少同志对张国焘的罪恶行径憋了一肚子气，为了团结，强忍住没有发作。我对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同志和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同志讲：北上一定要把我们红军学校特科团带上，否则，我们开小差也要北上，那时候可不要因为开小差而开除我们的党籍。

红军学校特科团在凌晨三时左右接到北上的命令，韦国清同志和我马上集合全团学员准备出发。出发前，我们简要地向学员们讲了当前面临的情况：现在有两条方针，一条是向甘肃、陕北北上抗日；一条是回过头去向南，再一次过草地，大家看怎么办？

我们还明确地告诉大家：北上是中央的方针，南下不是中央的方针。愿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北上的可以留下”

“赞成哪一个方针？”我们问大家。

“我们要北上！”

“我们要北上！”

“要北上，不要南下！”

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于是，特科团出发了。这时李德和我们同行。他是第三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在遵义会议以前的长征中，一直推行王明错误路线，这时他也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不满，向我们说：我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

红军学校的政治委员何畏，原为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积极追随张国焘，后来在延安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时逃跑了。在长征路上，他一得知红军学校北上的消息后，便立即去报信，于是张国焘下了停止前进的命令。

我们摸黑走了大约二十多里路，天快亮了，忽然从后面传来命令：传令兵通过，部队原地停下。

这是陈昌浩同志派人送来的张国焘要南下，不准北上的命令。红军是很守纪律的，虽然大家对此命令异常不满，但部队还是就地停了下来。

这时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走在红军学校前头，在半山坡上一块很小的平地上停了下来。王稼祥、洛甫、叶剑英、杨尚昆等同志也到了这里。我们都赶到毛泽东同志跟前。张国焘的追随者、红军学校教育长李特，这时持枪带着几个人从后面追到这里。李特问毛泽东同志：现在总部政治委员张国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

跟随李特的几个警卫员，手提驳壳枪，指头按着板机，气势汹汹，气氛十分紧张。

面对李特的无礼威胁要挟，毛泽东同志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地同往常一样，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出发，对李特晓以大义，语气平稳、庄重，耐心他讲明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指出在当时情况下我军只能北上，万万不能南下。

毛泽东同志冷静而坚定地说：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现在只有北上一条路可以走，因为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而陕西、甘肃的敌人比较薄弱，这是一。第二，北上抗日，

我们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得不到全国人民拥护的。

毛泽东同志严肃地正告李特：彭德怀同志率领的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德怀同志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毛泽东同志的严正警告，使李特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彭德怀同志在红军中享有能征善战的声威，他们不能不有所顾忌。

最后，毛泽东同志恳切地对李特说：请你向国焘同志转达我的意见。根据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分析，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的敌人力量很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甘孜、芦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只有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唯一正确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我们前面走，欢迎你们后面来。

最后一句话，接连讲了三遍。毛泽东同志这一番话，语重心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不少同志还清楚地记得。

红军学校特科团的干部都是一方面军的，招收的学员主要来自四方面军。李特看威胁右路军南下无望，便对毛泽东同志说：根据张国焘同志的命令，红军学校的学员要南下。

毛泽东同志说：可以，红军学校的学员回去跟四方面军南下吧。我们特科团的干部要北上。

毛泽东同志顾全大局，为着团结，让四方面军的学员回去。当场命令韦国清同志和我，集合特科团全体同志。毛泽东同志对学员们讲了话，讲话的内容同前面讲的大体相同。毛泽东同志在讲话结束的时候反复强调说：南下的路是走不通的，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现在回去不要紧，将来还要回来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

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坚持原则，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粉碎了张国焘妄图挑起红军打红军的一场阴谋。

四方面军的学员走了以后，特科团只剩下我们几十个干部了。我们到甘肃俄界宿营。甘肃军阀鲁大昌师在腊子口堵住了我们的去路。腊子口形势险要，突不破这一关，就打不开通向陕甘的路。我们的先头部队从侧面攀登上去，夺取了腊子口，大部队顺利通过。到达甘肃哈达铺，部队休整了几天，进行改编。因为当时兵分左右两路，朱德、刘伯承、罗炳辉、董振堂等同志在左路军。我们右路军只剩下几千人了，便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毛泽东同志兼政治委员。下辖三个纵队，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二纵队司令员彭德怀兼，政治委员李富春；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治委员邓发。我们特科团改为随营学校，属三纵队，校长是陈奇涵，我任政治委员。从哈达铺开始，以后打仗不多，但是敌人的骑兵对我们威胁很大。到了吴起镇，就到陕北革命根据地了，大家都很兴奋。接着，我们到了瓦窑堡，这里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政府所在地，大家更高兴了。以后随营学校和陕北的红军学校合起来，又改为红军学校，周昆任校长，我任政治委员。不久，我调到红二十八军工作，由原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接任红军学校的政治委员。

陕北窑洞做新房
新婚数日上前方

我和钟月林同志是 1935 年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时结婚的。

那时候，红军历尽千难万险走完了两万五千里，行军打仗，发动群众，整整一年时间，颠沛流离。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如同回到了自己久别重归的故土，从此红军又有了自己的根据地，自己的家了。队伍到了陕北，才算是安顿了下来。不少的同志相继结婚。当时，我自己还没有考虑到那么多。袁国平同志的夫人邱一涵大姐是个十分热心的人，她张罗着给我找对象。那时，红军队伍里的女同志不多。她提到的三个女同志的名字，其中就有钟月林。我在长征路上就见过她，虽然了解不多，但对她的印象很好。

在长征途中，陈赓同志带着几个女同志到我们干部团来玩时，向我介绍过她。她是当时我们长征队伍里 30 个女　　兵中最小的一个。长象没有什么特别，普普通通的，一个小女兵，听说她家是贫农，家境贫寒，当红军以前是个童养媳，地地道道一个苦孩子出身，可我觉得她很实在，外貌很质朴很善良。于是便同意与她结婚。

贺子珍同志先把这件事告诉了钟月林。没几天，邱一涵同志陪她到了我这里。那天是 12 月 12 日。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一年后的这一天发生了“ 西安事变 ”。

那个战争年代，一切从简。结婚不举行什么仪式。我的宿舍一切都没有变化。一间不到 8 平方米的窑洞，一张单人士炕，一套我原来自己的铺盖。地上烧着一个火炕炉子。一切生活用具都没有新添置。只是多了一个人便成了一个家庭。结婚后，我拿出仅有的两三块钱，请蔡畅、邓颖超、贺子珍、邓六金等几位大姐们及红军学校的几位同志一起吃了一顿饭。那时候结婚，就这么简单。

我们结婚后没几天，周恩来副主席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决定派我到刘志丹同志任军长的第 28 军去工作。我便离开了那间刚刚称之为是家的小窑洞，上前线去了。在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我们都懂得什么是最主要的，是第一位的。所以，谁也没有怨言。

那时，我感觉最深的是陕北真冷。尽管我们身上都穿着棉衣、棉裤和棉鞋，可骑马走在山上，那身上就如同一丝不挂似的，北风像小刀子一般，扎的人透心凉。

几天以后，钟月林也参加农村工作队，深入基层为扩大红军队伍动员群众做宣传工作去了。那次，钟月林在农村得疟疾，发高烧，被人用担架抬回瓦窑堡住进医院。我因工作忙，没有回去，让警卫员回去看她时，她正烧的昏迷不醒。

她 1915 年出生于江西于都一个贫农家庭。8 岁作了童养媳。15 岁参加革命，从儿童团员、共青团员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1 年，冯文彬同志到她的家乡平安寨区挑选优秀的共青团员到新区开展工作，钟月林就是其中的一个。1935 年参加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先后在省妇联、省群工委等部门工作，继续深入农村发动群众。为了上前线她上了中央电讯学校，学习发报。1938 年毕业后，经毛主席批准到前线，一直默默地任劳任怨地做报务工作。后她一直和我在一起坚持战斗在八年抗日战争的第一线。

第五章　东征西战的红二十八军

1935 年 10 月，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并以此为抗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领导中同人民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纠正错误肃反，直罗镇战役胜利
挽救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

陕北是我党领导下的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革命根据地。它是在陕北人民的领袖刘志丹、谢子长同志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创建和发展起来的。这里很早就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进行了土地改革，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有一支勇敢善战的红军武装。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深受陕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不幸的是，在党中央到达陕北前夕，这里发生了错误肃反。刘志丹、习仲勋等许多领导同志被打成“右派”抓了起来。原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以及陕北地区党政军的许多领导干部无辜被捕。更加令人痛心的是，有一些好同志惨遭杀害。这次错误肃反，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陕北恶性膨胀的产物。转眼间，一个生气勃勃、充满朝气的陕北革命根据地，陷入了危险局面。

这时，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了解到这里正在进行错误肃反，刘志丹等同志被关押的情况后，立即下达“停止捕人”、“刀下留人”的指示，采取坚决措施，及时纠正错误。刘志丹等一大批遭受迫害的干部被释放出狱，并为已被杀害的同志平反昭雪。

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亲切接见了刘志丹同志，安慰他说，你和陕北的同志们受委屈了！

刘志丹同志光明磊落，襟怀坦荡，不仅毫无怨言，还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事情就好办了。

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受害干部会，这个会我参加了。会上宣布了不少同志受冤枉，造成错案，全部予以平反纠正。参加会议的不少受害同志发了言，有些同志很激动，甚至个别人痛哭流涕，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刘志丹同志表现不一般。他最后发言，非常冷静，十分诚恳地说，中央救了陕北，救了根据地，救了我们的同志，感谢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处理得好。他指出，不要认为我们做的什么事情都是正确的，我们也有错误。当然，我们不是右派，但是工作中有没有右倾错误或其他错误，我们要冷静地回头想一想。并一再强调要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为完成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我听了志丹同志的讲话，很受感动。志丹同志不愧为一位胸怀大局、品德高尚的领袖人物。

志丹同志平反后就和我在一起工作，他曾亲自向我讲述过他被捕的那段经历。

1935 年 10 月初，后方保卫局通知刘志丹同志从前线回瓦窑堡。他在返回途中，经过安塞县时，恰巧碰到后方保卫局的通信员往前方司令部送信。刘志丹同志当时担任十五军团副军团长，他威信高，通信员就把这封给十五军团团部的急件交给了他。志丹同志拆开一看，原来是要逮捕他的密令。当时，他未露声色，让通信员把信送到前方军团部，自己毅然策马奔赴瓦窑堡。他很坦然，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准备直接向当时中央派驻西北的代表团申明正义。同时他也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即可能被关押或甚至被杀头。但他

坚信最后一定会水落石出，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因此，他毫无私心和畏惧，过家门而不入，径直到保卫局去，结果被抓了起来。志丹同志在讲述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时，平静、深沉。他认为这是在错误路线影响下当时党组织犯的错误，应当吸取教训，丝毫没有个人的埋怨情绪。他一再向我表示：当时王明领导的中央派来的同志不了解情况，我对他本人没有什么意见。志丹同志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没有耿耿于怀，这说明他以党的事业为重，党性很强。在当时的复杂情况下，能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党中央纠正了陕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后，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同志指挥下，聂荣臻等领导的一军团和徐海东、程子华领导的十五军团，于1935 年 11 月下旬在直罗镇打了一仗。这一仗打得漂亮，俘敌五千三百多人，缴枪三千五百余支。为党中央转移到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由于党中央在政治上采取了纠正错误肃反等一系列措施，在军事上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陕北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陕北红军组成红 28 军，反“围剿”临时组建北路军

1935 年底，在瓦窑堡，中央决定由陕北红军组成红二十八军。任命刘志丹同志为军长，我为政治委员，参谋长是唐延杰同志，政治部主任是伍晋南同志。下辖三个团，共一千二百多人。绥德、吴堡战斗团编为一团，团长黄光明，政治委员王再兴；米脂西游击师编为二团，团长于占彪，政治委员柴成俊；清涧红四团编为三团，团长杨琪，政治委员陈仿仁。

周恩来同志亲自找我们几个由红一方面军派到红二十八军工作的同志谈话，嘱咐我们去了以后，要尊重刘志丹同志，尊重地方红军，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志丹同志党性强，顾全大局，十分注意维护党和革命队伍的团结，他对中央派去的干部非常尊重，并经常教育陕北红军尊重外来干部。他在许多会议上讲，中央派来的干部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锻炼的，地方红军应当尊重他们，向他们学习。我个人比志丹同志年小六岁，对他很敬佩，凡是大事我们都一道商量着办，我们彼此推心置腹，没有丝毫芥蒂。由中央派来的其他几位同志，也都和陕北红军的同志相处得非常融洽。

红二十八军成立不久，中央临时组建北路军，任命志丹为总指挥，我为政治委员。北路军除二十八军外，还有由二十六军改编的七十八师和陕北骑兵团。任务是向吴家坡、响水、横山一带挺进，配合红军主力打退国民党反动军队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牵制北线敌人，相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扩大红军影响。北路军虽然组建时间不长，但屡获战果，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北路军是临时组成的，完成任务后，部队归还原建制，准备接受新的任务。刘志丹同志和我仍担任二十八军的职务。

配合红军主力东征，打通陕北苏区和神府苏区

1935 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东三省和热河之后，又策动华北事变，妄想吞并整个中国。为了挫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计划，进一步推动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我红军主力改编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挥戈东征，准备东出山西、河北、察哈尔一带抗日前线，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改编后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一军团、十五军团和二十八

军、三十军。2 月 20 日，在毛泽东、彭德怀同志指挥下，一军团、十五军团分别强渡黄河。阎锡山急令到陕西“围剿”红军的四个旅东渡回援。不久，我二十八军奉中央命令，由吴堡北上向神木、府谷进发，打通陕北苏区和神木、府谷苏区，使之连成一片，巩固和扩大神府革命根据地，并迅速发展苏区党的组织，壮大地方武装力量，巩固抗日后方，以牵制绥德、榆林地区的国民党二十二军和八十四师，策应主力红军东征。

国民党驻陕北的高桂滋和姜梅生等部，得到我二十八军北上神府苏区的消息后，急忙调集大批兵力，前堵后截，妄图阻止我军去路。我军屡挫敌军，迅速向北推进。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先后在清涧、绥德、吴堡、米脂、阎家峁、杨家堰、葭县、高家堡等十多个重要城镇，打击了敌人，胜利进入神府苏区。我党机关报《红色中华》多次报道了二十八军胜利进军的消息。其中 3 月 23 日，以《陕北苏区与神府苏区己取得联系，红二十八军与神府红军会合了》为题，发表了这样一则报道：“我军最近在吴堡、绥德一带积极向北发展，十七日在米脂以东某地击溃高桂滋部五个连及保甲五十余人，缴获步枪几支，敌人大部击散，一部退守土寨。二十日我军遂与神府红军会合于葭县以北之某地方，仍继续向东北发展，在西七区将高双成部杨向之营两个连全部消灭，计缴获步枪八十余支，短枪六把，机枪两架，……俘获敌营长一名，排长二名，士兵九十余名，现我军正向太和寨方向乘胜追击中。”

这里所说的二十日的战斗，是指杨家堰战斗。这一仗打得很漂亮，充分显示出志丹同志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这天拂晓，部队在贺家峁吃过早饭后，出发向东南行进。当我们到路家沟时，当地群众报告，有驻太和寨的敌军八十六师杨向之营，正在我前方十里远的杨家堰抢劫粮食，奸淫妇女，危害百姓。我们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志丹同志向群众仔细了解了敌人的兵力和装备，摸清杨家堰的民情和地 形后，当机立断，决定集中兵力消灭这股匪军。他作了周密 部署：一团由北向南，正面主攻；二团绕道杨家堰西侧山下，切断敌人退路，阻击西面来的增援之敌；三团在杨家堰南山沟内埋伏，歼灭溃败之敌。各团都按预定时间进入阵地。志丹同志一声令下，冲锋号四起。一团发起冲锋。敌人毫无准备，顿时乱成一团。二团也在西山开火合击。敌人朝南山沟底逃，我三团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敌走投无路，纷纷举手投降。这个战斗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全歼敌人一个营。这次战斗得到了地方同志的很大支持。神府特委的同志亲自给我们作向导。神府老三团也赶来参战，协助我们追歼逃敌。这一仗我们打出了威风，附近敌人闻风丧胆，听说志丹同志领导的二十八军来了，没等我们打，就连夜逃走。一个月来，陕北红军的同志们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在绥德的一次战斗中，我们打垮了敌人一个团，北上首战告捷。在这次战斗中，三团团长杨琪同志身先士卒，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献身。杨琪是陕西延川县人，18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领导下，先后担任西北反帝同盟军大队长，红四十二师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师长等职。 1935 年陕北根据地发生错误肃反时，杨琪同志以“莫须有”罪名被扣押。平反后，被任命为三边地委领导的独立营营长。二十八军成立后，任三团团长。杨琪同志是一位忠诚革命事业、久经考验的党的优秀干部，他作战勇敢，屡建战功，是陕北红军的一员战将。他的牺牲使我们感到十分悲痛和惋惜。还有些战斗也打得很激烈，如在粉碎阎家峁姜梅生骑兵旅和几个步兵连的战斗中，我一团二连九班就接连换了八个班长，前七个班长都伤亡

了。实践表明，陕北红军是一支政治素质良好，战斗作风过硬，很有战斗力的部队。

三月下旬，部队进入神木、府谷后，神府特委和特区政府召开盛大的欢迎祝捷大会。当地群众兴高采烈，纷纷送来猪羊、红枣、米酒、鞋袜和果品，慰劳红军指战员。有不少老百姓从远道赶来，要亲眼看一看刘志丹同志。当地群众不称呼志丹同志为军长，都亲昵地叫他“老刘”。有位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十分激动地从人群中挤到志丹同志面前，拉着志丹同志，从头上摸到脚下，又从脚下摸到头上。陕北人民就是这样爱戴自己的领袖。

我们按照中央军委命令，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打通了陕北苏区与神府苏区的联系，为红军主力东征建立了巩固的后方。

东渡黄河，占领罗峪口，配合主力，牵制调动敌人

毛泽东同志率领东征大军渡过黄河以后，由晋西分兵两路向东推进。右路军插进晋西南汾河流域，左路军打到晋西北。正当我军突破敌人一道道防线，逼近同蒲铁路时，阎锡山急忙调兵堵截，阻止我军开往抗日前线。三月下旬，中央电令我二十八军从葭县以北东渡黄河，破坏晋军在罗峪口和黑峪口之间的沿河防线，插入晋西北地区，配合十五军团迅速打通奔赴抗日前线的道路。

根据中央部署，我们很快打下黄河西岸的沙峁头，在贺家川一带积极进行渡河的准备工作。神府特委和苏区政府把支援二十八军东征作为首要任务。特委派杨和亭、王兆相、王道三等几位有经验的同志负责造船以及筹粮、供应等工作。志丹同志下令在一周内赶造五条渡船。群众听说是给红军造船，积极性很高，表示不管有多大困难都要如期完成。木材不够用，有的把自己家的门板卸下拿来，有的还献出准备做棺材的木料。时间紧迫，船工们昼夜倒班干，终于在一周内造好了五条渡船。神府自古是个缺粮区，老百姓自己吃粮都有困难，当他们听说红军要打日本鬼子和阎锡山，有一斗的拿出半斗，有一升的拿出半升，争着捐粮，很快把粮食备齐。

与此同时，志丹同志和我一道详细调查了附近渡口的守敌和河两岸的地形、地物等情况。志丹同志等还登上山坡，仔细观察对岸敌军的工事设施和驻防情况。沙峁头对面的渡口是罗峪口，守军是晋军二一六旅了炳青部的一个营，沿岸有碉堡封锁河面，附近渡船全被晋军抢走。经反复研究分析，最后我们把渡口选在沙峁头附近天台山下的一个村庄。这里两岸陡峭，河面较窄，水流湍急，敌人防守不严，又加上这个地方是窟野河与黄河的交汇处，不易被敌人发觉。

3 月 31 日晚，我们开始渡黄河。出发前，志丹同志接见了全体船工，向他们敬了酒，感谢他们对部队的支持，鼓励他们要不畏艰难，帮助红军快速渡过河去。王兆相同志率领神府地区的三支队随二十八军一同行动。红三团在沙峁头山顶上佯攻，牵制、迷惑对岸敌人。担负突击任务的我一团一连和二连一个排，首批登上木船，船工迅速朝河东岸划去，敌人未料到我军在此处渡河，因此戒备松懈。当我军出其不意接近对岸时，敌人才发现，急忙以火力阻击。我军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冲上岸，拔掉了岸边两个中心碉堡，很快占领了李家梁，接着一、二、三团相继在拂晓前渡过黄河。又经一场激战，消灭敌人全部守军一个营，敌营长被我击毙，占领了罗峪口。

罗峪口是一个有几百户人家的镇子，地处晋陕交通要冲，商业比较发达，

市面比较繁荣。我们首先在这里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任命王道三同志为政府主席。道三同志那时还年轻，对筹集粮款支援红军打仗很积极，是个好同志，但是对党的某些政策理解不够。他上任不久，发生了一起我新政权没收商店货物的事，引起了工商业者的恐慌。志丹同志对执行党的政策是非常认真的，不容许有偏差。他知道此事后很恼火，对道三同志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这样做对实现我

党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更多的人抗日的危害性。王道三同志

很快认识了错误，他亲自登门，向商店主人道歉并赔钱，归还被没收的货物，纠正了错误，在群众中影响很好。原来阎锡山造谣说，“ 共产党杀人如割草，穷人要知道，富人要家

晓，共产党来了穷富都难逃。 ”罗峪口的群众亲眼看到我们纪律严明，对红军的恐惧心理一扫而光，青年纷纷参加红军。

我们接着向北，很快打下了黑峪口，破坏黄河东岸敌人防线三十多公里。随后，我们的部队又由北向南，准备同十五军团会合。进入临县白文镇时，接到中央军委急电：为了配合主力红军进逼汾阳威胁太原，打通前方与陕北之联系，保证红军背靠老苏区，令我二十八军即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相机攻占中阳县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我们即率部队从白文镇出发，向南接连打败临县、方山、离石、柳林和中阳来犯小股之敌，四月十三日到达三交镇附近的留誉镇。

刘志丹阵亡三交镇，
陕北赤子魂归故里

三交镇是座落在山西中阳县西部靠黄河的一个重要渡口。河西是我陕北苏区的绥德县境。该镇南北两面环山，西面临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当时镇内有重兵把守，沿河有坚固的工事。志丹同志对大家说：越向南走，离中央总部越近，一定要打好三交镇这一仗，打通山西前线和陕甘苏区的联系。为了打好这一仗，志丹同志亲自勘察地形，仔细研究敌情和作战方案。接到中央电报的当天，我们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传达。并对打三交镇作了如下的部署：一团攻打南山，二团攻打北山，三团为预备队，担任警戒和阻击前来增援的敌人。

4 月 14 日拂晓，围攻三交镇的战斗打响了。我军指挥部设在南山顶上的党家山，距我一团阵地不远。一团很快从东南面攻上山，进展顺利，接连拿下敌人的许多碉堡。南山守敌见势不妙，全部撤到北山固守。志丹同志便命令一团向北山移动，与二团夹击北山之敌。时至中午，攻击不大顺利。这时我们才发现，原来的情报不准确，以为敌人只有一个营，实际上是一个团部，两个营，还加一个炮兵连。志丹同志和我商量，让我留在军指挥部掌握全面情况，他亲自到一团阵地去看看。我让负责保卫工作的特派员裴周玉同志和参谋等随志丹同志一起去。

志丹同志到前沿阵地指挥部队作战，在观察敌情时，不幸左胸中弹，伤势很重。志丹同志断断续续地对裴周玉同志说，告诉政治委员，请他带着部队消灭敌人，坚决把三交镇攻下来！裴周玉等几位同志将刘志丹同志抬到军指挥部所在的阵地上，我跪下来摸他的心脏和脉搏，察看伤口。这时志丹同志因大动脉出血己昏迷不能说话，不多时即溘然长逝。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陕北人民的领袖刘志丹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牺牲了，年仅三十三岁。裴周玉同志向我讲述了志丹同志中弹

的经过。我们非常悲痛，肃立在亲密战友的遗体旁，脱下军帽致哀。我对在场的同志们说，刘军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的遗志，完成他未完成的革命事业，更多地消灭敌人，为刘军长报仇。我们把志丹同志的遗体抬上担架，把军大衣轻轻盖在他身上，一步一步地送下山坡。我把志丹同志牺牲的消息立即电告中央。并赶紧筹划船只，制作了一具棺材装殓志丹同志的遗体，在场的数十人扶棺流泪，与志丹同志诀别。然后，派人护送志丹同志的棺材过黄河，运往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同时，也将伤病员和多余的武器运过江去，以利部队轻装战斗。

志丹同志离开了我们，二十八军仍像志丹同志活着时一样，坚守阵地，继续战斗。黄昏时分，我们又以两个连的兵力向敌人阵地发起猛攻，怒火在战士们胸中燃烧，复仇的子弹和手榴弹射向敌人阵地，狠狠打击了敌人，三交镇的大部被我攻占，但是未能拔掉敌人设在制高点上的主碉堡。在战斗中，敌人伤亡很大，我方伤亡也不小。入夜，我们通宵未眠，认真分析了战局，估计太原守敌必来增援，为了避免更大损失，按时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决定由一个班留守阵地，拖住敌人，大部队南撤。为避免同前来增援之敌遭遇，我们不走大路，走山梁小道。谁知，增援的敌人也不敢走大路，也走山梁小道，于是，我军同敌军在山梁上打了一场遭遇战。我们对地形不熟，一边走，一边打，打得很艰苦。我带着一部分部队在后面掩护。后来，才把敌人甩掉。

长征时就和我一起在干部团，给我当勤务兵的王道全同志，到达陕北后，和我一起调到二十八军。在这次遭遇战中，他表现得非常英勇，拿着一支步枪，边走边打，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只想部队能够安全撤退。他说：“你们快走，我在这里掩护一阵子，马上就来。”由于他表现好，先后提升为班长和机枪排排长。不幸，道全同志在以后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才二十一岁。为革如献出年轻生命的何止王道全同志一个，而是千千万万！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浇灌了革命胜利之花。我们的革命胜利，来之多么不易啊！

部队到康城镇，我便到总部向毛主席汇报了志丹同志牺牲的经过，以及二十八军渡河后的战斗情况。毛主席又让我向彭德怀同志作了汇报。二十八军经过多次战斗，人员不断伤亡，三交镇战斗后，全军只剩七百多人。部队虽然减员将近一半，加上三交镇仍没打下，志丹同志壮烈牺牲，指战员们非常悲痛，但是部队的士气仍然很旺盛。志丹同志在指战员中的威望很高，但他从来不树立个人的威信，而是经常教育部队处处以党的事业为重，听从党的指挥。志丹同志为人正派，一身正气，对部队也深有影响。志丹同志带出了这样一支好部队。因此，志丹同志牺牲后，我们指挥部队没有遇到任何困难。红二十八军的同志们，就像听从志丹同志的指挥一样，听从我们的指挥。我由衷地敬佩志丹同志，对红二十八军广大指战员怀有深厚的感情。

由于刘志丹同志牺牲和部队减员较多，原曾经准备撤销二十八军，后总政治部专门派人到二十八军作了考察，认为部队情绪稳定，士气旺盛，素质确实不错，于是，决定保留二十八军建制，补充一部分兵员，任命我为军长，蔡树藩同志为政治委员。

东征大军在毛泽东等同志领导下，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共歼敌约七个团，俘敌四千余人，扩大红军约八千人，筹款三十余万元，在山西的二十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成绩是很大的。

红军东征的节节胜利，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先后调遣十个师共

三十多万军队进入山西，协同晋军堵截红军东征抗日，又下令东北军、西北军等部进攻陕北革命根据地。大规模内战迫在眉睫。党中央认为，国难当头，双方决战，无论谁胜谁负，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称快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命令红军于 5 月初全部西渡黄河，回师陕北，并于 5 月 5 日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我二十八军随红军主力于五月初回到陕北，胜利完成了东征使命。

挺进三边，右路军挥戈西征，巩固发展西北抗日根据地

蒋介石拒绝我党提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继续调兵遣将，“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东有阎锡山部，东北有汤恩伯部，北有高双成、高桂滋部，南有东北军和西北军，西有马鸿宾部，对我根据地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他们图谋凭借军事优势，蚕食革命根据地，消灭红军队伍。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巩固和发展西北抗日根据地，扩大红军，发展统一战线，积极贯彻“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决定只留周恩来同志指挥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东线游击战争，牵制进攻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敌军，我主力红军挥戈西征。

西征的红军组成西征野战军，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分兵两路从延川地区出发，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挺进。红一军团为左路，左权同志代理军团长，聂荣臻同志任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西征野战军总部和右路军一起行动。此时，红二十八军由宋时轮同志任军长，我任政治委员，属右路军。

右路军经贾家坪、安塞、保安一线，西出甘宁，挺进三边（即安边、定边、靖边）。部队从新城堡集结地出发后，直取靖边和宁条梁，守敌不堪一击，望风而逃。接着又夜袭定边城，经过一夜激战，攻下定边。根据总部命令，我二十八军除接替七十八师防守定边外，又抽出两个团配合七十八师继续前进，攻打盐池。

盐池位于宁夏东北部，地处宁夏、陕西、内蒙三省区交界处，地理位置重要。古城虽小，但城池坚固，城内原有一个保安团，马鸣远又增派一个骑兵营加强防守。我们在 6 月 20 日包围了盐池县城。我七十八师和二十八军各两个团分别于城东和城南，骑兵团于城西。白天，我们围而不攻，一面抓紧时间休息，一面做群众工作，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勘察地形，了解敌情，研究攻城方案。天黑以后，各团进入阵地。攻城号令吹响后，我军从东、南、北三面发起猛攻。敌人依仗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拚命抵抗。战士们几次登上云梯，都被敌人的火力压下来。我七十八师二三二团首先从北城墙打开缺口，红军战士争先跃上城墙，与守敌展开肉搏战。敌营长被击毙，敌军失去指挥，乱作一团。东门和南门也相继被我军攻破。伪县长见势不妙，带着几个亲信从西门仓皇逃走。21 日凌晨，全歼守敌，盐池城解放。

6 月 30 日，我军奉命围攻安边城。攻城前，在东门外长城上构筑不少堡垒，除监视城内敌人动向，防止他们突围外，同时也防备敌人增援，打击来犯之敌。安边城墙又高又厚，我们没百大炮，如靠正面强攻，必然损失太大。我们决定先挖地道，用炸药炸开城墙，然后攻城。敌人很狡猾，当我们在挖通往城下的地道时，他们沿城墙在地下埋了许多大缸，专听缸内发出的声响，判断我们挖地道的部位和进度，事先做好了防御准备。地道挖到西门下后，

我们把炸药装进棺材，放在城下坑道内。攻城一开始，先点着炸药，西门城墙炸开了一道口子。当部队向城里发起冲锋时，遭到敌人的阻击，我方伤亡较大，安边城没有攻克。

定边和盐池打开后，我二十八军奉命在这两个县驻防。两个团在定边，一个团在盐池。军部设在定边。

红军西征后，党中央所在地由瓦窑堡转移到了保安县城（以后改为志丹县）。当时，保安城小，相比之下定边算是陕北比较大的县城了。于是，中央党校搬到了定边。董必武、李维汉、成仿吾、蔡畅、高岗等同志都到了定边。他们一面办党校，一面做少数民族工作。一些同志曾两次同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拜把子、交朋友。记得有一次我们同蒙古族一位活佛拜把子，蔡畅同志年长，排行第一，我最年幼，排在最后。

在定边和盐池驻防期间，部队在搞好整训的同时，主要向这一地区的人民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和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组织领导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地方武装。部队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首先建立区乡两级革命政权，之后成立县级革命政权。还成立了不少群众团体，如抗日救援会、青年救国联合会、抗日少年先锋队等，并组织赤卫军、游击队等地方武装。盐池的地方武装发展很快，北区成立了一个赤卫连，城区成立了一个赤卫排，北区的少先队还成立了两个赤卫小队。他们到处设岗，担任警戒，捉拿汉奸和敌探，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根据中央争取全民族都投入伟大抗日斗争的政策，我们对开明地主采取团结的方针，不没收他们的财产，对其中能够拿出粮食支援前线的人，我们还赠送“团结御侮”的锦帐予以嘉奖。

定边、盐池一带回族较多。我们在工作中注意严格执行民族政策，搞好民族团结。对回族群众，我军实行“三大禁条”和“四大注意”。三大禁条是：禁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是：讲究清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的器具；注意回汉两大民族的团结。违犯者以军纪处罚。红军很快得到回族群众的拥护，民族团结搞得不错。回族群众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起来，回民联合会、回民解放会、抗日救国会和回民游击队等群众组织和武装相继建立起来。回、蒙、汉三个民族的代表还在定边举行了盛会，互表民族团结、驱逐日军、争取祖国独立解放的心愿。

1936 年 12 月 12 日，发生西安事变。凌晨，张学良将军电告我党中央，要求红军协助东北军和杨虎成将军领导的西北军，共同防御胡宗南部队的进攻。这时，国民党内的亲日派，打着“讨逆”的幌子，先后调遣二十多个师从东西两面向西安逼近，妄图挑起更大规模的内战。蒋介石派去进攻陕甘宁苏区红军的嫡系胡宗南部，也朝西安方向开去。中共中央应张学良和杨虎成将军的邀请，从全民族利益出发，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同志赴西安参加谈判。并同时命令红军第一、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一部，南下集中到西安附近，协助东北军和西北军准备迎战所谓“讨逆”。这时，国民党胡宗南部、第二十五师关麟征部、第三军曾万钟的一部分，向我陕甘宁边区进攻，被我击退。为了追击敌人，中央军委下令我驻甘肃环县东北黑城岔一带的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袁任远）和驻宁夏东部大水坑地区的二十八军，临时组成追击军，由罗炳辉任司令员，我任政治委员。根据中央命令，我们追而不击，主要防范胡宗南对张学良、杨虎成两部进攻。我们到甘肃平凉后停止追击，驻平凉、崇信县。在此期间，我们向当地群众宣传我党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抗敌后援会等。不久，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追击军的任务即告完成。

援西军进驻镇原
散失西路军纷纷归队

1936 年 10 月中旬，我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1937 年 2 月 27 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的指示。按照中央决定，由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宏坤领导的四军，军长肖克、政治委员郭述申领导的三十一军，以及二十八军和三十二军组成援西军，刘伯承同志任司令员，张浩同志任政治委员，李达同志任参谋长，刘晓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先在陕西镇原一带集中，准备相机援助和接应西路军。刘伯承同志住在镇原集忠恕街慕氏家庙内。

镇原位于黄河中游，泾水之北的黄土高原，为华夏古土，有数千年的历史，历代均在此地封署设县。镇原东邻庆阳县，西接固原县，南界泾川、平凉县，北靠环县。

援西军进驻镇原后，家家户户或捐献粮食、猪、羊、蔬菜，或捐献鞋、袜、现金，慰劳部队，以保军需。闰孟村的孟跃祖，经动员把他家的碉堡让出给援西军所属的红四军做军部，又将周围四十亩耕地让出供部队做操练场，并捐献小麦五百多斤。红军开赴抗日前线时，红四军军长陈再道代表四军给孟赠匾两面，一面书写“爱国可亲”，一面书写“民族先锋”。

在镇原，我见到了刘伯承司令员。他对我说：“你不要再回二十八军了吧，现在援西军政治部只有刘晓同志一个人，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都没有，工作人员太少，你来政治部当组织部长吧。”我同意留了下来，担任组织部长。中央关于成立援西军的电报中明确要求：“司令部、政治部组织，力求简单。”我们这个组织部确实简单，一共只有四个人，除我以外，有两个干事和一个勤务员。

不久，刘伯承同志告诉我，中央已经决定刘晓同志调往上海搞地下工作，由我担任援西军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同志任组织部长，唐天际同志任宣传部长。

为了使在极其艰苦的斗争中失散的西路军指战员能够很快找到我们，援西军政治部在兰州到西安的公路上沿途书写和张贴通告，写明红军的驻地，欢迎他们归来。对于历经千辛万苦陆续归队的同志们，我们都去看望。回来一个看一个，回来一批看一批，对他们表示欢迎和慰问。一天下午，我随刘伯承司令员、张浩政治委员到招待所看望大家，伯承同志赞扬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同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表现非常英勇。他说：同志们在险恶的环境中，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采取各种方法，坚持进行斗争，凡是能够回来的同志，表现了政治上的坚定性，都是好同志，都是党的宝贵财富，组织上都给予信任。伯承同志这一番话，使大家深受感动。

对于归来的西路军人员，援西军政治部遵照中央指示，迅速进行审查甄别，除了个别确有叛变行为者外，一律予以信任，很快恢复了党的生活，重新分配了工作。这些同志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表现都很好。

根据刘伯承同志的意见，政治部向归来的西路军同志们讲授社会发展史常识。我们自编教材，自己讲课，从猴子变人讲起，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一直讲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部还办了指导员训练班，专门讲如何在

连队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这些做法，效果都比较好。

援西军在镇原等地还广泛地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扩大红军，派党的干部到国民党部队进行工作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争取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当时的镇原县县长邹介民，经过工作，积极同我们合作，支持抗日，为我军筹集粮食等，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其间，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同志到过镇原，指导援西军进行清算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斗争，强调矛头只对准张国焘一人，最广泛地团结四方面军官兵，不搞扩大化。任弼时同志还亲自给援西军指战员作报告，到援西军随营学校视察工作。

1937 年 7 月底，援西军司令部在镇原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刘伯承同志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一、取消援西军；二、全部援西军部队立即开赴三原镇接受改编。

我二十八军编人以贺龙同志为师长的一二〇师。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三十一军以及陕北的第二十九军、三十军等编为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我任政训处副主任。我一二九师，除留三八五旅一个团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外，主力部队奉命开赴晋东南抗日前线，投入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

第六章　出师抗日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顾大局，红军改编
换军帽，人民军队本质不变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国各族人民义愤填膺，要求抗日的呼声响彻神州大地。7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7 月 9 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代表全体红军将士，致电蒋介石和第二十九军并通电全国，声援国民党第二十九军抗击日寇的爱国行动，表达红军力主抗战、请缨杀敌的决心，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与日寇决一死战。7 月 15

日，我党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宣言，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愿意在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开赴抗日前线。8 月 6 日，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集中于陕西省三原县地区，待命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我在援西军，当时，驻在甘肃省东部的镇原县。

卢沟桥事变后，援西军接到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命令，令我们开赴陕西省三原地区集中。于是，我们在刘伯承司令员、张浩政治委员率领下，8 月上旬从镇原县出发，途经宁县、陕西省的旬邑、淳化等地，于 8 月下旬，到达三原西石桥镇。

国共两党经过多次谈判达成协议，根据协议，中共中央军委于 8 月 25 日颁布命令：陕甘宁边区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 月 11 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9 月 11 日改称正、副总司令），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辖 3 个师：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一一五师是以原红一方面军和第十五军团为主编成的。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一二〇师是以原红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一部为主编成的，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一二九师是由原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一部编成的，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10 月恢复政治委员制度，改为政治委员。1938 年 1 月由邓小平同志接任），参谋长倪志亮，我当时任政训处副主任，还有李达任参谋处长，周玉成任供给处长，钱信忠任卫生处长。

一二九师下辖三八五、三八六两个旅。三八五旅是由红四军改编的，辖七六九团、七七〇团。王宏坤任旅长，副旅长王维舟，参谋长耿飚，政训处主任苏精诚。陈锡联任七六九团团长，副团长汪乃贵，政训处主任丁先国；张才千任七七〇团团长，副团长胡奇才，政训处主任肖元礼。三八六旅由红三十一军改编的，辖七七一团、七七二团。陈赓任旅长，副旅长陈再道，参谋长李聚奎，政训处主任王新亭。徐深吉任七七一团团长，副团长韩东山，政训处主任黄振棠；叶成焕任七七二团团长，副团长王近山，政训处主任谢富治。改编后全师共一万三千多人。

在改编过程中，对部队进行了形势教育、统一战线教育、保持红军光荣传统和人民军队本色的教育。当时思想工作最难做的一件事是“换帽子”。根据红军改编的协议，我们红军指战员要把红五星的帽徽摘下来，换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帽徽，穿上国民党军队的衣服。大家看不惯、想不通，舍不得换掉红军帽。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红军战士，从当红军的那天起，就头戴红五星冲锋陷阵和国民党军作斗争。今天要亲手摘下闪闪红星，戴上国民党军的帽徽，思想一下转不过弯来，刘伯承师长针对大家的想法亲自做思想工作，他说：我们改编了，穿的是当年北伐军的衣服，我们要继续北伐军的革命精神，还要比北伐军更好，换帽子不过是个形式，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还要更好发挥红军的优良传统，搞好军民关系。刘师长是深受广大指战员信赖和敬重的领导者，在部队中威信非常高，他的话解开了许多人思想上的疙瘩。

还有一件事，就是这次改编将全部红军仅编为三个师，显然这是蒋介石有意限制我军、削弱我军。八路军越多，他越害怕。红军缩编后，原来的各级干部就得降职使用，干部层层下放。我们红军原来的军长、师长、团长，无论指挥作战、管理部队，带一个军、一个师、一个团是完全胜任的。现在只好大才小用带一个旅、一个团、一个营。陈再道、王宏坤同志当时都是红军的军长，改编后只当了旅长、副旅长。叶成焕、汪乃贵、王近山等同志原来都是红军的师长、师政委，现在当了团长、副团长。当然，我们这些老红军，回想当年之所以参加红军，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了当官。这方面的思想工作好做，有些想法比较容易解决，部队情绪是稳定的。

各部队经过思想教育，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军队的政治工作，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责任心和组织纪律性。思想觉悟普遍提高。抗日情绪十分高涨。大家整装待发，盼望早日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为国杀敌。

为民族，为国家誓师出征，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后，蒋介石曾叫我们三个师都开赴山西省和河北省交界的涞源县、蔚县地区。那儿是块穷地方，我们部队装备差，又是晋察冀的最前线，很明显，蒋介石这个命令是想借刀杀人。利用日军之手将我们三个师红军一举消灭。这是蒋介石的一贯伎俩，对他这一套我们早有思想准备，及时识破了蒋介石企图驱使红军当炮灰的险恶用心。毛泽东主席在洛川会议上曾明确提醒全党全军，切不可忘记蒋介石想通过抗日战争来取消或削弱共产党和红军的阴谋。我党中央、中央军委断然没有接受他这个命令，而是打到敌后去，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蒋介石这一阴谋企图未能得逞。

我们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我们总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也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的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侧重于山地。首先在山地创建根据地，依托山地开展游击战争，逐步向平原发展。我们说的“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相对的独立自主。

三个师要不要全打出去，延安还留不留军队？当时是有不同意见的。毛主席认为延安还是要留一部分军队，保卫边区。开始先出动两个师。8 月 31 日，一一五师经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沿同蒲铁路北上开赴晋察冀。9 月 3 日，一二〇师随一一五师之后北上开赴晋西北。一二九师是最后于 9 月底出发的。两个旅四个团，实际上只出去七六九团、七七一团和七七二团三个团，

张才千为团长的七七〇团和三八五旅旅直以及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等部队没有出去，

留守陕甘宁边区。

一二九师出征前，于 9 月 6 日，在陕西省三原西之石桥镇举行出征誓师大会。当时徐向前副师长不在，他随周恩来副主席去了山西太原，会见阎锡山。阎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我军将进入山西抗战，一些具体问题诸如行进路线、活动区域、指挥关系、后勤保障等需同阎锡山商谈解决。参谋长倪志亮也不在，还在延安。刘师长指定陈赓旅长担任大会总指挥。会场布置得简朴、庄严。天公不作美，那天正赶上下雨。开始只是稀稀拉拉落了几个小雨点。不一会儿，雨点越来越大、越下越密，还刮起了风，风夹着雨，雨伴着风，从零星小雨变成了瓢泼大雨。部队指战员没有雨具全浇湿了。刘师长、张主任也没有穿雨衣，和大家一样也全浇湿了。风雨无阻，大会按时举行。

列队在风雨中的全师指战员，秩序井然，威武雄壮。每个人的面庞经过雨水冲洗后，更显得英姿焕发，神采奕奕。满怀无往而不胜的气概，接受师首长检阅。阅兵后刘师长讲话。他站在风雨中泰然自若，声音洪亮。讲了全国抗战的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我军的战斗任务等。刘师长的讲话激励着全师将士，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抗日救国的巨大历史责任感，撞击着每个人的心扉。大家深感大敌当前，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危在旦夕。为国杀敌，驱逐日寇，收复失地，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每一个红军战士责无旁贷。

接着，开始宣誓。全师指战员举起右臂，紧握拳头，刘师长读一句，大家跟着读一句：“日本帝国主义，它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父母兄弟……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好完全肃清，誓不回家！”……

读完誓词后群情振奋，慷慨激昂，全师将士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高亢的口号声响彻云霄，这是中华民族的怒吼，是时代的最强音。

9 月 16 日，一二九师奉命进驻富平县庄里镇地区，加紧做好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准备工作。9 月 30 日，从富平县庄里镇出发开赴抗日前线。当时，康克清、马海德同志也跟我们同行。那时康克清同志是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工作。八路军总部已于 9 月 15 日东渡黄河进至太原附近。马海德医生是美国人，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从美国来到我抗日根据地帮助工作，后来加入了中国籍。奔赴前线为国杀敌，大家心情很兴奋、激动，你一言、我一语，有说有笑。那时大家都比较年轻，一路很热闹。

我们走了几天，大约 10 月 6 日左右，到达韩城县芝川镇地区。由芝川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省境内。又走了二三天，到了侯马镇，由侯马乘火车北上直奔娘子关地区。在阳泉下了火车，开到平定、昔阳一带，进入太行山区。

“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群众热烈欢迎八路军

我们过了黄河一踏上山西的土地，就受到山西人民的热烈欢迎。从黄河东岸向侯马行进中，沿途老百姓见了我们，非常亲热。一些年轻妇女、老太太、儿童送来鸡蛋、核桃、红枣给我们。我们不收就硬往怀里塞，塞给我们

调头就走，有的索性丢在地上留给我们。还有些地方摆设了桌子，放上茶水、食品等慰劳我军。我们进入侯马镇时，镇上的居民走出家门拥到街上，欢迎慰劳部队。古人讲：“ 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我们不是“ 王师 ”，是人民子弟兵，是抗日之师，人民群众欢迎八路军比迎接“ 王师 ”更热烈、更隆重。

山西人民为什么这样热烈欢迎慰劳我们呢？因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真正的抗日军队。我们部队来到山西之前，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八路军总部均已先行，沿此路线北上，八路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同国民党兵形成鲜明对比。人心如镜，这一点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1936 年上半年，我军东征时到过山西，也到过侯马一带，曾在许多地方开展群众工作，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同时为老百姓做好事，给老百姓分过一些东西，我军的行动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给山西人民留下深刻印象。山西人民这样欢迎和热爱我军，充分说明抗日救国，驱逐日寇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

一二九师部队进入山西后，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是团长陈锡联指挥七六九团于 10 月 19 日夜袭晋北的阳明堡机场。焚毁日军飞机 24 架，毙伤日军一百余人。这是我军出师华北抗战以来，继 9 月 25 日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一千余人之后第二个重大胜利。这一胜利，给全师指战员极大鼓舞，使疯狂进攻忻口之敌丧失了空中突击力量。同时，迫使敌人不得不抽调兵力加强其后方守备，这就大大牵制了敌人，有力地支援了在忻口方向作战的国民党军和阎锡山的部队。平型关和阳明堡这两仗的胜利，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大长了中国抗日军民的志气。

我们到平定、昔阳一带时，沿正太铁路西犯之日军正猛攻娘子关，国民党军进行了顽强抵抗。日军为尽快夺取娘子关，以主力一部由井陉经测鱼镇沿正大铁路以南山地向西进犯，企图迂回娘子关地区国民党军侧后实施夹击。为迟滞日军进攻，挫敌凶锋，一二九师奉命绕到进攻娘子关之敌侧后，寻机歼敌，配合国民党军阻止日军西进。七七一团一部于七亘村以东老爷庙后山设防，阻击从测鱼镇西进之日军。10 月 22 日上午，日军一个联队兵力向我进攻，我军顽强阻击。敌多次发起冲锋，均被打退。激战至黄昏，我军撤出战斗。毙伤日军 70 余人，我伤亡 30 余人，一营副营长徐其海受重伤。

黄昏后，七七一团全团在七亘村集结，准备后半夜进入新阵地。由于轻视敌人，部队未行动前遭到日军袭击，受了些损失，但部队仍按计划进入新阵地，继续执行阻击任务。

七七一团七亘村受损失这件事，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站见到刘师长时说：看起来，你们八路军的游击战还是不行，还得靠正规战啊！我们听了非常生气。当时正太路防御战是由黄绍竑负责指挥的。

10 月 26 日、29 日，七七二团在七亘村进行了两次伏击。第一次毙敌 300 余人，缴获骡马 300 余匹及大批军用物资。我军仅伤亡 10 余人。第二次毙敌 100 余人，缴获骡马数十匹，我们伤亡 20 余人。我们又见到了这位“ 黄长官 ”，便把缴获的一匹日军战马送了给他。并对他说：我们缴获的战利品多得很，送给你这匹马是点小意思。

太原失守后，蒋介石害怕日军继续向河南推进，遂派汤恩伯率部到榆次地区部署兵力，构筑阵地，企图阻止日军继续南下，策应平汉线作战。汤恩伯当时是国民党第二十军团司令兼第十三军军长。汤部到达山西榆次以南的榆社时，即遇到从前线溃退南撤的国民党军。汤部见此情形也不敢再北进了，

将指挥部设在榆社。

汤恩伯到榆社后，和我军联系商谈协同作战问题。刘师长和徐副师长到榆社会见了汤恩伯，和汤谈了很长时间。主要是说服他不要再南撤了，从大局出发，支援山西战局。只要他定下决心阻止日军南下，我军一定积极配合。还向他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讲了如何开展游击战争。汤部的纪律之坏是出了名的，开进山西后，欺压群众，鱼肉百姓，山西的老百姓怨声载道。因此，我们还向他讲了军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脱离了群众便无法坚持抗战。我们这样讲是有针对性的。

这次和汤恩伯的会谈并没有起什么作用。虽然汤说了些“携手合作”、“同舟共济”一类的话，只是表面上的一些客套话。会谈后，汤部很快就从榆社向南撤到长治一带，司令部设在晋城。以后，又率部跑到河南去了。抗战期间，河南人有一句口头语：“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汤恩伯）”。可见汤部的纪律是何等之坏。

太原失守后，华北的国民党军大部撤到黄河以南去了，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成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太原失陷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签署了中央军委对八路军的指示，要求八路军在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和晋西南地区控制一部兵力对日军作战，大部兵力分散到各要地组织群众武装，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筹办粮饱，实现自给，扩大部队，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人向内线进攻。

为加强地方党的工作，北方局将平汉线省委改为冀豫晋省委（后改称晋冀豫省委），李菁玉任书记，李雪峰任组织部长，徐子荣任宣传部长，我任军事部长。省委随一二九师师部活动，当时，中共省委不公开，对外称“一二九师编辑部”。

根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一二九师在昔阳县武家庄及和顺县石拐先后两次召开干部会议，进行坚持华北抗战的动员，传达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建立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具体部署开展山地游击战的各项工作任务。一面继续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一面分兵发动群众扩大队伍。石拐会议后，师部移驻辽县（今左权县）。师的主力部队分别在同蒲铁路东侧、正太铁路南侧和平汉铁路石家庄至磁县段以西地区展开。

当时，我们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只有 3 个团。根据开展游击战争的需要，我提了一个建议：把部队中副职抽出来，搭成团的架子，政治部的领导同志分别带队，下去搞扩兵。同时也搞点枪、搞点钱。当时是个好机会，机不可失。因为那时群众抗战热情极高，许多热血青年请缨杀敌，报国疆场。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纷纷溃败南撤，散兵游勇很多，散落的枪支也很多。搞钱也不难，有利条件不少，可以同当时的政府一起筹款。因为，抗战开始后，阎锡山将山西全省划为七个行政区，晋东南地区主要属于第三、第五行政区，第三行政区主任是薄一波同志，第五行政区主任是戎子和同志。薄一波同志还担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又称新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还是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沁县中心区负责人。戎子和同志是决死队第三纵队司令，牺盟会长治中心区负责人。此外，还有廖

鲁言、周仲英、杨献珍、韩均、徐子荣等十多位同志在那里任政治委员。

师首长采纳了我的建议，派我和师政治部组织部长王新亭、宣传部长刘志坚，分别率领从部队中抽调一些骨干组成的工作团和步兵分队，到沁县、武乡、沁源、襄垣、安泽、屯留、长治、平顺、陵川、高平、晋城等地，配合地方党开展工作，放手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各种抗日组织和地方抗日民主政权，扩大部队。七七一团政治处副主任赵基梅率该团第三营两个连随我去晋东南扩兵。这支小部队很快发展成一二九师赵（基梅）涂（锡道）支队。

我去晋东南扩兵时，刘伯承师长、徐向前副师长让我代表他们到晋城去拜访一下汤恩伯。刘帅、徐帅同他打过很多仗，可以说是老对头了，他们之间彼此很熟悉。当时是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嘛，拜访一下也是很自然的。我去时穿着普普通通的八路军服装，打着绑腿，带了个警卫员。那时没有军衔，除了带有“八路”二字的臂章外，也没有其它什么标志。汤恩伯当时是军团司令。为了进见时通报方便，拜访前临时写了张名片：“宋任穷，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九师政训处副主任，湖南浏阳。”

见到汤恩伯时我说：“刘伯承师长、徐向前副师长委托我来看望汤司令。”

他说：“外面有太阳，就在外面坐。”

我们俩坐下后，天上的地下的闲谈了一通。谈得很多，也很随便。我们闲谈中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有一点我不了解，你们八路军为什么打仗总打不散，散了也能够收拢来。我们的部队就不行呢？”

我说：“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军队每个连都有共产党支部。汤司令要学的话，我们派些人到你的部队，也在每个连建一个共产党支部。保险你打散了又可以收拢。”

他听了后哈哈大笑。汤恩伯周围的一些随从见到我这个二十多岁的八路军年轻军官同他们的司令长官讲话如此随便，感到十分惊讶。

红军、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不管物质生活如何菲薄，战斗如何频繁，都能上下一心艰苦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汤恩伯是理解不了的。

我在晋东南时，彭真同志到沁州，要从一二九师调一个人去沁州帮助薄一波同志加强新军工作。当时，领导提出让我去。《周恩来选集》（上卷）中有一个电报，是 1937 年 11 月总理从临汾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人发的，电报说：“加强各军区的工作。加强晋东南，提议宋任穷、彭真去主持，以决死队八千人为基础。”（见《周恩来选集》上卷 80 页）讲的就是这件事。我到了沁州彭真同志处。后来，中央又取消了这个决定。于是我又回到了一二九师，彭真同志去了晋察冀中央分局。

第七章　开辟冀南

1938 年春，华北正面战场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华北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尽陷敌手，日本侵略者趁机抽出大批兵力南下，投入华中战场。企图首先夺取战略重镇徐州，打通津浦铁路，以连贯南北战场，尔后全力会攻，夺取武汉。这样，日军在华北战场上的兵力相对减少了。这种态势，在客观上为我军深入发展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敌后平原抗日根据地是个有利时机。

八路军挺进冀南平原
冀南根据地不断扩大

一二九师进入太行山区抗战以来，深入发动群众，积极配合我军作战，连续取得阳明堡、七亘村、黄崖底、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战斗的重大胜利，在晋东南山岳地带站稳了脚跟。这就为我军逐步向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建立了良好基地，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二九师派兵进入冀南平原之前，冀中平原已经有了吕正操的部队。吕正操同志是原国民党东北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是共产党员。 1937 年 10 月 14 日，他拒绝国民党南撤命令，率部于河北省晋县小樵镇誓师抗日。吕部编为人民自卫军，与我党领导的河北游击队相结合，在冀中平原开展游击战争。这为我们向冀南平原发展也创造了条件。

冀南地方党也几次派人到太行，要求我军尽快派兵东进冀南。

冀南，泛指河北省南部。西临平汉铁路，东接津浦铁路，北边靠沧州至石家庄公路，南边跨漳河。冀南的地理位置很重要，西临太行，东临山东，是连接山西和山东两省的纽带和桥梁。冀南向北可达北平（今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向南可通中原大地，东西可控制平汉、津浦两条铁路干线，是南北交通的要害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冀南地区不仅交通便利，而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为我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冀南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我党在冀南人民中间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冀南地方党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指示，积极地开展抗日工作。不久，成立了以马国瑞同志为书记的直南临时特委，积极领导恢复冀南各地党的组织，宣传抗日救国，建立抗日武装，为我军创建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在思想上、组织上做了必要的准备。

“七·七”事变后，冀南平原沿铁路线的城市很快沦陷敌手。日军所到之处，疯狂地烧杀抢掠，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惨案。冀南人民生活在腥风血雨之中。在此国难当

头，国民党及其政府理应同人民一道抵御外侮，拯救国家民族于危亡。然而，国民党军一撤再撤，政府官员畏敌潜逃，冀南一时陷入无政府状态。在此形势下，一些汉奸趁机四处活动，组织维持会、伪政府。也有些人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深感国家民族危亡的严重性，自发组织武装抗日救国，像武强、深县一带段海州组织的“青年抗敌义勇军团”，宁晋、赵县一带赵辉楼组织“民众抗日自卫军”等等。还有些人利用群众积极要求抗日的心理，打起抗日旗号，拉队伍组织武装。一时间，各色各样杂牌武装以及民团、土匪蜂拥而起，当时组织的各种武装，除我地方党领导的以外不下百余股，人数多者达数千人，少者十几人。有人形容当时是“司令如毛，土匪遍地”，也不无道理。确实，有些名为抗日，实则土匪；有的暗中勾结日寇，当了汉

奸。他们各据一方，不断扩充自己势力，进而互相火并。对群众横征暴敛，鱼肉乡里，烧杀奸淫，无恶不作。除了这些拉杆而起的武装，还有些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利用群众要求安定社会秩序的心理和一些封建迷信思想，趁机组织起各种会道门，如南宫、枣强一带的六离会，衡水一带的二坎会，平乡、广宗一带的大刀会，以及什么白极会、黄沙会、红枪会、天门会等。参加会道门的许多群众是为“防匪自卫”、“保家护村”，但其中有些头头暗中通敌，名为会首，实为汉奸。

处在外侮内乱极度混乱局面下的冀南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夕数惊，鸡犬不宁。田园荒芜，民不聊生，他们翘首盼望八路军出师冀南，领导他们抗日救国，安定社会秩序。

一二九师首先派往冀南的是由孙继先、胥光义同志率领的挺进支队。孙是队长，胥是政委。挺进支队是由师教导团抽调的 30 余名营连干部组成的。挺进支队出发前，刘师长亲自交待任务：了解情况，帮助地方恢复建立党组织，宣传抗日救国，建立抗日政权和各级抗日武装。此前，一二九师曾组织先遣支队，由张贤约率领下太行侦察了解情况。先遣支队没有到平汉路东冀南地区，只派了冷赤哉（冷后来逃跑了）、熊德如、王金材三同志过铁路到任县邢家湾和尧山县等地，了解冀南地区抗日情况，后来这三个人留在冀南了。

1937 年 12 月 13 日，孙继先、胥光义他们到达冀南隆平（今隆尧县）一带，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和支持。在地方党的协助下，隆平及其周围一些县的抗日工作很快发动起来了，建立了“抗日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委会）。

为了迅速创建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派出挺进支队之后，又组建“八路军东进抗日游击纵队”（简称东进纵队或东纵）挺进冀南。陈再道同志任司令员，当时的冀豫晋省委书记李菁玉同志兼政治委员。师首长向陈再道、李菁玉等同志讲了我军开赴冀南，创建敌后平原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意义并交代了有关的方针、政策等。

1938 年 1 月 15 日，东纵到达隆平县魏家庄一带，与先期到达这里的挺进支队会合。会合后，胥光义同志任东纵政治部主任。整个东纵部队人数虽不多，只有五个正规连，其中三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一个机枪连，另有 20 多名干部。但是均系老红军，声势很大。我军进入冀南的消息传开，广大群众莫不欢欣鼓舞。一些杂牌武装的头头，有的也来找陈再道，要求委任。再道同志到冀南不久，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经过反复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成功地解决了巨鹿县以保安团为一方、土匪刘磨头为另一方火并的问题，东进纵队胜利开进巨鹿县城。“巨鹿事件”的和平解决，在整个冀南地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久，东进纵队即向南宫开进。再道同志率东进纵队开进冀南后，冀南地区的抗战形势发展很快。

我是继陈再道同志之后，于 1938 年 3 月到冀南的。从此，我始终在冀南地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八年的日日夜夜，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永远难忘。

东进纵队开赴冀南不久，根据冀南抗战形势的迅速发展，为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和领导力量，师首长又派我带着一个骑兵团、一个独立支队和一个机枪连开赴冀南。骑兵团是由原红军十五军团骑兵团和陕北红军的部分骑兵编成的，改编为八路军时是骑兵营，后发展成骑兵团。团长王振祥，政委邓

永耀。这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进入冀南后，配合东进纵队很快收复了十多座县城，消灭、摧毁伪军、伪组织，建立抗日政府，收编县保安队，建立抗日武装等。如：3 月 30 日收复广宗县城，4 月 4 日消灭盘踞在任县环水村的土匪刘国栋部（即刘磨头，刘表面上接受改编，暗中与日军勾结，仍干坏事，环水村是刘的老巢），4 月 8 日收复平乡县城，4 月 9 日收复南和县城，5 月 16 日参加平息反动的“六离会”，5 月 27 日收复邱县、曲周县城，5 月 29 日收复永年县城，5 月 31 日收复肥乡县城，6 月 2 日收复广平、魏县县城，6 月 11 日收复成安县城。

独立支队是河北省藁城县马玉堂组织的一支抗日武装。抗战爆发后，马玉堂在其家乡组织起一支抗日游击队，后不断发展壮大，编为“抗日义勇军第二路第五支队”，马任支队长，张正身任政委。在藁城、栾城、晋县、赵县一带活动。1938 年 2 月，这支部队到了平汉路西赞皇县黄北坪和我接上了头，经请示一二九师，恢复了马玉堂、张正身等几个人的党籍，并将马玉堂部改编为独立支队。我们去帮助整训，又派了些政工干部进去。那时候整训很简单，时间也很短，就是几天。讲讲怎么做政治工作。第一、官兵关系，官兵平等，不准打骂士兵，组织士兵委员会，搞好伙食；第二、军民关系，军民团结，鱼水深情；第三，瓦解敌军。大概就是这么几条。那时不讲太多大道理，简明好记。讲上几天就派去做政治工作，主要是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提高。马玉堂这支部队整训后我们给一个东进纵队独立支队的名称。马玉堂任司令，徐绍恩任政委，张正身任政治处主任。

我们这次开赴冀南的部队不少，浩浩荡荡，声势很大。到南宫后见到了陈再道、李菁玉同志。我和再道同志是在援西军时认识的，红军改编后又一起到了太行山区。他在红军时就是一员战将，身先士卒，英勇善战。我们和东进纵队会合后，上级决定我接替李菁玉同志担任东进纵队政治委员。

初到南宫时，我们活动的区域不大，只有南宫以西、威县以北一小块。骑兵团向南宫西南挺进，先后收复了广宗、平乡、南和、鸡泽、邱县、曲周、永年、肥乡、广平、魏县、成安等县城。再道同志亲率东纵一部消灭了威县城东伪军赵山峰部和临清的一些伪军。骑兵团每到一地即摧毁维持会等各种伪组织，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协助地方党建立战委会和抗日政府，委派抗日县长。如习从真为曲周抗日县长，韩希葛为永年抗日县长，孙意远为肥乡抗日县长，肖一舟为广平抗日县长，李慕三为鸡泽抗日县长等，安定民心。

冀南抗日形势的迅速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各地需要大批干部。为解决这一问题，东纵和晋冀豫边省委一到南宫，就办了一个干部训练班。后来扩大了，叫抗日军政学校，陈再道司令员兼校长，日常工作由东纵司令部训练科长王永瑞（即王蕴瑞）同志负责。当时省委对外不公开，对外称“编辑部”。东进纵队对外是公开的。学员由各地方党组织从进步青年或共产党员中选送。没有专职教员，教员就是李菁玉和我们这些人。讲的课程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游击战争，政治工作，发动群众等。学习时间不长，一个月左右就派下去工作。先后训练了几百名学员，大部到各县区战委会或政府工作。在创建和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斗争中，这些学员大都成了骨干，发挥了积极作用。

徐向前副师长抵南宫

统帅冀南党政军民

在创建和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关键时刻，徐向前副师长和师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同志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发展河北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率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三四四旅六八九团和曾国华支队（五支队），于1938年5月初到达南宫县城。我们向徐副师长汇报了冀南区的情况。徐帅和我们一起研究分析了冀南的抗战形势和我军的发展。5月10日，攻打威县城，毙伤日军百余人。5月6日，平息了南宫一带的反动会道门六离会叛乱。对六离会我们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做了大量的争取团结工作。我们多次召集六离会的头头谈话，苦口婆心劝他们与我军合作共同抗日。他们拒绝与我军合作，他们不但不抗日，还杀害我抗日人员，发动暴乱。

6月10月，王新亭同志率七七一团两个营也来到冀南永年、肥乡地区。我们以南官为中心，分兵向东、向南展开，先后收复了临清、高唐、夏津、枣强、曲周、永年、成安、肥乡等县城。开辟了运河以东、以西和漳河以北大片地区。徐向前副师长率主力部队开进冀南震动很大，影响也很大。他当时名气很大，他的名字一亮，许多人都来拜见他，请教抗战的大问题。先后来会见徐副师长的有聊城的抗战爱国将领范筑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临清专员韩多

峰、濮阳专员丁树本等。冀中的吕正操同志也来南宫会见徐向前同志。冀中平原游击战争发展较快，当时已经成立了冀中军区和冀中行政主任公署，吕正操同志任军区司令员兼行署主任。冀南本地有名望的人，更是渴望见一见徐向前同志，共商抗战大事。也想看一看徐是位什么样的人物，怎么打仗那么厉害。见面一看，向前同志文质彬彬，像个教书先生，和他们原来想像的大不一样。

那时向前同志从早到晚忙得很，很辛苦。我和再道、志坚同志是他的助手。他利用各种机会同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大量做团结争取工作。

1938年6月14日，范筑先来冀南会见徐副师长。范当时是山东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也称聊城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长。早年曾在冯玉样西北军任职，是位抗战爱国将领。1937年11月中旬，正当国民党军纷纷南撤时，他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裂陛北视，决不南渡”，决心抗战到底。范来冀南后，陈再道、刘志坚同志和我随同徐副师长会见了范，就抗战问题我们彼此开诚布公地进行了商谈。联合范筑先，把冀南与鲁西北的抗日力量连成一片，是我们挺进冀南平原的一项重要任务。

韩多峰是山东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也称临清专员），也是原西北军军官，和范筑先的关系密切，同我们共产党的关系也比较好。我们收复临清县城后，专署迁入临清城，与东纵合作抗战。 1938年9月，韩赴南宫参加冀鲁两省军政联席会议期间，沈鸿烈采取突然袭击手段，将韩撤职。

正当我们在冀南开辟抗日根据地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毛泽东主席于1938年5月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在这部著作中，深刻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及国际关系情况，提出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前途。同时指出中国必须进行艰苦的抗战，只有坚持民族统一战线，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才能克服困难，取得最后胜利。当时拜读毛泽东主席这篇光辉著作，联系抗日斗争现实，深感这是部了不起的著作，使我受益匪浅。《论持久战》明确提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具体战略任务

与实现这些任务有关的政治、军事方针，始终指导了冀南的抗日斗争，成为鼓舞冀南军民应付严重局面，渡过难关、夺取最后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

正确执行政策
收编各类武装

“七·七”事变后，冀南地区出现了很多打着各种旗号的武装。如何按照党的统战政策，正确对待这些武装，是我们进入冀南后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些武装出现的原因是：日军打到冀南来了，国民党军队向南溃退，国民党的地方政府也跟着跑了，成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流落在民间的枪支很多，有些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看到日寇入侵步步紧逼，山河破碎，同胞受辱，愤然组织起武装抗日救国。还有些人出于“保家护村”，也组织起武装。也有少数土匪坏人趁机组织武装，扩大势力。也有些人在日本入侵的形势下感到没有出路，拉起队伍寻找出路。这些武装，有的称“游杂武装”，有的称“杂色武装”，也有的称地方武装。不管如何称呼，其基本特点是相同的，就是杂。政治目标杂，组织成份杂，内外关系杂。这些武装，除个别为汉奸坏人操纵外，大都程度不同地具有某些抗日要求，他们既有被我争取、改造的可能，成为真正的抗日武装，又有被敌人收买、利用的可能，成为助敌为虐的反动武装。他们是敌我友三方都在争取的力量。对此，中央军委曾给邓政委、徐副师长和我发过电报，指示我们“对冀南各县保安队及其所属的零散部队迅速设法去改造或收编，以免被他人利用。

根据军委和师首长指示，我们积极争取、收编、改造各色武装。同样，敌人在其已占地区也是大力收编土匪、保安团队，组建伪军，推行”以华制华“政策。威县伪警备旅就是被日军清水部队收编的原威县城北的民团。这支部队经过冀南地方党做工作大力争取，加之我军声望和胜利发展的影响，毅然弃暗投明接受我军收编。我们将该部编为“冀南抗日游击独立第二师”。在威县七级一带进行了整训。我到七级镇召开营级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动员。我给他们讲了抗战形势，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改变这支部队的复杂成份，派了些党员骨干和青年知识分子进去。在部队中发展党员，加强党的工作。这个部队大部分是威县子弟、是一支土生土长的游击武装。地域观念较强，愿意在本乡本土抗日。针对这种思想，我着重向他们讲了抗日与爱乡的关系，爱家乡首先要救国家。抗日不能只在本地抗，抗日不能“自扫门前雪”。这支部队经过几次整编，后来编为新四旅十一团、转战南北，屡建战功，成为冀南主力部队之一。

段海洲的“青年抗敌义勇军团”和赵辉楼的“民众抗日自卫军”是接受我们改编的两股比较大的武装。

段海洲是河北安平县人，学生出身。“七·七”事变后，在家乡一带联络了一些亲朋友好和一些热血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有少数共产党员），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称为“青年抗敌义勇军团”，段为司令。这支武装发展很快，到 1938 年初就有 4000 余人。驻在武强一带。另在冀县一带有一支武装称“河北民军第二路”，头头叫赵云祥，他是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南撤时未走的一名军官，收罗了一些散兵游勇，打起“抗日”旗号，很快发展到数千人，占据了冀县、衡水一带。为扩充实力，多占地盘，赵部想吃掉段部，两部有矛盾。

我到冀南前夕，再道同志曾邀请段、赵商谈共同抗日。当时段、赵两部是冀南地区各种武装中最大的两股。我军初到冀南，争取和团结他们共同抗

日，或暂时保持中立，对我军发展有利。

后来，段海洲派他的秘书陈元龙等几次来南宫，表示愿意接受改编。段本人也曾亲自来南宫，我们接待的非常热情。徐副师长亲自和他谈话。我和再道同志也参加了。我们态度诚恳、坦率，推心置腹。段很受感动，大有相见恨晚之情。段一再表示愿意接受改编。我说：欢迎你参加八路军，我立即给总部首长发电请示。第二天我和再道同志请段和陈元龙吃饭，席间收到刘师长的回电，同意收编段部，我们举杯相庆。徐副师长对段说：部队是你辛辛苦苦组织起来的，改编时不给你拆散，保持原有的干部和编制。名字改一改，叫一二九师“青年抗日游击纵队”（简称青纵）。段仍当司令，派李聚奎任政治委员。

我们所以能顺利改编段部，主要原因：一是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和我军的模范行动；二是受赵云祥部威胁，恐遭吞并；三是内部的地下党员和一批爱国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四是段海洲本人有一定的抗日要求。

为了改造和培养干部，段部改编为青纵后在南宫县苏村办了培训班。徐副师长讲授“运动战与游击战”，我讲授“统一战线”，刘志坚同志讲授“政治工作”，张茂林讲授“敌军工作”。

后来将以老红军团——七七一团为骨干的独立旅编入青纵。段仍为司令，徐深吉为副司令。这支部队战斗力大大加强，成为一支正规的野战部队。在长期战斗中，造就锻炼了一大批优秀指挥员。有的建国后成了国家的高级干部，有的当了将军。也有一些同志在胜利前就血洒疆场，以身殉国。青纵政治部副主任陈元龙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1985 年陈元龙的父亲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并寄给我一封信，我给回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表示：“元龙同志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我们至今仍感到十分悲痛……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冀南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八路军指战员、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包括陈元龙同志在内。”

后来段海洲因患眼疾请假回乡，徐副师长批准了他的要求。行前还送了些马匹、枪支，段回去后，又将马匹、枪支送回来了，他本人离了队，到了石友三那里，他们有旧关系。讨逆时，徐深吉同志曾给他写了一封信，晓以大义，劝其回头，他听不进去。段海洲离队，抱憾终身，主要责任在他自己。如果从我们工作上严格检查，也不是没有一点教训的。

我们收编的另一支较大的武装是赵辉楼的部队。赵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旧军人。“七·七”事变后，为了“保家护村”抵御土匪骚扰，组织起束鹿、赵县、藁城、栾城、晋县五个县的联庄会。其成员大部分是农民。为争取赵辉楼共同抗日，地方党派人去做工作。1938 年初，五县联庄会改编为“民众抗日自卫军”。后来赵辉楼主动提出要将其部队改编为八路军。我们就改编问题和赵进行商谈。商谈结果并报请上级批准：一、赵部改为八路军冀豫抗日游击支队，赵为司令员，赵月舫为政治部主任。编三个团，每团两个营；二、给赵部派各级政治干部；三、暂驻束鹿、晋县、藁城、赵县地区及石家庄一带活动。冀豫支队开始改编时，曾有加不加“八路军”三个字的讨论，后来还是同意在“冀豫支队”前加上“八路军”。

1938 年秋，根据一二九师首长指示，赵辉楼部和汪乃贵支队合并，仍称八路军冀豫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冀豫支队），赵任司令员，副司令员汪乃贵，政治部主任赵月舫，参谋长范朝利。赵辉楼同志进步很快，不久就入了党，成为我党正式党员。这支部队后来调给三八五旅了，成了一支骨干力量，赵

担任副旅长。冀豫支队的有些干部留在冀南了，如范朝利、李定灼等同志。

除这三支较大的外，还收编了许多股各类武装，像景县的葛贵斋、衡水的邵伯武、邱县的李景龙、冀县的金庆江、宁晋的赵勤甫，以及许多县区的保安队等。葛贵斋还当了我们军分区的司令员，后来叛变跑了。

为了安定冀南社会秩序，对有些作恶多端顽固不化的惯匪，我们毫不手软，坚决打击消灭之。比如任县的刘国栋，绰号刘磨头。不仅不听我之忠告，反而卖身投靠日军。奸淫掠枪无恶不作。盘踞在号称小梁山泊的环水村，二十年来未能攻破过。气焰十分嚣张。我们一举将其消灭，群众拍手称快。

枣强县民团团长杨玉昆，也是一个顽固反共分子。暗中勾结日军，被秘密委任为枣强、景县、故城三县“剿匪”司令。我曾多次派人与其谈判，做争取团结工作，希望他放弃反动立场与我共同抗日。杨拒绝我抗日主张，并公然扣押抗日人员，限制抗日活动，并要把“战委会赶出县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刘志坚同志率部队开进枣强县城，将杨逮捕，解除了该县保安团武装。后我将该保安团改编为东纵独立团。

我们在武装工作上，尽管有些地方还有缺点，还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是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从 1938 年 1 月东纵到冀南，至 8 月底半年多时间，共争取、收编、改造各类武装近万人，这不仅极大充实壮大了我军力量，而且对安定社会秩序，加速根据地的创建都有重要作用。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也摸索了一些有益经验。主要是：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加强党的领导，这是首要一点。其次是团结新部队，首先团结其中的干部，尤其是其中的领袖人物。再就是必须及时而耐心的对下属部队及普通战斗员做政治工作，加强民族教育。此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不能操之过急、要求过高，不能一切像老部队一样要求。但也不能不讲条件过分迁就。

收编土匪武装比其他一般的武装就更艰巨、更复杂一些，必须想尽各种办法。因为土匪容易失去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所以最容易被敌人拉过去当伪军。收编土匪应与其订立条约，内容一般是坚持抗战到底，遵守政府法令，保护人民利益，服从指挥等。土匪一般重视所谓江湖义气。因此，除加强政治上团结外，还要注意私人感情的培养，遇事与他们多商量，多照顾他们，这也是对政治工作的一种辅助，也是帮助政治工作的办法。对于比较进步有民族觉悟的土匪，可保持原来编制，用原来的干部，但要加入新成份或把我们老部队编进去作骨干。派干部必须派强有力的干部。多带领他们对日军作战，在战斗的考验中可以淘汰一些败类。对民族觉悟不高的土匪，如不愿加入八路军可编为外围军，用各种方式帮助其进步。对最坏的土匪，收编成外围军都不可能，对此，在群众拥护下，在有胜利把握的条件下，坚决消灭之。

陪同邓小平、徐向前
会见卡尔逊

1938 年 7 月中旬，美国人卡尔逊到达南宫。卡尔逊是美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对中国人民友好，特别仰慕八路军的抗战精神。为了使他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战实况，遵照毛主席指示，刘白羽、欧阳山尊等同志陪同他巡行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卡尔逊七月十六日抵南宫，七月十九日离开，历时四天。此时，正值邓小平政委、徐向前副师长在冀南，由邓、徐两位首长亲自会见，我陪同。

卡尔逊在辽县一二九师师部已经见过刘伯承、徐向前同志。当时，卡曾

问刘、徐：你们的师部在后方，而部队在前面打游击，如果在正太路一带遇到敌人，那么先要向司令部报告情况，获得批准后才能打，时间怎么来得及呢？刘、徐笑着回答这位只习惯于正规战，不了解游击战的西方军人说：遇到这种情况，前方部队的首长有权根据游击战争的原则和当时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相机作出决定，不必事先请示。

徐帅这是第二次与卡尔逊会面，着重向他介绍了冀南地区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情况。徐帅告诉他：早在 1937 年 12 月，冀南地区派代表到一二九师师部，要求派人帮助组织游击队。一二九师先后派出三批人：第一批 24 人，1938 年 1 月派陈再道率五个连开进，在巨鹿、南宫一带创建了根据地，1938 年 3 月派宋任穷率骑兵团到冀南，扩大了发展规模。徐本人是 1938 年 5 月到达冀南的。徐帅还向他详细介绍了我们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采取正确的政策，收编各类武装所取得的成果。同时也告诉卡，对于破坏抗日，继续危害人民的土匪，我们坚决予以打击，以安定社会秩序。

邓小平同志向卡尔逊谈了一二九师部队在抗战爆发后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并取得多次胜利的情况，还介绍了我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小平同志说：“ 这些原则是：收复失地；开展我们所有军队的集体行动；动员人民；铲除汉奸和机关中贪官污吏；建立一个民主政府；和日本、朝鲜及台湾农民一齐开展反法西斯运动；没收汉奸的财产用之于抗战；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教育秩序；检举并逮捕汉奸；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我向卡尔逊介绍了冀南地区广泛发动群众，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抗日群众团体和抗日民主政权等方面的情况。

我们还同卡尔逊就国际政局问题交换了意见。小平同志告诉卡尔逊，我们从美国发出的电讯中获悉，去年日本从国外购置的战争物资有一半以上是美国提供的。卡尔逊听后大为震惊，他回到汉口后，曾公开要求美国停止将物资运往日本。

卡尔逊回国后，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位反法西斯战争的指挥官，一九四七年逝世。周恩来、朱德同志称卡尔逊为中国的“ 挚友 ”，赞扬他“ 对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增进中美人民友谊与争取美国实行进步外交政策的贡献，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纪念。 ”

建立抗日政权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

帮助冀南地方党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是我军开进冀南平原的重要任务。这对我们加速根据地的创建，安定冀南的混乱局面至关重要。因此，我们一到冀南一手抓武装建设，壮大我军力量；一手抓抗日政权建设，以动员组织千百万群众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中。

最先进入冀南的挺进支队，到了隆平地区后，很快就在周围几个县组织起“ 抗日战地总动员委员会 ”（简称战委会）。这一组织基本上是群众性的团体，但又与一般的群众团体不完全相同，是带有半政权性质的临时组织机构，是发动群众支援和参加抗战的领导机关。这一组织对广泛地、深入地发动组织群众抗日救国作用很大，它为逐步改造旧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准备了条件。从建立战委会开始，我们逐步建立起各县抗日民主政府以及区、村基层抗日政权。

东纵进入南宫后，建立了南宫县抗日民主政府。以南宫为中心向四周各

县发展，收复一地或一座县城，就组织战委会或建立抗日政府。那时我们的干部不多，采取“放县长”的办法，占领一座县城就召开群众大会，我们派一名干部当县长，当众宣布，请群众举手表决通过。那时八路军的威信相当高，又是战争时期，我们派的干部没有通不过的。当时急需干部，我们就开办训练班解决干部短缺问题。再道同志率东纵到冀南时，放的县长不多，还顾不上。我们到了后，逐渐多起来。

我们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实行“三三制”。所谓“三三制”，是我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政权时，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人员分配上所采取的一项政策。根据这一政策，在政　权人员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有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所谓“中间派”，就是一些开明士绅、开明地主。我们实行这种政策，目的在于保证我党对政权的领导，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实行“三三制”政权是毛主席提出的政策和策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阶级矛盾下降了，民族矛盾上升为第一位。地主阶级里除少数汉奸外，大部分是愿意同我们一起抗日的。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讲：“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斗争、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由过去红军时期打土豪改为联合他们抗日，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随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各群众抗日救亡团体也先后成立。如农民救国总会、工人救国总会、妇女救国总会、青年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抗日儿童团等。那时的儿童团很起作用，站岗、放哨，探消息、送情报。有些大人不太容易完成的工作，小孩子却可以完成。另外，还有文联，军分区开始时都有文工团。建国后长春电影制片厂有几位文艺工作者，就是那时文工团的演员。

这个时期，我们的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群众发动起来了，形势发展很快。虽然日军占领了平汉铁路和津浦铁路沿线的一些大中城市，然而内地的一些县城在我们手里。我们开进冀南地区不长时间，就收复了二十多座县城。

1938 年春，我们召开了一次冀南军政民联席会议，按照统一战线政策参加会的有各方面代表。军方有八路军代表，有赵云祥的“河北民军二路”，还有段海洲部的代表。段、赵两部和东纵经过三方会谈达成了协议。还有各县抗日县长和战委会主任，各救亡团体的代表。这次与会人员比较广泛，代表方方面面。会议通过了改革政治机构，统一军事指挥，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扶助人民春耕，开放民众运动等。根据各县要求成立了冀南军政委员会筹委会，推举巨鹿县著名士绅乔铭阁为主任。

这次会议后，我又召集了各抗日县长和战委会主任联席会议。根据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精神，讨论了县政权建设和民众动员问题。我着重讲了各县要建立抗日廉洁政府，让群众充分信任真心拥护。武装民众，肃清汉奸，整理地方财政，改善民众生活等问题。

7 月初，邓小平政委由太行到冀南检查指导工作。邓政委在南宫与徐副师长、再道同志和我研究了如何加快建设和巩固冀南根据地问题，进一步推动了冀南地方政权的建设。鉴于国民党已于武汉委任了鹿钟麟为河北省主席，主政河北。鹿受命在途。我们也要抓紧时机，加快政权建设的步伐。当时各地的党组织已普遍恢复和建立，已将原来的冀鲁豫边省委改为冀南区党委，区党委书记李菁玉，组织部长于光汉，宣传部长朱则民，民运部长张策

（后任组织部长），做为全区的党的领导机关。各县都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然而还没有统一领导全区的行政机构。遵照北方局和邓政委指示，8 月中旬，在南宫城召开了有各界代表参加的会议，决定撤销冀南军政委员会筹委会，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简称冀南行署）。会议选举杨秀峰为主任，我为副主任。

杨秀峰同志是位教授，大知识分子，才学渊深，博古通令，谦虚朴实。早年赴法国留学，后转入苏联学习。回国后，在（北）平（天）津地区文化教育界上层人士中，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七·七”事变后，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民训处冀西民训指导特派员”的身份在冀西建立了办事处（简称冀西民训处）。他打着国民党的旗号，以冀西民训处主任身份组织起冀西游击队，有几百人，杨任司令，郭峰、杨克冰等都是他的部下。冀南行署成立前，杨秀峰来到冀南，他是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的。

8 月 20 日，秀峰同志和我宣誓就职，冀南行署正式成立。行署下辖五个专员公署（简称专署）、五十一个县。一些爱国知名人士在各级政府中担任了一定职务，产生了良好影响。冀南行署做为冀南地区最高行政机关，成立后宣布了八条施政方针，主要有：动员冀南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广泛发动游击战争，坚持华北抗战。巩固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同胞，建立坚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抗战到底。建立廉洁政府，实施抗战教育等等。我们实行这八大施政方针有四个基本特点：一是坚决抗日，二是拥护统战，三是实施民主，四是改善民生。

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冀南十个月来的抗日政权工作》，刊登在 1939 年 1 月 31　日和 2 月 2 日两天的《新华日报》上。文章讲的主要是几个月来冀南地区抗日政权的建立过程，在叙述冀南行署的八大施政方针时，其中有一条的内容是拥护中央政府，拥护蒋委员长彻底实行抗战建国纲领，抗战到底。这一条内容在“文革”时期，给我招来了麻烦。一些人看到文章中有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提法，就简单化地批判我是投降主义。“文革”是极“左”思潮肆虐的年代，加上一些年轻人又不大懂得抗战时期那一段历史，他们有这种偏颇的认识，也难怪。其实，“拥护蒋委员长”是拥护他抗战到底。只有他抗战到底我们才拥护。他不抗战到底，谁还拥护他。那时一切服从抗日，只要抗日，我们就拥护，就联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象征着革命的红五星帽徽都摘下来了，换上了国民党军青天白日帽徽，那是当时的历史真实。如果不了解当时的历史，那不成了“投降”吗。文章还着重驳斥了当时有人散布的所谓敌后抗日政权不合法的问题。文章是这样说的：“可是某些人，他不去或者不愿意去正确的认识冀南抗日政权工作的成绩与我们的缺点，而一味不顾事实，抹煞成绩，歪曲真理，来进行不正确的批判，或者用一些不适合今天抗战环境的观点来看间题：（一）机械的合法观点——本来在今天的一切，应把握着‘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着抗日’的原则，尤其在敌人后方如何团结一切力量，反对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域中摧毁了伪政权，消灭了日寇汉奸恶势力，而人民自动的树立了抗日的新政权，在民族国家的观点上说来自无不法之处。我们今日对问题看法，只谈抗日与不抗日，也就是合法与不合法的标准。而某些人故意要在政权已经树立，工作正在胜利推行的时候，来曲解事实，认为未经政府批准，如何不合法。在执行中他并不能将工作推向前进，而是向后拉倒车。这样对沦陷区

域中抗战力量的团结只有损失，这种机械的合法观点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毛主席生前总是号召我们学点历史。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也号召青少年学习近现代史，从中了解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是如何受帝国主义侵略欺辱，我们党是如何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推翻了三座大山，创造了今天的美好生活。以史为鉴，可知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倘若忘记了历史，有些事情就可能看不清本来面目或者被歪曲。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成立标志着冀南有了我党统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权，冀南平原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全区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抗战局面。广大人民群众为了驱逐日寇保卫家乡，掀起了参加八路军的热潮。出现了许多“父送子、妻送郎，参军打东洋”的动人场面。使我军飞速发展。加之收编的各类武装，这时我们的部队不是成倍、而是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

这样，部队的吃饭问题，光靠国民党就远远不够了。按国民革命军序列，国民党是应该保障我们部队的给养的。但是，根本不可能。本来是想削弱、消灭我们，怎么可能保障供给，让我们发展壮大呢？有了自己的政权，才能顺利地筹粮筹款，解决部队及地方党政机关人员的穿衣、吃饭、医药、装备等。所以，行署成立后迅速制定了财政、工商、贸易、税收以及减轻群众负担的一些规章制度，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政策。第一是收税。束鹿县有个辛集（现已改称束鹿），是有名的棉花和皮毛的集散地，我们制定了“棉花运销救国捐和不资敌货出境税暂行办法”，依法收税。第二是纳公粮。不搞平均摊派，实行合理负担。制定了“冀南公平负担暂行办法”。按土地多少划分等级，实行累进税办法。有一个起征点，然后土地越多，征收也越多。地主阶级多负担一些，贫穷农民少负担些。多者多纳，少者少纳，大家都负担点，这样比较合理。第三是开设银行。1939 年 10 月我们办了个冀南银行，发行货币叫冀南票，在太行、太岳和冀鲁豫地区都通用。冀南地区比较富些，人口也比太行、太岳多，太行、太岳的物资、兵员要由冀南供给和补充一部分。

我们到冀南几个月时间，就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平原抗日根据地也初具规模，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党中央、北方局及一二九师的正确领导。刘、邓首长对开辟冀南非常重视，作过多次重要指示，特别是在关键时刻派徐向前副师长率主力部队抵冀南，直接领导指挥冀南各部队，我和再道、志坚同志作为他的助手。冀南的形势发展较快，工作做得比较好，与徐帅领导有直接关系。

第二、冀南地方党有相当基础，冀南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冀南地方党在长期斗争中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干部、党员，这些人土生土长，与群众有密切联系。“七·七”事变后，组织了各种抗日武装。在其他各色武装中也派进了一些党员，进行争取工作，而且很有成效。为我军开进冀南作了准备工作。

第三、正确贯彻执行了统一战线政策。因而，提高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威信，受到各界拥护。争取和团结了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的各界知名爱国人士，争取收编了一些各类武装，壮大了我军力量，推动了各项工作迅猛发展。

第四、时机有利。当时日军正集中进攻徐州、武汉，后方兵力不足，许多县城及广大农村为我军控制，为开展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抓住这一时机，加速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并为迎击日军回师华北“扫荡”作了准

备。

一九三八年，我在前方突然接到一份电报，内容是：钟月林已经从无线电学校毕业，要到前方工作。宋任穷现在何处，请回电。后来得知这份电报，是叶子龙同志根据毛泽东主席口述发出的。那时候，我们的前方与后方根据地之间都隔着敌占区，交通很不方便，除了电报外，几乎没有电话及信件等其它通讯形式。

当时，我们部队驻在冀南离南宫城八里之外的韩家庄。我正在重病之中，因感冒引发得了副伤寒，高烧不止，现在

我的一只耳朵不好，就是那时候留下的病根。当时，同志们都以为我没救了，已经为我准备了后事。尽管后来治愈，可那次病对我身体消耗很大。以前，我是个爱活动爱踢足球的人，那时足球放在我的脚边，我也无法踢滚它。当时，部队缺医少药的情况是很严重的。

我们接到电报后，大约有一个多月没有回电。不完全是因为我在病中。按常理，我身体不好，她更有理由来照顾。当时，前方部队里清一色都是男同志。除了康大姐和刘帅夫人汪荣华同志以外，几乎没有带夫人的。我当然不应该破这个例。

后来，听说钟月林来冀南是毛主席批准的。钟月林在延安找到毛主席，要求到前方工作。毛主席风趣地跟她开玩笑说：“前方的女学生可是多，你是不是怕宋任穷变心了？”在毛主席的关怀、安排下，钟月林随着张经武、江华等同志一起，途经西安到达我们前线部队，在军区电台搞报务工作。从此以后，她便一直与我在一起，共同经历了艰苦的八年抗日战争。

创造“人山”
开展平原游击故争

1938 年秋，为进一步加强冀南武装建设，成立了冀南抗日游击军区，我任司令员，王宏坤任副司令员。军区成立之前，就组建了几个军分区。为什么组建军分区这么急？我下太行赴冀南前，刘师长专门跟我讲：你去了以后，要把军分区快搞起来，光有正规军没有地方武装不行，要大力发展地方武装。所以，我到冀南后，根据当时的发展情况和部队活动区域，于 4 月底，初步划分了五个军分区，并向刘师长作了报告。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部队扩大，7 月，重新划定五个军分区。这时分区的部队和领导干部都是由东纵的各支队兼任的。这次划定的军分区的活动区域，后来虽有些变化，但变化不大。

日军攻占武汉后，中国的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侵略者虽然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土地和许多交通要道、重要城市，但遇到中国军队和广大人民的英勇抵抗。特别是我党领导的游击战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日军只能控制主要城镇和交通线。日本侵略者提出的“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速战速决的战略宣告破产，不得不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因此，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开始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集中其兵力对付敌后抗日军民。

1938 年 10 月下旬，种种迹象表明，敌人要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为迎击和粉碎敌人可能发起的“扫荡”，冀南部队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布置反“扫荡”准备工作。徐副师长作了重要讲话，分析了敌人近期“扫荡”的可能性，我军反“扫荡”作战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我

和再

道同志也讲了话，作了动员。会议研究了反“扫荡”作战的措施。

徐帅到冀南后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坚持开展平原地区游击战争，并使广大指战员在思想上坚定胜利信心。过去红军时代的游击战是在山地，靠山起家，只要有山就有办法。可是，能否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能否在平原建立根据地？最初还拿不准，不能肯定。党中央让各地先试一试。在河北、山东经过几个月的实践，党中央定下决心，向一二九师发出了发展河北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肯定了“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面深入群众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因此，迅速分兵，向冀南、豫北平原实施战略展开。我们开赴冀南平原前，一二九师首长们就考虑到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平原没有山怎么办？大家认为办法就是：在山区利用自然山，在平原建立人造山。刘师长说：平原没有山，要造人山。这山就是群众，有群众就有山。

创造“人山”是师首长集体的主张。但是，在平原地区怎样创造“人山”，采取什么办法造“人山”？徐帅最先下山，具体执行这一任务就落在他肩上了。

徐帅在冀南的时间不长，只有一年多。但是那一年多时间很关键，关系到决策能不能坚持平原游击战争这一大问题。徐帅到冀南后，掌握统一战线，军事、政治全盘筹划，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冀南的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造成了我军赖以依托的坚不可摧的“人山”。不仅使我军在平原地区站住了脚，而且开创了新的局面，并为进一步建设巩固和坚持冀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11 月中旬，日本侵略者根据先控制平原，再进攻山区的方针，向冀南地区发动了“扫荡”。敌人分别从石家庄、邢台、邯郸、德州四路出动，长驱直入，合击冀南腹心地区南宫一带。我军先后放弃了包括南宫在内的一些县城，冀南党政军机关撤出县城，在南宫、威县、广宗交界的一带沙地多林地区活动。东纵和青纵部分分散到广大农村，结合地方武装，分散游击。

冀南行署为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战，颁发了《战争动员紧急命令》，要求各地群众挖沟破路，空舍清野，积极配合部队开展反“扫荡”斗争，打击“扫荡”之敌。

我军避实击虚与敌周旋，采取伏击、截击、袭扰、围困等战术战法，不断打击、消耗敌人。敌人疲于奔命，捉襟见肘。在我军民打击下，于 11 月下旬，敌人被迫退出所占之南宫、隆平、故城、临清等县城。

日军“扫荡”冀南地区的同时，在鲁西北地区大举进攻聊城。范筑先率部守城抗敌，浴血奋战，壮烈殉国。噩耗传出，举国震哀。我们党中央高度评价了范筑先将军的抗战业绩和高风亮节。

通过敌人这次“扫荡”和我们反“扫荡”斗争的实践，深感敌人的汽车、坦克、骑兵等快速部队在平原上横冲直撞，对我极为不利。另外，冀南地区除各县城都筑有城墙外，不少较大的村镇都有围寨。如被敌占领，我军在无重火器情况下，很难攻克，对我也很不利。为了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根据这次反“扫荡”血的教训，我们进一步展开了挖道沟、拆城墙、围寨，改造平原地形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本来这一工作 1938 年初就开始了，这次冀南行署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凡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村民都参加。所有通行的大车路，一律挖成沟。对沟的深度、宽度等都作了具体规定。以通过

大车为标准，每隔一段，挖一错车宽沟。由于广大群众亲身体会到改造平原地形的重要性，挖沟的积极性非常高，男女老少齐上阵，日以继夜。道沟，使敌军的汽车、坦克、骑兵等快速部队难以行进，而根据地军民的转移却有了很好的掩护。冀南全区先后共挖道沟总长 5 万余里，显示了人民的伟大力量。

刘、邓、徐亲自领导反“扫荡”，推动了冀南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

1938 年 12 月下旬，刘伯承师长率一二九师主力部队从太行来到冀南。不久，邓小平政委也第二次来到冀南。这时刘、邓、徐首长都在冀南直接领导指挥我们，极大推动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

我向刘师长汇报冀南的情况，在说到冀南民众抗日情绪之高、对敌仇恨之深时，我举了两个例子，一是某些天主教徒在教堂作礼拜时，他们祷告：“保佑抗日军、保佑八路军，抗日军打胜仗、八路军打胜仗……”，二是一些老太婆也祷告我军打胜仗，还有的用白面粉做成小人，放在锅里煮。她们把小面人当成小鬼子，说：这么一煮，日本鬼子就不得好死。这些虽然带有一些迷信的色彩，但却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爱和憎，人心之向背。

刘师长听后笑容满面，非常高兴。称赞冀南的群众基础确实不错，老太婆尚能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刘、邓首长到冀南后，在威县七级西之老虎张庄（落户张庄）开了一次军政干部会，邓政委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根据冀南斗争形势，会议确定依靠工农群众，依托广大农村，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坚持冀南抗日民主阵地。敌人将会更大规模“扫荡”冀南，未雨绸缪，要充分做好各项反“扫荡”的准备工作。敌人为了进攻西北，对华北特别是对河北平原，必然要来一次更残酷、更严重地进攻与“扫荡”。我们说服了一些盲目乐观的人，有人认为“敌人不会再进攻冀南了”，甚至有人说“以五百伤亡把河北日寇完全赶出去。”我们进行了长期战争动员，号召抗日政府、群众团体、一切游击队、一切抗日正规军和广大人民，准备和日寇作长期斗争。

1939 年 1 月初，敌人开始第二次“扫荡”冀南地区。其规模比第一次大得多。敌人从平汉、津浦铁路东西两线共出动日伪军 3 万余人，分十一路进行大规模“扫荡”。这次“扫荡”，敌人改变了第一次“扫荡”时长驱直入的战法，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进攻方式。首先占领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的村镇、要点，逐渐向中心区压缩，企图将我军聚而歼之。

刘、邓、徐首长亲自领导指挥冀南军民展开了反“扫荡”斗争。根据敌强我弱态势，决定撤出县城，将部队分成若干集团，分区游击，独立作战，互相策应，依托广大农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当时把在冀南的部队分成几个游击集团：“五旅集团”、“六旅集团”、“青纵集团”、“东纵集团”和“先纵集团”。我负责指挥“东纵集团”，活动在五分区地区。再道同志指挥“青纵集团”。

这次敌人大“扫荡”，直到 2 月上旬才结束。“扫荡”结束后，我们军区、区党委、行署联合开了一次总结大会。邓政委在会上作了报告，指出冀南地区的中心工作是进一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加强政权建设。3 月上旬，刘、邓首长安排了冀南全面工作后，率师部及三八六旅主力等返回太行。徐副师长继续领导指挥我们冀南的对敌斗争。6 月初，他奉命也离开冀南，到山东去了。徐帅在冀南直接领导我们战斗一年多，我们朝夕相处，

度过了多少难忘的日日夜夜，真舍不得他走。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有师首长在冀南，我们感到有主心骨，心里踏实。师首长先后全走了，冀南的领导工作落在我和再道、宏坤、志坚以及李菁玉等同志肩上，深感担子沉重。

敌人两次大“扫荡”后，冀南的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敌人占领了所有县城及主要村镇，我军深入广大农村。“扫荡”与反“扫荡”作为主要作战形式日益激烈紧张，贯串抗日战争始终。当然，还有其它一些斗争形式，如“蚕食”与反“蚕食”、封锁与反封锁、围剿与反围剿以及交通战线上的修路与破路斗争等等。

敌人的进攻可分战役上和战术上的。在平原地区，敌人的战役进攻是有季节性的。大体在冬春两季是敌人大规模战役“扫荡”期。夏秋有了青纱帐，敌人要大规模行动比较困难，而这个时期对于我军则甚为有利，成了我军最活跃时期。

敌人战役进攻基本上采取两种作战方式，一是分进合击，二是分区“扫荡”。1939 年 1 月的大“扫荡”，敌人采取的是分进合击。当时，冀南很多县城在我军手里，敌人便出动数路分兵合击，夺占城镇据点。 1940 年春季的“扫荡”，敌人则采取分区“扫荡”方式。甚至逐渐采用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即调集几个据点的兵力，合击一点，其目的在于消灭我小部队，摧毁我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而增设敌据点，建立伪政权，扩大占领区。

敌人的进攻在战术上基本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采取以快速部队猛烈进攻，每次调集几十辆至百余辆汽车和坦克，组成合围圈，向中心地区冲击。由于冀南的河流没有像冀中那样多，加之开始时我们的破路不够，使敌人快速部队横行一时。但是后来我们开展交通破击战，改造平原地形，敌人的快速部队便不易施展了。第二个时期采取以步兵“扫荡”为主，同时以骑兵、空军侦察，并配以炮兵。

敌人出动时一般沿公路，避走村庄、树林和隐蔽地。而在返回据点时，也多绕道而行，避走旧路。这主要是怕遭我军伏击。敌人作战时，一般先行火力准备，然后按部就班进攻我军。敌人进攻作战时间，多在白昼上午 12 时至下午 3 时，黄昏后一般不行动，敌人最惧怕黑夜。

我军反“扫荡”作战方式基本采取游击战，同时也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敌人采取数路分进合击，我军则集中主力，打敌一路，以求粉碎敌之围攻。敌人分区“扫荡”，我则分散兵力，以小部队游击歼敌。

我们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基本经验：

首先必须有充分的战争动员与坚定的决心和信心。从思想上明确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意义和任务，我之胜利条件和敌之困难，从而坚定决心，树立信心。

其次是军政民三位一体紧密配合。军队打击敌人保卫家乡土地；政府进行普遍战争动员，筹集给养军需，维系民心；民众拆墙破路、空舍情野、带路、送信、报告消息等。三者密切相关相互配合至关重要。除军政民三位一体，还有正规军、游击队和民众武装三位一体有机配合，也是至关重要的。通俗讲：正规军是骨，游击队是筋，自卫军是肉。这种血肉不可分割的关系，是我们克敌制胜的保证。

第三、深入民众，动员参战，是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基本条件。在战争中，没有民众一切就无从着手。袭击敌人捕捉汉奸密探，空舍清野破路藏粮

等，都需广大民众去做。军队每到一地，都需要群众保密和掩护。特别是军队的给养供给更须依靠广大群众来解决。固然这些在山区也很重要，然而在没有天然山的平原地区，造成“人山”的意义，就更显得重要了。第四、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以提高抗日的决心和民族意识，保证一切命令的执行与任务的完成。最后一点就是要有灵活的作战指挥。这也是很重要的。

第八章　反磨擦斗争

日本侵略者攻陷武汉、广州后，停止了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转而集中兵力加强对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攻和“扫荡”，对国民党军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在日本政治诱降和美、英对日采取绥靖政策的影响下，国民党营垒发生了变化。汪精卫一派公开投降了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一派开始走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道路。

鹿钟麟主政河北搞磨擦

坚持独立自主，进行反磨擦斗争

1939 年 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建立了“防共委员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即在全国各地不断挑起反共磨擦，制造流血事件。不久，又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确定以政治“限共”为主的方针，进而实行以军事“限共”为主的方针，并发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同年 12 月，以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阎锡山部进攻晋西的山西新军和八路军为起点，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冀南反磨擦斗争，是自鹿钟麟主政河北来到冀南之后开始的。

1938 年 6 月，蒋介石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主席，鹿是河北定县人，早年在西北军冯玉祥部任职，奉冯玉祥之命率部将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赶出故宫的就是此人，他曾代理过西北军总司令，也曾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任过职。

鹿钟麟受命后即由武汉北上赴任。当时我冀南抗日根据地正日臻巩固，各项工作蒸蒸日上，蓬勃发展。我们对鹿钟麟主政河北，从国共合作抗战的大局出发，是持欢迎态度的。他路过山西长治时，刘师长与其商谈了有关河北抗战问题，并请他到师部驻地作了关于抗日的讲演。还召开了欢迎大会。彭总亲自在大会上讲话，表示热情欢迎，表明了我党我军团结合作抗战的真诚愿望。

1938 年 9 月 15 日，鹿钟麟到达冀南南宫城。鹿来冀南前，刘师长就通知了徐帅和我们几个负责同志，让我们作好准备。鹿到后，我们开了万人欢迎大会，徐帅发表了欢迎讲话。会后，徐帅与鹿钟麟进行会谈，我和杨秀峰、陈再道同志也参加了会谈。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谈的主要问题是：双方应坦诚合作，团结抗战；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是冀南唯一的政权机构；行署、专署和各县领导人，可由鹿以“省府主席”的名义正式委任等。

在谈的过程中，从表面看鹿的态度还可以，表示自己一无枪炮、二无军队，今后的抗战要多靠八路军，大家同舟共济，遇事互相商量等等。我们为表明团结合作抗战的诚意，将东纵到冀南后收编的邵北武部和王子耀部给了鹿钟麟。并根据鹿的要求，划定藁城、衡水、冀县、故城、新河等县负责对鹿的省府人员和部队的物资供应。但是，由于鹿钟麟有蒋介石的“反共”和向八路军“收复失地”的使命在身，周围又有一批国民党反共特务，除了说些冠冕堂皇的空话之外，对我们提出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均不表态，一个也不解决。后来，中共北方局代表朱瑞同志到南宫，会见了鹿钟麟，并与其商谈河北抗战问题，也未能解决实质性问题。

鹿钟麟到河北后，为扩大反共势力，四处搜罗反共武装。任命反共急先锋张荫梧为河北省民政厅长兼河北民军总指挥，将一些反共游杂土匪武装如

赵云祥、胡和道等部拉过去，并和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结成“冀鲁联防”，与共产党、八路军相对抗。

不久，鹿钟麟便自食其言，开始制造磨擦，破坏团结抗战。

9 月 30 日，鹿钟麟收编的胡和道部，勾结枣强县反动封建会道门的“白吉会”、“黄沙会”，进攻我驻该县姚屯的东纵独立团一部，杀害我战士 13 名，抢走步枪 17 步，制造了“姚屯流血事件”。我军以团结抗战的大局为重，没有还击。我和徐帅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气愤，立即向鹿钟麟提出抗议。各抗日群众团体为声讨胡和道杀害我抗日战士，联合组织成千上万群众到冀县北漳淮村鹿的住处请愿，要求惩办胡和道。在强大舆论压力下，鹿表示要严厉申斥胡和道，令其解散收编的会道门，交还抢走的枪支，抚恤我伤亡的战士及家属。

10 月下旬，鹿钟麟感到只靠收编的几股游杂武装和八路军斗，势卑力薄，便写信给他的上司，提议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和冀中行政主任公署，并要求调石友三部来冀南，任命石为河北省游击司令。

“姚屯事件”之后，河北民军赵云祥部又策动“白吉会”围攻枣强县城。高喊“撤换县长、驱逐八路军”的反动口号，气焰极为嚣张。赵部千余人趁机进占枣强县城西关。我们派区党委民运部长张策和青纵政委李聚奎为代表前去谈判，鹿钟麟对此事态度极为暧昧，不愿谈，在我强烈要求下被迫派邵鸿基为代表出面谈判。邵鸿基态度蛮横，坚持要接管枣强县抗日民主政府。谈判无效，只好以武对武。我们调骑兵团和青纵三团等准备反击，占领枣强县城西关的赵云祥部闻讯后，唯恐被歼，悄悄溜之大吉。我们平息了“白吉会”叛乱。

在鹿钟麟不断制造磨擦的时候，日军于 11 月中旬，对冀南抗日根据地开始了大“扫荡”。这是我们到冀南平原后，日本侵略者对冀南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扫荡”。我们根据游击战的战役战术原则，分散到广大农村，结合地方武装，避实击虚打击敌人，冀南党政军机关也随部队撤出南宫县城。鹿钟麟不顾冀甫军民艰苦地进行反“扫荡”斗争，竟乘日军占领南宫之机，别有用心的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不知去向”、“莫知所踪”为借口，公然宣布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同时，在各地任命他自己的专员、县长等。实际上，冀南行署撤出南宫后，一直活动在毗邻南宫县境的广宗、威县一带，曾几次用电话、电报与省府联系不通。专门派人去找鹿钟麟联系，也未见到省府和鹿的踪影。

12 月初，蒋介石为对付河北、山东地区的共产党、八路军，在河北成立了冀察战区，在山东成立了苏鲁战区。任命鹿钟麟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并将石友三部从鲁南调到冀南，任命石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察哈尔省主席。此后，鹿钟麟更加积极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路线，努力为蒋介石卖命。极力争夺地盘，也搞县政府、税务局，也派公粮，设村长。于是在一个县有两个县长、两个税务局长，一个村有两个村长。在我们基础好的地方，他就搞不成双的，基础不好的地方，一切都是双的。双专员、双县长、双税局、双区长、双村长，甚至小学校也是双校长。因此，磨擦不断升级，袭击、杀害我军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及抗日军人家属事件层出不穷。

我们从合作抗战的大局出发，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鹿多方做争取团结工作。1938 年 12 月 3 日，冀南区党委书记李菁玉去找鹿钟麟商谈，鹿十分傲慢，避而不见。隔了两天，我又去找鹿钟麟。这次总算没吃闭门羹，

可是谈了两个小时，没取得什么结果。鹿摆出省主席和战区总司令的架式，向我表示他愿意同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商量解决冀南问题的具体办法。

12 月底前后，徐帅害了一场大病，发高烧，身体很虚弱。幸好这时刘、邓首长来到冀南，直接领导冀南的工作，减轻徐副师长的担子。如何对鹿钟麟和石友三做工作，临时分了一下工，刘师长和我重点作鹿的工作，邓政委和刘志坚同志重点作石友三的工作。

刘师长到冀南后，多次和鹿商谈，劝他同我们合作抗战。有一次我跟刘师长去鹿那里，请吃饭，他带了个戏班子，演了一出“黄天霸拜山”，含沙射影挖苦我们。我先后随刘师长同鹿钟麟谈了三次，第一次是在南宫谈的，后两次是在冀县谈的。刘师长重申了我党我军与其合作抗日的诚意，推心置腹，坦诚相告。严正指出抗日是当务之急，高于一切，任何有损抗战、阻挠抗战、破坏抗战，都将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罪人。

我们如此真诚合作的愿望和顾全大局的态度，鹿视为软弱可欺，他更加肆无忌惮地以武力向我进攻。指使赵云祥部进占枣强县城，将我战委会赶出。我东纵二团干部、战士七八人，与日军作战时和大部队失掉联络，归队途中，被赵部捉去，收缴了武器，抢走了财物，并将人推入河中。王子耀部公然阻拦我军袭击敌人，打死我排长、战士 8 人。

国民党顽固派在其控制的地区，强迫群众实行保甲制、摊派制。不许实行我党制定的公平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不许群众成立抗日组织。总之，不许群众进行任何抗日活动。

后来，彭副总司令和鹿钟麟谈了一次。既坚持了原则立场，也作了些让步。但麟仍顽固坚持取消冀南和冀中两个行政主任公署，坚持执行保甲制、摊派制等，并要将我们组织的游击队改为“保安队”。

彭鹿会谈后，鹿钟麟即指使冀中的张荫梧、冀南的王子耀、赵云祥等不断向我进攻。为了坚持抗战，反对磨擦，我们冀南部队向王子耀部发起反击，冀中七支队（暂归一二九师指挥）向张荫梧、乔明礼部反击。我们将王子耀部大部歼灭，王逃到尧山投降了日军。张荫梧在冀中遭到歼灭性打击后，率残部经冀西逃到赵县一带，被我冀南部队歼灭，张只身逃窜。乔明礼被七支队活捉。刘师长想乘此机会争取乔，指出如今后能与我共同抗日，可放他回去。我根据刘师长指示，到河间县将乔明礼接到南宫城，作教育争取工作。乔一再表示：兄弟回去，今后决不参加反共漩涡，不再搞磨擦等。乔回去后，不久即自食其言，进攻我军。战败后，逃到石家庄投降日寇，当了汉奸。

鹿钟麟主政河北一年多时间，蒋介石认为其政绩不佳，未能完成蒋介石密授的“收复失地”，掌握河北的使命，有负蒋的厚望，不得不辞去河北省主席一职，还保留冀察战区总司令职务。但搞磨擦的积极性不那样高了。继鹿钟麟之后，石友三成为在冀南地区大搞磨擦的主角。

鹿钟麟在抗日战争时期奉蒋介石之命，同我们搞磨擦，作了坏事。全国解放前夕，他没有跟着蒋介石到台湾去，而是留在天津做寓公，没有反共和反人民的言行。我们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记前嫌，对他采取争取、团结的方针，安排他担任中央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五十年代，在一次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我和鹿钟麟见了面，他迎上来，拱着手大声叫我“任穷兄”，对自己在抗战期间的作为表示歉意，连声道“对不起，对不起”。我笑着说，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不必再提它了。

石友三顽固反共降日

冀中冀南联合讨逆

石友三是吉林长春人，在冯玉祥部下当过马夫。因善于投机钻营，连连擢升至西北军第五军军长。此人一贯反复无常，朝秦暮楚。三次投靠冯玉祥又背叛冯玉祥，投靠张学良也打过张学良，投靠蒋介石也打过蒋介石，因此，人们称他为“倒戈将军”。

我们对石友三的底细和为人是清楚的。日本侵华，大敌当前，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为了动员一切可能抗日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石友三这样的人，我们也是想方设法通过多种渠道做争取工作。早在抗日战争前夕，当时任冀北保安司令的石友三就与平津一带的日本特务、汉奸、亲日分子暗中来往。为争取石不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我华北联络局、东北特委和北平市委先后派人到石部做工作。杨秀峰、张友渔、黄松龄等同志，受党组织的派遣，以左派教授的公开身份与石友三建立了联系，轮流到石处，给他讲国内外形势、全民族抗战的道理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指出只有抗日才是唯一出路。在全国人民风起云涌的抗日高潮推动下，经过我们大量的工作，石友三在抗战初期曾一度表示愿意和我们合作抗日。

“七·七”事变后，石任国民党军第一八一师师长，不久扩编为六十九军，下辖一八一师和高树勋新编第六师，石任军长兼一八一师师长。石部先驻豫北，后到鲁南沂蒙山区。在此前后，张友渔、张克威、袁也烈、赵濯华、于克、王天、陈壮猷、孙湘等同志到石部工作，张友渔任六十九军政治部部长，张克威任学兵大队长。学兵大队是我们建议成立的，后改称教导总队，石兼总队长，康博缨任副总队长，吸收北平、天津、济南、西安、东北等地的一些爱国青年参加，学员受教育后派到石部基层做政治工作。

在此期间，石一再表示进步。对其部下官兵声称：“一定要打回东北去！”对我军则信誓旦旦：“要共同抗日，决不搞磨擦。”石友三当时既有这些抗日表示，我们就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他当作友军，对他采取团结和联合的方针，尽量争取他留在抗日阵营内，时间越长对我越有利。石友三在鲁南和日本特务、汉奸虽未完全断绝暗中联系，但他还没有公开反共和投降日军，同我党我军表面上保持着比较好的关系，这对当时的抗日大局是有利的。

蒋介石为了笼络石友三，加强华北的反共力量，提升他为第十军团军团长兼六十九军军长，并应鹿钟麟请求，于 1938 年底调石部到冀南。随石友三从鲁南来冀南的有一八一师、暂编第三师、特务旅等部队，共一万余人。

石到冀南初期，他心里很明白，孤军远处敌后，立足未稳，虽然有老上司鹿钟麟支持，但鹿也是下车伊始的光杆，唯一可以利用的友军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因此，表示愿意同我合作抗日。我们对石继续采取联合的方针。我和杨秀峰、刘志坚同志多次到南宫县乔村看望他，耐心地对其做工作，希望他真诚抗日，不搞磨擦。邓小平政委和刘志坚同志先后三次与石会谈，表明我军团结抗战的诚意，劝其与我坦诚合作，共同抗日。

我们对石友三一方面在政治上积极争取，一方面在物质上竭力相助。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尽量给石部以照顾和优待。八路军战士吃小米，省下白面给石军吃；八路军缺衣少穿，还帮助石军解决棉衣等。可以说，我们对石友三做到了仁至义尽。

石友三到冀南不久，日军加紧对我进行“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

造磨擦，我们当时的困难处境正像刘伯承师长所说的那样，“前门拒狼，后门拒虎”，处在敌顽夹击之间。就在这时，蒋介石又给石加官晋爵，提升他为国民党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并将河北游击总指挥孙良诚部以及赵云祥、胡和道、孟昭进、夏维礼、邵鸿基等部划归石指挥。同时还将戴笠在山东成立的忠义救国军第八师张栋臣部调冀南归石指挥。发给石部步枪 800 支、机枪 30 挺、子弹 100 万发，还给石部一次发半年薪饷。蒋介石还电令石友三：“在万难中拿住冀局，以对付八路军。”还告诉石：华北平原不能让共产党八路军作根据地，遗患未来，必须与鹿钟麟同心协力将八路军消灭或撵到北边去。

石友三受到蒋介石的青睐和褒奖，受宠若惊，自认为蒋对他真是捐弃前嫌，倚他为方面大员。感到现在人多了、枪多了，羽毛已经丰满，实现个人野心的时机已到，反复无常的本性大发作，便对我反目为仇，排挤走了张友渔等一批同志。之后，石在冀南取代了鹿钟麟的权势，变本加厉地制造磨擦，犯下了累累罪行。

为破坏我抗日民主政权，石友三向南宫、枣强、清河、景县等委派了他们的县长、税务局长和各区区长，以至村长。在双政府、双县长的对峙局势下，他们依仗武力横征暴敛，为非作歹。仅半年时间，就从南宫及周围各县勒索粮食几百万斤，搜刮货币和布匹不计其数，人民苦不堪言。石部还经常假冒八路军，四出抢劫、绑票、奸污妇女等，蓄意败坏我军的声誉。为了从经济上搞垮我们，石友三还用日军送给他们的印刷机私印国民党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的假钞票，强迫群众使用，并到处焚毁我冀南银行发行的钞票，毒打使用冀南钞票的群众。

石还不断制造军事磨擦，任意捕杀、活埋我抗日干部和家属，袭击我抗日军队。仅清河一县，就捕杀我县游击大队长及抗日人员家属 50 余人，并击伤我东纵三团及清河、清江两县游击队战士 57 人。在南宫县，包围、缴械我八路军东进纵队 2 个连，在临清西南小营村将青年纵队 1 个排缴械；在曲周，将我基干队 20 余人缴械，在威县，我青纵二团等几十人，在反“扫荡”中与部队失去联系，被石部抓去后全被活埋，令人发指。他们还丧尽天良地袭击威县贺钊一带我八路军后方医院。石友三还派其弟石友信等到北平、天津、济南与日军勾结，达成互相配合攻打我军的默契，并从天津聘来日军军官吉田为顾问。 1940 年初，石部公开配合日军 500 余人，“扫荡”我广宗地区。

石部主力到冀南后，长期盘踞在我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清河、威县、巨鹿、广宗、南宫、枣强的一些地区。为了对我发起大规模进攻，石调兵遣将，令其主力向南、向西移动，将新八军高树勋部由冀鲁边调至观城一带，向鲁西北、冀南伸延。这样，石部便与山东省主席沈鸿烈部和国民党濮阳专署专员丁树本部相连接，企图隔断我冀南和冀鲁豫之间的联系。石将其兵力部署在北起河北省的南宫、冀县一带，向南蜿蜒至山东省的观城一带，形成长达 150 余公里的长蛇阵。公开叫嚷要先发制人，打倒共产党，消灭八路军。他在一次动员其部队进攻我军时说：过去我们在山东与共产党合作，是为利用共产党发展自己，现在是利用日本人发展自己。他还大量散发《告官兵人民书》，大肆造谣、诬蔑我党我军。

正当石友三制造磨擦，捕杀我人员，袭击进攻我部队日益加剧之际，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顽军的军事进攻，要在有理有利条件下坚决反击的指示，命令我们对石友三部发起反击。对石友三这样的反共顽固派，“如

果不加以惩罚，我们就是犯错误，就是纵容汉奸卖国贼，就是不忠实于民族抗战，就是不忠于祖国，就是纵容坏蛋来破坏统一战线，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我们打击他们，则“全是为了坚持抗日，全是为了保护抗日统一战线。”

为了严惩石友三，保卫冀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决定集中冀中、冀南和冀鲁豫部队，由冀中军区政治委员程子华和我统一指挥，发起讨石战役。刘、邓首长，从作战方针，兵力配备和部署，到分化瓦解敌军的策略、俘虏政策等都作了一系列指示，使我们的讨石斗争得以顺利进行。如根据平原作战无险可守、易于突破的特点，刘、邓首长指示我们，打石“不可能一口吞下，应咬一口算一口。”后又 3 次电示，嘱咐我们在作战部署中应注意“不是由外箱石军使他固守，以致咬不动”，“要在运动中消灭之”，“要抓住石军长散杂居队形”，用主力“从敌腰软处砍断，打乱其长蛇阵，消灭南段再及北段”。并要我们注意“打断石高联系”。还指示我们，对石友三所辖各部采取区别对待方针，充分利用他们的矛盾，争取多数，孤立石友三；向孙良诚说明，“杀我同志，消灭和进攻我军者为石友三。与敌人勾结者为石友三”，“请勿卷入漩涡，最好与石分开，以免牵涉误会。”对张栋臣、孟昭进申明“打我者只石友三一人，石与日寇勾结，故我只对石一人。望勿生误会。”对赵云祥也申明，“我们只打石友三”。临战前，我们对石所辖各部头头，有的写信，有的派人去谈，做争取和瓦解工作。

讨伐石友三分为 3 个战役。第一次战役始于 1940 年 2 月 9 日至 18 日，叫冀南反顽战役；第二次战役于同年 3 月 4 日至 11 日，叫卫东战役；第三次战役叫直南反顽作战，始于同年 7 月至 11 月结束。

冀南反顽战役，
将石友三部逐出冀南

冀南反顽战役开始前，石部主力六十九军及孙良诚等部共 1.7 万余人，摆在南宫之垂杨、董家庙和枣强之大营以及咸县之郭固、雪塔等地区，高树勋部主力在冀鲁边观城地区，一部延伸到临清、冠县间。

我军以东进纵队主力、青年纵队七七一团及由冀中调来的刘（子奇）支队和一二〇师在冀中的贺（炳炎）余（秋里）支队、张仲瀚津南自卫军，冀南第四军分区部队（李荣部）等组成左翼队，由陈再道、刘志坚指挥。任务是将石军拦腰截断，由西北突击消灭郭固、董家庙地区之石军。

以东进纵队一团、青年纵队三团、先遣纵队一团、筑先纵队独立团以及三八六旅四团等部组成中央纵队，由徐深吉、吴富善指挥，任务是由南向北突击消灭郭固、董家庙地区之石军。

以筑先纵队、先遣纵队及曾国华支队为右翼队，由李聚奎、肖永智指挥，任务是箝制高树勋部。

杨勇支队到观城、朝城一带，逼近高树勋部主力，阻其北援石军。

冀中赵（承金）谭（冠三）支队及冀南李（林）赵（义京）支

队，由王宏坤指挥，任务是箝制石部一八一师及其周围部

队，阻其南援。

我们原定 2 月 11 日开始反击，被石友三发觉，石感到

孤军远悬，战力薄弱，甚恐我军兴师问罪，于 2 月 9 日秘密

南窜，并令高部为其策应掩护，高未执行。我军立即分数路追击堵截，第一次讨石战役开始。

战斗打响后，青年纵队七七一团等部在清河以西之狼

窝消灭孙良诚部 1 个团；东进纵队主力和冀中 1 个团在威县东北枣科、史家庄地区与石部暂三师激战，歼其 2 个营，击溃其大部；中央纵队在清河西南重创石部主力一八一师。

2 月 13 日，我左翼队及中央纵队等将顽军主力及石友三总部围困在威县东南下堡寺、摇鞍镇一带。我军与顽军进行村落争夺，展开激战。石部主力遭我痛击，伤亡惨重，逃散 500 余人，被俘 1500 余人，武器缴获颇多。这是首次讨石战役的

一次关键性的战斗。

13 日，孙良诚率 2000 余人突围南逃，渡过卫河进至南

乐地区，与丁树本部靠拢。15 日夜，石部主力残部突围向西逃窜。我东进纵队主力、青年纵队七七一团及冀中赵谭支队等部立即展开多路追击。 16 日，与顽军激战于曲周东北之南北龙堂，歼其 1 个营。冀南军区 5 个团及冀中刘子奇支

队、津南自卫军等部，由邱县东向西南急进，截击顽军。

在这时候，日军见石部被我军追击、堵截甚急，为掩护

石军逃窜，便由广平、曲周、肥乡等县出动日伪军 1000 余

人，进至广平、邱县间之平固店一带阻击我军，与我向西南急进、担负堵击任务的部队进行激战。我绕过日伪军继续追击顽军，于 17 日赶到曲周地区。日军见未能阻止我对顽军的追击，便又从威县、邱县等地调集一批日伪军，加上前一股共 3000 余人，分数路到东目寨、下堡寺一带，攻击我军尾部，并施放大量毒气。刘、邓遂下令暂停追击顽军。石友三趁我追击部队与日军激战之机逃窜。我原估计石率残部向南、向东从大名、馆陶间，或临清、馆陶间渡河南逃。他却向西经龙堂过滏阳河，又向南由曲周西塔寺桥过滏阳河，在日伪军的掩护下，逃脱了我追击部队的堵截。穿过日伪军据点密集、我军工作薄弱的魏县境内，从大名、临漳之间渡过漳河，逃到清丰、濮阳地区，向丁树本、高树勋部靠拢。第一次讨石战役到此告一段落，共歼灭顽军 7000 余人。

冀南讨顽虽没有将石友三部全歼，但将其赶出了冀南，为冀南抗日根据地拔除了一个大祸根，摆脱了“ 前门拒虎，后门拒狼 ”的严重局面，冀南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

卫东战役，将石友三
部赶到我根据地边沿

第一次讨顽战役后，蒋介石又命令进占磁县、武安、涉县、林县的朱怀冰部和逃到清丰、濮阳的石友三等部，再次向太行、冀南地区的八路军进攻；同时命令在黄河以南的第四十一、第七十一军，迅即渡河北进，协同朱、石等部夺取我太（行）南和冀南抗日根据地。于是，八路军总部决定趁黄河以南的顽军尚未北渡，朱怀冰部孤立突出于武安、涉县地区，鹿钟麟、孙殿英等部暂时持观望态度，以及石友三部在清丰等地立足未稳之机，路西我军发起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路东我军发起反击石友三部的卫（河）东战役即第二次讨顽战役。

第二次讨顽战役是于 1940 年 3 月 4 日开始的。这次战役，我们总结了第一次冀南反顽战役的经验和不足之处。由于缺乏平原大规模作战的经验，冀南讨顽战役在兵力的使用和部署上有不尽妥当的地方，如在贯彻“ 咬一口算一口 ”、“ 一口一口吃 ”的指示时，有的口张得大了点，反而吃不下。卫东

战役中，我们尽量注意布置得更周密些。

参加这次战役的除冀南、冀中的部队外，还有冀鲁豫的部队，各部队的任务是：

冀南军区诸地方部队留在冀南，由王宏坤指挥游击，巩固根据地，控制卫河渡口，策应卫东作战。

先遣纵队、筑先纵队，除留在卫河以西的一部外，其余为鲁西北支队，由李聚奎、肖永智指挥，从东北向观城、仙庄集一带进攻，箝制高树勋部向南增援。

杨勇部和挺进纵队第五支队为鲁西支队，由杨勇指挥，第一步进攻濮县城，不能攻占时，则派一部监视。第二步准备向西攻击黄城。

杨得志部为豫北支队，由清丰以南向东进攻驻黄城、袁庄、刘庄之石军，并以一部控制卫河渡口，防其向西南逃窜。

冀南 5 个团、冀中 5 个团为中央纵队，由陈再道、刘志坚指挥，与鲁西支队共同消灭石部。抽东纵 2 个团为战役预备队。

3 月 4 日凌晨一时，我军对石友三部发起总攻。我赵谭支队一部战前潜入顽军占领的六塔集，从里面打，出其不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歼灭该处顽军，攻占六塔集。这一仗打得很漂亮。鲁西支队攻占濮县，鲁西北支队攻占观城、仙庄集，刘子奇支队攻占卫城集。战役开始第一天，我军即重创顽军，俘其 800 余人，并击溃由范县进至观城以北的玉金祥部 1 个团。

我军攻占六塔集后，驻黄城之石部主力进行反扑，企图夺回六塔集，以固守黄城。我预备队投入战斗，将反扑之顽军击溃。顽军在我各路部队猛攻之下，军心恐慌，乱作一团。

3 月 5 日，顽军主力分路南逃，我军猛追，在濮阳城东和东南击溃顽军 2 个团。6 日，我军在八公桥又重创顽军。顽军向菏泽方向逃窜，杨勇部穷追不舍。 11 日，顽军逃到民权县以东，从柳河集过了陇海铁路，进入日军占领区。15 日，丁树本部也南撤到封丘一带。

但是，他们并不善罢甘休，当我军大部返回鲁西北时，石友三和丁树本部在山东菏泽日军 500 余人掩护、配合下，于 4 月 1 日进占东明县城。4 月 5 日，石部又进至徐镇、保安集及以东地区，丁树本部进至两门西北。我军集中冀鲁豫支队、赵谭支队于 6 日在两门西北小韩集一带，将丁树本部大部击溃，丁率残部千余人逃到豫西去了。4 月 8 日，东进纵队、冀鲁豫支队和赵谭支队再次重创石部，石率残部南逃曹县、定陶地区。此役，先后共歼灭顽军 6000 余人，将他们赶到我根据地边沿地区。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他们没有发动新的进攻之前，便适可而止，不再继续追击，第二次讨顽告一段落。卫东战役后，赵谭支队留在冀鲁豫，程子华率领刘子奇支队返回冀中。

这次战役前，为了贯彻区别对待，利用矛盾，分化瓦解顽军的方针，我曾给丁树本写了一封亲笔信，主要内容是规劝他不要跟石友三跑。信是由原临清专员韩多峰专程送的。韩是被沈鸿烈撤职的，此人曾来过南宫，与我们关系不错，同丁的关系也甚密。但是，丁树本不听我方规劝，最后被我击溃，落荒而逃。孙良诚更是顽固不化，和石友三紧紧勾在一起，对我们的好意劝告置若罔闻，结果落得个损兵折将，大部被我歼灭。有些顽军头头，经过我们做工作，采取观望消极态度，这对我讨石作战是有利的。

我们在作战中，认真贯彻执行了刘、邓首长和师政治部关于争取顽军下

层官兵抗日，孤立头子的指示，以及不准杀害、辱骂、殴打被俘官兵，禁止搜腰包，被俘官兵实行分居，连以上军官酌情给以物质优待等具体规定，效果很好。因石部等顽军下层官兵多来自冀南或山东沂蒙山区，不少人是被抓壮丁来的，他们的家乡曾遭日军蹂躏，抗日民族意识比较浓厚，对横行乡里、祸害百姓的汉奸深恶痛绝。他们对少数上层分子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内心深处愿意抗日和铲除汉奸，但不敢流于言表。根据我们掌握的这些情况，在石部被俘官兵中，广泛揭露石勾结日军当汉奸，攻打八路军，残害抗日群众的大量事实，还组织座谈会，让俘虏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石友三等人的罪行，激发被俘官兵的抗日爱国热情。经过教育，放他们回家。这些做法对瓦解石军起了很好的作用。石部好多士兵盼望我们去打，以便趁机逃跑回家。每次战斗，石部下层官兵都有不少趁机逃跑的。石友三族弟石友信的教导师逃亡情况尤甚。其第 1 团 2 连只剩下 23 人，第 2 团每连平均只剩 40 人。

直南讨顽战役重创石部，讨逆战役胜利结束

第三次讨顽战役（即直南讨顽）是在 1940 年 7 月开始的。

石连遭我两次打击后，不甘心失败，进一步勾结日军，向我反扑。石率残部逃到曹县、定陶地区后，便派其弟石友信到商丘向日军乞怜救援。6 月 5 日，日伪军出动步、骑兵 6000 余人，分 3 路“扫荡”我濮阳桑村集地区。遭我军打击后，便从徐州、兖州、泰安、安阳等地增调 1.5 万余兵力，分 12 路向清丰、濮阳扑来。我军分散游击，对敌声东击西，不断袭扰，消耗敌人。敌疲于奔命，到处扑空，遂于中旬大部撤回原地。在清丰、濮阳、内黄、东明县城，以及附近的村镇设立了 30 多个据点。

这时，石友三又率其残部及纠集之杂顽军 2.5 万余人，于 6 月中旬在日军“扫荡”掩护下卷土重来，占我观城、范县、清丰、濮阳和濮县等地，企图进窥我鲁西北，联结顽匪齐子修等部，建立反共基地，切断我华北与华中之间的联系。为粉碎顽军上述企图，我军遂发起直南讨顽战役，第三次打石友三。

7 月 2 日，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命令我与鲁西军区政治委员肖华共同指挥，发起直南讨顽作战。参加此役的部队有：冀南新四旅七七一团、新七旅二十团、新八旅二十二团及军区骑兵团，为中央纵队，由徐深吉指挥；以晋西独立支队、鲁西运河支队为左纵队，由杨勇指挥；以直南新三旅、民一旅及冀中南下支队为右纵队，由杨得志、崔田民指挥。

7 月 12 日，我和徐深吉同志率冀南参战各团，东渡卫河奔赴直南。战役原定 15 日夜发起。 11 日，石部特务旅和孙良诚部共 5000 余人，分 4 路先向我发起进攻。我运河支队与顽军奋战一天，歼其 1200 余人。15 日夜，中央纵队与左纵队进攻龙王庙、吴桥等地孙良诚暂编一师，激战两天，将其击溃。右纵队重创濮县顽军高树勋之增援部队，歼灭 1500 余人。孙良诚、高树勋两部经此打击，龟缩于濮县城周围。这时，日军为配合石友三等部由寿张出动 200 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向我奔袭，挽救石友三部的危局。8 月初，齐子修部千余人，从堂邑向南进到沙镇，企图策应石友三部，我中央纵队乘其立足未稳，将其击溃，俘 500 余人。

石友三等部经我打击后，则凭深沟高垒采取守势，并指使封建会道门对我进行骚扰。根据顽军此时的特点，八路军总部于 8 月中旬指示我们，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双管齐下，在军事上，我主力部队从东、北两面逼近顽军，

压缩其占领区，打击其外出部队。在政治上，我们采取召开群众大会，开明士绅座谈会，散发传单，释放俘虏。揭露石友三等勾结日军、破坏抗战等种种罪行，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时还采取空室清野，截断其粮源，动摇其军心。在我军事、政治双重打击下，顽军内部十分不稳，下层官兵大量逃亡。到 1940 年 11 月，我直南反顽战役结束。

在这次战役中，我军曾一度包围驻扎在濮阳巩庄的石顽三十九集团军总部，石甚为恐慌，给被围在观城的石友信发一密电，令其速去清丰联络日军出动“ 扫荡 ”。石友信派其副师长温大可，带少数人伪装成八路军，混出了我包围圈，到清丰城内与日军取得了联系。次日，石友信教导师与日军 1 个联队并肩出动，一起向我进攻，给石友三解了围。当晚，日军与石友信部一同宿营。不久，石友三又先后派石友信到济南、开封、北平等地，找日军头目联络，与日军进一步勾结在一起。我们从战斗中缴获的石友三的密件里，还发现石派人到郓城向日军报告石部移动和部署等情况。

石友三与我们几次较量中，不仅没有完成蒋介石要他“ 在万难中拿住冀局，以对付八路军 ”的使命，反而被我打得落花流水。尤其是勾结日军的大量事实被我揭露，臭名远扬、声名狼藉，为国人所不齿。蒋介石认为石友三已无利用的价值，即密令卫立煌、高树勋，于 1940 年 11 月 4 日，杀掉了石友三。

第九章　百折不挠

讨顽战役结束后，冀南抗战形势发展很快。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武装建设都有了较大发展，根据地进一步巩固。为统一冀南、太行、太岳三大区行政领导，成立了联合行政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杨秀峰任联办主任，副主任薄一波、戎子和。后来联办撤销，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秀峰同志任主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改为冀南行署，我为主任，刘建章为副主任。成立了冀南军政委员会，统一协调冀南区党政军民各项工作。为统一指挥冀南区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进一步充实和加强了冀南军区，陈再道任司令员，我改任政治委员，副司令员王宏坤，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参谋长范朝利。冀南地区各主力部队和分区基干部队，按一二九师序列统一编成 4 个旅，即新编第四旅、新编第七旅、新编第八旅和新编第九旅，各辖 3 个团。

参加百团大战

粉碎“铁壁合围”

1940 年秋，为了打破敌人的分割、封锁，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根据刘邓首长命令，冀南部队先后出动 10 个团，参加了由彭总亲自指挥的百团大战。冀南部队在百团大战中的作战重点，是继续破击敌人正在修筑中的德石铁路（东段），协同太行部队一部破击高邑至邯郸段平汉铁路，以及敌在冀南区修筑的一些公路。在百团大战期间，冀南区先后参加破路的人民群众达 25 万人之多。冀南区部队在百团大战两个阶段中共作战 139 次，毙伤日伪军 1500 余人，俘日军 7 人，伪军 150 多人，破毁铁路路基 50 多公里，缴获炮 2 门其中包括八八式野炮 1 门，机枪 5 挺等。我军负伤近 800 人，牺牲 357 人，其中有在枣强秦村战斗中牺牲的二十五团团长李林同志。

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华北日军，敌伪深感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对其严重威胁，惊呼“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日军从华中抽调 2 个师团增援华北，以加强其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攻。百团大战后，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地报复“扫荡”，野蛮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我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

1941 年 12 月 8 日，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侵略者对我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加紧进攻。因为日军不仅迫切需要巩固的战略后方，更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供应太平洋战场的需要。日本急于将在中国的占领区作为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巩固的战略后方，将华北变为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兵站基地。

根据这样的战略意图,冀南区的敌人对我抗日根据地连续不断地发起‘围剿”、“扫荡”。出动之兵力一次比一次多，少则数百人、千余人，多则数千人、上万人。“扫荡”之范围一次比一次大，持续时间一次比一次长。

为彻底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消灭抗日力量，敌人采取了各种极其野蛮残酷的手段，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一起又一起骇人听闻的流血惨案，制造“无人区”。

敌人的进攻方式也不断变化，1940 年前，敌人着重于点线占领。在战役上，采取“扫荡”、合击以及分区“扫荡”等。在战术上，从按部就班的逐渐进入，到分散配备，灵活“进剿”。以后，敌人在战役上多是组织连续不断的小“扫荡”，多路驱赶，然后集中兵力搞大规模合围。多在夜间出动，拂晓袭击，三面包围，一面埋伏，妄图以此歼灭我军有生力量。敌人采取了

“捕捉袭击”、“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以及“铁壁合围”、“梳篦清剿”等残酷的作战方式。

1942年一年中，敌人在冀南区搞了三次大规模“铁壁合围”，每次出动的兵力都在万人以上。4月29日一次，称“四·二九”大合围。6月11日一次，9月12日一次。每次合围的目标都是冀南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妄图一举摧毁我首脑机关，进而瘫痪我指挥系统。

这三次大的“铁壁合围”中，“四·二九”是最严重的。冀南党政军领导机关、新七旅旅直及四地委、四专署、第四军分区机关和新四旅旅直同时分别被合围。牺牲了杨宏明、孙毅民和陈元龙三名旅级干部和几名团的干部。地方也牺牲了好几名县级干部。“四·二九”大“扫荡”我没碰上。当时身体不好，在太行山上休养。陈再道司令员也不在军区机关，在下面分区检查工作，王宏坤副司令员也在分区检查工作。当时，只有范朝利参谋长和刘志坚主任在军区机关，他们俩指挥机关部队进行了艰苦的反合围斗争，冲出了合围圈。徐深吉同志指挥新四旅旅直也勇猛冲出了合围。

敌“四·二九”对冀南的“铁壁合围”和相继对冀中区进行的“五·一”大扫荡以及5月下旬对太行区的“铁壁合围”，是日军华北方面军统一部署、精心策划的。

“四·二九”大合围对冀南抗日根据地影响很大，损失严重。大合围后冀南区形势急转直下，环境更加困难，斗争更加艰苦。部队的思想也产生了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个别同志甚至怀疑冀南平原抗战还能不能继续坚持下去。由于接受了“四·二九”遭受严重损失的教训，“六·一一”反合围，我损失轻微，“九·一二”反合围，冀南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六地委、六专署、六军分区领导机关均于十一日夜安全转移出敌已形成的合围圈，而未受损失。

从太行回冀南，痛失良将肖永智

5月下旬，敌人合围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中共北方局以及一二九师等党政军领导机关时，我正在太行山休养。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合围，师部决定转移，转到外线打击“扫荡”之敌。

刘师长、邓政委对我的身体情况很关心。他们问我：“你怎么办，还是跟我们走吧。”

当时我身体已基本恢复了。心里很惦记冀南的情况，特别是遭受大合围后的情况，更惦记着战斗在冀南的广大指战员。因此，怀着急切的心情，希望赶快回来，我对首长们说：

“还是回冀南，平汉路上的日军大部调出打太行了，那里日军的力量比较空虚。另外，我已习惯在平原。在山区打游击有点不习惯。”

“你身体行吗？”刘邓首长担心我的身体。

“没问题！”我说：“这些日子，身体恢复得很好。”

师首长点头，同意我回冀南。

临行前，我和总部左权副参谋长通了电话。他对我说：

“你去平原行不行？敌人正在扫荡，现在回去不冒险吗？”

“不冒险，没问题。”我很有信心地告诉左权同志：“不过铁路（指平汉路）我没办法，只要过了铁路，我就有办法了。”

首长们的关心，我很受感动。

当时冀南的艰苦情况我是知道的。在这样的时候，我更应该赶快回到冀南。抗战初期刚进入冀南平原时，那时心里确实没有底，没有在平原打过游击。现在不同了，经过几年的斗争实践，摸索了一套开展平源游击战争的方法，学会了如何在平原与敌人周旋。所以我说到冀南就有办法了。

当时有 200 多名干部学员要到冀南来。孔庆德同志就是这个时候跟我来到冀南的。我只有一个警卫班，一挺轻机枪和一个掷弹筒。我请求师首长拨给点部队。师长说实在抽不出部队来，我说：部队抽不出来，能不能给学员干部发点枪和子弹。师长同意了。

于是，我带着这 200 多名干部学员下了太行山，向冀南平原行进。当我们走到磁县贾壁时，我和李达参谋长通了电话，他告诉我，我们走后敌人就开始“扫荡”，目标是我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从西边的长治、武乡、辽县和东边的武安出动日伪军 2 万余人，分别合击黎城、武乡县砖壁、辽县桐峪和武安县阳邑后，向太行根据地腹地急进。5 月 24 日夜，形成了对窑门口、青塔和偏城地区的合围。师部跳出了合围圈，转到外线。总部和北方局于偏城和辽县交界的南艾铺、十字岭一带遭合围。此时，李达同志打电话告诉我，左权同志在十字岭指挥突围战斗中不幸牺牲。听到左权同志牺牲的噩耗，我心情非常沉重、非常难过。往昔和左权同志相处的情形，一幕一幕在脑海中闪现，特别是这次下太行临行前，我们通话的情形，他那关心、体贴同志的热情话语，还在我耳边回响。左权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代英才，他的牺牲，使我党我军失去了一位卓越领导者，一位优秀指挥员。

我们从贾壁出发，继续向东朝冀南走。夜晚，从磁县北光禄镇附近过了平汉铁路，进入冀南成安县商城地区。大家走了一夜很疲劳，便在一个村子住下，煮点饭吃。我们刚要吃饭，当地的我方情报人员和老百姓急匆匆地跑来报告说敌人来了，你们赶紧走，不然就来不及了。我指挥干部队向西铁路方向走，走了一二十里路再折回来向东，以迷惑敌人。然后，在敌军据点商城底下通过。干部学员手里有点枪，但不多，子弹也很少。孔庆德同志带着警卫班在后边掩护我们。孔庆德打仗行，用掷弹筒打了几发，最后一发把掷弹筒炸坏了，他的手被炸伤了。到了夜晚，我们继续朝根据地走。当时没有向导，夜里辨不清方向。幸好我带着一个指北针，就靠它指方向。我拿着指北针走在前面，按照指北针指的方向走。有路走路，没路就走地里，一直朝北走。当时我们还看到邯（郸）肥（乡）公路上驶过了 10 多辆日军的汽车。那时，三分区那一带伪军工作做得很好。我们对每个据点、碉堡的情况都比较清楚，平时都有些关系。我们没有爬路沟，是从碉堡旁边通过的。我们悄悄走，他们不管。我告诉大家，从碉堡底下过，伪军若是打枪也不要怕，那是朝天打的。我们通过碉堡面前时，伪军有时朝天开枪，掩护我们。我们一个战士掉了队，被捉进了据点，后又恭恭敬敬地送了回来。这说明我们的伪军工作有相当的基础。过了邯肥公路、永肥公路后，与八旅机关会合了。后来听高厚良同志讲，敌人知道我到了三分区，出动 12 路日伪军“扫荡”、“围剿”，企图抓我，但我已经离开三分区了。

华北日军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不仅在军事上加紧“围剿”、“扫荡”，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文化上向我发起了全面进攻。敌人的政治进攻基本上采取“以华制华”政策，组织伪军、伪组织，建立伪政权，加强统治力量。他们还搞特务活动，组织土匪会门，破坏我抗日政权。在经济斗争方面，敌人基本上搞“以战养战”政策。在文化上灌输亡国思想。从 1941 年开

始，敌人又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所谓“治安强化”，就是过去推行的“治安肃正”的发展，也就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所谓“总力战”的进一步实施。其目的就是妄图隔绝我们各个根据地，打击与消灭我抗日力量，进而摧毁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

从 1941 年春到 1942 年秋不到两年时间，敌人先后推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每次都有不同的口号和重点，而中心是“反共”和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手段极其野蛮、毒辣，给我敌后抗日工作造成极大困难。冀南军民一方面要和敌人发动的一次又一次大“扫荡”作战，粉碎敌人的“铁壁合围”。一方面又要和敌人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进行斗争，粉碎敌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攻。

在敌人疯狂的进攻下，冀南区受到严重损失。首先是根据地被分割、“蚕食”，日益缩小。有些根据地变成游击区，有些游击区变成敌占区。根据地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格子网”，抗日军民的公开活动受到很大限制。敌人的据点碉堡星罗棋布，公路沟墙纵横交错。到 1943 年，敌人在冀南的据点碉堡，除平汉、津浦、德石等铁路干线上的外还有 1000 个左右，形势严重的一些地区，平均每 3 个村庄就有一个碉堡。据点与据点之间，据点与碉堡之间，碉堡与碉堡之间，平均只有几里，甚至更近。抗日军民的活动经常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极为困难。当时流行几句顺口溜：“日住碉堡下，夜观炮楼灯；行军必过路，天天闹敌情。”敌人为分割冀南根据地以及切断冀南根据地和太行根据地的联系，不断修复和新建铁路、公路，并在两侧挖掘封锁沟和构筑封锁墙，封锁沟深数丈，封锁墙高也数丈。到 1942 年，冀南区的公路总长约 9000 余里，沟墙共约 3200 余里。基干公路上每隔三五里就有一座碉堡，重要的公路都挖有封锁沟，有的还修筑了封锁墙。有些县与县之间，还挖了县界沟，以切断县与县之间的联系。

其次是根据地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敌人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根据地经济的严重破坏不言而喻。1942 年春，敌人“扫荡”广宗、平乡地区时，抓走壮丁 9000 余人。“扫荡”邢台、永年、沙河地区时，共抓走壮丁 13000 余人、牲口 900 余头。以耕牛为例，抗战前，平均每 40 亩地有一头耕牛，到 1942 年，平均每百亩才有一头耕牛。在敌人烧杀抢掠下，许多村庄被洗劫一空。

敌人强行摊派劳役也是十分惊人的，许多家因繁重的劳役而荒芜了自己的田园。例如，冀县北冯村共 190 户，1943 年 7 月份出劳役 766 人，每户平均 4 人。最严重的巨鹿县大吕寨村共 300 户人家，同年 5 月份出劳役竟多达 15000 多个工日，每户平均 50 余个工日。出劳役的民夫受到非人的待遇。例如，敌人强征滏阳河两岸老百姓冬季挖河，怕人们偷懒，竟强迫大家脱掉衣服干活。而且有时竟将最后一个到工地的民夫当众处死，以警告大家不得迟到。抓壮丁、服劳役，使冀南区的劳动力受到极大的破坏。

同时，冀南平原的耕地也遭到严重的破坏，不断减少。据当时的统计资料，仅就敌人在冀南修建的据点碉堡和公路沟墙所占耕地为例，截至 1943 年共有据点碉堡 1100 多个，以每一个据点或碉堡占地 15 亩计，共占地 1.6 万余亩。公路及封锁沟墙长 1.3 万余里，平均宽 3 丈，每里占地 9 亩，共占地 11.8 万余亩，这两项合计占地 13.5 万余亩。另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冀南人民单是为敌人修路、挖沟以及修据点、碉堡，即需出工 763.6 万多个。

在残酷地反“铁壁合围”斗争中，我军同冀南广大人民英勇奋战，予敌

以沉重打击。但是，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和牺牲，我军许多优秀指战员和地方党政干部血洒冀南大地，为国家和民族献出了宝贵生命。仅在 1942 年和 1943 年两年中，我们便牺牲了旅、分区和地委、专署级干部 20 余人，他们是肖永智、易良品、杨宏明、赵义京、陈元龙、孙毅民、袁鸿化、夏祖盛、陈耀元、李忠、李力、王泊生、李松霄、解蕴山、高捷成、刘铁之、郭好礼、郑前学、刘诗松、张峻峰、董宁等。我军团级干部和地方县级干部牺牲 50 余人，如桂承志、陈子斌、徐绍恩、李汉英、徐宝珊、梅华樊、石嘉植、马参、欧平、马功岑、宁心力等。抗战期间，冀南牺牲的干部很多。团以上干部的名字我大部分还能记得，特别是旅、分区和地委级干部，我都记得。上述只是两年当中牺牲的干部，若是整个八年抗战以及解放战争，冀南牺牲的干部就更多了。他们都是好同志，都是我军优秀的指挥员和优秀的党政工作者，不少同志牺牲时年纪很轻，如肖永智牺牲时才 27 岁，风华正茂，很可惜。他 15 岁就参加了红军，担任过旅政治委员、分区政治委员，还兼过地委书记。他政治上军事上都很能干，是一二九师很优秀的青年干部，人很聪明，打仗有勇有谋，很了不起，是栋梁之才。刘师长、邓政委都是器重的。他的牺牲实在令人惋惜。本来决定他到太行党校学习，已经通知了他。当时正赶上四分区和七分区部队，在临清以南地区发起

消灭伪军肖健久部的战斗，他那时是七分区政委，找到我，

要求参加这次战斗。我说：“ 已决定你去太行党校学习了。 ”

他说：二十二团是我带到卫东的，这次又是和四分区协同作

战，对开辟卫东关系重大。为便于指挥，密切协同配合，他非

要打完这一仗再上太行不可。和他同去学习的还有三分区

参谋长高厚良同志，他还给高厚良写信，要高等他一同去太行。可是，没有想到在这次战斗中遭日军袭击竟和我们永别

了。和他一起牺牲的还有四分区政治部主任袁鸿化同志。这

一仗是非打不可的，痛心的是这一仗牺牲了两位旅级干部。

如果当时我要再坚决一点，下个死命令，非让他走不可，肖

永智同志也就走了。每想起肖永智同志牺牲的那段往事，心

情总是不能平静，十分难过。

党政军民齐努力
生产自救，战胜大灾荒

除了军事上的困难外，天灾也来了。 1942 年春，天旱无雨，夏粮收成无几。春旱持续发展，旱情波及十几个县，许多地方大秋作物无法下种，致使秋收所获甚微。

1943 年灾情更为严重。先是旱灾，自春到秋久旱无雨长达 8 个月。许多水井干涸，河水断流，甚至人畜的饮水都

成了问题。冀南灾荒发展比较早和最严重的地区为一专区的元城、大名，三专区平大路以东地区，四专区的清江、邱县、企之、广曲、临清，二专区的巨鹿、冀特区、新河、宁南三

区，六专区的垂杨、清河、冀县等地。夏粮几乎颗粒无收。有些地区未能播种，有些地区春苗枯死，入秋后仍是白地一

片。冀南全区有 884 万亩耕地未能播种，有不少地区成了“ 无苗区 ”。

旱灾之后接瞳而来的是水灾。饱受 8 个多月干旱之苦的冀南军民，入秋后，又连遭暴雨，洪水泛滥，滏阳河、卫河两岸尽成泽国。水势稍退后，日

本侵略者又先后破坏了运河、漳河、滏阳河等河堤，使河水漫溢，洪水退后的大片土地再度被大水淹没。受害地区达 30 余县，许多村庄成了一片汪洋。馆陶全县 64%的村庄成了“ 水村 ”，武城县被淹 110 个村，清河县被淹面积达 50%，任县、隆平县更严重。房屋塌倒，人畜漂没，半浸在水中的断垣残壁，景象十分凄惨。

冀南的灾荒是日本侵略者造成的。自日军入侵冀南后不仅放水淹田毁坏耕地，而且修据点、修炮楼、修公路、挖封锁沟、筑封锁墙等占去了大量良田。以广平县为例，全县共有 89 个村，敌人在 10 个村庄修了炮楼，占地 2 顷。修公路 56 里，占地 4 顷多，共计占地 10 顷多。按每亩地每年收粮 4 斗，一年共收获粮食 104 万多斤,可供 1730 多人吃用。如果再加上敌人实施的‘ 三光 ”政策所毁的良田和烧毁的村舍，那就更多了，弄得多少人饥寒交迫，颠沛流离。“ 人祸 ”加剧“ 天灾 ”，“ 天灾 ”又加深“ 人祸 ”。“ 天灾 ”和“ 人祸 ”交相肆虐，陷冀南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除遇到旱灾、水灾外，还有雹灾和虫灾。冰雹大者如鸡蛋，实为少见。蝗虫之多，遮天蔽日，也是罕见的。蝗虫飞过来，简直像天阴了一样，太阳也看不见了。这样说并非夸张。大的蝗群方圆几里，一落地，顷刻间就把几亩、几十亩甚至几百亩农作物吃得一干二净。蝗虫所到之处，寸草不留。据南宫、巨鹿、隆平三个县统计，有 524 个村的庄稼完全被蝗虫吃掉。

蝗虫如此厉害，确实惊人。当时，我找到一本历史书看，是什么时候出版的，书名叫什么都记不清了。书中记载有清朝康熙、咸丰年间的大蝗灾情况，也是十分惊人的。那本书还讲了印度闹蝗虫的一个例子。印度有一次蝗灾最厉害时，铁路上铺了厚厚一层蝗虫，火车开过来时出轨了。当时还真有点不敢相信。最近看报纸，新华社发了一条消息，说埃塞俄比亚东部遭蝗虫袭击，大批蝗虫使火车的动力装置失灵，甚至造成火车出轨。可见那本书的记载还是有根据的。

继灾荒而来的还有瘟疫，当时有痢疾、浮肿，还有更可怕的霍乱流行。一家人上吐下泻，有的病一、二日而死，亦有的发病一、二小时即死的。冀南人民灾病交加，苦不堪言。巨鹿县因饥饿而死者 5000 余人，因霍乱而死者 3000 余人。清河县王世公村曾在一天中死亡 400 余人。垂杨县段芦头镇一个集日因饥饿、疾病倒街而死者 30 人。当时，冀南区饿死的、病死的共有几十万人。许多地方几乎是“ 家家添新坟，村村有哭声 ”。

有些老百姓为了糊口，拆了房屋，拿着木料到冀鲁豫、冀中去换粮食。那一带比冀南好些。还有不少人为了求生，不得不背井离乡逃荒外地，有的村成了“ 无人村 ”。往年收成比太行一带好的冀南平原，变得杂草丛生，满目荒凉。

在冀南这段时间，我才真正体会到“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这八个字的含意。过去多是从字表面上理解这句成语，这次从实践中理解和体会“ 祸不单行 ”，可就深刻得多了。真所谓“ 福不双至，祸必重来 ”。灾害来了，衣食无着，身体必然就弱了，生病的也就多了。人生病了，又缺医少药。天气久旱无雨，一旦下雨，又往往出现暴雨，以至泛滥成灾。越是久旱不雨，一旦来雨就容易下雹子。“ 祸不单行 ”四个字，生动地反映了旧中国老百姓荒年的悲惨。

那时部队吃饭也限量。吃饭时司务长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管了不管饱 ”。我们有的县长饿得竟昏倒在地上。那时的干部和群众是同甘共苦的，

没有一点特殊化。有一次我到曲周县一个村庄，正遇到一家妇女生孩子。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大人孩子危在旦夕。见到这种情景，我们心中极为难过，送了她 3D 斤小米，救活了母子俩，她很感激。那个年代，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好得很，真正是同生死、共患难，我的二女儿此时出生，将她放在邱县南辛店老百姓家中。按照规定，每月留给奶妈 30 斤小米。这 30 斤小米，在当时可解决大问题了，不仅可以养活小孩，也大大接济了房东一家三口人。“文化大革命”后，这位房东大妈到北京来看望我们，我们一再感谢她收养了我们的女儿，她反过来向我们道谢，说在这灾荒年每月 30 斤小米也帮助了她们渡过难关。房东家离我们的地下医院很近，我的二女儿就拿个碗常到医院，人们见了就给她一勺吃。她就是这样饿着肚子长大的。我的三女儿宋适荒放在元城县一位老百姓家里，由于又饿又病接回来没几天就死了。那时，不只是寻常百姓家忍饥挨饿，有饿死的、病死的，我们当干部的也同样忍饥挨饿，家里人也有被饥荒夺走生命的。

遇到这么大、这么多的自然灾害，时间又这么长，确是历史上罕见的。旱、涝、蝗、雹加上瘟疫，真可谓“五毒”俱全，严重威胁着冀南军民的生存。敌人频繁地、残酷地“扫荡”、“围剿”，使冀南遭受严重损失，抗日军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这并不可怕，只要军民团结奋战，同仇敌忾，就可以和敌人继续斗下去。日寇是不可能把我们赶出冀南平原的。而我们，不管如何艰难困苦，最后却要将日寇赶出冀南。但是，如此严重的灾荒确实令人可怕。解决不好救灾度荒问题，我们就有可能被灾荒赶走。已经有不少老百姓携儿带女离开冀南，逃往他乡。

坚持冀南抗战，燃眉之急是解决好生产救灾，度过饥荒，安定人心。饿着肚子怎么打鬼子。我们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的领导同志，多次开会研究部署生产救灾度饥荒的工作。行署和各级政府建立了救灾委员会，领导各地区赈济灾民，积极设法发放贷款，调济粮食，救济灾民。我们从冀鲁豫区借了粮食 300 万斤、麦种 50 万斤运回冀南，一部分救济群众，一部分用来为明年生产作准备。其实，冀鲁豫区也并不富裕，也是度过灾荒不久。他们这种高尚风格，冀南同志很受感动。

北方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一二九师十分关心冀南的灾情，积极支持冀南生产救灾度荒。 1943 年，边区政府先后发放春耕贷款和救济款 740 余万元（冀南票，下同）、贷粮和救济粮 64.8 万余斤。秋季洪水过后，边区政府又给冀南贷麦种 190 万余斤，发放救济粮 326.5 万余斤，还有大批食品。有了粮食，老百姓的情绪逐渐稳定了。

我们还开展了借粮活动。号召大家发扬团结抗战、互助互济、共度难关的精神。借粮是件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余粮户基本上都是地主。开展借粮的村成立借粮评议小组，通过调查摸底，公允地提出借粮数量。讲清道理，做好思想工作，避免出现顶着不借局面，顺顺当当地借出粮食。此外还开展以工贷赈，组织各种互助组，挖河筑堤，兴修水利，进行生产自救。根据连续旱灾、水灾情况，培修堤岸治理决口，疏浚河道开渠引水。

冀南军区领导部队一面打击敌人保护群众，一面同冀南人民一道开展抗灾救灾，协助地方堵口筑堤，疏河道、开水渠等，据不完全统计总长达 460 余公里，帮助群众打井一万眼。大规模开展捕蝗活动。当时捕蝗的场面是轰轰烈烈的。党政军民一齐动手，人山人海。开始捕蝗时，有个别老百姓思想还不太通。可能是受封建迷信影响，不愿意打。把蝗虫看作“神虫”，主张

烧香祈祷，请求“神虫”嘴下留情，不要吞噬庄稼。也有人以邻为壑，主张敲锣打鼓将蝗虫轰出本区了事。我们打多了，有些老百姓还不高兴，我们只好耐心做工作，思想很快就通了。时代不同了，只要把道理讲清楚，思想认识很好解决。军队按单位统计数量，按斤计算上报。地方捕蝗由政府发动各村群众联合作战，党政军民大打“人民战争”。有的扫帚打，有的木锨打，也有的用木棍钉上鞋底打。男女老幼齐出动，有打的，有喊的，其场面甚是壮观。在蝗虫多的地方采取挖沟的办法，沟深 2 尺、宽 1 尺，将蝗蝻赶入沟内，然后用土埋死。这种办法古人就曾用过。史书记载清朝康熙年间闹蝗虫时，老百姓就用过就种办法消灭蝗虫。到了冬天，我们还组织人力将蝗卵挖出焚烧，这个办法比土埋蝗蝻的效果还好。据有的书记载，清朝还有一种制度，一旦发现蝗灾，即调军队前去助民捕蝗。这本来应该说是件好事。但是，老百姓不愿意。因为清军到灾区后，要好吃好喝招待，灾年的老百姓怎么负担得起。清军下乡，还践踏庄稼。所以，老百姓宁肯隐匿不报。这些封建军队比蝗虫更可怕，与其引来兵灾，不如忍受蝗灾。我军是人民军队，我们助民捕蝗非常受欢迎，各地军民联合捕蝗不仅消灭了蝗虫灾害，而且从中体会到团结的力量，只要团结一心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在冀南最困难的 1943 年，平原分局书记黄敬同志到冀南检查、指导工作。黄敬同志作风根深入，在路上遇到老百姓，常常停下来同他们聊天，向他们作调查。我们招待黄敬同志吃饭，最好的饭是小米饭，最好的菜是辣椒酱和芝麻酱，而且每顿饭的菜只能给很少一点。

1944 年麦收后，严重的灾荒基本上过去了。农村生产逐渐恢复发展，形势好多了。但是，要使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彻底克服灾荒所造成的困难，并不是那么简单。还要很好解决在灾荒中的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特殊问题，如赎地问题、非正常婚姻和卖儿卖女问题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可能影响农村生产恢复和发展。在严重的灾荒中，有些农户为了度荒，把土地典卖了。灾荒过后，专署发出赎地训令，明确指出：凡 1943 年以来，因生活所迫而典卖之土地，均可照原价赎回。区党委、行署和各级政府大力帮助贫困农民赎回灾荒中低价卖出的土地。同时领导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和增资增佃活动，也称“双减双增”活动。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非正常婚姻是指在灾荒中，有些贫困农民因饥饿妻子再嫁，有的卖儿卖女。为使骨肉团聚，党和政府进行了大量细致调查工作，尽最大努力解决灾荒中妻离子散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不仅有利于安定群众情绪，发展农村经济，更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

依靠群众，扎根群众，
咬紧牙渡难关

1942 年和 1943 年两年，是冀南抗战最艰苦的年代。

敌人疯狂地进攻，“合围”、“扫荡”、“封锁”、“蚕食”、“治安强化”等，敌我斗争极其尖锐、残酷，又错综复杂，有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等各方面的斗争。冀南抗日根据地被严重分割，容纳大兵团活动的地区已经没有了。

根据地被分割后，根据地村庄距离敌人据点、碉堡近的只有 2、3 里，中间无一村之隔，敌人随时都可以组织进攻和袭击。不只每天，而且每时都有可能发生战斗。前一分钟还平静无事，也许在一分钟之后就有一场恶战发生。1942 年全年共进行大小战斗 2400 余次，平均每日 7 次，1943 年大

小战斗 4000 余次，平均每日 10 多次。

在战斗如此频繁、激烈的情况下，又偏偏遇上历史上少见的严重自然灾害，旱灾、水灾、雹灾、虫灾接踵而来。灾害种类之多、受灾范围之广、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加之，伴随自然灾害而来还有传染病流行，严重威胁着抗日军民的生

存。可谓天灾人祸，苦不堪言。这两年的日子确实不好过，熬时间，“看着表不走，看着太阳不动”，这个滋味没经过当时实践，是体会不到的。

“四·二九”大合围后，中共中央北方局任命我为冀南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我还是冀南行署主任，集党政军领导于一身，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们紧紧依靠党的正确领导，依靠上级首长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坚持斗争，坚持根据地。

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对冀南的严重形势非常关心。5 月初，刘邓首长就明确指出：“四·二九”受挫后，在干部和部队中必然会发生失败情绪，甚至怀疑今后平原能否坚持，地方也会有这些问题。指示我们必须提高部队与地方的斗争信心与勇气，充分认识形势的严重性和斗争的残酷性、长期性。

6 月下旬，北方局也提醒我们：冀南正处在严重危险之中，此种严重局面还在发展，要求我们在困难和危险面前，克服悲观情绪，提高坚持冀南抗战的信心，要保护群众力量。号召冀南区“全党、全军与冀南千百万群众共存亡”。

我们遵照北方局和刘邓首长指示，根据冀南区被敌人分割的严重形势，1942 年 10 月初，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冀南党政军主要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大家深入分析了冀南区斗争的严重形势，进一步研究了坚持斗争的有利条件和当前困难的程度。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立足冀南，励精图治，坚持斗争，坚持根据地，不管环境多么困难，斗争多么残酷，决不离开冀南平原。“县不离县”（是指县委、县政府和县游击队的活动不离开本县，在本地区坚持斗争），冀南党和八路军始终和冀南人民在一起，决心与冀南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生死与共。

区党委根据扩大会议精神，作出《关于渡过今冬明春艰苦局面的决议》。今冬明春的严重形势和艰苦局面，不会有所减轻和改变，一切工作必须从最严重、最困难、最艰苦的局面着想。巩固思想阵地，长期打算，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冀南抗日军民通过各种方式表示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

为适应当时斗争形势，我们对不同地区确定了不同的斗争方针、任务和斗争形式，以继续坚持斗争、坚持根据地。

在敌人统治较久、较巩固的地区，坚持“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着重加强党的秘密工作，开展社会统一战线工作，开展伪军伪组织工作。同时也不放松团结基本群众，指导其日常的合法斗争。所谓合法斗争，就是采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利用敌人统治范围内很少的一点合法为掩护，以积蓄抗日力量，保护人民利益。采取这种策略的村庄，各种组织形式，在表面上完全是伪组织的一套，但实质则是抗日的，也就是所谓“白皮红心”。

在接近敌人主要交通线和主要据点但其统治却都比较弱的地区，一方面坚持秘密工作，一方面团结和组织群众，进行隐蔽的武装斗争，扩大抗日政府和抗臼军队的政治影响。这种隐蔽的斗争，要注意及时而动、适可而止。

在敌占优势的游击区，则广泛开展群众游击战争，配合革命的两面政权，

保护群众利益，摧毁伪政权，进行反“蚕食”、反“维持”斗争，牵制与消耗敌人，阻止与迟滞敌人向我根据地推进。

在我游击根据地，积极进行武装建设，从保卫群众日常斗争中发动群众、改造村政权，团结社会各阶层，加强群众游击战争，准备应付更险恶的环境。

根据斗争方针、任务和斗争形式的变化，组织形式也必须随之改变。实行精兵简政，紧缩领导机关，领导机关全部军事化。政权组织，随军行动。旅与分区合并，正规军进一步实行地方化，以连、排甚至大班为独立行动单位，开展游击战争。

“精兵简政”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党中央极为重视。 在 1941 年底，党中央就强调指出：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根据地人民能否养活我们，能否维持抗 日的积极性。假如民力很快消耗，老百姓因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脱离，那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中央要求我党政军领导均应深刻了解这一点。我们根据党中央和一二九师‘精兵简政”的指示，在 1942 年、1943 年两年中，军区进行了六次精简整编。整编后，军区司令部只保留 4 个科，11 名干部。军区政治部平时只由刘志坚主任带一名秘书负责政治部全面工作。军区直属队总共只有 161 人。地方机关也进行了精简，有的县政府只留县长、秘书 2 个人，县委也只有 3 个人。部队还减发口粮，严格限定吃饭人数，停发菜金、办公费和各种杂支费，节衣缩食，和群众共渡难关。

在精兵简政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各分区主要领导参加地委常委，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县、区委书记兼县、区游击队政委、指导员。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和各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各级党委由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组成。主力军必须接受所在地区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

许多地区变成游击区或敌占区后，群众抗日情绪受挫。敌人气焰十分嚣张，敌特汉奸异常活跃。为打击敌特的猖撅活动，保护群众利益，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开展敌占区工作，贯彻“敌进我进”的斗争方针。军区和区党委经过周密调查和准备，挑选一些熟悉敌占区情况并与当地人民有密切联系的干部，组织起 20 多支精干的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秘密进入敌占区，访问当地士绅名流和有影响的人物，宣传我党和抗日政府的政策，开展社会统一战线工作。对少数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汉奸、敌特严惩不贷，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杀一儆百，显示我们的威力，为受害的群众撑腰出气。

我们还把部分部队化整为零，组成了许多分散小部队，由得力干部率领，分散到各县开展游击战。小部队和武工队相结合，深入“格子网”，开展敌占区、接敌区工作，将敌占区变为游击区，将游击区变成游击根据地，创造小块根据地，扩大回旋余地。

我们还吸取了冀中开展地道战的经验，将用于坚壁、藏身的地洞，逐步发展成能藏能打的地道。有些村里的地道户户相通，有的村与村之间也挖通了。冀南区开展地道斗争比较好的，是靠近冀中的第五军分区。

冀南地区还创造了一种“改造村形”的办法和敌人斗争，并将“改造村形”和开展地道斗争结合起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所谓“改造村形”，就是把一个村子内的几个方向的街道口或胡同口堵起来，只留一条出入口，并将村内一些院落贯通，在适当地方构筑隐蔽的射击孔。这样，一个村子就变成了一座地上“堡垒”。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我们抗日军民利用房上的

天桥、暗堡，村头、街中的挡墙以及村内、村外的地道打击敌人，坚持和发展冀南的游击战争。

刘邓首长看到我们冀南太艰苦了，牺牲的干部太多了，为了保存干部，来电报征求我们的意见，把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搬到平汉铁路以西办公。这是刘邓从战略上考虑的。我们几个领导开会讨论是搬还是不搬。师首长这样关心冀南，大家心里都热乎乎的。讨论结果，都表示不能搬到路西去，留在原地咬紧牙关坚持斗争。群众对我们很熟悉，如果我们走了，对干部和群众的情绪有影响。只要我们留在冀南，不讲话也没有关系，在群众中走几趟，老百姓看到我们，同群众见一面，就是对群众的鼓舞，就有一种政治工作的作用，就能坚定大家的信心。老百姓看到我们的马，就知道这是某某的马，就知道陈再道、宋任穷和其他领导人还在这里。

我们在群众中深深扎下了根，现在和我们刚到冀南时相比，大不一样。那时，冀南的老百姓还不了解我们。到了老百姓家里。大姑娘们都藏着不敢见面，躲着我们。经过一段群众工作，对我们了解了，就开始露面了。以后时间长了，彼此就更了解了，亲热得像一家人一样。我们同老头几、老太太、姑娘、媳妇，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好房子腾出来给我们住，而他们全家宁可挤在一起。那时的军民关系真是水乳交融。如果我们离开些日子的话，回来一进门，老百姓见了就说：“啊，又回来了。”他们好像是盼了很久似的，非常高兴地出来迎接我们。这虽然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话，却包含着对子弟兵的深情厚意。这是经过多少工作之后，军民凝成的感情得到的一句话。我们进了院子，原来住哪间房子，还住那间房子，真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

我们讨论的结果报告师部后，刘邓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们领导机关没往路西搬，和广大军民一起，不管多苦、多难，一直在冀南坚持斗争。

后来，中央考虑到冀南的回旋余地大小了，把冀鲁豫的三分区所辖之堂邑、冠县、濮县、清平、朝城、临清六县划归冀南，改成冀南第七军分区，赵健民任司令员，肖永智任政委兼地委书记（肖永智牺牲后由许梦侠接任），专员周持衡。我们跨卫河地区，活动余地就大了。实在困难时，可以跳过卫河休息一下。

为了减轻发生严重灾荒的冀南人民的负担，1943 年将骑兵团、七七一团、十团、二十团和二十一团等主力团，先后调出冀南。为了保存干部，抽出一批干部上太行、上延安。陈再道、刘志坚、范朝利、钟汉华等同志去了延安。徐深吉调太行后也去了延安。后来他们都作为代表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王宏坤同志也到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还有一大批冀南的党政军干部到偏城参加整风抢救运动，称后梯队。在抢救运动中，出现了“左”的做法，伤害了不少同

志。

在冀南留下少数干部就地坚持，称“咬牙干部”。冀南地区留下王任重、朱光、王蕴瑞和我，机关和直属队的人数很少了，不足二百人，区党委、行署以及军区的后勤机关都转入了地下。那时我身兼四职。困难时期我们都穿便衣。发现敌情就分成两股，王蕴瑞指挥一坨，我指挥一坨。到一个地方，干部、战士都睡在一个房子里，不管是官、是兵，还是炊事员，都打地铺。狗叫，容易暴露目标。为了保密，我们开展了打狗运动。那时保密工作非常好，一股住村东头，一股住村西头，谁也不知道谁。天亮后，一见面原来都住在一个村子里。

为了渡过难关，我们不但帮助群众搞生产自救，我们自己也组织生产自救。我和任重、蕴瑞、朱光同志，在邱（县）北就拉犁种过地。那时没有牲口，只好组织人拉犁。即使有了牲口也不行，没有粮食喂，人还没有吃的，哪里还有牲口吃的。我们四人加上警卫员八个人拉一张犁，每天种 3 亩地。

开始的时候，还觉得轻松，有说有笑，还有唱的，感到干这样活儿很新鲜。可是，过个把钟头，情形就不同了，说笑之声听不到了，唱的就更没有了，谁都累得不想说话了。等到天快黑了要收工的时候，人简直一步也走不动了。有时警卫员和我开玩笑说：“政委，你把绳子拉弯了。”

那时搞生产，干部参加劳动，不是一天，一个礼拜，走一走形式，而是一干就半个月或者更长些。其它什么工作不做，有仗打仗，没仗就同老百姓一起种地，自己也生产一点。军队里面不论是司令员，还是政委，地方上不论专员，还是县长，个个都脚踏实地地干，不打一点折扣。

抗战期间，在冀南最困难时期，我们就是这样咬紧牙关，与天斗，与地斗，与敌人斗，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扫荡”，战胜了天灾，渡过了灾荒，赢得了胜利。

争取瓦解敌伪军
成功抢救刘志坚

冀南的敌伪军工作受到过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和一二九师的表扬，彭副总司令和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同志都说过冀南的敌伪军工作做得好。最初确是逼出来的，不做不行，非做好不可。后来就逐渐运用自如了。

敌军工作是为武装斗争的胜利服务的。当时的主要做法是：摸清敌人的活动情况，有针对性地搞好对敌宣传，实行攻心战；掌握敌人行动规律，抓住有利时机，消灭敌人；利用敌伪关系，有效地保存自己。

军区政治部没有敌工部，专门做敌伪军工作。当时的敌工部长是张茂林（现名张友萱），敌工部的几位科长也都精通日语，有的是大学生，他们对敌斗争的经验都很丰富。全军区专职敌军工作人员 1000 多人，从上到下有一套完整严密的组织系统。

当时的瓦解敌伪军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灵活多样，很有成效。

一种是开展宣传攻势。“传条”、“传话”是当时效果很好的一种宣传方式。所谓“传条”。就是有的县开干部会时，每人写一张宣传小条，会后动员小学生抄成上千上万张，通过内线关系带进据点，在大街上、伪县公署、新民会和伪军宿舍等处散发张贴。这种小宣传条内容简单明了，但针对性很强，指名道姓说某某如何如何，攻心作用很大。

除了这种手抄的“传条”，还印刷一些内容较多的传单向伪军散发。通过传单向伪军宣传抗战的形势和我们的抗日政策，向他们讲解抗日道理，指明出路。告诉伪军、伪组织人员要“身在曹营心在汉”。有的还在传单上印上关云长的画像。

还有一种叫武装宣传，也叫给伪军上夜课。组成武装宣传队，夜晚到敌人炮楼前喊话，联系据点或炮楼内的具体人和事，表扬好的，痛斥坏的。

开展记“黑红点”和“良心大检查”运动。这是冀南在对敌斗争中的一个创造性的活动。我们对伪军、伪职人员宣传时说：八路军有你们每个人的“善恶录”、“生死簿”，谁干了坏事就画上个黑点，干了好事就画上个红点。到头来，对红点多的就宽大处理，对黑点多的严厉惩罚。

记“黑红点”运动的开展，对伪军和伪职人员震动很大，黑点多了害怕

八路军算总帐、点名（枪毙）。通过开展记“黑红点”，进一步开展“良心大检查”运动，叫伪军们要有中国人的良心，争取多点红点，给自己留条后路。

当时，我们差不多同所有伪组织都进行了谈判，对可能做工作的伪军都进行了工作。伪军、伪组织都怕将来与他们算总帐，就不敢闹了。伪军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急着做好事，多点红点，给我们通风报信的人越来越多。如果日军要出来“扫荡”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头一天就能得到消息。在工作基础好的地区，我们的基层干部晚上还可以进到日伪军碉堡所在的村落，待日军“扫荡”返回后才离开。

由于我们敌伪军工作做得好，成功地抢救出刘志坚和李定灼等同志。

1942 年 10 月，冀南区党委作了《关于渡过今冬明春艰苦局面的决议》。我们军区几个领导同志分头到各分区、地委传达贯彻。再道和我到一、三分区，王宏坤同志到二、四分区，刘志坚和区党委组织部长张策到五、六分区去传达。10 月 16 日夜晚，刘志坚他们到了枣强县恩察东大师友村。17 日天刚亮，突然一阵枪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鬼子进了村。志坚同志骑着马向外冲杀时，右腿被敌人子弹打断，从马上摔下来，被敌人俘虏，同时被俘的还有艾大炎、胡景云等同志，他们被关押在大营据点。

我得知刘志坚同志被俘后，当时军区几个领导都在下边，我立即用电报同再道、宏坤同志商量抢救办法。同时，向师首长作了报告。刘、邓指示要想一切办法，把刘志坚同志抢救出来。

六分区易良品、文建武同志立即进行武装抢救的准备。易良品想调集部队强攻大营据点，拿下据点救出刘主任。这时，正值二十团奉命从五分区向一分区转移，副团长楚大明率该团第四、第六连去军区后方机关领取棉衣，路过此地。因此，决定楚大明所率部队先执行抢救刘主任的任务。

军区敌工部长张茂林同志，原本就是跟着刘志坚一起　　行动的，正好在这里就地坐镇指挥情报联络工作。

大营据点的情况我们很清楚，据点内的维持会、伪军都有我们的关系。志坚同志被俘前，大营的伪军、伪组织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驻大营据点的日军是新换防的，刚来大营不久，什么也不知道，对大营及其周围的情况和我军的活动都不了解。

志坚同志在据点里被关押的情况我们一清二楚。每天都有消息从里面送出来，连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审讯，敌人问了些什么，志坚同志怎么回答的，都了解得非常清楚。刘志坚同志始终也没有承认什么，身份没有暴露，他只说自己是个参谋。日本人知道他的官不小，可能是个大官，但究竟是什么样大官不清楚。有些伪军知道刘志坚的真实身份，但他们不告诉日本人。

向外传递消息的主要是赵鼎新同志。他是在这之前不久被俘的，关在大营据点，一直没有暴露真实身份。这个同志在被关押期间表现很好。他在牢里给组织写信，说日本人答应，只要他同意给敌人“报平安”（注：给敌人报告消息的意思）就放他。区党委根据“革命的两面派”政策，经研究，同意赵给敌人“报平安”。在刘志坚被俘的前一天，赵已获得自由。他看到刘志坚同志负伤被抓进大营据点，决定留下来照顾。敌人看到刘志坚的伤势很重，需要人照顾，同时也想让赵“拉拢”他，获得些情况。这样敌人同意赵暂时留下来。赵鼎新利用此机会每天给刘志坚弄吃的，端屎端尿，帮助料理生活，还积极与外面的同志接头，传递消息。

我们通过内线关系获悉，敌人将于 10 月 20 日押送刘志坚去枣强县城。并摸清了敌人行动路线及押送的日伪军人数等情况。于是，我们决定于敌人押送途中实施抢救。经过周密研究布置，楚大明率二十团部队埋伏在大营至恩察之间的南宫庄附近的公路两侧。当押送的敌人走进我伏击地区时，我们的步枪、机枪一齐开火、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把日本人的火力压下去了，鬼子都卧在地上。刘志坚同志坐的是最后一辆牛车，听到前面的枪声，他叫赶车的急忙调转过头来往回跑。二十团警卫班长纪志明冲上去，背起刘主任向回跑，就这样将刘志坚同志抢了回来。

刘志坚同志被抢救回来后，当时根据地缺医少药，我们还得去找伪军。我们将刘志坚放在永年县南沿村伪军大队长韩荫亭家里养伤。和刘志坚一同到韩家去的还有其夫人刘莱英和一名医生、一个警卫员。韩对他们照顾得很好。韩原来是共产党员，在煤矿上当过工人，以后当了伪军。但他一直同我们保持着联系。在为刘志坚同志送行时，我和再道同志一起看望了韩荫亭，并向他表示感谢。日本投降后，他率部反正加入我军。刘志坚在韩家治疗休养了半年时间，还是不能走路。后来，我们将刘志坚同志送往延安了。

第二军分区副政委李定灼和敌工科长宋之光，是我们通过内线关系，从日本宪兵队监狱中抢救出来的。李定灼和宋之光同志由于汉奸告密，加之他们睡觉时警惕性不高，于南宫县大马村被敌人捉去，关押在南宫县城日本宪兵队监狱。我们研究决定，由十一团团长吕琢率两个连配合南宫县大队组织营救。营救人员在内线关系配合下，夜间秘密进入南宫县城，人不知鬼不觉地摸进宪兵队监狱，砸开牢房救出李定灼、宋之光以及被关押的 40 多人。击毙日军 4 人，俘虏伪军 40 余人，缴获长短枪 30 余支。我无一伤亡，内线关系也未暴露。

我们还多次通过内线关系端掉伪军的炮楼，南宫县臧家庄敌炮楼，先后曾被我利用关系打了三次。第一次（1941 年 3 月）打时，守敌以日军为主；第二、三次（1943 年 1、2 月）打时守敌系伪军，计击毙日军 12 人，俘伪军 20 多人。有的伪军炮楼非常孤立，却很高。我们做好了伪军、伪组织中的炊事员的工作，使其成为我们的内线。得知伪军吃饭时总是把枪放到里边，到外边吃饭。拂晓或黄昏时，我们把部队隐蔽在附近，派人伪装给他们送东西先进去，乘伪军在外边吃饭时，伙同炊事员把门一关。我们的部队一出来，把一、二十个伪军就俘虏了，然后再开门把枪收了，非常痛快。那时类似这样的事情还不少。策动伪军整班、整队，几十人至上百人反正，多次协助部队攻打日伪城镇据点，成绩亦甚卓著。

我们不但做瓦解伪军的工作，也做瓦解日军的工作。开始时，对日军开展宣传攻势，受语言文字不通的限制，方法上比较简单，内容的针对性也不强。宣传品主要靠上级发，部队拿着到处撒，效果不大。

后来有所改进，各单位组织敌工宣传员，由军区敌工部派人教日语，教唱日本歌曲等。根据不同据点日军的情况，采取写信、寄日文传单、送诗歌等，对日军宣传。针对日军士兵思亲想家的心理，每逢佳节特别是樱花节，大力开展宣传攻势，以引起日军士兵思乡厌战情绪。师政治部还专门颁发了《关于加紧樱花时季的对敌工的训令》。

以后，我们组织被俘日军士兵开展对日军宣传的工作，效果比我们做好多了。

俘虏日军士兵很不容易，他们受武士道精神毒害很深，很难捉到活的，

即使是抓到活的，也是受重伤的。有一次我们在战斗中俘虏了 10 多个日军士兵，都是负重伤的。在我们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下，只救活了一个叫秋山良照的。敌工部同志说，一定要教育好，使他转变立场，让他现身说法，开展对日军的宣传工作。后来经过我们耐心细致做工作，教育好了。“四·二九”铁壁合围时，他很勇敢，端着轻机枪，“突突突”，冲出来了。刘伯承师长曾在太行新华日报写文章赞扬秋山良照，说他“多次在枪林弹雨之中，亲自拿机关枪去协助我们作战。”

被俘的日军士兵组成“觉醒联盟冀南支部”，后改称“日本士兵反战同盟”。刚成立时只有秋山良照、水原健次和成泽三个人，秋山良照是负责人。后来发展到十六七人。他们经常向据点散发传单、喊话或打电话，号召日军士兵不要为侵略者卖命。他们还组织出版《日本士兵之友》、《战友》等刊物，向日军开展宣传工作。“觉醒联盟”的活动对日军影响很大，日本侵略者十分害怕，他们竟说八路军中有个“秋山良照部队”。

1943 年以后，我们把秋山良照他们“联盟”的一些人，先送到太行山，后又送到延安。他们在延安工作了一段时间。抗战胜利后，秋山良照和他的战友都回到了日本国。回国后，他加入了日本共产党，还写了《八路军中的日本反战士兵》等书，记述了抗战时期他在冀南等地的战斗经历。

1981 年，秋山良照来我国旅游，我会见了他，我们愉快地回顾了过去。从 1941 年他被我军俘虏算起，整整过去了四十个春秋，然而，在冀南的那段难忘的战斗生活，却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冲淡。

第十章　抗战胜利

1943 年 11 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冀鲁豫中央分局（也称平原分局），直接领导冀南区和冀鲁豫区两个地区，黄敬任书记，我为组织部长，李菁玉为宣传部长（后由朱光兼），张霖之为民运部长兼组织部副部长，张玺任秘书长。

1944 年 5 月，冀南和冀鲁豫两个区党委合并，撤销了两个区党委机构，由冀鲁豫中央分局直接领导原冀南区和冀鲁豫区各地委，分局直属北方局领导。

随着两个区党委合并，冀南军区和冀鲁豫军区也合并了，组成新的冀鲁豫军区，也称平原军区，我任司令员，黄敬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王宏坤、杨勇，副政治委员苏振华，参谋长阎揆要，不久由曹里怀接任，政治部主任朱光。

渡过困难时期转入局部反攻

冀南和冀鲁豫是在华北敌后联系密切的两个地区，抗战开始以来，南北互相配合，共同作战，粉碎敌人的多次“扫荡”，还联合进行了反顽作战。两区之所以合并，主要是从冀南比较困难考虑的。当时冀南和冀鲁豫相比，冀南区的敌情更严重得多，而且发生了大灾荒。两区合并，既可适应这种南缓北紧的形势，又可统一和增强对敌斗争力量。两区合并后，能有个站脚的地区，回旋余地就大了。原冀鲁豫地区有一个较大的根据地，叫濮、范、观，三个县的县城都在我们手里。根据地大了，各方面的条件就好多了，有些事情也就好办多了。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一两天就得转移换地方，甚至长期衣不解带，现在一住可以几十天，吃饭问题也很容易解决了。

1944 年以来，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给德国法西斯以连续毁灭性打击，完全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开始了战略大反攻，把战线推向了德国本上。英美联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希特勒法西斯已处在崩溃之中。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上，日本法西斯频频受挫，节节败退。美军在太平洋上继续反攻，战线不断向日本本国海域逼进。日本法西斯的末日即将来临。

国内形势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日本侵略者为使国民党政府尽快投降，对其加大军事压力，集中兵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再次进攻。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致使前线部队连遭失败。国民党统治区民生调敝、民怨沸腾。与此相反，在敌后战场上，各地抗日军民坚持持久战，克服困难，积蓄力量，游击战争广泛深入发展，积小胜为大胜，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敌我斗争形势向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迅速发展。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冀南的残酷环境也逐渐好转。抗日军民咬紧牙关以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战胜了敌人的疯狂进攻，而且又以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战胜了灾荒。

1944 年以来，各方面情况进一步向好的方面发展，抗日军民已渡过了最困难时期，抗日根据地在深入搞好减租减息，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掀起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努力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根据地在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方面，总的情况是好的，在个别地方也有侵犯中农利益的情况发生。部队本身除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外，也自己动手开荒种地，改善生活，减轻群众负担。

随着攻势作故和局部反攻的开展，战斗十分频繁，各部队的生产只能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进行。为使战斗和生产两不误，各部队内部开展生产互助活动。身体强的和弱的同志之间互助，机关和战斗部队之间互助，作战部队与休整部队之间互助等。

部队开荒种地获得了丰硕成果。以军区几个直属单位为例，共开荒地3000 多亩，收获粮食近 3 万斤、棉花 1.8 万多斤、花生 8.1 万多斤、蔬菜类20 万斤。此外还养了一些猪，有的单位能自给半年菜金，还能保证每个月吃一头猪。我们是一天一天好起来。

然而，敌人却一天不如一天。在我强大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下，日军思乡厌战，士气日益低落，伪军更加动摇不安。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不断受挫，为改变其不利态势，不得不从中国战场上大量抽调兵力，加强太平洋战场。这样，在华北敌后的日军兵力相对减少，而且补充的多为新兵，战斗力比较弱。日军相对集中，部分守备任务由伪军单独担任。斗争形势日益对我有利。

在敌我斗争的有利态势下，我们逐步开始向敌人发起攻势作战。盘踞在邱县城的敌人，在我军攻势的威慑下，于 5 月下旬，弃城撤走，我军遂收复了邱县城。这是自敌人占领冀南各县城后，我们收复的第一座县城。紧接着很快就解放了邱县全境。这样，邱（县）馆（陶）公路南北的冀南第三、第四军分区连成一片，我们活动的回旋余地比以前大多了。5 月份，我们还收复了清丰县城。驻守清丰县城的伪军于 5 月上旬弃城逃跑，我遂收复了该城。但是，敌人为了掠夺清丰地区即将丰收的小麦，伪冀南道尹薛兴甫抽调所属8 个县的伪警备队 2000 多人，并带领全道 13 个县的县长及日本顾问，在日军一个中队的掩护下，重占清丰县城。敌人连日开会、演戏庆祝“ 光复清丰 ”。我军区根据所获情报，决定由冀鲁豫八分区部队，趁敌疏于戒备之机，袭击清丰县城，打敌人个措手不及，一举击毙日军联络部代部长以下官兵 7 人、伪军 200 余人，俘伪道尹薛兴甫以及县长、警察所长等 40 余人、日军联络员7 人、伪军 1300 余人，仅据原冀南二、五、六、七等四个军分区统计：1944年上半年，敌据点、碉堡被我攻克和自行收缩撤走的有 170 多个，约占总数的 32.8%。

8 月初，打郓城消灭刘本功部。刘是山东济宁人，土匪出身，曾当过韩复榘手下的特务队长。投降日军后，盘踞郓城，杀人放火，作恶多端，成为日伪的模范县长。群众恨之人骨，骂他是杀人魔王。我们一举歼灭刘部伪军2500 余人，解放了几百个村庄，根据地向南推进了几十里。

从 5 月下旬开展攻势作战到年底，先后收复了邱县、濮县、清丰、内黄、濮阳、朝城、寿张七座县城。攻势作战的胜利，为进一步展开局部反攻和全面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全面大反攻，
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1944 年底，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发表了《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军民“ 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展开更大规模攻势作战，“ 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有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 ”。

遵照毛主席指示精神，我们要求各分区部队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势作战。积极围困深入根据地内的、比较孤立的敌人的据点和县城，迅速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将敌人压缩到最狭窄的地区和“ 点线 ”，开展局部反攻。

我军局部反攻的作战指导思想，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向敌人守备薄弱的地方发起反击，着重消灭伪军，相机夺取日伪军合守或日军单独守备的据点或县城。

1945 年初，开始局部反攻。头一仗是冀南三分区部队攻打大名县城。大名城守敌是伪东亚同盟自治军近千人，另有日军一个中队。攻打大名前，三分区通过被日军撤职的东亚同盟自治军原军长王天祥的关系，做通了该军突击团的工作，该团决定反正，作为内应配合我军攻城。1 月 16 日夜，我军在内应的接应下，一举攻入城内，击毙伪东亚同盟自治军军长刘坤等死心踏地的汉奸多人，俘伪军 400 余人。大名之战，揭开了冀鲁豫军区局部反攻的序幕。这一仗，可以说是 1945 年头一炮。

1 月 17 日，王天祥率反正的突击团开到我解放区元城的张铁集，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25 日，我和王宏坤、杨勇、曹里怀、朱光到该团驻地看望慰问这支反正的部队，并请他们排以上干部和家属吃了顿饭。席间我代表军区领导向他们表示欢迎，讲了八路军的民主作风和反攻即将到来的大好形势。

1945 年 3 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同志来到冀鲁豫地区检查、指导工作。随小平同志一起来的有彭涛、周惠等同志。我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主要汇报了对敌斗争，发动群众、减租减息以及生产自救、克服灾荒等方面的情况。在谈到冀南地区遭到严重灾荒，军民极度困难时，我难过得流了泪。此时，小平同志说，冀南的困难情况我们都了解，不必多讲了。当我汇报在农村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的情况时，小平同志指出，现在有少数地方出现了侵犯中农利益的事，指示我们一定要注意团结中农，保护中农利益，要采取坚决措施，制止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发生。就在这次汇报会上研究决定，为了指导冀南地区的工作，成立冀南工委，由彭涛任书记，周惠任副书记，归平原分局领导。

在反攻即将到来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召开了一次英模大会。大会是 3 月份在濮阳召开的。参加会的英模代表 186 人，这些都是在空前残酷的对敌斗争中，在战胜严重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在根据地的建设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代表人物，他们是革命的火车头。我在大会闭幕会上，讲了三个问题：一是继续扩大解放区，拔除敌伪据点，在全边区开展反攻；二是继续做好群众工作，深入减租减息；三是继续开展大生产运动。号召英模代表再接再厉，继续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为党为人民再做贡献。这次大会，为我军迎接全面大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进行了一次有力的思想大动员。

为进一步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濮阳英模大会后，于 4 月下旬，攻打南乐县城。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仗，当时集中了四个军分区的 5 个主力团、14 个县大队及部分区干队、民兵等。八分区司令员曾思玉指挥分区主力攻打南乐县城。九分区政委张国华和副司令员赵东衰率部攻打南乐城西的元村，并准备打击由回隆、楚旺方向来援之敌。七分区司令员赵健民、政委许梦侠和副政委张希才指挥分区主力，一部包围龙王庙据点，一部负责打击大名方向来援之敌。三分区副司令员孔庆德、高厚良和政委李福祥率主力攻取海子、杨桥、金安村三据点，牵制大名、魏县、广平之敌，阻其南下增援。经过几天激烈战斗，歼灭日军一个小队、伪军 3000 多人，缴获轻机枪 64 挺、重机枪 4 挺及其它大批枪弹。拔除敌据点 30 多处，攻克了南乐县城，解放了大名、广平以东大片土地，从而使冀鲁豫解放区南北连成一片。

南乐战役后，于 5 月中旬攻打东平县城。这一仗打得也很艰苦，我军冲进县府大院后，与日伪军短兵相接，逐屋争夺，最后消灭了敌人，计毙伤俘日伪军 1300 余人。接着，我军乘胜扩大战果。6 月中旬至下旬，又一举攻克了阳谷县城，歼灭日伪军 3000 余人。

为了适应反攻形势的迅速发展，便于指挥，军区报经中央同意，成立了冀南和豫东两个作战指挥部。冀南指挥部由王宏坤兼任司令员，豫东指挥部司令员王秉璋，政治委员段君毅。

1945 年 8 月 9 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同日，朱德总司令向全军发出了大反攻命令。之后，朱总司令又连续发布了几道大反攻命令。我们遵照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指挥部队向日伪军展开了大规模反攻作战。

日本无条件投降，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8 月 10 日下午，王宏坤、曹里怀俩人突然跑来告诉我说：日本要投降了！他俩激动得满脸通红。乍听，我还不敢相信，问，你们怎么知道的？他俩也不讲话，叫我跟他们去曹里怀住的房间。曹的房间里有一部收音机，正在广播日本政府要投降的喜讯，这一下子全明白了，日本真要投降了。我和他俩一样高兴得真是难以言表。日本投降了，中国人民胜利了，这是抗战八年来多少个日日夜夜所盼望的、无比激动人心的好消息啊！

日本投降了，我们很兴奋，一个晚上没睡觉，当夜召集平原分局和冀鲁豫军区领导同志开紧急会议，讨论研究日本投降后，我们怎么行动。在会上我对王宏坤同志说：

“老王，你不能走，还得你到冀南指挥作战”。

王宏坤同志微笑着点点头。

当时王宏坤同志身体不好，他病的时间也比较长了，中央已同意他到延安去治疗，他已打点好行装，准备即日起程。我想把他留下，他也不想走了，我们正好想一块去了。他听说日本投降了，病好像好了一半似的。

那时，我们有占领大城市的思想。当时，我们几个人都还年轻，敢想敢说，在极其兴奋的状态下讨论了一番，在尚未接到中央的指示之前，便立即向中央发了个建议电报，提出：我们行动的大方向应是平汉路的新乡、安阳和陇海路的开封一带以及周围的一些县城。山东部队和新四军应当去陇海铁路东徐州一带。郑州应归太行、太岳部队接受。石家庄应归晋察冀部队接受。德州应归冀鲁豫边区接受。这个电报，不仅建议我们部队如何行动，而且还建议了其他部队的行动方案。后来，我们才了解到，中央从全局和长远考虑，决定各地都暂不占领大城市，而采取夺取小城市、县城和广大农村的方针。当然，也就没有答复我们的电报。

我们决定分兵三路，以 13 个团组成中路军，下分三个纵队，由我和杨勇、苏振华指挥，歼灭新乡以东伪军，相机占领新乡、开封。以 3 个团组成南路军，由豫东指挥部司令员王秉瘴、政治委员段君毅指挥，协助中路军攻占开封，并阻止敌援军北上。以原冀南部队及地方武装组成北路军，由王宏坤指挥，其主力向平汉路安阳至邯郸以东地区之敌进攻，相机占领安阳、邯郸等，并分遣一部主力攻歼德石路沿线之敌。

三路大军组成后，星夜出动，浩浩荡荡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挺进。沿途群众敲锣打鼓热烈欢送人民子弟兵出征。所到地区，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热情拥护和支持，帮助部队洗衣、做饭、带路、侦察和运送物资。

中路军一纵队于 8 月 19 日，先后攻克延津、阳武，切断了汴新铁路。三纵队进至长垣以南，继续向开封逼进。 21 日，中路军二纵队攻克封丘城后，也继续向开封逼进。南路军已进至开封以南陈留地区，切断了陇海铁路郑州到开封段。至此，两路大军对开封已形成夹击之势。南路军主力集结在开封与朱仙镇之间，其先头部队已抵城郊。22 日，我们在开封周围作好了一切准备工作，民工也来了，已是箭在弦上，只等第二天拂晓发起总攻。可是，22 日下午，我们接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改变军事占领大城市方针的指示》。该指示指出：“我军应改变以主力部队夺取大城市的方针，应以相当兵力在民兵配合下继续围困城市，以主力部队转向着重夺取中小城市及广大农村，扩大与巩固解放区。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

实践证明，中央在这个关键时刻所作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国民党反动派要来夺取抗战果实，从峨嵋山下来摘桃子了。美国、蒋、日伪相勾结，阻挡日军向我军缴械投降。而且，日军正从小城镇往郑州、徐州、济南、石家庄、天津等大城市集中、撤退。我军攻取大城市，必遭日伪军顽抗，夺取大城市难以实现。根据这种复杂形势，中央改变了夺取大城市的战略方针。

根据中央的指示，军区立即发布命令，停止进攻开封，重新调整部署。中路军三纵队调头东进，攻取长垣、曹县，保卫鲁西南门户。并配合新四军及山东部队扫清陇海路沿线残敌。中路军一二纵队直取滑县、汤阴县城，切断平汉路，阻止国民党军第四十军马法五部北上。南路军夺取水东地区城镇。

小城市和县城是比较好打的。有些地方的小城镇只有伪军，有的我们已经作好了伪军的工作，他们就反正了。打大城市一时攻不下来，僵峙在那里对我们不利。同时，传来了毛主席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消息以及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我们的仗打得越好，他在重庆就越好谈判。所以，我们赶快组织打小城市。很快，就夺取了郑州以北的一些小城市，控制了平汉路一带的广大农村。北路军攻取冀南地区敌占县城，截止 9 月 2 日，先后攻克收复县城 27 座及其周围所有的据点、碉堡。

日本政府 8 月 15 日宣布投降，日军大本营命令各地日军从 8 月 25 日零时起停止一切战斗行动。但是，敌后日伪军拒绝向我军投降，继续顽抗。对此，我抗日军民在大反攻中对拒降之日伪军予以坚决、彻底打击消灭。9 月 2 日，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在中国进行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最终以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日本侵略者彻底失败而告结束。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延安《解放日报》为庆祝抗战胜利发表的社论中说：“半个世纪来，我们中华民族所受到的奇耻大辱、血海深仇，现在报仇雪耻了，这的确是我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大事，值得全国同胞热烈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各族人民。

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
取得抗日战争胜利

抗日战争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引下取得胜利的。抗战开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为我党、我军制定了正确的全民抗战路线。同时，用人民战争思想武装全党、全军和全国抗日群众。全国抗日军民在毛泽东指引下，同仇

敌忾，奋勇杀敌，最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在一二九师刘、邓首长领导下，主要在冀南地区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没有到过延安，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听取毛泽东的指示和教诲。当时，我们同党中央、毛泽东的联系主要通过电报。通过不断从延安拍来的电报，了解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冀南平原抗战以及整个华北敌后抗日斗争中重大问题的指示。

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重要讲话和文章，都是以最快速度用电报发到各抗日根据地，这对我们更好地开展抗日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相继发表了《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论政策》等，对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正确贯彻土地政策、劳动政策、税收政策、锄奸政策，以及正确执行对反共顽固派、汉奸亲日派的政策和策略，都作了极其精辟的论述，对我们的各项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我们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思想武器。我们在抗日根据地的实际工作中，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在同反共顽固派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对我们有深刻影响。全党整风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是一次成功的实践。那时，我们虽然身在前方，战事频繁，环境残酷，特别是 1942 年以后的两三年，人祸加天灾，但是我们仍然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党内进行整风，认真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矛盾论》、《实践论》等光辉文献。整风运动对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改进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大大推动了我们的各项工作。就我个人来讲，印象最深的收获之一是提高了对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认识。在平原地区创造“人山”，实质是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问题。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是胜利之本。过去，长期做群众工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这些经验是零碎的和感性的。经过整风学习，才真正提高到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理论高度。毛主席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验证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段富有哲理的论述，是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是群众智慧的结晶，放射着辩证唯物主义、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读后深获教益和启迪，极大增强了贯彻群众路线的自觉性，提高了思想和领导水平。我们在冀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在那极端艰难困苦的斗争中，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最后取得胜利，最根本的就是贯彻了毛泽东教导的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扎根于群众之中。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在中国抗日战争取得

最后胜利的前夜，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从 1942 年开始的全党学习运动和整风运动，在思想上为七大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七大提出的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党的七大，使全党在革命面临新的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在思想理论、政治路线和组织

制度上得到及时正确的指导，使全党团结一致去争取胜利具有了强有力的保证，因而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在前线，没有参加七大。七大胜利结束的消息传来，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七大结束后，收到新华社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说我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感到很突然，不相信自己会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怀疑新华社的电报搞错了。经过核实，电报并没有错，但我仍认为有别的同志比我的条件更好，比我更加合适。

抗战胜利后
任晋翼鲁豫军区第二纵队政委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大耍两面派，一面装出和平姿态，邀请毛主席赴重庆谈判；一面加紧调兵遣将向我解放区进攻，抢夺胜利果实。

毛泽东主席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作了科学的分析，在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前夕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重要文章，文中写道：“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并说：“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于 8 月 20 日，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任书记，副书记薄一波。同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副司令员滕代远、王宏坤，副政治委员薄一波、张际春（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李达，政治部副主任王新亭。后来，决定我也任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也撤销了。冀南和冀鲁豫两区又分开了，两个区党委直属晋冀鲁豫中央局。晋冀鲁豫军区领导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四个军区。我们习惯把晋冀鲁豫军区称大军区。

8 月中旬，日本刚刚宣布投降，阎锡山就令其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该军及六十一军共 5 个师及杂牌武装，从山西临汾、浮山向我晋东南上党地区进犯，抢夺胜利果实来了。先后占领了长治及周围各县。

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支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晋冀鲁豫军区刘邓首长决定集中太行、太岳和冀南部队主力发起上党战役，消灭阎锡山部的进犯。杜义德、孔庆德率冀南 5 个团参加这次战役，当时称“冀南纵队”。这时，陈再道同志已从延安飞抵太行，指挥冀南纵队。

这次阎锡山先后出动 13 个师共 3.8 万余人，被我们消灭掉 3.5 万余人，逃掉 2000 人，散掉 1000 人。击毙敌副司令彭毓斌，俘虏军长史泽波、孙楚等数十名高级将领。

在上党战役进行中，王宏坤同志指挥冀南部队和太行秦基伟、何正文部队，9 月 24 日，攻克邢台。10 月 4 日，攻克邯郸。之后，又攻克临洺关。

上党战役结束前夕，晋冀鲁豫军区决定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 4 个军区的主力部队，依次编为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一纵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二纵司令员陈再道，我是政委。三纵司令员陈锡联，政委彭涛。四纵司令员陈赓，政委谢富治。每个纵队辖 3 个旅，地方上还有游击队。 10 月 17 日，二纵在邯郸宣布成立，当时主要领导只有陈再道司令员，纵队机关着手组建。

在阎锡山部向上党地区进攻的同时，蒋介石兵分四路向华北各地全面进犯：一路是第一战区胡宗南部北渡黄河，沿同蒲路、正大路进抵石家庄，准

备进占北平、天津；一路是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经豫西向郑州、新乡集中，准备沿平汉路北上；一路是第十战区李品仙部经皖北到徐州，再沿津浦线北上；一路是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攻占我归绥、集宁后，又向察哈尔进犯。美国还帮助蒋介石从空中、海上向东北运兵。

10 月初，孙连仲部 3 个军在其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兼四十军军长）、高树勋（兼新八军军长）率领下，由新乡沿平汉路北犯，企图与经同蒲路、正太路进占石家庄的胡宗南部队南北会师，完全控制平汉路。

国民党的战略企图是：完全占领长江以南地区，着重夺取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线，以分割和压缩解放区，并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出兵占领整个东北。

遵照中共中央“巩固华北、争取东北、坚持华中”的战略部署，晋冀鲁豫军区为了阻止和消灭北犯之敌保卫华北根据地，刘邓首长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集中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及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部队各一部发起平汉战役（后称邯郸战役），在漳河以北、邯郸以南地区歼灭北犯之敌。党中央、毛主席对这次战役极为重视，刘邓首长决心把平汉战役作为大量消灭敌人的第二个上党战役。

我从冀鲁豫赶到邯郸，见到了陈再道同志，这是我们自 1943 年上半年分开后第一次见面，感到格外亲热。范朝利、钟汉华也从延安赶到邯郸。原来冀南的一些老熟人又到一起了，非常高兴，大家互致问候。二纵的主要领导同志都到了，我们研究了纵队机关和 3 个旅的组成问题，旅的干部大军区都任命了。

邯郸是平汉路上一个较大城市，是河北省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当时有 3 万多人口。在军事上是个战略要地，是华北的南大门。邯郸又是座古城，是战国时期赵国都城，古迹很多。我们冀南的一些老人相逢在这座古城，真想参观游览一下。可是大战迫在眉睫，时间不允许。我和再道他们说：“打完这次战役，我们好好看看这座古城是个啥样子。”

10 月 24 日，我们向敌人发起了反击，二纵向邯郸以南地区之敌发起攻击。我各纵队积极做好总攻部署，同时，加紧做争取高树勋部工作。高部原属西北军，不是蒋军“嫡系”，属于“杂牌”，受歧视、排挤。该部中一些民主分子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不满，该军内部也有我地下党的同志在工作。为了最终争取高树勋起义，在我军发起总攻前，刘邓派李达参谋长亲自会晤高树勋将军。 30 日，高率新八军及河北民军共万余人在磁县马头镇起义。这下，使敌人乱了阵脚。我军发起总攻后，一举将敌歼灭。11 月 2 日，历时 10 天的平

汉战役胜利结束。歼敌 2 个军，1 个军起义，俘敌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第十一战区参谋长宋肯堂以下官兵 2.3 万余人。邯郸战役的胜利，高树勋率部起义起了重要作用。刘伯承司令员看望高树勋时，转达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对他高举义旗，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壮举的热烈欢迎。

平汉战役的胜利，敌两个军被歼，1 个军起义，在国民党军内部引起很大震动，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同时，对阻止国民党军沿平汉路北进，掩护我军在东北战略展开，迫使蒋介石签订“停战协定”起了重要作用。

平汉战役结束后，我和再道等同志游览了邯郸城，参观了古赵国的一些

名胜古迹。不少成语典故与赵国古都邯郸有关，如“邯郸学步”、“胡服骑射”、“完璧归赵”、“将相和”、“黄粱梦”等。当时邯郸工商业比较发达，有面粉厂、发电厂，电机是五百千瓦的，据说还是清朝慈德太后那儿搞来的。见了电灯，当时真觉得了不起，高兴得不得了，眼都看花了，游览了邯郸城，大开眼界。

平汉战役后，各参战部队利用一定时间进行了战斗总结和休整。

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大军区也召集所属各纵队、各军区领导以及地方负责同志在峰峰开了一次会，对平汉战役作了初步总结。刘邓讲了话，还请与会同志吃饭。席间，刘邓向大家敬酒，大家也举杯相庆。

平汉战役后，大军区又以太行和冀鲁豫部队组建了第六、第七纵队。

这时，中央发电报到濮阳，令原来准备派到山东去的林彪去东北。同时去的还有 10 多个中央委员，彭真、陈云、罗荣桓、李富春、林枫、吕正操等。要他们到东北创造和巩固根据地，与苏联打通联系。中央还要求各地干部，凡是东北人都回东北去。我们从冀南部队中抽调班、排、连、营、团长，组成 5 个团的架子，而且是最好的干部。当时认为，只要把东北根据地创建起来并巩固住，我们的胜利就可靠了。当时，中共中央从各解放区共抽调了十一万人的部队和二万名干部进入东北。

1946 年 7 月，二纵由邢台移驻威县，与冀南军区合并，陈再道任司令员，王从吾任政治委员，副司令员王光华，副政治委员刘志坚、马国瑞，参谋长王蕴瑞，政治部主任钟汉华。

第十一章　从北方到南方

八年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轰轰烈烈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了。由于我党我军在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等一系列政策上的英明正确，我们很快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反攻。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使蒋家王朝风雨飘摇，我军在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争中，节节胜利。随着革命的步伐，我一步步从大北方，走向大江南。

在普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
办党校，培训地、县领导干部

1946 年 6 月，我调到地方工作，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长兼党校副校长，直到 1948 年 4 月。

晋冀鲁豫中央局是 1945 年 8 月成立的,书记是邓小平,副书记是薄一波，秘书长陶希晋，宣传部长张磐石。中央局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党委。中央局组织部的干部是分别从所辖的四个区党委调来的，以便熟悉这些地区的干部情况。太行有刘建勋，太岳有马宗磷，冀南有乔增堂，冀鲁豫有岳肖峡。中央局组织部机构很小，只设干部科

（科长先是刘建勋，后为岳肖峡），组织科（科长李光禄）和招待所（后改为接待处）。人员也很精干，整个组织部包括两位公务员在内总共只有十多人。但任务并不轻，负责辖区内重

要干部的考察了解、调动任免及审查工作。组织部的同志们

工作都很勤奋，从部长到干事，对来部里办事的同志，都是热情接待，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同志式地与他们交换看法。大家亲切地称组织部为干部之家。当时，中央局组织部

曾分配了一批日本投降后从延安来晋冀鲁豫解放区工作的干部。还审查了一批中原五师从宣化店突围出来的干部。审查工作主要是靠他们自己做的，进行得很顺利。我到中央局

党校兼任副校长（校长由薄一波兼）以后，就搬到党校去住，仍兼管组织部的工作，但主要精力放在培训地、县以上领导干部上，组织部的工作主要依靠刘建勋等同志去做了。

1946 年 6 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向我解放

区大举进攻，发动了全国性的反革命内战。经过我人民解放军一年的英勇作战，歼灭国民党正规军 90 多个旅，使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947 年 6 月，党中央决定，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

区，在外线大量消灭敌人，把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高潮。为此，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决定以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基干部队及原中原军区的部队，依次组成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五个纵队。以后又组建了第十二、第十四、第十五纵队。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陈赓、谢富治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陈毅、粟裕、谭震林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分别挺进大别山、豫陕鄂和豫皖苏，夺取中原，建立中原解放区。6 月 30 日，刘、邓率部突破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首先揭开我军战略反攻的序幕，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解放了大别山区的 20 多座县城，建立了鄂豫和皖西两个战略根据地。8 月，陈、谢部强渡黄河，向豫西挺进，解放了陇海路沿线的许多县城，直逼

西安，建立了以伏牛山为中心的豫陕鄂解放区。9 月，陈、粟、谭部发起进军豫皖苏战役，迅速扩大和巩固了豫皖苏战略根据地。此后，我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大别山发动的大规划“清剿”，又胜利地开辟桐柏、江汉两个新区。我中原三大主力军相继开辟和扩大了鄂豫、皖西、豫皖苏、桐柏、江汉各战略根据地之后，初步形成了地跨鄂、豫、皖、苏、陕五省的中原解放区。 1948 年，中原解放区进入不断发展和巩固的阶段。

1948 年 2 月，中央曾决定要陈质和我去搞豫陕鄂，由我任豫陕鄂中央分局书记。我奉命到达豫西，一路上传达毛主席关于形势和任务的讲话，特别着重传达中央关于新区政策的指示（我是友晋冀鲁豫中央局听陈毅同志传达的）。此时，刘、邓大军已从大别山撤回豫西，正在那里召开旅以上政治工作会议，刘、邓也让我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上述指示和讲话。到豫西不久，刘、邓告诉我中原局已向中央报告，豫陕鄂中央分局不成立了，你从中央带来的干部都交给我们。你住在司令部，等待分配工作。

从晋翼鲁豫到豫皖苏
任豫皖苏中央分局书记

等了一段时间，中央来了命令，决定组织豫皖苏中央分局，以我、吴芝圃、粟裕、张国华、刘瑞龙、杨一辰六人为委员，我为书记，吴芝圃为副书记，粟裕兼军区司令员（未到职），张国华为副司令员，我兼军区政委，吴芝回兼副政委。豫皖苏行政公署主任为吴芝圃，副主任为杨一辰。豫皖苏解放区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老根据地之一，在斗争最残酷时我军主力曾一度撤离，但党领导人民群众在该地继续坚持斗争。1944 年 7 月下旬，党中央令“新四军第四师西进豫皖苏边区，首先恢复肖县、永城、夏邑、宿县根据地，然后打通与睢杞大地区的联系，相机控制新黄河以东地区”。同年八月，四师彭雪枫、张爱萍师长奉命先后率主力西进，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于 11 日即基本恢复了豫皖苏抗

日民主根据地。1946 年 10 月，中央决定正式恢复豫皖苏边区，由吴芝圃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张国华任军区司令员。陈赓率部南下挺进后迅速扩大了解放区，建立了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的豫皖苏根据地。我到豫皖苏任职时，该根据地下辖 8 个地委，3 个市，68 个县，1600 多万人口，为中原解放区最大的根据地。

同时，中央指定粟裕和我为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粟裕仍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陈毅离职时其军政职务由粟裕代理，并任命我为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委。华东野战军的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问我什么时候到总部上任？我对他们讲，我这个第三副政委是挂名的，我还是主要在地方搞支援前线的工作。毛主席于 1948 年 5 月给陈、粟、谭震林和我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宋任穷同志亦非专任华野副政委而是以豫皖苏中央分局书记兼任副政委，故于华野大政方针之命令文件应当署名，而于日常事务及战役作战之命令文件则不须署名。”

豫皖苏中央分局归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因受战争环境影响，驻地不固定，在界首以及以界首为中心的亳县、杞县、太康、郸县、淮阴等县一带流动。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继续清剿顽匪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城乡生产，繁荣经济：安定社会秩序，巩固和发展解放区，支援前方作战。

执行中央的新区政策

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

初到新区，我们有些同志犯有急性病的错误，采用了一些“左”的做法，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譬如，简单地抱着尽快完成土地改革的愿望，轻率地照搬老解放区的经验，决定在新区农村立即实行土地改革。实践证明，这是行不通的。新区往往敌情比较严重，国民党和地富的武装力量尚未肃清，群众和干部的准备程度不足，大多数农民还没有组织起来分配土地的要求，本地的正派的基层干部还没有大批涌现出来，外来干部又来不及熟悉情况。在这种条件下，匆促实行土地改革，是不成功的。农民一般都不敢要有势力的地富的土地，有些地方分配了土地之后，国民党军队结合当地地富势力，很快组织起反攻，使这些地区受到严重摧残。毛主席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讲到这种情况时说：“才去到新区，群众热烈欢迎，打土豪分浮财人家就走了，不热烈了。这是硬搬土地法的结果。”

针对上述情况，党中央适时指出，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的情况有很大区别，应当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土地政策。并明确指示，在新区“要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食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以便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帮助人民解放军消灭一切国民党武装力量和打击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分子，在这类地区，既不要分土地，也不要分浮财，因为这些都是在新区和接敌区的条件下，不利于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完成消灭国民党反动力量这一基本任务的。”

在豫皖苏解放区，我们坚决遵照党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决定在辖区内的老解放区仍实行土地改革，在新区的农村则立即停止土地改革，开展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减租，一律实行“二五减租”，即按原租额减去二成半；减息，实行对农民向地主、富农所借的旧债，按月利分半计算清偿的办法，普遍为农村各阶层群众所接受，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我们在实行减租减息的同时，向干部和群众讲明，土地改革是我党始终要贯彻的方针，因为只有土改才能使农民获得比较彻底的解放，暂时改为减租减息，是因为土改条件尚不成熟，减租减息在目前对人民比较有利的原故。对此有个别干部包括领导干部一时思想不通，认为不立即进行土改是“右”了，经过耐心说服特别是经过实践，他们很快接受了中央的正确方针。

从政治上坚决打击散布在广大农村中的反动的恶霸分子，是新区土地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争取多数，安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措施。我们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注意严格控制打击面，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集中力量打击大地主中的恶霸反动分子，对于群众最为痛恨的小地主、富农及保甲长中的恶霸分子也予以打击，而不去惊动小地主、富农的大多数。地主富农中的左翼分子，我们则同他们合作。新区地主富农中历来都有一部分左翼分子（其中有些是知识分子），拥护我党反帝反蒋的政策，有些能在我党的教育下改变其地主富农立场，执行党的路线，对这些人我们就同他们合作，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并吸收其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对于由于斗争的深入，思想发生动摇以至障碍运动发展者，则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有的可继续任用，有的要调动职务或送去学习，对于坚持错误不改者坚决清洗。

恢复发展工商业，整顿金融秩序

正确对待工商业者是新区政策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初到新区，供给困难，

侵犯工商业者利益的事屡有发生，如没收地主的工商业部分，假借没收官僚资本反动分子的财产，没收了那些本来不应当没收的工厂和商店。中央和中原局发现后，坚决予以制止。

中原局于 1948 年 9 月 29 日就进一步恢复工商业问题发出专门指示，指出：只有使工商业获得恢复与发展，才能安定广大的工商业者及市镇工人、贫民的生活，吸引他们成为反美反蒋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才能加速城市工业品与农村生产品的交换过程，减少二者之间的剪刀差额，大大有利于农民经济的发展；才能加速金融流转，增加市场的货币流量，以利我发行与巩固中票（注：指在中原解放区发行的中州农民银行钞票）价值；才能便利于军需供应及财政征收；也只有积极地去帮助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才能取得对于工商业者的领导。对于破坏工商业的行为，要求我们一经发现，即严格纠正。同年 10 月 23 日中原军区的安民布告中又明确规定：“ 保护民族工商业，凡私人资本经营之工厂、商店、作坊、企业、公司、银行、钱庄、货栈等，一律加以保护，不得侵犯 ”。对于农村中恶霸地主财产中的工商业部分，也不予没收，留给其家属经营，对于已经破坏或没收的，必须实行适当补偿。

为了克服新区的经济混乱状况，减轻人民负担，安定民生，有利于发展生产，我们采取的另一重要措施是废除国民党旧货币，发行新区货币。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进行反革命内战，掠夺人民，滥印纸币（先为法币，后改为金圆券），致使物价飞涨。1947 年，国民党统治区物价上涨 20 余倍，1948 年第一季度又上涨八倍。银元与敌币之比，一年之间，由 1 比 3.5 万骤升到 1 比 800 万。敌币贬值之快，令人瞠目。不时宣布某种面值的敌币作废，结果都烂在群众手中，使老百姓受害无穷。

为了保护人民利益，中原局决定在中原解放区肃清敌市，发行自己的货币，即以中州农民银行的钞票为中原区的本位币。中原局所属各区的一切财政税收，公私交易及供给制度均以中州钞为本位，规定其法定价格为中州钞 200 元合银洋 1 元。友邻解放区银行的钞票，如冀南解放区银行发行的冀钞，暂时继续准予流通，并规定相应的价格。指导人民群众积极向国民党统治区输出敌币换回必需品，以减少损失。在豫皖苏，我们在每个村都组织排法（排除法币即敌币）代表小组，主要吸引小贩参加，积极输出敌币，换回物资，农民小贩均从中得利，收效很明显。上述做法，严重打击了敌币对人民的掠夺，保护了中原人民的利益。在中州钞发行初期，为补救通货缺乏，准许银元在市场上流通，俟中州钞地位巩固后，即禁止银元流通。当时金融斗争很激烈，我兼任分局财经委员会主任，骆耕漠同志为副主任，我们经常开会，有时一天要开两次会，研究应付金融战线出现紧急情况的对策。 1949 年 3 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平津先后解放，中原、华北、华东三大解放区联成一片，中央决定在中原解放区正式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作为统一货币，并规定 1 元中国人民银行钞票等于 3 元中州农民银行钞票。中钞发行历时九个月，在中原地区起了积极作用，至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减轻群众负担，
组织人民支援前线

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豫皖苏地区支援前线的任务日益加重。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支前的积极性十分高涨。同时，我们有些后方机关和前方部队曾发生乱抓差的现象，引起群众不满。为此，中原军区于 1948 年 9 月颁布了禁止无偿派差实行给价包运的布告。规定前后方任何机关、任何个人一律

禁止无偿派差，禁止只供给伙食，不给工资之义务运输制度。并对各种运费作出具体规定，如转运一名伤员行 50 里者，发给运价粮食 30 斤；运送军械、弹药、被服等，每百斤百里之运费，人力挑运为粮食 32 斤，驮载 25 斤；运送公粮、柴草等，每百斤百里，人力挑运为 23 斤；民运集中待运期间，因气候阻碍运输时，每人每日发给粮食 3 斤半，牲口每头骡每日 9 斤，驴每日 7 斤，牛每日 6 斤。布告的最后

一项为：“严禁抓夫支差，凡违犯上列各项规定者，按情节轻重予以警告、禁闭、撤职等处分。人民可以拒绝此种支差，各级政府对此等犯法人员，可予逮捕，扭送军事机关惩办。”以上措施，保护了人民利益，减轻了群众的负担，深受群众欢迎。

淮海战役揭开序幕后，中原局于 1948 年 11 月 13 日和 16 日，先后发出了关于全国支援淮海战役的紧急指示和支援淮海战役致豫皖苏的指示，指出此次徐州会战是围歼国民党在长江以北最大主力，是一次最大的决战，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大决战。此战如获全胜，则长江以南将无大战，全国战局将发生基本变化。要求中原解放区的全体干部和人民不顾一切疲劳，克服一切困难，忍受一切损失，以争取此次决战的胜利。并责成豫皖苏分局加强支前机构与支前工作，授权支前机关全权征调粮草与民夫担架，保证一切作战需要，责成豫皖苏有关专署组织强大的供应站，供应作战部队油、盐、猪肉、菜蔬及黄烟、烟叶、纸张等，保证部队必须的生活水准，以维持部队战斗力，并指出，“在征调过程中，群众负担不公者，以后允许再行调整。”指示我们必须保证铁道、公路之畅通，尤其是接通前线之公路、桥梁必须保证经常畅通无阻。还指示各后勤部门必须重新部署工作，如后方医院的设置，药品、弹药、军鞋等的采购和供给，使之适应战争之需要。豫皖苏分局遵照指示全力投入紧张的支前工作。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表示：决心忍受一切艰苦，克服一切困难，倾家荡产支援前线，争取战役全胜。

据统计，豫皖苏人民支援粮食 2.1 亿斤，柴草 5.3 亿斤，担架 12.5 万付，后方男女老少，不分昼夜磨面、碾米、制鞋，有的献出仅有的口粮和种子供部队食用，有的甚至拆下住房木料供给部队，形成了支援前线的高潮。在淮海战役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我赶到前线了解支前情况。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粟裕同志告诉我：前方缺柴禾，必须紧急解决，以保证部队战斗力，我们当即采取应急措施，尽最大努力解决了部队的柴禾供应问题。当时我们下了决心如果柴禾供给不足即使拆房也得保证前方的需要。坚强的后勤保障极大地支援了前方。

随着解放战争之节节胜利，新解放区不断扩大，需要有计划地准备大批干部调往新区和城市工作。豫皖苏在这方面的主要做法有：各级党政军的领导机关，均分别有计划、有步骤地开设各种干部训练班，地委经常举办轮训区委及可培养为区委级干部的训练班，县委举办乡村干部及积极分子训练班；行署除继续办好各中等学校和扩大加强原有的军政干校、建国学院，培养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军政人才外，还开办财经学校，豫皖苏机关报社附设新闻训练班，培养财经、新闻干部。大量培养提拔干部，各级各种重要岗位一律增设副职，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以备提升或调用。凡抽调干部，一般抽正职留副职，提外来干部留本地干部，抽调干部，由地委提名，报分局批准，抽调区级干部，由县委提名，报地委批准。中原局认为豫皖苏分局关于培养提拔和抽调干部的部署很好，摘要通报各地供参考。

由于中原形势的胜利发展，为了统一领导全区的各项工作，1949 年 3 月成立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举邓子恢为主席，吴芝圃、李一清为副主席。3 月 7 日，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豫皖苏中央分局和豫皖苏行政公署同时宣告撤销。中央决定调我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

组建安徽省委，
出任省委书记

1948 年 2 月 9 日，淮海战役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电报向中央和中央军委请示：“ 为适应紧迫的作战，要求安徽省委必须立即建立，宋任穷、曾希圣等应即到职使有依托。否则，江淮、皖西不能统一，妨害极大。如中央认为此时尚非建立省委时机，而为作战需要，我们建议豫皖苏分局移至合肥，统一领导皖西、江淮两区及豫皖苏之安徽部分，而将豫皖之河南部分交由中原局另组区党委管辖（但困难很多）。究应如何，请早示复。 ”2 月 11 日，中央军委复电指示：“ 江淮皖西必须统一。究以立即建立安徽省委为宜还是以豫皖苏分局移至合肥统一江淮皖西两区及淮北安徽部门为宜，请在你们此次会议上解决并立即施行报告中央备案即可。 ”

淮海战役总前委和华东局、中原局负责人当即开会研究决定，并报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安徽省委。2 月 16 日，华东局发出《关于安徽省干部分工情形》的电报：“ （一）为统一安徽全省工作，决定成立安徽省委，并规定原华中工委所辖的江淮区党委、原中原局及豫皖苏分局所辖的皖西区党委、淮北各地委及全部皖南地区，统一归安徽省委领导。（二）决定以宋任穷、谭启龙、曾希圣、曹获秋、黄岩、张劲夫、汪道　涵、梁从学、孙仲德、李步新、李世农、宋日昌、杨光池、张恺帆等十四同志为省委委员，以宋任穷为安徽省委书记兼省府主席及军区政委；谭启龙为副书记兼皖南区党委书记；黄岩为组织部长；曹获秋为宣传部长；张劲夫为省府副主席；汪道涵为财办主任；张悄帆为秘书长；曾希圣为安徽省军区司令员；梁从学力第一副司令，孙仲德为第二副司令兼参谋长，赵汇川为副参谋长；杨光池为政治部主任。（三）上述决定，已经中央批准，应立即实施。 ”

2 月底，我奉命到达合肥，即召集曾希圣、张劲夫、汪道涵、曹获秋、彭涛（皖西区党委书记）、桂林栖（皖西区党委副书记）等开会，宣布中共安徽省委成立，明确省委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全力在皖北地区开展渡江支前工作，同时筹建省委工作机构（仅设组织部、宣传部两部）。大兵团集结于一地作战，物资需要量极大，支前工作艰巨、繁重，安徽省应全力以赴。在华东支前委员会和安徽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在合肥、蚌埠设立了办事处，在部队运动途中及集结地设立了兵站，构成了四条补给线，组织和运用了各种运输力量，克服了种种困难，保障了部队所需的物资和器材的供应。合肥、六安至安庆路上，数十万民工日夜赶送军粮。为了筹集渡江船只，我们与部队共同组成船只管理委员会，派出大批干部搜集、打捞和修补船只，积极启发和提高船工的政治觉悟，通过船工与部队合练，建立了同舟共济、胜利渡江的思想基础。整个渡江准备，是在解放区人民“ 要粮有粮，要人有人，要船有船 ”的伟大支援下进行的。

当时，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4 月初，华东局向中央报告：“ 由于要集中主要干部负责城市工作，由于主要干部仅够配备，因此决定，暂不成立安徽省委，而分开成立皖北区党委和皖南区党委。 ”中央批准了华东局

的报告。这样，中共安徽省委遂结束工作，皖北、皖南区党委相继建立。我奉调到南京工作。

第十二章　接管南京前后

1949 年 4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我奉命进入南京，协助刘伯承同志进行接管工作。

南京解放，
军管会宣告成立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主力被我人民解放军歼灭。我军厉兵袜马，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在此形势下，蒋介石于 1949 年 1 月 1 日提出愿与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我军虽然有足够的力量和充分的把握在不长的时间里全部消灭敢于顽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但为了争取一切可能尽早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痛苦，表示愿意以真诚的态度进行和平谈判，并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从 4 月 1 日起，国共两党经过半个月的谈判，共同拟定了 8 条 24 款的国内和平协定。当时，中央指示，如“ 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 ”，但着重强调“ 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一举渡江成功。 ”4 月 20 日，协定被国民党政府拒绝，充分暴露了他们阻挠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反动立场，也充分表明，他们当初提出和谈建议，只是为了取得喘息时间，妄图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翌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出了“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 ”的伟大号召，我各野战军奉命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大进军。

也就在这个时候，即 1949 年的 4 月，我奉命协助刘伯承同志接管南京。在进南京前，我们为参加接管南京的工作进行了紧张的准备。我们组织干部认真学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使大家明确认识到党的工作重心已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入城后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在学习中，强调了要防止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以及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特别要警惕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为了使解放区干部了解南京的情况，我和张霖之、彭涛同志组织一些从南京来的地下党员编写一套介绍南京概况的资料。这些同志积极性很高，多方收集材料，在不长的时间里编印出了介绍南京的土地、人口、风俗习惯，国民党的政治、经济、文化机构，党派、社团、公共事业、工矿企业、手工业以及军、警、宪、特组织等情况的材料，供南下的同志们参考。

4 月 21 日，第二、第三野战军在 500 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迅速摧毁了敌人认为难以逾越的长江天险。4 月 23 日午夜，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五军由下关经揭江门开入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中共中央电贺南京解放，贺电说：“ 此皆我前线将士英勇善战，后方军民努力支援，江南民众奋起协助，其他野战军、地方军一致配合行动所获的结果，当此伟大节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现在整个形势对于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极为有利，尚望前线将士继续攻进，后方人民努力生产，解放全国人民，为建立统一的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4 月 25 日至 28 日，邓

小平、陈毅、刘伯承、饶漱石和我先后到达南京。

4 月 28 日南京市军管会宣告成立，并发表如下布告：奉

中日人民解放军总部电令：“ 南京已获解放，为保障全体人民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确立革命秩序，决定在南京市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该市军事管制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全市军事、民政等管理事宜。并任命刘伯承为该会主任，宋任穷为该会副主任。 ”本会遵即于 4 月 28 日宣告成立，本主任并于同日到职视事，奉行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城市政策，遵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实施军事管制，特此布告周知。

此　　布

主任刘伯承

副主任宋任穷

军管会委员共 18 人，除刘伯承和我，还有张际春、李达、陈士菜、陈修良、江渭清、柯庆施、张霖之、周兴、段君毅、徐平羽、王明远、黄华、陈同生、罗士高、孔从周、刘宠光。

加强团结

南下干部与地下党大会师

南京地下党为迎接南京解放，在白色恐怖的艰苦条件下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保护人民财产、维持社会治安和保证我军顺利渡江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战火迫近南京时，地下党积极组织人民自卫队护厂、护校，英勇机智地防止和抵抗敌人撤退前的破坏，同时在各阶层群众中间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稳定人心。地下党还打入敌军警宪内部进行瓦解工作。由于地下党广泛发动群众，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大军人宁后，水、电、通讯一日未停，学校始终未辍课，火车和市内公共交通很快恢复。

南下干部同地下党会师后，达到互相尊重，互相团结，乃是今后完成各项任务的基础，是第一关键之工作。5 月 1 日，在华东局的直接领导下，召开了会师大会,来自 9 个不同解放区的干部和地下党的同志共 3000 余人参加了大会。邓小平、饶漱石、陈毅、刘伯承都讲了话。邓、陈、刘 3 位都没有讲话稿，只有饶漱石 1 人照稿宣读。他们都强调要互相学习，以对方的成绩来勉励自己，各自克服缺点。会议提出不仅要实现组织上的会师，还要真正做到思想上和政策上的会师，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下苦功夫，花大力气，为建设一个崭新的人民的南京而共同奋斗。领导同志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会场洋溢着团结、热烈、欢乐的气氛。

在会师大会上宣布成立新的南京市委，由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陈修良、李达、陈士榘、柯庆施、张霖之、彭涛、周兴、黄华、陈同生、段君毅、徐平羽、江渭清、王明远 16 人组成。刘伯承（市委书记兼统战部长）、宋任穷（市委副书记）、张际春（宣传部长）、陈修良（组织部长）、陈士榘（南京警备区司令）5 人为常委。此时，华东局委托南京市委代管皖北、皖南、赣东北 3 个区党委和芜湖市委的工作。陈锡联、谢富治率领的解放军甫下干部同以胡明为首的地下党在皖南的会师是最成功的。

南下的同志和地下党的同志对解放和接管南京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由于过去各自的斗争环境、经历和工作方式不同，也发生过一些不够协调的现象。南京市委常委会对此作了认真研究，并于 5 月 7 日为纠正这些不协调现象作出了相应的指示，要求南下同志与地下党同志共同努力，真正做

到从组织、政策和思想三方面会师。5 月 23 日，南京市委就会师工作向中央、华东局写出报告。毛主席看到此份报告后于当天电告华中局、西北局：“ 兹将南京市委关于外来党与本地党会师问题的经验转发你们，请你们充分注意此项问题，务望抓紧指导，不可再蹈我党历史上对此问题处理不善的覆辙。 ”在以后的接管工作和其它工作中，南下干部和南京地下党干部的关系有较大改善。

坚决惩治破坏分子
一个月亮成接收工作

三十五军入城后，即将全部物资严密看管起来。会师大会之前，我们即对重要部门进行接收，会师大会以后，接收工作全面展开。在市军管会统一领导下，大致分为军事、行政、财经、交通、文教等几个接管委员会及公安部、警备司令部、外侨事务处等部门，分头进行。华东局专门派曾山同志来宁协助和指导南京的接管工作。

南京市委在总结初期接收工作的基础上，于 5 月 7 日发出《关于今后接管工作的意见》，明确作出 4 项指示：一、接管原则是行政方式的，但须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接管方式是自上而下，但必须结合群众，联系群众。二、建立军管、党委统一领导的组织系统。军管会各接管部门的党委、党组（由军事代表、工作组组长与党支部书记 3 人组成）到党的支部，统一贯彻接管的原则和政策，及时总结经验，互通情报，互相学习，统一步调，并有系统地向全党进行思想教育、政策教育，以求得全党在组织上、思想上、政策上、步骤上的一致。三、为加强党的领导，原地下党应做到大部公开，一般的做到公开 70%。四、向全党说明，接是短期的，管是长期的。先要接好，接着要管好。为搞好接管工作，要加紧学习有关政策，学习毛主席的思想作风，以此为团结的基础，党员应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要发现人才，勿使物资流散和损失，以奠定生产、建设的基础，防止犯偏“ 左 ”和偏右的错误。

在接收工作中，时有敌对分子进行抵制和破坏。为了打击反动势力，保护人民群众，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军管会于 6 月初发出布告，宣布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等为非法的反动组织，中统、军统及其所属组织为法西斯特务组织，一律予以解散，其所有公产、档案一律没收，并警告一切反动组织之一切人员必须立即停止活动，向人民政府悔过自新，立功赎罪。军管会将执行“ 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 ”之政策，对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定严惩不贷。布告震慑了敌人，分化瓦解了反动阵营，挽救了一批愿意悔罪、走自新道路的分子。同时，对于执迷不悟、估恶不梭的反动分子抵制和破坏接收工作的罪恶行径，予以坚决揭露和打击，保证了接收工作和其它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南京的人民群众多年饱受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之苦，初获解放，热情很高，积极协助我们搞接收，同破坏分子进行斗争。在军管会的统一领导下，经各方共同努力，接收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只用 1 个月的时间，全市原属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市系统的 1000 多个单位的接收工作便大体完成了。

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
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

接收工作的顺利完成，使南京未遭受过多的破坏与损失，为新南京的建设奠定了基础，这是解放南京后的第一个大胜利。接着，我们的工作便由接的阶段转向管的阶段，即动员党政军民共同努力把南京管好，全力恢复生产，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生产，逐步把消费城市建设成为属于人民的生产城市，这是当时第一位的任务。

南京原为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是一个畸形的城市。这里拥有臃肿的国民党官僚机构和庞大的非生产的消费人口，遍布的衙门和公馆在全市房产中占的比重很大，美、英等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帮凶横行无忌，是一座典型的半殖民地的消费性城市，其工业生产基础十分薄弱，120 万人口中产业工人只有 2 万人左右。我们接收下来为数不多的近代化企业，由于成本高昂，管理不善，冗员大多，无不亏损。私营企业 800 余家，除永利化工厂等几家外，其余均规模不大，且设备简陋，基础也相当薄弱，手工业生产更是破敝不堪。同时，我们又遭到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地主阶级的阻挠、破坏，内外交流和城乡交流均受到极大限制，以致物价不时引起波动，大大阻碍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因此，在这样的形势下建设新南京，比起接收工作来要困难得多。我们以恢复与发展生产为中心而进行的各项工作，都是在封锁与反封锁、破坏与反破坏的斗争中进行的，是一项更加艰巨、更加复杂的任务。

在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指导下，有一点我们很明确：恢复　　和发展生产，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依靠他们的觉悟

性和组织性。伯承同志多次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同他们恳

切谈心，并讲解党的路线、政策，讲解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历史使命。伯承同志 5 月 9 日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讲了一段寓意深刻的话：“ 我们说依靠工人，联系群众，但工人是否

一定让你依靠，群众就一定让你联系，这就必须加以主观的

努力贯彻我党正确的政策，把工作做好，造福于群众才行。这就是说，要联系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就要解决群众

必须解决的问题。古人说：‘ 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 ’

其意也在于此。 ”

南京解放之初，只有解决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最为关心和迫切要求解决的物价、复工、工资和失业等问题，才能稳定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生活，也才能依靠

工人阶级和联系广大群众。当时金圆券不断贬值，严重影响群众生活，我们决定迅速排除金圆券，发行人民币。5 月 2

日公布了人民币和金圆券的比价及限兑办法，不过几天时

间，即完成了排除金圆券的工作。同时，为防止银元买卖波动物价，加强了对银元市场的管理，允许银元持有者到人民银行按牌价兑换，但禁止银元在市场上流通。这个时期，物

价虽然有波动，但总的来说是平稳的，南京的物价还略低于镇江和芜湖。大批失业失学人员，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采取的办法大致是：凡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一切公私工商业均有步骤地协助其复工，吸收一大批人员参加生产；有专门技能及特种研究之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及政治条件好、年轻体健有改造前途者留职或送去培训；开办工人政治学校、军政大学、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等培养建设干部的学校与训练班，招收一部分失业工人、公务员和学生入学；对老弱病残、无专长和只能消费的人，送回原籍从事生产或转业；收容散兵游勇，发放路费，建立交通站，护送他们回家生产。工资问题，我们遵照中央的指示，采用“ 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 ”的办法，一

方面，对解放区来的干部和一些新参加工作的地下党干部、学生等实行供给制；另一方面，对接收的员工按中央原职原薪的原则，加紧研究制定新工资标准。在新标准未确定之前，5 月 4 日和 17 日发放两次预借费，6 月按新的工资发给，稳定了广大职工的情绪。初步解决上述几个问题之后，工人和其他阶层的群众都比较安定，积极投身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工作中来。伯承同志在一次工商界代表座谈会上详细地阐述了毛主席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提出要照顾到矛盾的 8 个方面。他讲：“公私是一面的两方，既要顾公，又要顾私；劳资又是一面的两方，既要顾工人的利益，又要使资方有利可图；城乡是另一面的两方，城市要为农村服务，农村则供给城市的生活必需品；内外又是一面的两方，既有对内的贸易，又要有对外的贸易。只有照顾了这四面八方，才能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怕承同志的论述，受到各界赞赏，也给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在工作中，注意合理地兼顾城市各阶层的利益，适当调整工人过高或过低的工资，适当调节资方的合理收入，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努力发展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打破敌人的海上封锁。同时，大力增强农村工作的力量，占领农村阵地，努力促进城乡交流，打破封建势力的封锁。解放初期，上海曾一度缺粮、缺煤，为了使这座大城市不断粮、断煤，我们努力向上海提供一部分粮、煤，满足上海的需要。自己不够，再设法从山东、芜湖、淮南等地调进。

伯承同志在许多场合一再强调群众路线是人民政权的根本路线，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他在一次报告中以安泰脱离大地母亲，被人悬在空中扼死的神话，教育大家要高度警惕脱离群众的危险，并严厉批评了极少数干部以胜利者自居、盛气凌人、动辄训人等恶劣作风。当他发现个别人城部队与人员不按规定购买车票，恃强乘车，以及不购门票，强行进入娱乐场所的情况后，即于 5 月相继发出市军管会军字第一、二号布告，严令禁止上述行为，宣布除对违反者依法惩处外，给各部主管负责人以应得处分。伯承同志还严厉批评了极少数干部要住好房子、坐好汽车、骄横蜕化、铺张浪费等现象，号召大家同这种恶劣倾向进行坚决斗争。

整顿文化阵地，
积极进行宣传文教战线的工作

在解放前的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利用报刊、电台等各种宣传工具以至学校的教科书，大肆进行反动宣传，向学生和群众灌输反动思想，散布各种毒素。因此，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宣传余毒，努力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我们面临的又一项艰巨任务，也是顺利进行建设新南京的重要保证。

伯承同志和南京市委非常重视宣传文教战线的工作。6 月下旬，伯承同志亲自宴请路经南京赴北京开会的沪杭宁文艺界代表团，并讲了这样一段话：“革命有今天的胜利，我们能够在这里会师，除了有解放军流血作战，也有文化界朋友的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种力量的总结果……今后的任务是如何建设新中国的问题。生产建设也要靠文化界在文化建设上与之协同动作。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是我们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前进的两个车轮。我们要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各位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压迫下，向反动文化作斗争，不得不用打游击的办法。今后有条件打正规战了。”

进城之初，南京的报纸种类很多，为数不少的报纸（包括小报）起的作用很坏。为此，我们发出通告：“过去本市的报纸通讯社一律重新登记，并呈缴各该报纸解放前一年之合订本一份，解放后每日三份；任何新建立之报纸通讯社，未经登记及批准者，概不予以承认和存在。”经过审查整顿，我们取缔了一批反动报纸，并于4月30日出版了我党领导的《新华日报》，派有办报经验的石西民同志主持报社工作。为了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伯承同志对报纸特别重视。他眼睛不好，指定我负责审阅《新华日报》的大样。每天清晨4时左右大样送到，对新华社发的消息我只看标题标得是否适当，对南京自己撰写的重要消息和文章我都过目，经我审定后才付印。为此，每天要花个把小时的时间。我后来视力不好，恐怕与这一时期的这项工作有关。

南京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城市之一，有大中学校和科学研究院等近百所，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成为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我们遵照4月25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精神，通过《新华日报》公开宣告：“人民政府本着严格保护学校、文化教育机关的政策，对于有成绩的科学研究机关和专家的工作，一定帮助其有更大的成就与进步。对于原有教职员，除极少数极端反动分子和破坏分子以外，则采取团结与教育的方针，帮助其学习，照顾其生活。希望真正有学问的专家学者和广大教职员、学生来和南京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同来推进南京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和文化。”我们废除了学校的反动训导制度，取消了宣扬反动思想毒素的公民课，革除课本中的反动内容，努力把教育机关逐步变成培养有用人才的园地。伯承同志还在文化科学界座谈会上同专家学者们诚恳谈心，交换意见。他说：“今天文化科学界欢聚一堂，大家都是主人。在建设中，无论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方面，都需要大量人才，希望共同工作，开展南京市的文化科学建设。”专家、学者对南京各方面的工作提出许多建议和意见，伯承同志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军管会表示热诚欢迎。伯承同志在南京学生代表座谈会上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学生们讲形势，讲任务，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勉励同学们努力学习，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市委负责同志还向知识界及学校师生做报告，当时把这种听众人数多的报告叫做“上大课”，讲解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讲政治经济学，讲党的方针政策。尽管当时工作很忙，做报告的同志仍抽出时间进行认真的准备，报告的效果都很好。我也应邀到中央大学去做过一次报告。那天正下大雨，同时市公安局的负责同志告诉我，他们获得情报，国民党特务要在做报告时暗算我，建议取消这次报告。经过分析，大家认为国民党特务是准备长期潜伏的，不敢轻易在公开场合下手，我们不要放弃向青年学生做工作的好机会，决定还是去。听报告的学生坐满了大礼堂，我讲了两个多小时，主要讲学习问题，反映热烈，效果也不错。事实证明，不取消这次报告是对的。

解放初期，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热烈拥护和衷心爱戴的，但有些人对共产党能否长期保持优良作风，是否具有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存有疑虑。有一次，我陪同怕承同志参加一个座谈会，有位学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坚持20多年的人民战争，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纪律和作风都很好，我们很佩服。但会不会像泡茶一样，第一、第二杯味道很浓，很有味道，后来逐渐变了，喝起来就没有什么味道了呢？我代表伯承同志回答说：这位先生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们共产党将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向党员进行教育，必要时还要进行整风，如延安整风，批评和纠正不良作风，清

除不良分子，并且按照党员条件吸收新鲜血液入党，我们党将永远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因此，决不会像喝茶那样，越喝越没有味道。这点请大家放心。

我们还登门拜访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上海解放前，陈毅同志在南京曾亲自到中央科学研究院拜访吴有训、陶孟和、杨钟健等专家，同他们谈心，向他们做工作。陈老总知识渊博，风度潇洒，谈笑风生，专家、学者们对他很钦佩。4 月底，毛主席曾致电二野领导同志称，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熊子容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愿向我们靠拢，嘱将他的复电转交熊教授。伯承同志派我持毛主席致熊的复电去拜访熊先生，复电是："南京中央大学熊子容先生大鉴：邵力子先生带来 3 月 29 日一信及卯有（即 4 月 25 日）来电均悉。兄有所见请与刘伯承市长、宋任穷副市长接洽为盼。弟毛泽东卯艳（即 4 月 29 日）"（当时我没有担任南京市副市长，市长是刘伯承，副市长是张霖之、柯庆施）。我转交了毛主席的复电后，熊先生表达了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意，对我党和人民政府的主张表示拥护和支持，并愿意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我向熊先生表示感谢，希望他今后多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我拜访熊子容先生是不公开的，但第二天南京市的许多小报都发表了这个消息。

南京的名胜古迹很多，进城不久，市委发出内部通知，为了缅怀先烈，学习先烈的革命精神，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严格规定外来干部必须首先到大批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壮烈牺牲的雨花台瞻仰，然后再到其它名胜古迹参观。同志们目睹被反动派枪杀的无数烈士的遗骨，悲愤流泪，受到了生动、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

英国挑起紫石英号军舰事件，同帝国主义展开外交斗争

南京是各国大使、公使集中之地，涉外工作相当多。由于外事工作政策性极强，刘伯承同志除掌管全面外，亲自主管这方面的工作。同时，中央特派外语好、有外事工作经验的黄华同志任南京市外事处长，协助刘伯承同志处理具体涉外事宜。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第八条规定："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一切外国侨民各安生业，保持秩序。"我们反复强调，一定要认真执行布告的规定，严格遵守外事纪律。

4 月 20 日至 21 日，当我军攻击北岸敌桥头据点及江中许多洲岛准备大举渡江的时候，侵入我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 4 艘英国军阴和国民党军舰一道向我军开炮，妄图阻止我军渡江，致使我军死伤 252 人。我军进行还击，紫石英号被我击中负伤，被迫停于镇江附近江中，其余 3 艘英舰战败后向江阴以东逃去。英国海军竟如此横行无忌，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在一起，向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挑衅，闯入人民解放军防区发炮攻击，直接参加中国内战，致使人民解放军遭受巨大损失。紫石英号事件震动世界各地，英共报纸和英国舆论也纷纷责备英政府，激烈抨击其错误。我党的原则立场是：英方必须承认错误，并要求英方赔偿损失。英国当局曾派人与我军代表进行多次谈判，要求将紫石英号放行，但采取狡猾态度，拒不承认错误。同时，英国首相在议会的讲话中还造谣说，中国军队准备让英舰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该舰要协助人民解放军渡江。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当谈判尚在进行之际，紫石英号于 7 月 30 日夜趁我一客轮经过镇江下驶，强

行靠近该轮与之并行，掩护逃跑。当我军警告其停驶时，紫石英号竟开炮射击，撞沉木船多只，逃出长江。紫石英号事件充分暴露了英帝国主义侵犯我主权的霸权主义行径。处理紫石英号的整个过程，都是在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指示下进行的，表现了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不畏强暴的原则立场，同时也表现了灵活的斗争策略。

在其它众多的涉外事件中，在中央的及时指示及伯承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处理得都很得体。由于我们缺乏经验，以及外事纪律的教育不够深入，在这方面也出现过一些失误，三十五军人城的第二天，发生了我军误人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住所的事件。三十五军一〇三师的一位营长带着一个通讯员，在为部队安排食宿的时候，不慎误人司徒雷登住所，很快便退出。可是，当天夜里，“美国之音”就广播了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搜查美国大使馆的新闻。不久，又发生了南京电报局未经中央同意，擅自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电的事件。中央对此类违反外事纪律的事件十分重视，及时指示陈士柒、江渭清同志调查处理。毛主席亲自电告总前委，指出“三十五军进入南京纪律严明，外国反映极好，但是侵入司徒住宅一事做得很不好”，并批评说：“不但证明你们部队（三十五军）对如此事件不经请示擅自行动是错误的，而且证明关于外交问题你们对下级似乎事前毫无教育，此事必须立即引起注意。”中央要求“一切外交事务不论大小均需事前向中央请示”，郑重指出“我党政军人员未奉命令不能和任何外国记者和外国人谈任何事情”，并要求“各级干部一体遵照”。针对外事纪律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央要求我们：领导机关关于政策及工作方法的指示，主要应当靠写电报、发通令，而不要只靠开干部会口头讲。口头指示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一则无文字可凭，二则范围不见得很明确，三则到会的少数人听到了，没有到会的多数人没有听到，有挂一漏万的缺点。此次外交政策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就因为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文电指示，中央告诫我们务必从中吸取教训。

南京解放初期，我们在伯承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是十分紧张的，大家夜以继日地处理各条战线千头万绪的工作，往往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但是，同志们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情绪十分高涨，工作得非常愉快。

我军渡江后，形势发展很快，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国民党军队不断被歼，残敌溃退华南和西南一带。6 月，中央开始部署向华南、西南的进军。7 月份我交代了南京的工作，主要从事进军西南的准备。9 月份，我随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伯承同志和我调离南京后，由粟裕同志接任军管会主任、市委书记，唐亮同志任军管会副主任、市委第一副书记，江渭清同志任市委第二副书记。

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
挺进大西南

早在 1949 年 1 月和 3 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上就作出决定，由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负责接管西南各省。随后，又对二野进军西南的时间、任务及组织领导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着手做进军西南准备工作的时候，突出的问题是干部不足。我们南下时，从太行、太岳带来一批干部，准备到西南去的。到南京后，饶漱石向邓小平同志提出，福建缺干部，希望把大行、大岳带来的干部都给福建，并说可以给一部分山东的支前干部随二野去西南。小平同志顾全大局，很痛快地答应了，说我们再另想别的办法吧。此后，根据小平同志的建议，我们除了从中央和老区选调一部分新闻、邮电、

财经、公安等方面的干部以外，从上海、南京等地吸收一部分知识分子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 1949 年 6 月 25 日，西南服务团正式成立，由我任团长。上海、南京两地分别由曹获秋和彭涛同志负责。当时，年轻人革命热情很高，报名十分踊跃，一时间参加西南服务团的浪潮席卷许多院校、工厂、机关，报名的人排成长龙，总数达两、三万人之众。有不少大学生、中学生，其中有进步学生运动的骨干、中共地下党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他们有强烈的反美反蒋情绪和救国救民的壮志，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政治素质普遍较好。

我们对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们做了充分的思想动员工作，并组织了集训。学习的主要内容有《社会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及其三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国内外形势，党中央的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中央关于新区的政策。刘伯承、邓小平、粟裕、张际春等二野的领导同志亲自为大家做报告，他们除了讲形势及中央精神外，还针对学员们在学习中反映出来的模糊认识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和透彻的解释。这些深入浅出的报告，对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有很大的帮助。小平同志报告的题目是《论老实》，着重讲思想作风问题，还向大家提出了搞好会师、搞好群众工作、搞好统一战线三项要求。我也给学员讲了几次课。在动员时，我们还特别强调西南地区条件艰苦，要充分做好吃苦的准备。讲了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贫穷地区，云南历史上曾是充军的地方。到那里全部实行供给制，要钱没钱，要官没官，愿意献身革命，干一番事业的，不怕吃苦的，我们热烈欢迎。同时，中共南京市委组织力量为西南服务团编写了介绍西南各省有关情况的资料以及有关政策汇编，共十余册。由于思想动员和组织工作都做得比较细，对可能遇到的困难又讲得比较多，大家的思想准备比较充分。

1949 年 8 月，决定由我率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赴滇。该支队队长刘林元，政委马继孔。西南服务团还有川东、川南两个支队。根据中央部署，川西、川北、西康省由贺龙同志率部进驻和接管，二野不派人去。同年 10 月 3 日，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天，云南支队从南京下关坐火车出发，经徐州、开封、许昌、武汉到长沙。我同当时的省委书记黄克诚同志商量，希望在湖南吸收一批知识青年参加西南服务团。湖南省委全力支持。在湖南招收的一小批知识青年编入云南支队所属各大队。11 月中旬，从湖南湘潭出发，从此开始了长途徒步行军，沿湘黔公路西进，每天平均步行几十里。行军途中，士气高昂，情绪饱满，大家一路行军一路歌。我们还坚持边行军边学习，同时要求严格行军纪律，明确提出：“地扫不干净不走，借来东西不还不走，住户水缸挑不满不走。”部队所到之处，与当地群众的关系处得非常好。年轻同志也在长途行军中受到很好的锻炼。

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们到西南各省后分配到不同的部门工作，他们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强烈的革命责任感扎根边疆，同当地的干部、群众一道，克服了种种困难，为解放西南、建设西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许多同志成为工作的骨干，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应当学习他们，纪念他们。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们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成长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无私奉献的一代，为青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了又一个生动的榜样。

第十三章　入滇前后

我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伟大胜　利后，挥师南下，追击残敌。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在云南方面、除原驻滇的嫡系余程万的 26 军以外，蒋介石又调进李弥的第 8 军，共布重兵 6 万，同时又派遣大批军统、中统特务到云南，特务头子毛人凤亲自飞抵昆明指挥，大肆搜捕和镇压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把西南作为他们在大陆的最后反共基地。云南地处边疆，当时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群众生活贫困，民族问题复杂，又有帝国主义分子插手。我们入滇前后面临的形势非常困难，任务十分艰巨。在这个时期，党中央和西南局对云南各方面的工作及时作出十分重要而又具体的指示，省党、政、军、群各部门团结一致，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各兄弟民族亲密合作，使我们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1949 年，我人民解放军按照军委的部署，对西南之敌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广州、贵阳、重庆、南宁等城市相继解放。我第 2 野战军主力从湘黔边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了敌军退往云南的道路。4 兵团准备在广西战役结束后直奔滇南，关闭云南逃敌门户。云南已处于我军三面包围的态势。云南地下党和滇黔桂边纵队在当地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们广泛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地方游击队，开创了滇东南、滇南、滇西北、滇西、滇东北、滇中、滇北等革命根据地，革命武装主力达 3 万余人。党领导的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主要内容的反帝反蒋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地下党还深入滇军和国民党军政机关内部进行工作，特别加强了对党政要人的统战工作，并专门成立了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小组。国民党在云南的反动统治摇摇欲坠。

卢汉起义，
云南和平解放

1949 年 10 月，我带着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和警卫部队共 1000 余人，从南京出发向云南方向走。经徐州、郑州、武汉、长沙，于 12 月 27 日到达贵阳。此时，接到刘、邓发来的电报，让我在贵阳住些日子，向主持贵州省工作的苏振华、杨勇同志介绍接管南京的经验。到贵阳不久，我们得到卢汉将军毅然率原保安部队组成的两个军在昆明起义的消息。这是 1949 年 12 月 9 日。

卢汉将军通电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周总理称“爰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卢汉将军在我党政策感召下，顺人心之所向，选择了追求光明，投向人民阵营的正确道路，受到我党和全国人民的高度评价。毛主席、朱总司令电贺卢汉将军，称赞此举“加速了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欢迎”。

国民党反动派对卢汉起义恼羞成怒。顾祝同令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汤尧指挥在滇的国民党军“讨伐”卢汉。卢汉将军在滇黔桂边纵队的有力配合和全省民众的积极支持下，指挥起义部队顽强反击敌军的进攻。同时，急电刘、邓要求支援。2 野前委立即令 5 兵团 17 军 49 师自贵州安顺星夜驰援昆明。敌军得知人民解放军入滇的消息后，开始撤退。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敌军进攻昆明不成，即南下蒙自、个旧地区，准备在滇南负隅顽抗，并有逃亡国外之企图。中央军委发现敌军企图后，即令 4 野抽调两个师截断敌军外逃之路，又令 2 野一部进军滇南歼敌。4 野 151 师、114 师由百色、田州一线向

滇越边境前进；2 野 13 军从南宁附近向蒙自前进，统归陈赓指挥。两支兄弟部队亲密合作，在滇桂黔边纵队的积极配合下，胜利完成了歼灭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两个军的任务。滇南战役是一场长距离的追击战，行程 1800 余公里，歼敌 27000 余人，生俘已升为陆军副总司令的汤尧，残敌逃出国外。

云南的和平解放，减少了因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为我军进入云南解放全省创造了条件，为提前结束西南战役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对我们是有利的。同时，和平解放必然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和困难。加重了我们对卢汉及其所属军政人员的统战工作和团结改造工作，增加了工作的复杂性。中央对云南问题十分重视，针对云南当时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云南的工作方针是“在省委领导下，团结第一，工作第二”。1950 年 1 月 19 日中央批准了西南局关于处理云南问题的方案，并作了重要批示。中央和西南局指示的主要精神是：在云南解决一切问题，均应和卢汉商量处理，经过双方协议，作出决定，凡是卢汉不愿办的事均不要勉强去办，切不可我们一方单独决定，硬性执行。在未与卢汉达成协议以前，一切维持原状。云南情况比川康更为复杂，处理云南问题的办法要比处理西康问题略宽一些。必须给卢汉以恰当的照顾，对卢系人物的教育改造要不借功夫，做到仁至义尽。同时，对于整编改造部队、政权移交，省政府以及专、县两级政府的组成等问题均有重要指示。

搞好内部“会师”，
准备接管云南

在中央和西南局的具体指导下，我们制定了进入云南接管工作纲要，强调了以下 4 个问题：第一，首先搞好内部会师。在未与卢汉见面进行协议前，4 兵团、省委和滇黔桂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在适当地点会面，统一思想，以取得思想上政策上步调上的完全一致，达到在省委领导下的高度集中统一。所谓高度的集中统一，是指一切原则政策必须统一在毛泽东思想上和中央规定的政策上。只有我党内部高度的集中统一，才能集中力量做好对卢汉及其部属的统一战线工作，任何各自为政、分散主义，对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对国家和人民利益都是极其有害的。第二，打通干部思想，在党内进行反复的艰苦的思想教育和说服工作，防止“左”的思想情绪。由于部分干部对卢汉的仇恨根深，对卢汉及其部属的团结改造工作容易发生情绪上的对抗和“左”的思想，对此必须进行耐心的说服和教育。必须指出，卢汉在云南曾镇压革命运动，杀害革命志士和进步人士，但他毅然率部起义，归降人民，并对以前的罪过有所检讨，应当欢迎。对卢汉讲统一战线，积极地团结他及其部属，并改造其成为我之干部，这完全是从整个人民利益，也是从云南人民利益出发的。必须将团结党内、团结群众、团结改造卢汉三者结合起来。同时，与卢汉的团结绝非一味迁就，原则问题必须进行适当的和必要的斗争。第三，接管的步骤是：在未与卢汉协议前，一切均不接管，也不插手，如卢要求接管，均婉辞谢绝；在与卢汉正式协议并经中央批准后，才正式接管，在接管中首先必须进行我党政策的宣传，启发旧人员的思想觉悟，使其逐渐靠拢我们，切忌把他们摆在一边，既不教育又不给予工作；对旧政府旧军队人员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除个别极反动分子以外，均予留用。第四，所有干部要发扬高度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扬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精神，如到昆明后准备住最坏的住房和挤着住，这是影响群众和旧人员，团结改造他们的重要方法之一。

我们得到中央和西南局的明确指示，并作了必要的准备之后，4 兵团、滇桂黔边区党委的负责同志遂于 1950 年 2 月 5 日在贵州的安龙会晤,到会的有陈赓、我、郭天民（4 兵团副司令员）、郑伯克（原云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滇桂黔边区党委副书记）等同志。大家一致拥护中央提出的“在省委领导下，罚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和一系列指示，认为没有我党我军的大团结，就不会有各方面工作的胜利，表示一定要把中央的方针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把所有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争取的人都争取过来。大家还认为，面对云南的复杂情况和艰巨任务，当前要首先搞好内部会师，要加强党内团结，加强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团结。会议认为，各方面都要树立这样一个明确的观念，即充分肯定和尊重对方的工作成绩，虚心向对方学习，对于对方工作的缺点错误采取原谅态度，诚恳地给予帮助。要用自己的弱点和缺点去比人家的长处和优点，而不要用自己的长处和优点去比人家的弱点和缺点。如发生不团结现象，各方要多做自我批评，会议要求全省党内同志统一思想，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并确定最初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是搞好统一战线，特别要注意团结改造好卢汉及其所属军政人员。这次会晤的气氛很融洽，会开得很成功。在这次会晤以前的 1 月 11 日，我同滇桂黔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同志在贵州盘县亲切会见，互相通报了情况，着重就如何搞好内部会师和做好卢汉及其部属的工作初步交换了意见。

不久，中央批准陈赓任军管会主任和省人民政府主席，周保中任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进云南前，中央任命我为 4 兵团政治委员。4 兵团辖 3 个军，13 军军长周希汉，政委刘有光，14 军军长李成芳，政委雷荣天，15 军军长秦基伟，政委谷景生，加上直属部队、特种部队，共 10 万余人。

成立云南省委，
增进党内困结

各项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后，我们于 2 月 14 日入滇，经早已解放之罗平、师宗、陆良、宜良，20 日到达昆明，广大群众沿途欢迎慰劳，情绪十分热烈。入昆之日欢迎群众达 15 万，22 日召开欢迎大会，到场群众逾 10 万，充分表现了广大群众对我党我军之热爱。陈赓同志在欢迎大会上讲话，他说：云南的解放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的伟大胜利，云南人民和中共云南地方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的长期奋斗，卢汉将军及其部属的起义，才有今天这样的胜利。我们今天庆祝云南人民的解放，要向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及毛主席致敬！向朱总司令暨人民解放军致敬！向艰苦奋斗的云南地方党及滇桂黔边纵队致敬！向卢汉将军和起义的全体爱国官兵致敬！最后他表示我们一定要保卫祖国的西南边疆，保卫人民的革命胜利果实，与全体云南人民共建新云南。

2 月 24 日，召开了全省地、师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云南省委正式成立，经中共中央西南局批准的云南省委由 9 名委员组成，我任第一书记，陈赓任第二书记，其他 7 名委员是周保中、李明（林李明）、郑伯克、刘林元（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地下党员，省总工会主席）、郭天民、庄田（滇桂黔边纵队司令员，边区党委常委）、牛树才（树才同志当时在皖南工作，因饶漱石不肯放，未到职）。同时，宣布滇桂黔边区党委结束。在此以前，边区党委专门作出《会师指示》，号召“学习南下干部的宝贵经验，对政策的了解和掌握，思想作风的纯正与宽宏，各种制度的正规化，以弥补自己的不足，改造与提高自己”。“应尽一切可能和力量，动员一切人力财力物力，帮助配合

大军，使大军行经之地，所到之处，均能了解情况，得到帮助，……给予大军以行军与作战的便利”。并表示安徘职务时，边纵的干部“可任副职”。我1月份在贵州盘县同郑伯克同志会晤时，伯克同志代表地方党对南下部队和南下干部表示热烈欢迎，并表示将与南下同志通力合作，并竭尽全力搞好内部会师和各项工作。为云南的解放进行了艰苦斗争并作出重要贡献的滇桂黔边纵队和地方党在会师问题上都表现了严以律己，顾全大局的高风格，使南下同志受到很大教育，对南下的军队和干部是重要的支持。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同原地下党和原边纵的同志都合作得很好。4月4日又召开各方面的党员干部两千多人参加的会师大会。在这两个会议上，陈赓、我、周保中、李明、郑伯克、庄田、刘林元同志都讲了话。会议认为，我们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和复杂，当前要以统一战线工作为中心，首先搞好党内团结，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团结。强调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要互相帮助，虚心学习对方的长处，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会议还指出财政形势严峻，民族问题复杂。要求大家把思想统一到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在省委领导之下，克服困难，努力奋斗，为保卫边疆，建设云南做出贡献。由于大家对党中央和毛主席都有高度的信仰，各方面的领导干部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取得了思想上的一致，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云南的内部会师搞得比较成功。

持之以诚，
改造起义部队

我们严格遵照中央的指示，对卢汉充分尊重，事事协商，待之以礼，相见以诚。因此，卢汉及其部属的情绪比较稳定。卢汉3月初电其在港的夫人称，他在昆明一切均好，决定暂留昆明。经与卢汉本人协商并获中央批准，由卢汉出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我和周保中任副主席，卢属下的一部分军政要员安排为委员，每周开两次会，共商云南军政大事。卢汉及其部属都比较满意。云南有一批头面人物，有在北洋军阀时期一度当过内阁总理的李根源，还有像李鸿祥、杨希闵、杨适生、金仅鼎、白小松、马伯庵、杨克成、安恩溥、张天放、王少岩等知名政界要人。对他们都注意做团结争取工作，有些会邀请他们到场，对李根源等人我们登门拜访，向他们宣传人民政府的政策，希望他们合作。中央派张冲同志和潘朔端同志同我们一起入滇工作。张冲是云南彝族，到过延安，潘朔端是云南籍，1946年率部在海城起义。张冲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潘朔端任昆明市市长。他们两位都是共产党员，在云南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在加强民族团结和争取、团结旧军政人员方面有突出贡献。

接管昆明的工作，由于我们有接管南京等城市的经验，进行得比较顺利。接管工作从3月4日开始，军管会下设军事、政务、财经、工业、交通、文教、卫生等7个接管部，每个接管部配备军事代表和一部分工作人员，各接管单位都成立了协助接管小组，一般由共产党员和群众代表组成。我们自始至终格守中央的指示，特别强调依靠群众，团结合作，和衷共济，使接管工作一直在比较和谐和互助互谅的气氛中进行，经过50多天就大体结束了。接管昆明的同时，各专区的接管工作同步进行，大致也在4月份基本完成。为便于边疆地区的工作，我们成立了滇西、滇南两个工委。滇西工委辖大理、丽江和保山3个地委，由14军军长李成芳任书记；滇南工委辖文山、蒙自和思茅3个地委，由13军政委刘有光任书记。军队的师、团干部分别兼任地、

县的党政职务。对于留用的旧政府机关人员，除自愿回家的给足旅费以外，我们采取“全部包下来，适当安排工作”的方针，由于财经紧张，中央号召“两个人的饭3个人吃”。同时，有计划地把他们送到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训练班进行轮训。第一期训练了3848人，第二期训练了2150人。各专区也设立训练班轮训旧人员。

关于改造起义部队问题，我们是决定暂缓一步。入昆后，陈赓同志和我去拜会卢汉时，他提出他的部队不改造不行，要求我们赶紧派政治干部去。我们回答说：你别着急，过些时候再说，我们还要调干部，训练干部，从长计议吧。经过必要的准备之后，我们派了一批政治干部进去，卢汉采取合作态度，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卢汉部队有明显进步。过了一段时间，经过协商并得到卢汉的同意，卢汉部龙泽汇军同13军合编，龙任副军长；卢汉部余建勋军同14军合编，余任副军长。

我们入昆后，卢汉先生对我们的工作总的来说是合作的，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斗争。当时主管省财政工作的一位先生是卢汉将军的部下。他在卢汉的默许下，趁我们经济困难之机，在地方上临时出一种票子，名义上说是为了换金圆券，其实是借换票子的机会换银元换金子，从经济上卡我们。我们很快察觉到这是企图同我们搞经济斗争，这类事我们在接管其他城市时也曾经遇到过。我把此事告诉卢汉将军，说“这件事不知道是否向卢主席报告过。这样做可不好，请卢主席给他打个招呼，不要再继续这样搞了”。卢汉佯装不知，说“啊，还有这样的事，那还行啊！”结果，此事出台不久，便被制止了。

加强民族团结，稳定土司头人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有几十个民族，其中有些民族尚处在相当落后的发展阶段。他们过去长期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压迫和欺凌，受到大汉族主义的歧视，又有帝国主义分子从中挑拨离间。因而，民族之间主要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隔阂颇深。在工作展开初期，我们有少数干部在民族工作中存在着“左”的思想情绪和操之过急的做法。少数民族对我党和我人民解放军普遍存在疑虑。云南的少数民族基本上都居住在边远山区和边境地区，有些少数民族与邻国的同一民族跨境而居，国内外反动势力相勾结不断在那里借机骚扰。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民族问题，就没有安全的边境，也就没有巩固的边防。云南的民族问题是关系全局的突出问题，至关重要。鉴于此，我们一进云南，就对民族问题十分重视，在做法上十分谨慎。省委反复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指出只有区别不同情况，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在1950年7月召开的云南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根据云南的特点，提出了“民族和睦，加强民族团结，消灭历史造成的民族隔阂，工作稳步前进”的民族工作方针。

根据这个方针，从云南民族工作的复杂状况以及当时民族工作中主要存在“左”的倾向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提出了在党的领导下，“讲团结不讲斗争”，“宜缓不宜急”，“要反左不反右”的口号。提出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搞土改，不反霸。我们初进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做三件事。第一，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当时，不少少数民族还是刀耕火种，产量极低。我们向他们传授耕作技术，逐步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使生产水平很快得到提高。第二，派医务人员给群众治病。那时候，少数民族地区缺医少药的情况十分严重，

基本上没有西药，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比较高。医务人员进去后，治愈了许多他们过去认为难以治好的疾病，提高了群众的健康水平，受到普遍欢迎和好评。第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改变落后的陋习，不采取强迫的办法，而是耐心做工作，反复协商。如处在奴隶社会的瓦族，每年都要杀 1 个人，用人头祭神和谷子。我们便找土司头人做工作，尽管工作十分难做，但是我们不厌其烦地耐心地同他们协商，晓之以理，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终于说服他们同意用牛头代替人头祭神和谷子。各个部队和民族工作队还广泛开展“做好事，交朋友”的活动。这些做法，少数民族群众普遍感到满意。

少数民族多数保持着土司制度。入滇初期，在土司头人中，坚决靠拢我们和坚决反对我们者均占少数，而动摇犹豫、思想顾虑者占多数。在有些地区，曾发生过对土司头人采取缴械、接管以至消灭的错误做法，致使这些地方的头人与我们处于对立状态，有的则被匪特所利用组织武装暴动。因此，采取正确的政策和工作方法，争取和稳定土司头人中的大多数，孤立和瓦解少数与帝国主义和蒋匪特务相勾结的土司头人，是民族工作的关键。云南省人民政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于 1951 年 7 月发布了《关于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批示及公告》，其中有若干条明确规定了这方面的政策。如“……（二）凡过去因受帝国主义、国民党欺骗而实行武装对抗者，只要停止武装对抗行为，与帝国主义蒋匪特务坚决割断联系，回到祖国大家庭来，接受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的领导，人民政府一律不究既往，并保护其生命财产之安全。（三）因受骗而实行武装对抗之土司头人，只要诚心悔过回到祖国怀抱，人民政府可不收缴其武器。对于剿匪有功者并论功给奖。如坚决与各民族人民为敌，不明大义，那是自绝于祖国与各族人民……（五）边疆各民族区现行政治制度及土司头人之现有地位和职权，人民政府不予变更。凡爱祖国爱人民之土司头人，可同时参加各级人民政府之工作。（六）边疆各兄弟民族区，不实行一般汉人地区之社会改革。有关各兄弟民族内部改革事宜，完全根据各民族人民的意志，由各族人民和各族人民的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减轻人民负担，办工厂农场经营工商业者，上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赞助。”

这个《公告》的公布和贯彻执行，对稳定和争取土司头人起了很好的作用，少数民族群众也都表示拥护，为各民族的团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土司头人中的年轻人比较容易接受我们党的主张和政策，思想进步快，其中有些人加入了我们的党，成为人民政府的干部，有的担任了省、地一级的负责工作。还有个别土司头人在解放前就积极靠拢和支持我地下党，如有一位哈尼族土司头人叫李和才，为了支持革命几乎贡献出了他的全部财产。解放后，和才同志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前几年才病故。但是，也有少数土司头人，群众对他们的仇恨根深，要求斗争他们。如果这些人继续留在本地，我们的工作很难做。我们采取的办法是，把这些土司头人接到昆明，给一幢房子，安排个适当的职务，让他们吃好住好，一切花费我们包下来，避免留在当地与群众的矛盾激化。这些人在本地住不下去了，也愿意留在昆明。

我们在讲少数民族地区暂时不搞土地改革的同时，宣布到一定的时候，条件具备了，还是要搞土地改革的，当然要采取符合各少数民族地区具体情况的适当方法。不搞土地改革，群众便不能真正发动起来，也不会有真正巩固的边防。后来，在少数民族地区搞土地改革的时候，我们始终强调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加强民族团结，强调区别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指导，采取了一

些区别于汉人的措施，如对少数民族的地主处理上要宽一些，一般不采取斗争的办法，而采用协商、调解等办法，少数民族的小土地出租者和富农出租的土地予以保留；未征得少数民族的同意，其学田、寺田、族田等全部不动；不搞反宗教、反迷信；“神树”不予没收等等。

我们十分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入滇后不久，地、县两级都办了民族干部训练班，接着省里办了民族学院，并不断选送民族干部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部队的民族工作队吸收民族干部参加，剿匪和土改也培养了许多民族干部。经过学习和实际锻炼，大批民族干部成长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其中有一部分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为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尊重宗教信仰，
围剿土匪骚扰

在云南，特别在中缅边境地区，宗教有相当的势力，主要是缅寺、喇嘛寺、清真寺和天主教、耶稣教。这些宗教的上层人物都联系着广大的信教群众，不少人与国外有联系。如何正确对待宗教界上层人士，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其政

治态度来讲，他们的大多数是爱国的，是可以争取的，坏分子是极少数。因此我们在宗教工作中，坚决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尊重信教自由，对宗教界上层采取尽量争取的方针。有

一个景颇族的传教士斯拉山，因当时对我们存在疑虑，要到缅甸去，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他还硬是要去。我们没有勉强

他，对他说，来去自由，如果以后回来，我们欢迎，什么时候

回来都欢迎。他走了以后，我们对他与教民的政策一如既往。过了不久，他消除了疑虑，放心地回来了。在土地改革

中如何对待宗教上层人士，省委专门进行了研究，并作出了

明确规定。对回民阿訇中的地主采取缺席划阶级的办法，对其土地不采取一般的没收方式，而动员其交出，他们的房屋、衣物、家俱一律不动。个别属恶霸成分的阿訇也不进行斗争，经地委批准后采取在民族代表参加下由政府仲裁教育的方式解决。对个别有反革命活动的阿訇只用侦察，不作处理，经省委批准后作专案处理。对缅寺、喇嘛寺的长老、佛

爷也采取与上述相同的办法，对寺庙财产坚决予以保护不动。对天主教、耶稣教，主要是提高群众觉悟，开展“三自爱国”的教育，在土地改革中限制神父、牧师、传教士的活动。同时，反复宣传我们的宗教政策是一贯的，土地改革并不是消灭宗教。

入滇初期，匪患猖獗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土匪以推翻人民政府为目的，进行一系列猖狂的破坏活动，并一度攻占了新平、易门、牟定等县城，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和社会秩序，给人民群众带来深重灾难，也影响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不消灭土匪，许多工作都很难进行。人民解放军不得不投入相当数量的兵力进行匪剿斗争。我们坚决贯彻中央制定的“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经过军民近 3 年的艰苦努力，取得了剿匪斗争的彻底胜利。

遵照中央的指示，我们进行了整党。这次整党，我们认真贯彻执行少奇、小平同志提出的“坚决、严肃、稳慎”的方针，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虽然存在一些缺点，但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它对于提高广大党员的政治觉悟，统

一思想认识，纯洁党的队伍，加强党的团结，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起了积极的作用，为顺利地开展各项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入滇后的工作千头万绪，除了上面提到的各项以外，还有接管军政财文各部门，团结、改造留用人员和起义部队；镇压反革命，整顿社会秩序；进行经济领域的斗争，争取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工厂的民主改革；农村的减租退押、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运动等等。这里只着重就如何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在省委领导下，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搞好内部会师，加强党内外团结及各民族团结等问题，作一些片断的回忆。这个方针，从字面上看，把工作放在了第二位，似乎工作没有团结重要。而实际上，上下左右的团结搞好了，大家心情舒畅，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互相支持，密切合作，工作必定能搞得更好。这样，工作也就成为第一了。这是辩证的关系。几十年过去了，不少同志回想起当年云南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方针后取得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从而促进各方面工作发展的情景，仍十分留恋。特别是联系到我们以后犯的几次“左”的错误，挫伤了干部、群众积极性的教训，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当年中央针对云南实际情况提出的“在省委领导下，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的正确性。

克服困难，
支持援越抗法斗争

云南与越南接壤。新中国成立不久，胡志明同志专程到北京，请求党中央援助越南进行抗击法国殖民者的斗争。此时，我举国上下正致力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等工作，任务十分艰巨；同时，中央己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进行抗美援朝斗争。我党中央在国内外面临诸多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博大胸怀，答应了胡志明同志的要求，毅然决定向越南提供无私的军事援助和财政经济援助。中央派罗贵波同志任中共中央联络代表，派陈赓同志任军事顾问。陈赓早年与胡志明熟识，具有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在率四兵团开进云南不久，便赴越执行任务，在协助指挥越南人民军抗法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遵照中央指示，云南作为越南抗法斗争的后方。当时，越方在云南办了一所越南步兵学校，培养军事指挥干部，校长黎铁雄，政委陈子平（陈后任越南驻中国的大使，六十年代陈以外交官身份到东北参观时，还专门约我叙谈过一次）。云南省对这所步兵学校以及越南的其它后方设施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胡志明于 1950 年 10 月就高平战役胜利结束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我应该指出，陈赓、任穷、云逸、天佑、贵波、剑英、方方、国清及顾问同志们在战役中之特别功劳。”就是对云南、广西两省支援越南抗法斗争表示感谢的意思。当越南到广西的陆上通道打通后，中央决定，将援越抗法的后方从云南迁到广西。刘少奇同志为此还专门找我谈过一次话，说明中央这个决定的意图。我对少奇同志讲，只要对援越抗法斗争的大局有益，云南方面没有意见，完全服从中央的决定。

第十四　章在中共中央西南局

1952 年 7 月，邓小平同志离开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在这以前刘伯承同志已调到南京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中央任命贺龙同志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并决定将我从云南调到重庆，任西南局第一副书记，张际春同志和李井泉同志任第二、第三副书记，一起协助贺老总主持西南局工作。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心里很不安，感到难以担此重任，赶紧找到贺龙同志，竭力推荐李井泉同志任第一副书记，说李井泉同志工作有经验、有魄力，比我更合适。贺龙同志对我讲，四川是个大省，需要有一位得力的同志去主持工作，中央已决定井泉同志兼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你就不要再提了。我不好再说什么，只得奉命赴任。小平同志离任之前，在成都召集我们西南局几位负责同志开了一个小会，宣布了中央的任命。大家进行了讨论。小平同志简要的作了一些交待。之后便直接乘飞机从成都飞往北京赴任。

中共中央西南局，是在解放祖国大西南的战役胜利结束后成立的，是党中央在西南的代表机构，设在重庆市。邓小平同志任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刘伯承同志任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同志任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在小平、伯承、贺龙同志的共同主持下，在西南地区胜利地进行了清匪反霸、改编旧军队、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进军西藏等各项斗争和工作，为西南地区各方面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 1952 年到职，至 1954 年大区行政机构撤销后离任，前后差不多两年时间。当时，西南局的常委，除正、副书记外，还有王维舟、周兴、张子意同志。西南局的委员，除常委外，还有陈赓、周保中、李达、蔡树藩、周士第、王新亭、廖志高、陈锡联、谢富治、杨勇、苏振华、张霖之、于江震、郑伯克、李明、李大章同志。

西南局由贺龙同志挂帅。贺老总胸怀全局，善于抓大事、抓中心，又善于发挥集体的力量，带领大家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和部署，共同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贺龙同志具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原则精神。他作风民主，爱护干部，团结同志，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贺老总的领导下，西南局的领导班子团结一致，配合默契，大家都感到能够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心情十分舒畅。

积极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
贺龙同志言传身教

1952 年，《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刚解放不久的西南新区来说，大批新干部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不熟悉；老干部由于面临着崭新的任务，也迫切需要重新学习。因此，西南局把组织学习毛泽东思想当作一件大事来抓。贺龙同志亲自抓这件事，他在 1952 年 10 月 6 日由西南局和重庆市联合召开的学习动员大会上讲：“中国革命是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成功的，今后的工作更要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他号召大家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强调“一定要领会其精神实质首先钻进去，然后考虑如何运用之于不同的工作岗位，求其融会贯通。”最后他说：“我自己虽然快六十岁了，但我一定要努力地学、不断地学、一直学到老。”贺龙同志的讲话语重心长，亲切感人，对西南地区的干部和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身教重于言教。贺龙同志以身作则，带头制定了一份学习《毛泽东选集》的计划。这个学习计划我保留了一份，多年来一直保存着，现全文介绍如下：

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的计划

贺龙

（一）学习的目的与要求：

关于毛主席的著作虽然有些已经学过。但不系统，对某些问题的了解还不够深刻。因此时常感到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尚未达到应有的程度，对某些问题的处理就难免从经验出发，这一方面由于文化程度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由于主观努力不够，学习不经常。今后，为了更深刻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并贯彻到工作当中去，使工作搞得更好，决心用“钻”与“挤”的精神，经常地、有系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在可能条件之下，尽量争取八个月学完《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两卷。

（二）学习的具体计划：

（1）学习方法——以个人阅读为主，利用时间与同志们漫谈。并同时学习文化，读完一篇文章后，用最短的文字把中心或心得记下来，以便练习写作，帮助记忆。

（2）学习时间——每日上午七时至八时，每星期六小时，下午如工作及精力允许的话，还可或多或少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不算在计划之内）。

这个学习计划，倾注着贺龙同志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深厚感情，表现了这位革命老战士活到老、学到老的感人精神。毛主席曾建议贺龙同志要学习文化，因此他在学习计划中专门写了一条，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同学习文化、练习写作结合起来。贺龙同志严格地执行了这个计划。当时，他虽然患高血压病，但仍坚持学习不辍，在规定时间认真读书，晚上还挤时间多学一些。在贺龙同志带动下，西南局从书记、常委到一般干部，都制定了学习计划，形成了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风气。

在组织干部学习《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1952 年 10 月 6 日，在西南局、重庆市联合召开的学习动员大会上，贺老总发表了重要讲话。由于西南局宣传部有关同志在具体工作中的疏忽，造成《新华日报》报道失实。在这次大会的报道中，没有写贺龙同志到会讲话，只提到我在会上讲话。这是个严重错误。我当即查明情况，向贺龙同志汇报。贺老总正在吃饭，放下碗筷说：“我以为出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呢，这没有什么！”他一再嘱咐我，不要为这件事去处分人，还专门为此作了一个批示。经办这件事的同志，自知犯了错误，主动写检查，请求处分。当他听到贺龙同志的指示后，深受感动。事隔几十年了，提到此事，还记忆犹新，深感贺龙同志对干部的宽厚与爱护。贺龙同志谦虚谨慎，不突出个人，不居功自傲，严以律已，宽以待人的高尚品德，使我们大家都受到深刻的教育。

大抓经济建设，
各级党委集中力量做好经济工作

1952 年底，在胜利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基础上，党中央及时地领导我们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根据中央的部署，西南局把经济建设作为这个时期的中心工作，集中主要力量抓经济工作。解放前，西南地区除了军工企业较多以外，整个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解放后，我们在厂矿企业主要抓民主改革工作，普遍建立了党、团、工会组织和民主制度，职工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劳动热情高涨，合理化建议大量涌现，促进了生产

的恢复和发展。全区的工业生产总值 1951 年比 1950 年增长百分之 134。1952 年又比 1951 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二。但是厂矿企业普遍存在着产品质量差、设备利用率低、财务管理混乱、流动资金周转慢、成本高、事故多等一系列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多数干部不熟悉经济工作，缺乏领导生产的经验。党的中心转向经济建设以后，西南局针对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厂矿企业着重抓了以下几件事：

一是统一全党思想，使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真正认识到抓好经济建设是全党工作的中心。贺龙同志在 1952 年底至 1953 年初西南局召开的厂矿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要求："省市委必须集中力量做好经济工作。"他严肃指出："我们一定要学会厂矿工作，在经济战线上取得胜利。把工厂办好、厂矿办好，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办不好是关系到国家计划经济的问题，有的甚至必须追究法律的责任。"他还号召在厂矿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刻苦钻研业务，学会一套生产建设的本领，由外行变成内行。他还要求"共产党在工厂、矿山的组织，应当成为生产的中心、团结的中心、思想教育的中心、带动厂矿前进的中心。"西南局的其他领导同志以及西南局领导的各种新闻媒介以各种形式反复宣传党取得政权后把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

二是在民主改革胜利完成的基础上着重抓厂矿的生产改革。当时，西南地区厂矿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管理与工人阶级日益高涨的生产积极性不相适应。进行生产改革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我们在厂矿工作会议上对这项任务作了专门部署。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负责人在厂矿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厂矿生产改革和基本建设》的报告中明确提出，生产改革的目标是改进生产管理，改善劳动组织和提高技术，逐步达到实行经济核算制和施行计划管理；生产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核查资产，确定定额，提高产品质量，加速流动资金的周转，加强成本管理，降低成本。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厂矿的面貌有明显改观。

三是调得力干部充实工业战线。解决好干部问题，是当时搞好厂矿企业的关键。西南局作出决定，抽调一批优秀的地、县委书记和军队转业干部加强厂矿企业的工作，并作了具体部署。贺龙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要求"全党全军必须按照计划，抽调优秀干部，及时配备到经济战线上来。"鲁大东同志就是此时从地委书记调到一个大厂主持工作的。

四是树立先进典型。我们除了号召大家积极学习全国的先进典型以外，还树立本地区的典型。如 21527 厂由于学习先进经验，改变了生产面貌，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1953 年 1 月，我和张际春同志随贺龙同志到该厂参加发奖大会，表示热烈祝贺。 27497 厂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总结出来三百多项先进生产经验，有六百多位同志因此获奖。贺老总给该厂全体职工写了贺信。贺信说："喜报传来，我们欣喜异常，特此向你们全体职工同志热烈祝贺。深望你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团结互助，继续努力，巩固既得的成就，争取更大的创造，为完成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任务而奋斗。"这些先进典型为推动西南地区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东北地区在厂矿企业实行一长制。西南局研究后认为，一长制是照搬苏联的做法，不适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在西南地区不宜实行。我们认为，根据当时西南地区的情况，还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比较好。

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会议，

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3 年党中央适时地提出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党中央酝酿了很长时间。1953 年，毛主席在中南海西楼召集会议，再次研究总路线问题，通知中央局的负责同志也到会。我作为西南局的负责人之一，一连参加了几次会。会上，大家发言踊跃，畅所欲言，讲话时都没有稿子，唯高岗一人照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声音很小，而且念得结结巴巴，显然是别人为他拟的稿。主席耐心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在他亲自主持下，对总路线如何表述一个字一个字地进行推敲琢磨。1953 年 6 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总路线的提法正式进行了讨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表达。同年 9 月 24 日发布的庆祝国庆四周年口号，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了这条总路线，即“在相当长的一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年 12 月，毛主席在审定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即概括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总路线公布后，西南局决定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广泛地组织干部群众学习，努力做到家喻户晓，人人都知道，并要求各行各业都在总路线指导下进行工作。西南地区各族人民表示热烈拥护，一致认为这条总路线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现在看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及时的，内容也是正确的。这条总路线指明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方向，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且明确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工业、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的。”这个提法本身就具有明显的防止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含义。但是在后来的贯彻执行过程中，恰恰出现了急于求成和急躁冒进的问题，由于头脑发热，一再加快速度，工作也做得比较粗。这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不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本身的问题。

提高官兵的政治、军事素质，
组织部队支援经济建设

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在胜利完成清剿顽匪百余万和改编旧军队九十余万的任务之后，在领导部队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广大官兵的政治、军事素质的同时，积极组织部队支援地方经济建设。

贺龙同志作为西南军区司令员十分重视部队的现代化建设。他说：“军队是国家组成的最重要的部分，我们非常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他进一步指出：“首先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强的政治品质，要具有先进的军事科学素养和高度的文化水平。”他在抓紧部队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的同时，针对当时部队文化水平不高的实际状况，号召“掌握文化工具，突破文化关”，亲自到西南军区文化教育代表会议上讲话，指出：“不过这一关，我们的战斗力就提不高，就不能锻炼成为能够掌握现代战争的军事技术的强大武器，也不能直接和毛主席的著作见面，不能很好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贺龙同志还指示部队把全面开展战斗性、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作为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部队生活生动

活泼，很有生气，使广大指战员具有强壮的体质、充沛的精力和丰富的文化生活。

1953 年，解放军某部为修建射击场，不利用荒地和附近暂不使用的飞机场，却占用大量可耕土地，还平毁了一部分坟地，涉及到十几个自然村，群众意见很大。贺龙同志对这件事十分重视，即将此事电报中央和军委，同时转发至西南各省委和各军区，指出这种做法“严重地损害了群众利益，脱离了群众。其他机关、部队及地方企业部门的基本建设过多地占用及过早地圈了群众耕地的现象也是相当普遍和严重的。”贺龙同志要求：“各省委、军区派出得力干部进行切实检查处理，将过多的占用了群众的耕地坚决退回群众耕种，并赔偿群众损失，已经圈了但暂不使用的土地，应尽量让群众耕种，绝不能让它荒了；购买价钱太低的应补足，免使农民吃亏。今后所有机关、部队占用耕地时，须绝对遵守中央指示，必须经西南局批准才行。”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及时派人下去妥善处理了此事，将占用的耕地全部退还群众，并按实赔偿损失，挽回了不良影响。贺龙同志对这件事的严肃处理，为我们树立了坚持党的优良传统、搞好军民关系、坚决维护群众利益的好榜样。

在党的中心转向领导经济工作之后，西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积极支援地方的经济建设，在西南地区的交通建设中作出了尤为突出的贡献。

解放前，西南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交通十分不便，严重地阻碍着这里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一解放，国家便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交通建设。成渝、宝成、成昆铁路和成阿（成都至阿坝）、康藏、川康、康青公路等主要干线相继开工。解放军是筑路的主力。这些线路大多蜿蜒在崇山峻岭之中，工程十分艰巨。以全长一千五百多公里的康藏公路（从西康省的康定到西藏的首府拉萨）为例。这条公路要穿过绵亘千里的高山峡谷，要跨越波涛汹涌的金沙江、怒江和澜沧江。最艰险的怒江段，山如刀削，崖似斧砍，飞鸟不至，人无立锥之地。筑路大军只能吊在悬崖峭壁之间奔腾的江水之上悬空作业，在高达数十丈的半山腰上劈出一条路来，工程之险为我国乃至世界交通史上所罕见。

贺龙同志十分重视康藏公路的筑建工作，他在重庆亲自召集筑路部队负责同志和工程技术人员开会，同他们一起研究线路和各项具体问题，并派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到工地检查督促工作，又责成西南军区后勤部长余秋里率工作组深入工地调查研究，切实解决筑路队的生活保障和各项物资供应问题。

其他公路、铁路筑建工作之艰巨由此可见一斑。勇敢顽强的筑路大军，发扬“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战胜了地势险要、气候恶劣等重重艰难困苦，在自古叹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两南地区建筑了条条铁路和道道公路，为发展西南地区的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

1952 年 11 月 20 日，康藏公路康定至昌都段提前 50 天通车。毛主席、朱总司令亲笔题词慰问筑路队和民工。毛主席的题词是“为了帮助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朱总司令的题词是“军民一致，战胜天险，克服困难打通康藏交通，为完成巩固国防繁荣经济的光荣任务而奋斗。”刘伯承、贺龙同志在嘉奖电中说“康藏公路通车昌都，为今后康藏交通建设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于国防建设、发展西藏经济及民族团结，均有显著的贡献。”

解放军筑路部队为西南地区的交通建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将载入史册。

诸多条铁路和公路的开通，使西南地区同全国的铁路和公路网络沟通，为西南地区各兄弟民族带来了幸福和繁荣。

贯彻七届四中全会精神
执行中央关于撤销大区的决定

1954 年 2 月，召开七届四中全会。

西南地区参加四中全会的同志到北京后，贺龙同志问　我们，你们闻到点什么味道没有？我们不解其意，没有作答。他又说，你们有点感冒了吧。贺老总告诉我们，毛主席也曾经这样问过他们。事后，我们才理解，贺老总是说我们政治敏感性差。

1952 年底，高岗由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此后，他个人野心急剧膨胀，企图夺取更高的权力。他散布流言，集中攻击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破坏中央威信。同时吹嘘自己，并且进行非组织活动，要求由他来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邓小平、陈云同志察觉高岗的反党分裂活动后，立即向毛主席作了反映，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党中央及时揭露了高岗的问题，七届四中全会，主要就是解决高岗以及同他积极配合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饶漱石的问题，并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党中央对高、饶以及个别与此有牵连的同志，均采取“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的方针。毛主席讲过，检讨得好，真诚悔过的，要适当安排工作。但是，高、饶不恩悔改，拒绝做认真的检讨，高岗最后走上以自杀对抗党的道路，中央才干 1955 年 3 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决议，开除高、饶的党籍。对于有牵连但是检讨比较好的几位同志，以后都安排了适当工作。这些同志在认真吸取教训，改正了错误之后，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努力为党做工作，有的同志又被委以重任。

回到西南后，贺龙同志亲自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要求西南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西南局遵照中央指示，没有层层抓小高、饶，没有扩大批判的范围，也没有伤害什么人，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在领导班子内部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特别强调党的团结的极端重要性，强调“ 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同一切破坏党的团结、损害中央的威信、妨碍中央的统一领导的言论和行动作坚决的斗争。 ”要求全体党员都要做到“ 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 ”“ 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党的团结 ”。要求共产党员一定要摆正个人与组织的关系，要把个人置于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之下，警惕和防止居功自傲情绪和个人主义的滋长。强调党内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和派别活动。

七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及贯彻执行非常及时，对全党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也清除了党内一大隐患。这场斗争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自始至终进行得比较稳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

同年 6 月，中央决定撤销大区和中央局。6 月 19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32 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写道：“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代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和监督地方政府，对于贯彻中央政策，实施人民民主建政工作，进行各种社会改革运动，恢复国民经济，以及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中，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都胜利地完成了它的任务。现在，国家进入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时期。国家计划经济的建设，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为了中央直接领导省市以便于更能切

实地了解下面的情况，减少组织层次，增加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为了节约干部加强中央和供给厂矿企业的需要，并适当地加强省、市的领导，撤销大区一级的行政机构，是完全必要的和适时的。”决议还同时指出此项工作“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必须做得非常稳当。”

撤销大区的决定公布后，我们进行了认真的动员，并于同年 8 月，召开西南行政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进行具体部署。强调撤销大区是一项复杂细致的工作，对于上下衔接、人事调配等各项具体问题都要妥善安排，避免一切可能发生的损失。对西南一级行政机构撤销的步骤，按照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的原则，逐个加以撤销，我们根据各单位的不同情况，将该撤销的单位分别采取不同的办法，划为早交迟撤，早交缓撤和早交早撤三类。早交迟撤的有商业、交通、地方工业；早交缓撤的有教育、民族事务、粮食部门；早交早撤的有公安、文化、高教、卫生、民政、劳动工资、监察、检察、财政、水利、气象、群众团体。还有些不能撤，必须整个机构移交的如交际处、广播电台、商店、报馆、美术学校、剧团等。原为中央直辖市的重庆市已子 7 月 1 日即并入四川省的建

制。

安排好撤销机构的各项工作后，我和贺龙、李达等同志于 1954 年 12 月一起离开重庆到北京。

贯彻“谨慎稳进”的方针，
做好少数民族工作

西南地区的云、贵、川三省都有众多的少数民族。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决定西藏工委由西南局代管。西藏更是藏族的聚居地区。因此，西南局始终把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谨慎、妥善地处理好民族问题，维护西南地区的稳定，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整个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的主要倾向，同云南省一样，也是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左”的急躁冒进情绪。如在一部分干部中有所谓两不通，即：“团结上层不通，不土改不通。”因而，对有些可能团结的上层没有团结好，已经安排职务的上层人士有职无权。又如对民族内部的旧制度急于进行改革，对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够尊重，有的地方发生过征收少数民族的祭祖田、清真寺，毁坏寺庙，挖掘祖坟，激起群众不满的事。个别地方甚至发生乱斗，乱捆的严重事件。而往往到工作取得成绩的时候，干部这种急躁冒进情绪就容易抬头。

为此，西南局一方面调配得力干部，加强各级民委机构，向各民族地区加配领导干部，另一方面加强民族政策的宣传和指导，指出西南地区由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与帝国主义矛盾之交叉，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必须坚决地认真地贯彻“谨慎稳进”的方针。要求各级干部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克服急躁冒进情绪，认真执行团结民族上层的政策，推行民族自治，保护宗教信仰，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等各项政策。并下大力气积极帮助少数民族扩大生产，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

在处理涉及到民族问题的具体工作时，我们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凡是涉及到原则性、政策性的问题，不论事情大小，西南局都向中央报告，请求中央指示。我记得有这样几件事：

贵州与广西毗邻的一个县准备将几个苗族聚居乡划给广西苗族聚居县的事，经两省反复商量，西南局进行了讨论，最后又请示中央，中央为此事专

门作出批示：“凡涉及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整行政区划，均须征得有关民族首先是少数民族的人民及其领袖人物的同意，始得进行。”

1953 年，组织西藏青年参观团赴京，是组织西藏、昌都两个团，还是合并为一个团，以及西藏青年代表团副团长的次序如何排列的问题，都是由西南局请示中央后决定的。西南局 1953 年 5 月 4 日关于这个问题向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从这一问题可以看出，今后凡是与西藏有关的问题，只要是有原则性、政策性的问题，都必须报告请示中央，否则即或看来是很小的事，也往往牵涉全局，将会陷我们于被动。”

1952 年 12 月，西藏工委成立农牧部，只报西南局未向中央报告。西南局未请示中央就作了决定。毛泽东同志知道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必须认识藏族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必须应付恰当，不能和处理寻常关系一样看待”，“你们和西藏人相关的各项工作，每项均须事前报告中央，经过批准，然后执行。”

关于在民族学院发展几位藏族学员入党，采取什么方针和办法的问题，我们也请示了中央。中央都给予明确指示。

为了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推动民族工作的健康发展，西南局及各省委都专门召开过民族工作会议进行研究和部署。由于有中央及时和具体的指导，各级党委的重视，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工作在这一段时间里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第十五章　干部部

1954 年 10 月，中央军委任命我为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排在赖传珠同志前面（赖也是第一副部长），协助罗荣桓部长主持总干部的日常工作。

我 1954 年 12 月到职，1955 年 1 月正式上班。当时，我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好几个职务。我考虑到精力有限，不可能把身兼数职的工作都做好。为此，我向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同志请示，主要精力应当放在哪里？小平同志告诉我：是罗荣桓同志让你到总干部部的，你要集中精力搞好总干部部的工作，别的地方可以少去。这样，我就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总干部部，别的事很少去做。

罗荣桓主持工作，
干部来自五湖四海

那时，我住的地方离罗荣桓同志的住处很近，我经常晚间上他那里去汇报工作情况和问题，向他请示，罗帅总是耐心地听取汇报，对总干部部工作，从大的方向到具体部署，作出明确的指示，并鼓励我们放手工作。我和其他几位副部长都很尊重罗帅，认真按照他的指示进行工作。

总干部部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掌管全军干部工作的领导机关，是与总政、总参、总后并列的一个总部。我到总干部部之前，已经建立了总干部部党委。罗荣桓同志同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工作繁忙，没有参加总干部部党委。赖传珠同志为书记，徐立清同志为第二书记。五位二级部部长为委员。这些同志的情况大体是这样：赖传珠同志，江西人，是红一方面军的，在红一、五军团、新四军工作过，来自四野；徐立清同志，安徽人，是红四方面军的，在第一二九师工作过，来自一野；一部部长李信同志，湖南人，是红二方面军的，在红六军团、第一二〇师工作过，来自四野；二部部长王文轩同志，是山东地下党的，在山东纵队、第一一五师工作过，来自三野；三部部长袁子钦同志，福建人，是一方面军的，长期作学校工作，在一、二野都工作过，来自志愿军；四部部长曹广化同志，是 1926 年入党并在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讲习所学习过的老同志，是四方面军的，在延安军委参谋部和留守兵团工作过，来自四野；五部部长郭炳坤同志，陕西人，是陕北红军的，长期在陕甘宁边区工作，来自一野。在我将要离开总干部部时，又将在一方面军、留守兵团、二野、华北军区和东北军区工作过的甘渭汉同志调来担任总干部部副部长。罗荣桓同志在组建总干部部时，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抽调各个方面的干部。不仅领导干部如此，一般的机关工作人员也是这样。领导干部是由军委指名抽调的，而一般干部则只提出具体的选调条件，由各大军区按条件选调。可以说，总干部部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力求照顾到各个野战军及历史上各个大作战区和各个方面军的干部。这很有好处，既便于开展工作，交流经验，熟悉干部，也有利于增强全军的团结。不只总干部部是这样，在组建其他单位时，也是如此。

我到职时，总干部部已初具规模。下设了四个二级部，即：一般兵种干部任免部（简称一部），管理一般兵种师以上干部的考核、任免等工作；特种兵干部任免部（简称二部），管理各特种兵师以上干部的考核、任免等工作；组织统计部（简称三部），管理干部的组织、调配、培养、数质量统计、军官预备役及抚恤保健等工作：军衔奖励部（简称四部），主要管理授予军官军衔及颁发勋章、奖章等工作。此前曾设立过抚恤保健部，但已于 1953 年撤销。1955 年 5 月，又增设了预备役干部动员部（简称五部），主要统管

预备役军官的各项工作。一共五个部、一个办公室。赖传珠副部长分管三、四、五部和办公室，徐立清副部长分管一、二部。

建立军衔制度，
颁发勋章奖章

那几年，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把我军建设成为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的总方针，我军正处于大转变时期，部队由分散到全国统一，由单一兵种到诸军兵种，由游击队到建立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在这样一个大的转变和发展的形势下，总干部部面临的任务繁重，工作头绪很多。至今印象最深、当时耗费精力最多的是授衔和颁发勋章奖章的工作。这方面的主要情况是：

1955 年 2 月 8 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由毛泽东主席下令正式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为了适应我军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个条例专门规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条件、来源、军衔、奖励、权利和义务、预备役等问题。特别是建立军衔制度，是一项既新且急需实行的工作。中央军委决定，要在 1955 年内将现役军官的授衔工作进行完毕。

1955 年 2 月 12 日，经全国人大会常委会通过、由毛泽东主席下令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军委指示，全部勋章奖章分两期颁发完毕。1955 年颁发现役军人的勋章奖章，1956 年颁发转业、复员和离队军人的勋章奖章。

这两项工作都由总干部部具体承办、具体组织实施。这正是我刚到总干部部以后面临的一项要求高、难度大、时间紧迫的工作。1955 年，我大部分时间都用到了这两项工作

上。

为着指导这两项工作的开展，军委于 1955 年 1 月，先后发出了《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颁发勋章奖章工作的指示》，阐明了实行军衔和勋章奖章制度的目的、意义，并对评定授予的步骤和范围，评定的标准、批准的权限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总干部部也在 1 月份召开了全军军衔奖励工作会议，就军衔奖励工作中的标准掌握，评定中的若干具体问题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问题，经过认真的研究后作了具体部署。各级还专门成立了办公室，专管这项工作。

这两项工作传达到部队以后，引起了干部的普遍关注。大多数干部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和态度，但也有不少干部担心自己的军衔评低了，面子上不好看，因而和别人比高低，有的竟公开向干部部门提出要什么军衔。这就使我们意识到，要搞好评衔工作，一方面要尽量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纠正一部分干部中错误的认识和态度；另一方面要做好平衡排队工作，尽可能评得公平合理，既使本人基本满意，又使上下左右都没有意见。因为只有评得适当，才能真正达到调动干部积极性的目的，如果搞得不好，不但会损害干部的积极性，还会影响干部之间的团结。

工作量最大、难度最大的就在于搞好平衡排队工作。这就要求在全面考核了解干部的基础上，根据评衔的条件和标准，反反复复地比较，多方面征求意见。那时少将以上的军衔由军委直接掌握，所以都由总干部部搞平衡排队的工作。我记得那个时候除了处理其它日常工作以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搞这个平衡工作。在排队平衡过程中，我们认真研究，反复斟酌。当时在掌

握评衔标准方面，除了依据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服务的经历和对革命事业

的贡献以外，还适当照顾到各个方面军干部的相对平衡，照

顾到少数民族干部和起义将领，同时还要考虑到已在地方

工作的干部与军队有历史联系或与某一地区有联系的代表

人物的授衔问题。比如从部队调到外交部当大使的和在地

方工作的，有的也提出要军衔。好在中央和军委领导都很关

心重视这项工作，能够及时听取我们的汇报，及时给我们指示。有些高级干部的思想工作，中央军委领导同志还亲自出

面去做。这就使我们的工作好做多了。

毛主席坚决不要大元帅军衔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谢授元帅衔

这里要特别说说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不要元帅军衔、不要勋章的一些情况。根据军官服役条例和勋章奖章条例，按照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历史功勋和在部队的任职情况，是应该给他们授衔和授勋的。在初步方案中，毛泽

东主席为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为元帅，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为大将，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

同志也列入了授勋名单。但毛主席坚持不要大元帅军衔，

不要勋章。这事，在一次人大常委会上还引起热烈讨论，包括不少民主人士在内的常委会委员纷纷发言，认为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创建者，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应该给他们授衔授勋。尤其是毛主席功劳最大，应该授予大元帅，授三个一级勋章。

主持人大常委会议的刘少奇委员长知道毛主席不要大元帅、不要勋章的态度，因此他在会上表示，我也不能作结论。其中有位民主人士说，人大作出决定，他有什么办法！少奇同志当时讲，人大可以作决定，但他是国家主席，还需要他下命令才行呀，他不下命令又怎么办？最后少奇同志只好表示：你们不是经常见毛主席吗？你们见面后当面去说服他，争取他的同意，这次会议不作决定。

以后有一次，我和赖传珠同志随彭德怀、罗荣桓同志去向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授衔援勋工作，由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同志和罗荣桓同志主谈，汇报了我们提出的初步方案。

毛主席听完汇报后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他问少奇同志：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是元帅。少奇同志当即表示：不要评了。他又问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周、邓都摆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主席又转身问几位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后来到地方工作的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这几位同志也都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以毛主席为首的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主动提出不授衔，对全军干部是个很大的教育，也解决了评衔工作中的许多矛盾。原来一些自认为评低了的同志，也从思想上想通了，这就大大地推动了授衔工作的顺利进行。最后评的结果，

是大家都知道的：没有评大元帅，只评了 10 个元帅，10 个大将，55 名上将，175 名中将，802 名少将。还有 2 名上将、2 名中将以及一部分少将，是在 1956 年以后授的。除了赛福鼎、乌兰夫、谢富治、韦国清、叶飞、阎红彦等少数几位因特殊情况授予军衔外，其他已转到地方工作的同志，包括驻外大使，都没有授予军衔。首批授衔授勋仪式，是在 1955 年国庆节前夕，9 月 27 日在中南海隆重进行的。首先举行授衔仪式，由毛主席授予元帅军衔；由周总理授予将官军衔。授衔仪式后，着上礼服，接着举行授勋仪式。元帅和将军的勋章，都是由毛主席授予的。各大军区、各总部、军兵种、院校，随后也举行了授衔、授勋仪式。

授予军人军衔，是为了确定军人在军队中的地位，便于识别和指挥，也是给军人的一种荣誉。颁发勋章奖章，是对在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表彰，是历史总结性的奖励。军衔制度的实施和勋章奖章的颁发，都表达了党和政府以及全国人民对军队的关怀，这对于鼓励广大军队干部的上进心，激发他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以至于对推进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都有重要的作用。

全面加强部队建设
做好六个方面工作

除了授衔和颁发勋章奖章工作外，总干部部还进行了其他方面的工作，主要有：

一，选调大批优秀干部建立和充实军委各总部和军、兵种机关。那时共有八大总部，其中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和总财务部都是在 1954 年底和 1955 年内相继建立的。已有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和军、兵种机关，也都需要充实干部。一下需要那么多干部，都从哪里来呢？当时，时值中央决定撤销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军区，主要都从这六个大军区选调干部。六个大军区撤销后，组成了十二个军区，即：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成都、昆明、兰州、新疆、内蒙古、西藏军区。 1956 后又增设了福州军区。那时选调干部不但数量多，而且要求质量高，任务非常繁重。在选调过程中，认真贯彻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一贯倡导的搞五湖四海和任人唯贤的路线，破除了论资排辈的资历观念，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大胆提拔年轻优秀的干部，如总干部部的每个二级部，都提拔了三十三、四岁的副部长。事实说明，这些干部提起来以后，增强了干部队伍的活力，对部队的发展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二，从军内外选调一大批适合做学校工作的人才组建各类军事院校，培训干部。战争年代，我军就很重视培训干部，建国后更加重视这项工作，特别重视办学校培训干部。如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高级步兵学校、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一批高级指挥、政治、后勤和技术院校，都是在那个时期先后建立的。针对当时工农干部较多的情况，为提高干部的文化素质，还建立了一批文化速成中学。办学校的干部，要求有更高的文化、科学知识。除了从部队选调一些适合做学校工作的以外，相当多的教学人才是请地方大专院校支援，特别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差不多都是从地方上选拔的尖子人才。总干部部不仅要负责选调办学干部，而且还要协同有关部门制定教学计划，考核学员学习成绩，分配毕业学员，还包括选派留学生进苏联军事院校学习等一系列的工作。这为全面提高我军干部的素质，加强我军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这里还有必要说一说关于 1955 年选调工农战斗骨干入学和 1956 年初提出大胆提拔干部的方针的问题。抗美援朝作战结束后，1955 年将有 80 万战士要复员。我同总干部部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一致认为，为了有计划地培养我军基层干部，增加干部的储备，应该从有战斗经验的战士中特别是从参加过抗美援朝作战的战士中选拔一批优秀战斗骨干到军事学校学习后提拔为干部。为此，我到各位元帅处一家一家地登门拜访，汇报总干部部的这个想法。他们都表示同意。军委遂发出了关于部队复员时注意保留工农战斗骨干问题的通知，要求从部队（尤其是参加过抗美援朝作战的部队）的战士、班长特别是战斗英雄模范以及副排级干部中，将政治纯洁、工农出身、具有战斗经验、年龄在 23 岁以内、身体强壮的优秀分子选拔 20 万人左右，有计划地送入学校培养。总干部部根据军委的指示，把这项工作列入了 1955 年的重要工作之一，实际上选拔了将近 14 万人。这本是加强我军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但当时在处理上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不能一下子都送入学校培养的情况下，过分地强调了要按计划调入学校培养，不适当地把这批骨干冻结了起来，以至当基层干部有了缺额时，也不让提拔这些骨干，结果使一些优秀的有战斗经验的骨干未能得到及时提拔，甚至作了复员转业处理。虽然在 1956 年初已对此作了纠正，但已经迟了一些，这是很可惜的。

总干部部在 1956 年 1 月召开的全军任免组织工作会议上，针对当时在职干部缺额数很大的情况提出了大胆提拔干部的方针。由于贯彻执行了这一方针，在同年 3 月底以前基本上按编制配齐了干部。这个方针的提出，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提法上和执行过程中都有缺点。只强调“大胆提拔”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提“大胆而稳妥地提拔”就比较全面了。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少数干部提拔不当和提拔干部过多造成干部超编。这些都与我们提出的方针不够全面和对实际工作指导不够有关，这是应当引以为训的。这件事，我在 1957 年初向彭德怀同志和军委写过信，承担了责任。信的全文是“德怀同志并军委：关于一九五六年军队大胆提拨干部问题，这一工作我是主持者和积极参加了的，出了很多主意，同时在总干部部就是由我管理干部任免工作（因徐立清同志病）。如果在贯彻执行大胆提拨干部这一方针发生了偏差和错误，当然我应负主要责任。听说军委正在召开扩大会议，因我已调离军队工作，应该向军委说明这一点。宋任穷。一九五七年一月六日”

三，安排大批干部转业、复员，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建国初期，一方面国家进入经济建设的新阶段，需要补充大批干部；另一方面军队由战争状态转入正规化建军时期，有一大批编余干部需要安排转业复员。这项工作，党和国家十分重视。1950 年 7 月，中共中央就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聂荣臻为副主任的复员委员会，统一领导转业复员工作。全国从各大行政区、省、专署到县、区、乡政府以及军内各级也都建立了复员委员会，专门负责转业、复员工作。我到总干部部工作前，军队大批编余干部已基本上转业复员到了地方工作。同时还有 31 个师和 4 个团集体转业到农林、水利、地质、石油、建筑、交通等部门，参加社会主义生产建设。1955 年实行军衔制以后，则是按照军官服役条例的规定，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工作。这项工作的量很大，牵涉的问题也很多，但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而且既符合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又符合国防建设的需要，因此进行得还是比较顺利的。

四，建立预备役军官制度。建立预备役军官制度的目的在于，既能在平时减少常备军，节省军费开支，而一旦进入战时，又有充足的军队干部预备力量，迅速扩建军队，这项制度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实施而建立的。关于预备役干部的来源和条例，在兵役法和军官服役条例中，都有明确规定。

1955 年 5 月，军委决定在总干部部正式成立预备役干部动员部。这年 12 月召开了全军预备役军官动员工作会议，讨论了预备役军官登记统计办法暂行规定（草案）、高等学校实施军训的规划、动员部门的工作职责等问题。随后，动员工作全面展开。军队转业干部都已登记在册。当时，我们对这一工作没有经验，基本上是按照苏联顾问介绍的经验去做的。但经过大约一年时间的实践证明，按照当时的做法，过于复杂，难以进行下去，只好把这项工作暂时停了下来。在 1957 年，总干部部的预备役干部动员部缩编为一个处，并入了总参谋部的动员部。

五，建立和完善一整套适应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干部管理法规。除了制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以外，还要制订有关干部的考核、选拔、培训、使用、任免、调配、晋升、晋级、工资、奖惩、福利、抚恤、保健、档案、统计、转业、复员、储备等等一整套规章制度。据初步统计，单是我在总干部部工作的那两年，这类法规性的文件就下发了 107 件。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要经过深入地调查研究，要多方面的反复地征求意见，文字上要字斟句酌，工作量很大。这些干部规章制度的制订，使得干部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对于加强干部和干部队伍的建设，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六，实行薪金制。

上下一致，团结一心，
罗荣桓同志带出好作风

总干部部在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的直接领导下，在总干部部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罗荣桓部长非常重视机关的作风建设，重视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使得总干部部机关具有良好的作风。

首先是坚持搞五湖四海，认真贯彻执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干部的选拔使用，各级领导班子的配备，机关院校的组建，军衔、级别的评定，坚持公道正派的作风，坚持搞五湖四海，认真贯彻执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同时又充分照顾到历史上的各个“山头”（以达到消灭“山头”的目的）及其他方面的特殊情况，不搞山头主义，不搞宗派主义。

第二是处理各种问题时，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干部工作各项政策、制度的制定，都是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并在广泛征求与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贯彻执行过程中，也能从实际出发，照顾各单位的特点，重视全面考核了解干部，对干部的历史和现状，都经过认真深入的了解，任免调配干部都能听取并尊重各级党委和各级干部部门的意见。对干部的奖惩都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处理。

第三是在工作中坚持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总干部部在处理各种问题的过程中，特别是有关干部的选拔、使用、军衔和级别的晋升调整，都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经过部党委会、部务会集体讨论决定，没有个

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并注意尊重各级党委和下级干部部门的意见。在总干部部内部和召开的全军干部工作会议上，都能充分发扬民主，做到畅所欲言。

第四是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团结友爱的精神。总干部部的办公用房和用具以及各级干部的吃住都比较简单，都严格执行有关制度规定，领导干部能以身作则，广大干部廉洁奉公，谦虚谨慎。上下关系和同志间的关系融洽，领导关心群众，广大干部也都尊重领导。

第五是坚持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广泛团结干部，关心爱护干部。罗荣桓同志要求，要把总干部部建成为全军干部之家。总干部部的同志按照这个要求做了多方面的努力：从部的领导到干事，常年在部队考察了解干部；利用各总部和军兵种在京开会的机会，到住所去看望干部，听取各级干部对干部工作的意见；对过往的干部都热情接待。领导干部家里，不管是平时和节、假日，也不分白天、晚上，干部来往不断，都像朋友一样地接待；每天都有几十封上百封的干部来信，都力求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十分重视干部的福利保健工作，关心病残干部的治疗。凡是干部提出的某些实际困难，只要是合理而又能够解决的，都尽量给予解决。即使解决不了的，也要回信作好解释工作。

第六是领导干部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管理部属。在工作中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在评衔定级等工作中，比同级干部要求更严。例如徐立清同志，既是总干部部副部长，又是正兵团级，按评衔条件可以授上将军衔。但他自己坚决要求，不要上将。他的理由就是：他是管干部任免的，他这样做，更便于做别人的工作。

那个时候，我们对于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缺乏经验，总干部部也聘请了几位苏联顾问。当时，对于我军的制度建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就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来讲，我们长期以来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不能照搬苏军的办法。我曾向罗帅建议，苏军顾问到期后可不再续聘，他采纳了这个意见，并明确表示，既要向苏联学习，又要保持我们自己的优良作风。另外，实行军衔制度，我们曾仿照苏军的做法，进上级办公室后有一套报告词，搞得大家很拘谨，不利于密切上下关系，我提出在总干部部内部先取消报告词，大家一致赞成。

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
领导人关怀总干部部的建设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没有建立统一的管理干部的专门工作机构，各个作战区根据各自的情况，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由组织、作战、军务部门分别管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军进入了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为了适应我军建设发展的需要，需要建立统一的专门管理干部的工作机构。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亲自关怀下，于 1950 年初开始筹建“ 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 ”。由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负责，派总政第一研究室主任黄镇、副主任刘绍文带领一部分干部，在北京北池子 58 号进行筹建。不久，黄镇调离，具体工作由刘绍文负责。筹建工作从 1950 年 1 月开始，同年 8 月中旬，将过去由中央组织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分管的军队军事、政治、后勤、技术干部工作，交由总干部管理部统一管理，总干部管理部在北京成立。同年 9 月 2 日，中央军委将总干部管理部的组成、任务、分工及干部配备电报通知各大军区。9 月 4

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建立各级干部管理部之规定》。随即各级干部部门从上而下相继建立。9 月 13 日，朱德总司令在总干部管理部全体干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同时宣布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同年 10 月，中央军委任命赖传珠、徐立清同志为总干部管理部第一、第二副部长。1952 年 7 月，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改称“军委总干部部”。 1954 年 12 月，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那时政治干部仍归总政治部管理。总政治部下设有干部部。许多工作都是由总十部部同总政治部共同做的。1956 年 12 月，中央军委同意罗荣桓同志提议，解除其总干部部部长职务，任命肖华为总干部部部长。

1956 年 6 月，中央决定调我到三机部（后为二机部，即核工业部）工作。9 月，离开总干部部，在那里工作的时间不到两年。到三机部后，中央没有马上免去我在总干部部的职务，直到 1957 年 9 月中央才正式免去的。在离开总干部部时，我向罗帅提出：经过几年的实践，总干部部还是同总政治部合并，由政治部门统管干部工作为好。这也不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军队不少同志都有类似的看法。

到 1958 年，中央决定总干部部合并到总政治部，在总政治部下面设干部部，统管全军的干部工作。

1956 年 9 月 15 至 27 日，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它是在全党的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并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召开的，显示了全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我出席了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处成员。大会通过的决议正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确立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可惜的是，后来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八大的决议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八大的民主气氛浓厚，大家畅所欲言，发言十分踊跃，大会发言的六十八人，书面发言的四十五人。我在九月二十日的大会上作了发言，就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的体会，着重谈了加强集体领导的问题，指出集体领导的实质是群众路线在党的领导工作方面的应用，要把集体领导与群众路线结合起来。发言的初稿写好后，我请小平同志审阅，他说写得太原则，让我再进行调查研究后作些修改。遵照小平同志意见，我找了一部分同志座谈，对发言稿进行了修改，增加了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在八大，我被选为中央委员。

第十六章　部的艰苦创业

二机部是搞原子能的。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开创于 50 年代初。那个时候，美国依仗手中的原子弹，多次对我进行核讹诈和核威胁。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核垄断，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尽快掌握国防尖端技术，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毛主席、党中央恰当地估计了我国的资源条件和科研基础，于 1955 年 1 月毅然作出了创建中国原子能事业和研制原子弹的决策。周总理亲自组织实施，并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具体业务由薄一波任主任、刘杰任副主任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负责统筹和管理。

打破帝国主义核垄断
中央决定发展原子能事业

1956 年 4 月，周总理对我说，要从军队里调个中央委员出来加强地质战线。我思考了两天，毛遂自荐，对总理说就把我调出来吧。当时才受军衔，我对穿那一身制服不习惯。总理说你能出来吗？我说总干部部有人。总理说要请示主席。不久，周总理告诉我，主席有新的考虑，要成立原子能委员会。但后来总理又找了刘杰等同志征求对机构设置的意见，认为成立原子能委员会，势必还要设立办事机构，增加层次，因此还是成立原子能事业部好。周总理在 1956 年 7 月向中央作的《关于原子能建设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成立“原子能事业部”的建议。主席同意总理的意见。1956 年 11 月正式提交一届人大常委会议通过，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 年 2 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当时，一机部搞民用，段君毅的部长；二机部搞军工，赵尔陆的部长；三机部搞原子弹，让我当部长。搞原子弹的，在苏联叫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是斯拉夫斯基。那时三机部机关没有几个人，副部长是刘杰、刘伟、雷荣天、钱三强，后来又增加了袁成隆。主要抓队伍组建，抓地质找矿，抓科研基地建设。

地质找矿和科学研究是发展原子能事业的两个根本环节，毛主席曾不止一次亲自关心和指示过，成立三机部后进一步推进了这两方面的工作。地质方面，开始是中苏合营，双方各派两人组成中苏委员会，第一轮主席是刘杰，委员是高之林。高之杖原是北京大学教授，地质专家，在创建铀矿地质事业中，做了大量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后来随着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经中苏两国政府商定，由中苏合营改为苏联提供技术援助，中国自主经营。雷荣天同志主持，在山西、四川、辽宁、江西，连同先前在湖南、新疆共建立了六个区域性地质勘察队，覆盖了全国大部分地区。我任部长后用很大精力抓地质工作，几乎所有搞铀矿地质勘探的地方都去过。当时，我年纪还不大，不到五十岁，不论冬夏，都与干部、工人一起住帐篷，同吃同住，并且向他们学习地质找矿知识。地质找矿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经常出没于深山密林，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但是广大地质科技人员和工人，知道自己是为建立和发展祖国原子能事业找矿，一种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激励大家以苦为乐，以难为荣，奋不顾身，忘我工作。结果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发现了大批放射性异常点，经过揭露勘探和工业评价，于 1958 年正式向国家提供了第一批铀矿工业储量。

科研方面，当时主要抓紧苏联援助的一堆（反应堆）一器（加速器）建设，由刘伟同志主持，在北京西南郊坨里，1956 年 5 月开工，1958 年 7 月建

成。为了争取时间，充分掌握这一堆一器技术和加快建设进度，我曾与刘杰等同志一起讨论决定，反应堆、加速器的主要工程技术人员、操作人员和检修人员，应参加设备安装工作；研究所以甲方身份参加基建活动的人员，可以不参加当时正在展开的整风运动。1958 年 9 月 27 日一堆一器正式移交使用，在现场举行了隆重的移交典礼，中央很重视，陈毅副总理剪彩，聂帅和郭沫若讲话，中外来宾 1000 多人。从此，我们有了一个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该基地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仍属中科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以二机部为主，钱三强任所长。该基地汇集了一批科技人才，赵忠尧、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朱光亚等著名核科学家，以及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彭湃的儿子彭士禄、李四光的女儿李林，都在这里工作。这个基地在我国原子能事业建设和发展中，特别是对于原子能科技骨干的培养，起到了“老母鸡”的作用。

坚持自力更生
争取外国援助

我国原子能事业建设初期，我们的方针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努力争取苏联的援助。从 1955 年到 1958 年，在核科学技术和核工业领域，中苏两国政府前后共签订了 6 个协定，其中包括两个地质协定、一个科研协定、两个工业协定、一个武器协定。但是，苏联的援助是有限的，特别在核动力和核武器研制方面，一开始不是托辞拒绝就是明确不给。说什么“社会主义这个大家庭，有了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无须大家都来搞。”1956 年赫鲁晓夫上台大反斯大林，结果在世界范围掀起反苏反共的高潮，我们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两篇文章，提出对斯大林要三七开，既分析了斯大林错误的性质和根源，又反击了帝国主义反苏反共的恶浪。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为了换取我们的支持，对援助我国防尖端技术才表现有所松动。我们不失时机地通过当时苏联驻中国的经济技术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向苏联政府提出了要求。

随聂荣臻访问苏联
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

1957 年 7 月，我驻苏大使刘晓报告国内，苏联要我们派代表团去商谈原子弹、P2 导弹技术援助问题。阿尔希波夫也受权正式向我宣布，苏联政府同意我们派代表团前去谈判。中央决定由聂荣臻同志任团长，我和陈赓任副团长，成员有刘杰、李强、万毅、钱学森等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与以别尔乌辛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进行了谈判。我和刘杰专门谈原子弹方面的问题。我们九月份去的，谈了个初步结果，派我回来汇报。刘晓对我讲，你回去向主席汇报，说赫鲁晓夫有困难，想请毛主席去莫斯科，使馆倾向于接受赫的要求，请主席来。此时恰逢国庆，我一下飞机，毛主席就把我叫到钓鱼台 12 号楼，周总理、小平、富春等同志都在场。我汇报了两个内容：一是谈判的初步成果，二是大使馆倾向于毛主席接受赫鲁晓夫的要求访问苏联的意见。我还谈了搞原子弹，一要找铀矿；二要建反应堆；三是搞浓缩铀厂，这种工厂很费电，苏联明确讲他们有部分用过的生产浓缩铀设备可以卖给我们；四要铀水冶厂；五要搞从四氟化铀到六氟化铀的转化厂；六还要搞个锂厂，以后搞氢弹需要锂，苏联表示可以给我们一个锂厂。至于导弹方面，苏联答应给我们 P2，这是陈赓他们谈的，我只看了模型。主席听了汇报后，对代表团的工作表示满意，认为我谈的这些都可以。我即给驻苏使馆打电话，

对聂帅讲，主席、中央同意我们的意见，可以准备签署协议。同时我说我就不回去了，但聂帅还是让我回去，于是我又回到了苏联。整个谈判进展比较顺利，前后历时 35 天，于 10 月 15 日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两国政府协定，简称为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规定为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在上述莫斯科谈判中也谈到了工业援助方面的问题，因为第一个工业协定对一些项目的建设规模和进度未作具体规定，需要进一步加以明确。当时苏方表示没有准备好，而我方也感到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结果双方同意留待以后再谈。根据中国国情，原子能事业初创时期到底建多大规模为好？1956 年 8 月，同苏联签订第一个工业协定提出的方案比较大，主要是浓缩铀工厂投资比较多，可能给国民经济带来较重的负担。遵照中央的精神，后经反复研究，在 1957 年 3 月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从尽量缩小规模，减少投资，而又能保持最低限度的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要求出发，提出了一个规模小而门类全的新方案。这个方案投资比原方案减少了 40%，比较切合当时国民经济的实际，使战略需要与实际可能统一起来。以后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1958 年 8 月，苏联政府派代表团来北京，我们就按照新方案同他们谈，于 9 月 29 日双方签订了第二个工业协定，作为对 1956 年 8 月协定的补充。这个协定对每个项目的规格规模和进度，以及苏方完成设计和设备供应的期限，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多数项目要求于 1959 年和 1960 年内完成。

各方援助，“移花接木”
迅速建立自己的科技队伍

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后，我们进一步展开原子弹研制和工业建设的准备工作。1958 年 1 月决定成立九局，这是二机部最重要的一个局，李觉任局长，负责核武器研制和基地建设工作。在这之前，还成立了十四局，负责筹备反应堆、后处理厂建设，周秩任局长，局长就是将来的厂长；成立了十五局，负责筹备浓缩铀厂建设，王介福任局长，局长也是将来的厂长。当时的主要工作是选厂址。从 1957 年上半年开始，选厂工作组跑了西北几个省，选了很多地方，最后陆续报经中央批准，浓缩铀厂定在甘肃兰州，反应堆、后处理厂定在甘肃酒泉，核武器研制基地定在青海海晏具。浓缩铀厂这个厂址原是航空工业部门准备建重型轰炸机厂的，工程建设的前期工作也已经开始，因为非常适合浓缩铀厂的工艺条件，有利于缩短建设周期，我们要，报经聂帅同意，他们也就忍痛割爱让给我们了，足见当时大家对建设原子能事业是多么的支持。

工作展开以后，急需大批科技人员、技术工人和管理干部。我们向书记处、中央组织部要人。我曾兼过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但是从未进过组织部的大门，这次进去了，向安子文部长要人、要技术干部。中央很支持，为此专门发了三个通知。第一个通知是 1956 年 4 月，主要为原子能研究所和铀矿地质队伍抽调干部和工人，紧接着 10 月又为建立三机部机关抽调了一批党政管理干部；第二个通知是 1958 年 9 月，主要为筹建浓缩铀、反应堆、燃料元件、核武器生产、铀水冶等 5 个厂和 3 个矿的建设抽调干部和工人；第三个通知是 1960 年 3 月，主要为了应付苏联可能要撤专家，我们要加速原子工业建设和加强原子弹研制力量，紧急抽调了一批高中级科技骨干人员。

另外，为了适应原子能事业发展的急需，我们还采取“移花接木”的办法，通过教育部从苏联东欧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挑选一百多名，改学原子能

科学技术专业；从国内各有关高等院校相近专业的高年级学生中选调二百多名，集中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兰州大学，改学原子能专业知识。以这几批学生为骨干迅速组成一支年轻的原子能科技队伍。同时，根据原子能事业涉及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科学技术各门类，综合性特别强的特点，采取分头组建，成建制划拨的办法。如经中央决定，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与正在筹建的原子能研究所合并，将地质部铀地质队伍划归三机部，将冶金部铀矿冶厂矿划归二机部，从建工部划拨三个建筑公司、一个安装公司和一个工业建筑设计院组成原子能工业设计施工队伍，从煤炭部调拨一个竖井队组成铀矿建井队伍，将五机部五二三厂划归二机部从事原子能专用设备制造，等等，从而迅速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原子能科技工业体系。

制造原子弹是一项高度机密的事业，我们选调人员在政治上、技术上的要求都是很高的。由组织、人事、保卫部门共同制定了原子能事业用人条件，凡调入二机部的人员，不论科技人员、管理干部、工人，都要按照条件严格审查，而且由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党委领导亲自过问，层层把关，决不马虎，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这支队伍的良好素质。

中央对原子能事业特别重视，给我们开绿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一切都优先。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谨慎的。还在组建队伍初期，发现有些基层干部强调事业特殊，保密严格，不太尊重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盛气凌人，目无组织，我们就严肃批评了这种现象，反对特殊化，明确规定各单位的工作应向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请示汇报，也要同当地人民群众搞好关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遵纪守法，服从管理。我到广东韶关出差时，没有找地委书记而直接向地委的工业部长汇报情况，他们非常重视，问题解决的很顺利。同时，我们重视职工思想政治教育，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我到地质队、矿山、建设工地，总是要讲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创建原子能事业的重要意义，当前的困难和将来的前景，希望大家克服困难，艰苦奋斗，为国争光，为民争气。并且要求大家关心国家大事，天天看报、听广播。野外地质队的同志，身居深山老林，往往十天半个月看不到报纸，我提出每个队必须配一台收音机，保证每天能听到新闻广播，及时了解中央精神和国内外大事。

先学正楷，再学行书，
严肃的科学来不得半点盲目

1958 年搞大跃进，我们也受到影响，头脑发热，提出了“大家办原子能科学”、“全民办铀矿”的口号。这两个口号的推行，一方面动员了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破除了人们对原子能的神秘感，促进了原子能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同时通过土法炼铀获得了重铀酸按 150 余吨，为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提供了铀原料，争取了时间，赢得了主动。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大家办原子能科学”，要求一个省建一个反应椎和一台加速器，根本不可能。后来看着不行，又改成每个大区搞一堆一器，实际也不可能。“全民办铀矿”，特别是农民、生产队办的矿点，由于设备过于简陋，工艺技术落后，往往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也不可取。那个时候我们心急，有些想法和做法不切合实际，曾经提出过如果苏联的样品交得早，原子弹 1962 年就可以爆炸，后来证明不行。

随后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有些同志热劲很大，要对苏联提供的设计和设备进行革新改造，而且还很坚持。我和一些副部长认为，这要慎重。搞

地质、盖楼房、一些辅助系统，我们比较有把握，可以革新、改造，而反应堆、扩散机等工艺设计和设备，当时我们还没有弄明白、没有掌握好，怎么能随便改呢？不研究透彻就要改，带有很大盲目性，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可是，要求改的同志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我便专就此事写信给毛主席，要求当面向他汇报。两三天后就接到电话，通知我到中南海游泳池去见毛主席。我汇报后，主席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这个原子堆、铀 235 工厂，你们还没有掌握好，怎么就动手改呢？只有首先掌握好了，然后才能去改。比如，写字，先得学写正楷，再学写行书，然后再练草书。小孩子连走路都不会，就想跑，怎么行？不要跌跤吗？！我回来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大家统一了思想，并且遵照主席指示精神正式作出了决定：对苏联的主工艺设计不准改，对苏联提供的仪器设备不准乱拆乱动，如需任何改动，都要报经上级批准。而且明确了在建成投产一年半的时间内，这些规定必须严格执行。这样，就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对主工艺设计和设备盲目乱改的危险。

原子能事业是当代科学技术的最高成就之一，它的工艺和设备极其精密，极其复杂。当时我们在技术方面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千方百计尽快地把苏联技术学到手。我们提出了“边干边学，建成学会，苦干三年，基本掌握”的方针，要求科技人员加紧向苏联专家学习，并把学习苏联技术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采取一系列措施和办法，对一些核心工程和关键技术抓住不放，“打破砂锅璺到底”，彻底弄明白，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现在看来，这条方针是对的。我们的技术人员，通过工程实践，边干边学，消化吸收，掌握了技术，提高了自力更生的能力，而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还有所改进和独创，为我国原子能事业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宣传党的正确路线
说服苏联专家

在学习苏联技术，接受苏联援助方面，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作是完全按照他们那一套程序和方法，按部就班去做，还是把他们的援助纳入我们自力更生的轨道，争取时间，加快速度，使我国的核工业建设搞得更快更好呢？我们在自己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向几百名苏联专家展开了宣传，让他们理解我们党的总路线，理解加快建设速度的重要意义。结果，大部分苏联专家被我们说服了，由同我们两股劲拧成了一股劲，加快了工程设计和建设进度。就这件事，我们向中央写了报告，毛主席批了一大段话，说“就共产主义者队伍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己人。大会之后，根据总路线同他们多谈，政治挂帅，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主席的批示给了我们极大鼓舞，使我们更加放手地做专家工作，增强彼此理解和感情交流。总的说我们同苏联专家的合作关系是搞得比较好的。

1958 年 6、7 月间，苏联派三个搞核武器的专家来华考察和工作。先到青海看了核武器研制基地厂址，7 月 15 日回北京做了报告，我和刘杰、袁成隆、钱三强、吴际霖、郭英会等都去听了。这次报告对我们研制原子弹初期工作是有荒的，起到了引路的作用，加快了研制进程，争取了一些时间。可是他们讲的，毕竟只是一种教学概念，不是工程设计，而且有的数据根本不对，苦了我们用两年左右的时间，经过反复计算才完全弄清楚。后来的研制工作，完全是靠我们自己的科技人员，刻苦钻研，艰苦探索，反复实验，逐步过关，最后达到 1964 年核爆炸试验成功。

那次报告之后，我请这几位苏联专家在北京饭店吃了一顿饭，总顾问扎吉江也参加了。以后又请他们参观了一些机械厂和研究所，他们参观后说，没想到你们的工厂有这样的水平，我们对你们估计低了，你们的机械制造水平相当高。我们苏联有些厂子还不如你们。这些专家对我们是友好的，他们有的过去当过红军，后来才改学技术的。

与苏联关系恶化

赫鲁晓夫单方撕毁协议

但是，过不多久，当我中央严正拒绝苏联提出旨在控制我国、侵犯我国主权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后，苏联对我们的态度就逐步恶化。原来答应 1958 年 11 月给我们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迟迟不予运来。我们一再催促，回答总是支支吾吾，以多种借口拖着不给。这时候按协议规定，派来一位搞空气动力学的专家，到我们核武器研究所帮助工作，但来了以后尽支使我们科技人员学外语，到无关紧要的工厂矿山实习，而自己整天躲在办公室看书，问他一些重要技术问题，什么也不说，我们称他是“哑吧和尚”。

这时我们的工厂建设进展较快，科技人员陆续调集，研究队伍也已初具规模，考虑到国际形势的发展，我们想能不能争取苏联提早供给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因为根据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只是答应先给教学模型和资料，但生产正式成品的技术资料需待裂变物质生产出后和制造成品的工厂建成后再给。我们趁苏联专家组长回国之际，托他向主管部门非正式地提出这个要求，看有无可能。结果他们也认为必要，但因为涉及协议的补充修改，须由政府正式提出。在我们正在组织代表团准备前去谈判时，1959 年 6 月 20 日苏共中央突然给我中央来信，借口他们正在日内瓦同美英等西方国家进行停止核试验谈判，正式提出原协议应给我们的原子弹模型和资料，推迟两年以后视国际形势发展再定。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赫鲁晓夫将要单方面撕毁协议。我们党组连续开了几次会，认真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我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们要有思想准备，完全、彻底自己干。

上庐山汇报情况

彭德怀受到错误批判

1959 年 7 月 4 日，我根据党组讨论的情况，给聂老总写信，向他报告了我们对苏方来信的分析，并提出三个对策方案和根据目前情况对原子能工业建设采取的方针和做法。当时中央正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没有去。聂老总说，等庐山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让我、刘杰、万毅三人到庐山向他和彭老总汇报。会议预定 7 月 14 日结束，让我们 7 月 14 日到。

我们一上庐山，原来准备结束的会议延期了，并一下由反“左”转向反右。召开庐山会议的目的，原本是总结前一段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纠正“左”的做法，统一全党思想，更好地完成 1959 年的任务。由于彭德怀同志写了一封信，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不满，后一段的会议开成了批判“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会议。现在看来，彭德怀同志的信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尽管有一些偏激的言词，但是内容是正确的，切中了时弊和要害。我由于当时存在着“左”的思想，也表示不同意彭德怀同志的信，作了批判彭德怀同志的发言，这说明自己觉悟不高，认识片面，应当引以为戒，作自我批评。同我一起上山的万毅同志，是赞成彭德怀同志这封信的，他因此也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庐山会

议后，我同国务院另外几位部长一起到北京医院看望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因腿伤未能上庐山。他躺在病床上，一条腿上了石膏，吊挂在床架上。我们几个你一言我一语地向他讲了庐山会议后期批判彭德怀同志的一些情况。小平同志沉思片刻后说：彭德怀同志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斗争中都有很大的功劳，不论他有什么错误，这些功劳都应当充分予以肯定。小平同志在批判彭德怀同志的调子越来越高的当时讲这样的话，表明了他对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这件事的态度。他的这几句话，对彭德怀同志无疑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而对我们这些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左”的思想，头脑不够清醒的人泼了一瓢冷水。到 1980 年 4 月，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又讲到庐山会议，他说：“1959 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注：引自中央党校出版社《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 870 页）

平稳有序地掌握生产技术
全面转移到自力更生的轨道

我们在庐山期间，关于苏共中央来信和我们分析研究的情况，我向彭老总和聂老总作了汇报。彭老总由于在受批判，听完我们的汇报后，没有讲什么意见。聂老总说，苏联不给，我们就自己搞。我说，我们一方面自己搞，一方面要说他们不履行合同，继续向他们要。当时我还带了一份由刘杰亲笔起草代中央拟的给苏共中央复信稿，在向周总理汇报时，请示总理要不要复信，总理说，中央研究过了，我们不理他那一套。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中央的决心很清楚，我们回来就抓紧部署应变工作，并于当年 12 月制订了原子能事业八年规划纲要，提出“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的奋斗目标，动员干部和群众，发愤图强，埋头苦干，把全部建设工作逐步转移到完全、彻底自力更生的轨道上来。

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不管有多大困难，也必须千方百计地尽快把原子弹的核装料生产出来，把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搞出来。我们调整了建设的战略部署，把在建项目分成一线、二线。一线就是铀生产线，其中包括五个铀矿山和水冶、元件、六氟化铀、浓缩铀、铀冶金五个工厂。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首先把铀生产线建起来，研制原子弹就有了核装料。二线是钚生产线，建设刚起步，设计、设备等条件比较差，一时也上不去，就暂时调整下来，继续积极准备，等待适当时机，创造条件再上。同时，为了争取时间，铀生产线在正式工厂尚未建成投产之前，先利用研究所实验室搞了八个简法生产装置，因陋就简，摸索前进，很快生产出合格的二氧化铀、四氟化铀、六氟化铀，而且通过实践验证了工艺原理、条件、参数、设备性能和操作规程，积累了生产经验，对于全面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提前掌握生产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时，苏共中央图谋撕毁协议，中止援助的事，还没有向他们的下属传达。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差，采取了两个行动：一是抢建浓缩铀厂主工艺厂房，搞好设备安装条件，紧逼苏方履行合同，交付设备。浓缩铀厂是生产原子弹核装料的关键工厂，12 月初，苏联专家到现场察看，估计至少还要一个多月才能完工，结果我们用 10 几天时间就把主厂房抢上去了，而且又满足了对清洁度的严格要求，迫使苏方不得不按时提供了主工艺设备，对于保证浓

缩铀厂顺利建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二是组织科技人员采取同苏联专家对口学习的办法，千方百计把苏联专家的技术和资料学到手。

与此同时，我们抓紧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在核武器研究所后来的苏联专家什么也不说的情况下，我们就组织朱光亚、邓稼先、陈能宽等科学家带领一批新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开展了自己的理论研究和科学试验工作。一天，我和刘杰同志一起去核武器研究所，看到大家劲头很大，干得不错，就对他们说，人家预言我们搞不成，我们要争口气。你们都是搞流体力学和空气动力学的，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口气变成动力，把我们的事业搞成功。 1960 年以后，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等一批老科学家和从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回来的周光召等年轻科学家，陆续到核武器研究所工作。他们同全体科技人员一起，愤发图强，刻苦钻研，英勇拼搏，百折不挠，为我国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作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当时还比较年轻的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等，后来都成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部门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骨干。

为了核设备和新材料国产化，我们还抓了扩散机的核心部件分离膜，用于矿浆吸附的离子交换树脂，用于密封垫圈、垫片的聚四氟乙烯，用于扩散机的特种润滑油等核设备和新材料的试制工作，动用了中国科学院和各有关工业部门以及大专院校的科研力量，形成全国的科技攻关协作网。其中分离膜是气体扩散法生产浓缩铀的核心部件，当时苏联人称之为“关系社会主义阵营安全”的机密技术，对我们控制特别严格，其金属配方和制造工艺对我们只字不露。我们由钱三强主持，组织科学院、二机部、冶金部、纺织部、上海复旦大学等研究单位协作攻关，用了两年多时间就攻下来，为浓缩铀自力更生、稳定生产创造了条件。

总的说，这段时间我们的工作是紧张的，也是很有成效的。我们赶在赫鲁晓夫集团还没有撕破脸皮，把中苏矛盾公开化之前，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技术上做好了应变的准备，加速了自力更生的进程，争取到了主动权，所以到 1960 年赫鲁晓夫公然背信弃义，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的时候，我国原子能事业建设没有因此造成混乱和停顿，比较稳当地过渡到全面、彻底自力更生的轨道。

自力更生方针的伟大胜利，
1964 年 10 月核试验成功

但是，苏联中止援助，撤走专家，毕竟也给我们造成了若干困难，影响了一些建设进度，看不到这一点也是不切实际的。 1960 年初，周总理领着一些部长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结束后，毛主席约见我们几个部长，康生也去了。康生一见我就谈起了什么时候能够爆炸原子弹的问题。我说，苏联原来答应给我们的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现在不给了，部党组经过再三研究，即使尽到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推迟到 1964 年。康生摆出一付“最革命”的架势，说 1964 年爆炸迟了，还是应该 1962 年爆炸。康生讲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话，毛主席一直没有表示，最后只讲了一句话：康生，你去当二机部部长吧。康生一听势头不对，便再也不吭声。康生明明知道 1962 年爆炸做不到，却偏偏一再坚持，足见他不怀好意。以后的实践证明，确定在 1964 年爆炸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1960 年 7 月，苏联政府搞突然袭击，一个照会就把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全部撤走，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他们这种做法显然很不得

人心，不少专家都表示不理解、不满意。我们一是请专家吃饭，二是开会欢送，大讲中苏两国人民友谊。不少苏联专家与我们共事几年也确有感情了，临走前用各种不同方式把有关的技术资料留给我们，这些资料对我们以后继续进行未完工程建设是有一定帮助的。当然，苏联专家中也有少数表现不友好的，有些应该给我们的资料也不给，装到包里又带回去了。他们说，“这是对你们的毁灭性打击”，“再过两年你们只好卖废铜烂铁了”。“从此你们将处于技术真空状态，估计 20 年后你们也搞不成原子弹”。然而他们的预言完全错了，他们走后只过了四年，也就是 1964 年 10 月，我们就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当时，我在东北局，刘伟打电话告诉我下午 3 点钟爆炸，我一直等着听广播，等到晚上新闻联播仍然没有听到报道。后来才知道，是毛主席说不忙着发消息，一再要求核实是否真是核爆炸。并要求注意外国的反映，等完全证实后再正式公布。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在全世界引起极大的震动，全国人民和海外炎黄子孙莫不为之振奋、鼓舞。我在二机部工作过 4 年多，曾经为此费过一些心思，作过一些努力，当然也感到特别高兴和欣慰。

出色的领导者和群众共同奋斗
是我国核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

我在二机部工作期间，始终与刘杰同志合用一个办公室兼会议室，我们合作得很好，党组同志之间的团结合作也很好。刘杰同志长期从事党的工作，曾任察哈尔省委书记。1952 年调到地质部，任副部长（李四光是部长）、党组书记。1954 年开始参与创办原子能事业，协助薄一波同志工作。1956 年成立三机部后，他是常务副部长，主持日常全面工作。他对原子能事业钻研较深，考虑问题思路清楚，善于抓时机、抓关键，有效地推进事业发展。工作刻苦、努力、扎实、细致，我是很满意的。

刘伟同志是江西兴国人，老红军，参加过长征，参加过淮海战役，长期在军队工作，经受了战争的锻炼和考验。1955 年他从公安部警卫局调到原子能事业上来，先是抓苏联援助的一堆一器建设，对我国第一个原子能科研基地建设有贡献。成立三机部后任副部长，分管基本建设和物资供应。工作有魄力，善于决断问题。能够经常深入现场，重视工程质量，要求严格。

袁成隆同志，学生出身，参加革命后搞过文化工作、农村工作，担任过德州地委书记和华东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调入三机部前是中央二办地区工作部组长。他热爱原子能事业，业务上比较钻研，工作热情很高，特别在苏联撕毁协定、中止援助后，抓核燃料系统自力更生，过技术关，抓得较深、较细、较得力，作出明显的成绩。

雷荣天同志是山西孝义人，早年参加山西抗敌决死队，长期在军队工作。1955 年他从公安部经济保卫局调入地质部，担任铀矿地质局长。成立三机部后任副部长，仍然主管铀矿地质工作。他对业务也比较钻研，重视研究地质工作规律，根据发展阶段，提出指导方针，对我国铀矿地质勘探事业的发展有贡献。他对队伍管理较严，特别强调艰苦奋斗精神，这给大家的印象比较深刻。

钱三强同志是著名核物理学家，重原子核三分裂与四分裂的发现者。1948 年回国后，一直积极推动核科学研究事业。他是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首任所长。成立三机部后任副部长兼所长。他在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中，有独特的贡献。在普及原子能科学知识、培养推荐科学技术人才、建立

综合性核科研基地、引进和吸收外来技术、组织领导重大科技攻关和科技协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到了别人所起不到的作用。

我在二机部工作几年，深感二机部这支队伍素质好。党政领导干部大都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他们到了原子能事业部门，发扬战争年代那种“从战争学习战争”的革命传统，边干边学，在实践中增长了领导才干，有些人成为十分内行的领导者，出色地领导完成了各项建设和发展任务。科技队伍中有一批老科学家、老专家，他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在一些重大技术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一批年轻的科技人员，他们德才兼备，年富力强，思想敏捷，工作积极，是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在科技攻关和工程建设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工人队伍也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不但政治素质好，大都是党团员；而且技术素质也好，不少人怀有高超技艺，解决了许多加工技术问题。所有这些，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事业的胜利成功。

我在二机部工作，对干部和群众是信任和依靠的。但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对一些人思想政治问题的处理，也有不妥，甚至有错误的地方。如在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中，虽然在部机关没有错划右派的事，但是在基层院所，特别是在北京大学技术干部培训班，搞得比较厉害。各单位合计错划了 39 个右派分子，其中有一个刚从学校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后送到牡丹江一个农场劳动改造，最后死在那里，令人感到沉痛。在 1959 年反右倾斗争中，有 6 名局级干部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判。虽然后来我主张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都没有给他们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但是确实给他们在思想上造成很大压力，工作上也受到了影响。我是当时二机部党组书记对此当然负有责任。

1960 年，中央决定调我去东北局工作。总理问我，我走了以后，谁接我的工作合适，是否还从军队里找一个人？我说，从军队调人来可以，如军队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由刘杰同志接任部长也可以，请中央决定。后来报到毛主席那里，主席认为刘杰接任部长合适。中央也就这样决定了。

9 月，我要去东北了，临走前刘杰说吃顿饭吧，我说免了。后来，王鹤寿同志个人花钱在北京饭店请我吃了一顿饭。随后我就离开了北京。

第十七章　在中共中央东北局

1960 年 7 月上旬到 8 月上旬，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会议开始时我没有参加。中间，彭真同志通知我到会。我原以为是要汇报二机部的工作，便做了些准备。到北戴河后，彭真同志说，二机部的工作不要汇报了。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在各大区建立中央局，不成立政府。这是一项十分必要和适时的重大措施，准备派你去东北局任书记。并说，成立中央局，一方面可以使中央能够腾出手来更多地考虑国际和国内的全局性问题，更好地领导全国的建设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也更有利于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个地区情况的结合，加强具体的组织工作，促进各大区经济体系的建设和战略部署的完成。听了彭真同志的谈话，我感到大区的任务很重，中央对大区的期望很高，担心个人难以胜任，又考虑到在二机部工作几年，对原子能工业还是有感情的。因此，对到东北局工作有些犹豫，便找了贺帅、聂帅、罗总长等几位老总，向他们讲了我愿继续留在二机部工作的想法，他们也同意我留下来。嗣后，又找小平同志谈了我的想法。见到小平同志，他说，这件事不要再提了，毛主席已经定了，准备去吧。这样，根据中央的决定，我由二机部到了东北局。

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

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建立六个中央局是当年九月。开始，中央和我谈由我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任第二书记，黄火青、吴德同志为书记。后来经过我们的建议，十月下旬接到中央关于东北局组成人员的决定的电报。由我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任第二书记，马明方同志任第三书记，黄火青、吴德、黄欧东、陈锡联同志任书记，喻屏、强晓初同志任候补书记。东北局成员由十八人组成，除上述人员外，还有赖传珠、冯纪新、关山复、周桓、白潜、王新三、倪伟、李范五、赵林等同志。后来，顾卓新同志于 1962 年从国家计委调到东北局任书记。

关于东北局的工作任务，八月北戴河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局的时候，小平、彭真、富春同志都曾谈到过。他们讲了三条十四个字：工业支援全国；搞好农业；加强国防。十月北京会议期间，周总理对东北局怎样做工作又提出了十六个字：统帅一切，贯彻一切，承上启下，顶上护下。当时，东北局书记处的同志都感到任务很艰巨，工作是够我们做了。东北局第一次会议就议了这个问题。大家认为，从东北局来看，最重要的是“贯彻一切”，就是要根据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东北地区的具体情况贯彻执行。做到这一点，也就自然能够做到“统帅一切”。至于“顶上护下”，我的理解主要是要我们紧密结合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有些具体指示，在东北地区贯彻确有困难的，应当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建议，而不要机械地强性执行。这样做，正是为了使中央的路线、方针能在东北地区更好地贯彻执行。

东北局成立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在 1960 年 11 月初于长春南湖招待所召开的。为什么在长春召开呢？8 月中央北戴河会议上，小平、彭真同志找我谈话后，9、10 月间，我在黑龙江省委强晓初同志陪同下，到东北三省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了解一些情况。关于东北局机关设在哪里的问题，当时考虑，长春地理位置居东北地区的中心。经过研究，大家建议设在长春。后来，

周总理的意见还是设在沈阳，因为沈阳历史上就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所以，东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后，东北局机关就设在沈阳了。东北局一次全会之前，曾开过预备会议，中间，周总理把我、欧阳钦、黄火青、吴德四人找到北京，指示我们立即飞鞍山，在鞍钢召开会议研究部署保钢的问题。所以，原来预定在 10 月下旬召开的这次会议，推迟到了 11 月初。由于北京中央的会议上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使东北局第一次全会的思想更明确了，会议的内容也更充实了。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一是在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和三省省委多次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东北地区的形势，研究今后的工作方针、任务，特别是着重讨论农业问题，以贯彻中央关于农村政策紧急指示信为中心，安排当前的工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届东北局是在 1958 年建立的原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基础上成立的。原东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是欧阳钦同志。在东北局成立前的两年多时间里，东北协作区委员会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作了许多工作，为东北局的成立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准备了良好的条件。第一次全会再一个内容是讨论组织机构问题。关于国防问题，会上请沈阳军区曾绍山同志作了专题发言，留待以后的书记处会议讨论。

会上，我首先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对东北局工作的指示，然后由欧阳钦同志作了关于东北地区形势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黄火青同志作了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吴德同志作了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东北地区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及关于发展东北地区农业的十个问题的意见，并由我作了会议的总结发言。在总结发言中，着重讲了九个问题：一是形势问题。当时东北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支援全国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农业机械化已有初步基础，农村都已实现了公社化，正面临全面展开农业技术改造的新形势。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的发展与工业的发展还不相适应，轻工业的发展与重工业的发展及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还不相适应，特别是农业的发展用不上工业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已成为当前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当时也是逐步明确的，而且对这一方针的认识也需要不断提高，不断加深。在实行中必须把农业摆在重要地位，也就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地位。如果摆不适当，就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三个问题，是贯彻政策问题。那时提政策问题，是事出有因的，即“五风”。盛行引起来的。为了纠正“五风”必须坚决贯彻政策。特别是“共产风”，打击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地破坏生产力。必须严肃认真地遵照中央的政策，彻底纠正。第四个问题是作风问题。除“共产风”外，一些干部中的命令风、浮夸风、特殊风和瞎指挥风也是必须纠正的。纠正这些坏作风要对症下药，一个总的药方，就是加强群众观念，走群众路线。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要加强群众观念，走群众路线。没有这一条，就做不到实事求是，也不能密切联系群众，几种坏作风也难以纠正。五，工业问题。强调了在东北地区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前提下，工业的重要性并未减弱，任务并未减轻。相反的，东北地区的工业要进一步大力支援全国，这是头等重要的任务。彭真同志向我谈东北局任务时这是第一条。同时，工业还要支持农业，这也是一项繁重的任务。六，关于目前工作安排问题。东北局刚刚成立，全地区面临的工作很多。如生活安排、征购粮食、贯彻“农村十二条”、整　党整社、冬季生活和明年工农业生产

的准备工作、编制明年经济计划、基层选举、精简机构、压缩城市人口、接收移民等。工作任务是繁重的，都必须做好。当时东北局摆在最重要位置的是两项工作：一是安排群众生活，二是农村整党整社，通过抓这两项带动其它工作。七，加强国防问题。那时，东北地区，国防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工业支援全国，搞好农业，加强国防，是中央指示东北地区的三大任务。东北是一个战略地区，必须具备独立作战的能力。鉴于这个问题的特殊性与重要性，留待以后书记处专门讨论。第八，讲了东北局的组织和工作问题。东北局的工作机构是本着精干的原则建立的，全机关暂定编制 710 人。调配干部的原则也是既照顾中央局的需要，又不过多地削弱各省的力量，因为全地区的工作主要还是靠各省来做。第一次全会之后，经书记处研究确定并报中央批准，配备了东北局各部委的主要负责人：强晓初兼任秘书长，喻屏兼任组织部长，关山复任宣传部长，倪伟任计委主任，王新三任经委主任，冯纪新任农委主任，白潜任财委主任，冯秉天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关于书记处的分工，除由我负责全面领导外，欧阳钦同志负责常务和农业工作，马明方同志负责财贸和政法工作，黄火青同志负责工业工作，吴德同志负责宣传、文教工作，陈锡联同志负责国防、军事工作，喻屏同志负责组织工作，强晓初同志协助欧阳钦同志处理东北局书记处的常务工作。总结发言最后，讲了一个团结和学习问题。强调把国内工作做好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要做好工作就要加强团结，加强学习。在学习问题上，要采取认真的态度，深刻领会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领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把工作做好。

1965 年，东北局人事作了一些调整。鉴于赖传珠同志去世，白潜、冯纪新、关山复同志相继调离东北局，沈越同志任计委主任，倪伟同志任财委主任，喻屏和强晓初同志不再兼任组织部长和秘书长工作。东北局委员新增加了曾绍山、吴宝山、沈越、张树德、李治文、徐元泉、于林等七位同志。

总的说，东北局的班子是团结的，是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东北局的领导集体团结一致，齐心努力，同东北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一道，做了许多工作，成绩是显著的，为推进东北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我个人来讲，在指导思想上没有摆脱“左”的束缚，如在一段时间里强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工业方面“以钢为纲”等。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当时东北的工作有缺点也有错误。在我主持东北局工作的六年多时间里出现的问题，当然应该由我负主要责任。

恢复农业生产

东北局成立的 1960 年，正是我国从 1958 年开始连续三年“大跃进”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由于自然灾害和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工农业生产都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困难局面。以农业来说，全地区耕地受灾面积达七千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中，绝产面积 1800 万亩左右，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左右。全区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如辽宁省 1960 年的粮食产量仅 360 万吨，比 1958 年 700 万吨减少 340 万吨，将近一半，比建国初期 1949 年 405 万吨还减少 45 万吨。其它如棉花、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幅度减产。全区农业生产存在很多困难，口粮、饲料、劳动力、畜力、粪肥都严重不足。所以，东北局一建立就把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

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和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深入开展三反、整风整社运动，全面安排好人民生活作为中心工作来抓。

三年困难时期，东北城乡人民的生活是很困苦的。农村留粮标准之低，是解放后历年来所未有过的。全区 1957 年农村人均口粮留量是 514 斤，1960 年减到 232 斤，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五。辽宁省这一年城乡粮食销量比 1957 年减少 35 亿斤，下降百分之二十三点五。而副食品供应情况就更为严重了，1960 年辽宁城市人均猪肉消费量，包括特殊供应在内，只有 3 斤 8 两，而黑龙江省低到只有 2 斤 8 两，这里所说的都是市斤。不少农村，特别是辽宁省不少农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饥饿生病，死亡增加。城乡许多地方普遍发生浮肿病。为了能过上日子，保证灾区人民休养生息，保证群众维持正常的生产能力，东北地区各级党的组织根据中央提出的“低标准，瓜菜代”等方针，在安排人民生活方面尽了极大的努力。一方面采取发动群众，大搞代食品，适当扩大自留地，搞些小开荒，多种一些早熟作物，分段安排口粮，及保护和复壮耕畜，并合理安排城市粮食销量等措施；一方面及时向中央反映东北地区的粮食紧张状况，进一步争取国家的支援。困难时期，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东北地区粮食问题，一直是很关心的。1960 年 10 月，周总理在中央

召开的会议上，参加东北组讨论时就指出，粮食产量不要估得太高。当时我汇报黑龙江是 186 亿到 190 亿斤，吉林是 116 亿到 120 亿斤，辽宁是 90 亿斤。周总理当即就说按低的标准算，合起来是 392 亿斤，按高的算我不放心。在问到黑龙江当年要向国家调出 34 亿斤，吉林调出 16 亿斤，辽宁调入 30 亿斤后，总理担心地问道：各省是否能安排下，特别讲到黑龙江 4 月以后，粮食是不是要紧张？并说，过去说保证不饿死一个人，现在看一看，真使人心中不安。应该说三年困难时期东北地区向国家调出的粮食是比较多的，特别是黑龙江和吉林两省调出大批粮食，帮助国家克服困难。如黑龙江省 1959 年调出 35 亿斤，当年库存还有 20 亿斤，

1960 年农业遭灾大减产的情况下，这 20 亿斤库存粮又调

出去了。由于粮食调出的大苦，1961、1962 两年东北地区的粮食状况非常紧张。黑龙江省 1962 年春天农村缺粮 15 亿斤。那几年，仅大牲畜就死了 70 多万头。当时，不少群众写信给中央，反映黑龙江的情况。我们抽调了一批原籍黑龙江

省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用探亲的名义回乡调查，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写了不少调查报告，有些报告送给了中央。记得周总理看了 19 篇调查报告，对黑龙江的粮食情况非常重视，找李范五去北京专门汇报粮食情况，具体研究黑龙江

的问题。并说，如果过去早点下去摸摸，情况会知道的早一些。 1960 年北戴河会议已经意识到粮食有问题，但大家不承认，结果把真实情况掩盖起来了，黑龙江和四川就是 1960 年下半年调苦了。总理还作自我批评说，对这两个地方，我们犯了个大错误，不管我在这个错误中占多大分量，总是不对的，这两年我认识不到，深受其苦。其实，吉林和辽宁两省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辽宁省的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更为严重的。1960 年末，东北局书记处在沈阳三经街开会，研究辽宁农村粮食问题，当时的紧张状况使会议开不下去了。我立即给李富春同志打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报告情况，请求中

央紧急调拨粮食。富春同志也不好办，说工业上的问题还可以解决一些，粮食这样的事得找小平同志。会后，我们立即派马明方、强晓初同志去北京，向总理、少奇、小平等同志汇报。那时，辽宁农村 1 至 9 月份每人只有 120 斤粮，有的还不足 120 斤，浮肿是普遍现象，盘山县情况最为严重，报告死了许多人。朝阳、北票、建平也死了不少人。中央答应紧急调运 2 亿斤粮，这 2 亿斤粮食，当时可是解决了大问题，不然真不知道要多饿死多少人。

如何使用好这 2 亿斤粮食，主管财经工作的马明方同志为此花费了很大的心血。他几乎天天算过来算过去，筹划这部分粮食的分配方案，认为主要应当用在春耕大忙时节。经过反复周密的计算，提出冬闲时一天补助 3 两，实行“瓜菜代”，春耕时一天补助 1 斤到 1.5 斤。到 1961 年秋收时，我又一次来到沈阳郊区的闵家窝棚，看到那里的情况有了明显变化，庄稼收成很好，农民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实践证明，东北局采取的上述措施，是行之有效的。

缓解粮食紧张状况再一条重要措施，就是加速压缩城市人口、精简职工，减少城镇粮食销量。这不仅是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措施，而且也是调整国民经济关系的重要措施。东北地区有组织有领导地动员还乡，基本上是从 1961 年 6 月开始的。5 月以前，全区减少城镇人口 51 万，大多数是自动离职的。当时，中央要求东北地区在 1961 年和 1962 年压缩城镇人口 360 万，要求精简职工 225 万。到 1962 年 5 月，全区共压缩城镇人口 262 万，精简职工 220 万。此后，又继续压缩城镇人口 80 多万。两项数字接近完成中央的要求。经过精简和压缩，使城镇人口比例得到下降，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减少了城镇粮食销量。仅 1960 年下半年就少销粮食 3 亿斤，减少工资等项开支近 4 亿元。

由于采取和实行多种措施，加上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军民同心同德，共渡难关，所以，尽管是天灾人祸，生活艰难，但是人心还是稳定的，社会秩序也保持了基本稳定。最根本的是避免了人口的大量死亡和逃荒，这就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逐步恢复和发展。

六十年代初，党中央为了解决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针对当时农村人民公社中破坏性最大的“共产风”，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在东北地区农村人民公社中，同样存在紧急指示信所指出的问题。在执行政策方面，“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在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后，许多地区仍然是时起时伏，此起彼伏。特别是在上海会议后，由于在农村所有制过渡问题上的超前设想和为创造过渡条件，各地方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使得“共产风”比 1958 年更为严重地泛滥起来，破坏了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损害了大集体下的小自由。有些机关、企业、学校占用公社的土地、劳力、畜力等，用许多名目掩盖“一平二调”的实质，我到辽宁、黑龙江农村，群众对此反映很强烈。肇东县姜家公社群众编成顺口溜：“管理区有啥，公社要啥。公社用啥，就来调啥。轻的调一半，重的连根拔。”富锦县的群众说：“办工厂”调原料，调车马带绳套，办食堂调锅灶，大搞水利调木料，畜牧场调土地，银行扣款当储蓄，交通设厂调机器”。在干部作风上，“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和“瞎指挥风”比较普遍地存在，甚至放“假卫星”。群众对这些坏作风最为痛恨。辽宁铁岭县大讥河群众作了一首诗讽刺说：“种地不由民，生产乱调兵，草比苗还高，还喊产万斤”。“五风”对群众生产积极性和农村民主生活危害最大。中央紧急指示信的贯彻执行，成为解决当时农村生产

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存在的问题，调动群众积极性，保护和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

1960 年 11 月，毛主席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中提出：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个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并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 1961 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1961 年 3 月广州会议上，中央又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为的首要准则。为了解决东北地区农村在执行政策上存在的各种问题，东北局书记处为贯彻广州会议精神，研究确定：除在工业、商业、教育等工作方面进行调查外，在农村工作方面，主要调查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指示信和试行人民公社六十条中的问题。特别是反对两个平均主义中的问题以及农村商业和手工业问题。4 月，我带领两个调查组到辽宁阜新市进行工、农业两方面的调查。欧阳钦、黄火青、吴德同志分别就近到黑龙江的宁安县、辽宁的盖平县和吉林的农安县进行农村调查，同时也结合研究工业方面的问题。马明方和喻屏同志去大连进行财贸和党的组织及干部工作的调查。东北局机关的正副部长也大部分带工作组下去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活动，仅东北局机关就组成 31 个调查组，有 139 人参加。我和冯纪新等同志在阜新农村进行调查，先后于 5 月 9 日和 14 日两次写信给毛主席反映农村工作情况。仅就记忆，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一个是食堂问题。我所去的阜新县富荣镇公社，大多数食堂办得不好，群众意见很大。不少食堂停伙了，没停伙的也难以为继。基本问题有两个：一是吃不饱。富荣镇六家子大队共有 3 个食堂，早午两餐每顿只能吃到一个不足 4 两粮的饽饽，汤菜不多，晚餐喝稀的，没有菜。多数食堂代食品原料已用完，代食品也没得吃。如果社员把粮领回家，掺一些野菜、榆树叶之类或有一点咸菜、大酱，比在食堂还能吃得饱一点；二是“三沾”受不了。炊事员、管理员、粮食加工员等多吃多占，社员吃不到应得的口粮，群众极为气愤地说：“一天 8 两粮，吃到肚子里 7 两就差不离”。此外，群众对办食堂不便于养猪、养鸡也有不少意见。办食堂，把柴草都集中到食堂，不让群众在家做饭，病人、老人和妇女、孩子都不方便，尤其是冬季天冷不能烧炕，群众意见最大。这个富荣镇公社 3 月份还有 73 个食堂，入伙人数 7600 多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一。进入 5 月，只剩下 4 个食堂，入伙人数只占百分之一点九。生产队干部说：“食堂办也不好，不办也不好，群众不愿办，上边硬让办，队干部真难办。”至于如何解决，当时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思想不解放，所提出的意见仍然跳不出管理工作的范围。实际上，办食堂是脱离群众生活和生产实际的，既不利于生产，又不方便生活，许多食堂停办是实事求是的，是有道理的。再一个是实行供给制问题。以经济水平中等的富荣镇土地营子生产队为例，1958 至 1960 年 3 年来，供给部分的比重，1958 年是百分之五十三点六，1959 年是百分之六十九点四，1960 年是百分之六十点七。由于供给比例过大，劳力强、工分多的社员收入不多，劳力弱、工分少的社员收入不少，破坏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所以，正确解决社员收入中供给制部分，是纠正社员之间平均主义的重要环节。第三是关于牲畜问题。调查中，感到突出的是保护畜力的问题。对此，困难时期一般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致因饲料不足、饲养不好，牲畜普遍瘦弱，冬季寒潮一来，有不少地方死了牲口。

所以耕畜保膘复壮是个大问题。我在农村调查见到有些生产队对牲畜饲养已建立了奖励制度，但是责任制尚未普遍建立，特别是没有把责任落实到个人身上。对此，我在几个地方和干部、群众交谈，或在一定的会议上，提倡生产队或社员饲养要建立责任制和使役、饲养、繁殖奖励制度，对散牛、猎、羊的饲养，改变过分集中，多下放给社员分散饲养，这样可多积肥，群众的饲养积极性也高。当时，许多同志都赞成这个意见，认为我对这件事抓得好，我也开玩笑说我到处“吹牛拍马”。可是“文革”中间，这件事却成了我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的一条罪状。我向毛主席反映的情况还有一个林木问题。我到阜新、朝阳、锦州几个地区，都没有见到成片的成材林，荒山不少，零星的林木各地都有，但树木破坏很多，树皮被剥光了。群众房前屋后和自留地里的树木却完好无损，这说明和所有制不无关系。有的则是管理的问题。我建议对树木分别情况确定所有制和合理的育林政策。还提出，东北地区荒山、河滩不少，划定自留山，群众极为拥护。实行自留山政策，不要几年，荒山就可以长出“毛毛”，既可以保持水土，又可解决部分烧柴。在农村调查的基础上，东北局集体讨论时，大家针对东北农村的具体情况，归纳出十二个字，就是治山治水，植树造林，养猪积肥。后来不少地方在这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文革”中，这一条也被批判是违背了毛主席的“八字方针”。

之后，强晓初、徐元泉同志带了一个组到东北三省的平原地区进行调查，他们认为平原地区只搞农业不行，要搞多种经营，要搞林木，搞手工业。东北局听了汇报后，赞成他们的意见。

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确实像毛主席讲的，领导上做到了心中有数，工作起来“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东北农村经过整风整社，坚决兑现了各项政策，干部作风改进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过日子的心盛了。铁岭县大汎河公社经过整风整社，群众有了干劲，一个多月修了 2000 多间房子，外流的 2700 多人，有 1200 多人还乡。群众说，东北农村贯彻十二条和六十条后有三大高兴：一高兴能大搞生产了，过去嘴上讲干劲，心里没干劲；二高兴日子好过了，“共产风把心吹散了，贯彻政策把心又聚起来了”；三高兴干部作风转变了，百姓过去躲着干部走，现在和干部并肩走。总之，党和群众共渡难关，战胜灾荒，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农村的面貌为之一变。

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1960 年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在讨论经济工作中，通过了《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在这次会议过程中，原苏联政府突然单方面宣布召回苏联专家，撕毁经济合同，严重地打乱了我国的经济建设，使我国的经济生活面临更大的困难。面对原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行为，全党全民非常气愤。会上，一些同志提出要炼“争气钢”，争取当年生产钢 2000 万吨，提前实现钢产量赶上英国的目标。所以，11 月东北局成立后，便以保粮、保钢为中心，大力组织全地区的增产节约运动。工业保钢，东北地区自然是重点之一。因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东北地区已经建立了一系列的新工业部门和现代化的骨干企业。其中，已经有了由鞍山、大连、本溪、抚顺、富拉尔基等大型钢铁企业组成的强大钢铁工业和由抚顺、阜新、本溪、北票、通化、辽源、蛟河、鹤岗、鸡西、双鸭山等大型煤矿组成的强大煤炭工业。 1959 年钢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二点九，生铁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九，煤炭占百分之二十五点四，原木占百分之四十点一，可谓

举足轻重。所以，中央对东北地区的生产状况非常关心。10 月，在中央保钢、保煤电话会议上，富春同志指出，像鞍钢这样的大型钢铁企业，虽然产量有所上升，但还不稳定，还没有真正好转。特别是抚顺、阜新大型重点煤矿，生产情况还不很好。要进一步加强生产调拨，保证重点企业、厂矿的生产。要求辽宁、黑龙江等工业省份主管工业的负责同志，深入到重点厂矿中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特别指出，鞍钢除了袁振同志，还有省委的杨春甫、李东冶和冶金部的吕东同志都在那里，无论如何要把鞍钢生产搞上去。到了 11 月下旬，全国钢、铁、煤、运都出现了生产逐日下降的严重情况。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中央又于 12 月初发出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指出，当年能不能完成 1860 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外瞩目的一件大事，是个政治问题。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抓紧时机，克服困难，集中力量抓煤、钢、铁、运，把钢的生产水平突上去，确保工业的继续跃进。东北地区按照中央的紧急指示，首先把抓煤炭生产作为中心环节。因为煤上不去，钢也上不去。煤炭生产不仅决定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而且还关系其它重轻工业、交通运输和人民生活的安排。经过各地区、各部门的积极努力，可以说是千方百计，东北地区接近完成这一年的原煤和钢、铁生产计划。全区共生产钢 820 多万吨，生铁 778 万吨，原煤 9646 万吨。

1961 年 1 月，党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全会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由于从 1958 年开始，连续三年大炼钢铁，各项生产指标定得偏高，造成国民经济各项比例严重失调，1960 年则更为突出了。1961 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出现了严重滑坡，各项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大幅度下降。特别是煤炭生产，由于连年过量开采、造成采剥、采掘比例严重失调，到 1961 年，几个主要煤矿的煤炭产量都大幅度减产，生产用煤严重不足，许多企业被迫停产或半停产。停产的企业只能发保温煤来保护机器。为了摸清情况，力争生产水平不再下滑，东北局和各省都成立了煤、木、运领导小组，具体掌握和领导广大职工开展以煤、木、运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并抓紧设备维修，采取措施，解决具体问题，扭转生产局面。针对煤、木、运的紧张情况，各地大力发动群众把积压的煤炭、木材抢运出去用到生产上。这一年的元旦和春节，煤矿的广大职工和干部都没休息，坚守生产岗位。在年初中央工作会议上，黄火青同志汇报了东北地区煤炭生产问题。当时李富春同志讲了几条很重要的意见：首先强调要整顿和维修现有的煤矿，恢复科学的采掘方法，解决短途运输和设备维修所需要的器材问题，增加掌子面的设备，先把旧井搞起来。还帮助安排抓紧建井的收尾工程和建设新井。那一次包括续建和新建在内，中央给东北投资大约一亿元。这期间，东北局和各省都加强了对工业生产，特别是煤炭生产的调查研究。年初，由强晓初同志负责组织有关同志进行调查，起草关于工业工作的十二条。3 月，我带领工作组去阜新，有杨波、李东冶等东北局、辽宁省委和阜新市的有关同志参加，继续组织完成阜新平安矿工作十二条的制定工作。这个十二条是仿照农业十二条搞的，内容包括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行奖励制度，提倡小包工等。当时效果比较明显的是实行奖励制度，如超额奖励，回收坑木奖励。奖励的数目并不大，但是当时受到工人的普遍欢迎，对于调动群众积极性，促进生产起了很大作用。

这年 2 月，周总理曾亲自到沈阳，对以煤炭为中心的工业生产进行了安排。从 2 月 23 日至 25 日三天时间里，周总理不顾疲劳，在北陵休养所，连

续召开八次大小会议，有五次会议是总理亲自主持召开的。他认真地听取我们和三省领导同志关于工业生产情况的汇报，主持研究东北地区煤炭分配方案。在他亲临指导下，全区开展了抢运落地煤的增产活动，这对缓解煤炭紧张状况，使大批停产和半停产的企业恢复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2 月 25 日，周总理回京前，在东北局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作了重要的讲话。总理充分肯定了东北三省在支援全国建设上所作出的成绩。他说东北不仅在大灾之年用粮食支援了全国，东北支援全国的方面很多。我曾经跟东北局和三省的同志谈过，全国最基本的工业在东北。如煤炭、钢铁、木材、石油、电力、运输、机械、化工等，可以数得上十项。在最主要原材料工业上，东北可以说是全国之冠，这说明东北也是以工业支援全国。当然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如果没有全国的支援，如果国家不在东北首先投资，也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总理讲话中还指出，从十一年的发展看，东北的发展不是那么平衡，也不能净搞原材料工业，你们生活资料就不够，农业经济作物比较少，工农业比例相差太大了，当然这是为全国的要求发展起来的。经过三年大跃进，出现了新的不平衡，这个问题必须进行很好的调整。所以，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东北也面临着这个问题，也就是东北地区和全国一盘棋怎样配合得好，这是个大课题。

5 月中旬，为了推动和抓好以煤炭为中心的工业生产，东北局转发了阜新平安煤矿工作十二条（草案）并将这个文件同时上报中央。阜新平安煤矿工作十二条的特点，是从调动职工群众和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出发，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入手，主要着眼于解决企业管理中最迫切的、带有政策性的问题。在平安矿宣传实行十二条之后，职工积极性和生产水平都有提高。十二条虽然是在阜新平安矿调查写成的，但它接触到的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因此，当时强调在其它企业中也可以试行。当然那时搞的十二条，对解决工业企业中的问题，也只是个开端，有些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后来中央有关部门又经过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并征求了各大区的意见，形成了更为完整的工业工作七十条。

东北局从 1961 年初，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精神，一直到 9 月贯彻庐山工作会议精神，主要是围绕调整国民经济这个主题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在 6 月召开的东北局第二次全会上，全会决议在经济工作中要坚决实行农、轻、重的方针，有计划、有步骤、按比例地调整、缩短重工业战线，拉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首先要抓减少城镇人口的工作。全区在三年内，力争在 1960 年城镇人口 2300 万人的基础上，减少 300 万人。这一年，全区城镇人口减少了 158 万人，城镇人口由原来的百分之四十二点八，降到百之四十点八。在调整、缩短重工业战线上，除煤炭、石油、农机、农药、化肥等急需而又发展不足的工业，需要适当建设发展外，其余各项工业都要适当缩减，放低发展速度，集中力量提高质量，确保重点的急需产品。关于拉长轻工业战线，从东北地区实际情况出发，主要是发展人造纤维合成纤维等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特别是生活上急需的各种日用工业品，保证人民生活的最低需要。

7 月，小平同志来东北视察，我们书记处同志向他汇报经济工作时，小平同志说，有几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无非是农轻重关系和城乡关系问题，看来只照顾一头都不行。他首先讲了以鞍钢为代表的重工业。指出，鞍钢不保，八大品种不增加，一切都上不去。所以，保鞍钢是个战略问题，能早上去一

天都好。现在讲农轻重，农和轻是上，重是下，但也要保证逐步地上，逐步地下。现在看来用三年时间进行调整是不够的。小平同志还谈到为了搞好企业管理，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企业问题的解决要从“几定”着手，否则工交企业整风也整不出名堂，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搞好了“几定”，城市减人和供应等问题也随之解决。后来薄一波同志也指示我们搞好“几定”的试点工作。小平同志指示后，东北地区在 27 个企业中进行了试点。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进一步了解了企业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对企业的生产能力、设备、经营管理、人员、职工生活等状况摸了底，在摸底的基础上，搞出了“几定”的初步方案。在“几定、几保、几奖”和建立责任制方面都取得了具体成绩，有力地推动了企业整顿。“几定”工作，在当时确实成为解决企业问题的钥匙，受到广大干部和职工的热烈拥护。

1961 年，东北全区经过一系列的艰苦工作，以煤炭生产为中心的工业生产，在上半年得到了初步的稳定。但是，从全年生产情况看，虽然经过调整计划，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比前一年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全地区共生产原煤 6744 万吨，为 1960 年实际产量的百分之七十左右。钢 387 万吨，生铁 415 万吨，均为 1960 年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木材 905 万立方米，为 1960 年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实现铁路货运量 1.5 亿吨，为 1960 年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在工业企业调整方面，据当年全区 11 个工作部门统计，共关停并转 1083 个。其中，中央企业 45 个，地方企业 1034 个。由于那时我们对于工业战线必须后退，工业不退够，不松动一个时期，国民经济就难以调整，就不能健康、协调地发展，在认识、理解上还不深刻。所以，当年的工业生产指标仍然们高，在执行中间又不得不再进行调整。

传达贯彻“七千人大会”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以及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七千多人，大家习惯地称这次会议为“七千人大会”。这是我们党在执政后召开的一次空前规模的总结经验大会。中央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 1958 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工作中发生的“左”的错误，通过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战胜困难。

“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1961 年 12 月 20 日至 1962 年 1 月 10 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为“七千人大会”做准备。我记得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曾讲过，明年这一年的工作很重要，这次会议要好好议一下过去的经验教训，要有个统一的看法，要步调一致，以便在这个基础上前进。大会从 1 月 11 日开幕，原定 1 月 28 日结束，因为讨论和修改少奇同志的《书面报告》用的时间较长，毛主席针对会议的讨论情况，又提出了开“出气会”的建议，所以会议延长到 2 月 7 日闭幕，连春节在内，共开了 28 天。这次会议有两个“高潮”：一个是讨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书面报告》。少奇同志在会上没有宣读他的报告，而是从国际和国内形势、集中统一和党的作风四个方面作了具体深入的解释和补充。会议的第二个“高潮”是开“出气会”，让大家把憋在肚子里的话全讲出来。为了开好“出气会”，毛主席提议让大家在北京过春节，并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1 月 30 日晚上，毛主席在各中央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对如何开好“出气会”作了指示。从 1 月 31 日到 2 月 7 日，主要是召开小组

会，让大家对省委、中央局和国家机关、中央机关提批评意见。许多负责同志也在会上发言，对工作中的失误进行自我批评。2 月 7 日会议即将结束前，我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剧场东北地区全体会议上作了一次发言。主要就东北地区的问题讲了关于民主集中制和发扬民主的问题。当时我讲，东北局成立一年多来，在中央的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但作得很不够，主要工作是靠各省做的。东北局研究下边的东西不多。听的看的都不够。并联系我个人刚到东北时的情况，那时对东北地区的形势，特别是农村的灾情和生活困难是有认识的，对搞代食品等发动群众渡荒，注意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和指导各省的工作。对工业形势的认识就差一些，我到东北就是带着高指标的劲头来的。　1961 年 2 月，周总理到东北视察时，我还想把煤炭多搞上去，钢也多搞一点，当时，欧阳钦、黄火青、吴德同志都认为指标定的高了，我感到还可以。那时总理帮助我们想了一些办法，请军队调车帮助抢运落地煤。4 月，我到阜新作了些调查，6 月，小平、一波同志来东北视察工作，分析了形势，我才感到按原来设想的高指标，不仅煤不行，钢也不行。如果我不去阜新调查一番，认识也不会变化这样快。这件事说明听进人家的意见并不容易。就是调查研究，不发扬民主也调查不好。我以前到阜新、朝阳调查公社办食堂，一间群众食堂管理、生活状况好不好，都说好。贯彻“十二条”、“六十条”以后去调查，我向他们说，你们讲出心里话，保证不戴帽子。一小队长听了后说，我当干部别的都不怕，就怕办食堂。这就看出，不发扬民主，人家就不能说真话。总结经验不发扬民主，不走群众路线，也是总结不好的。　1961 年最困难，比 1957 年难过得多，粮食少，死了一些人，可是没有出大问题，没有出“皇帝”。除了农村政策十二条和六十条起作用外，和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是分不开的。这一条经验是应该很好地回忆、总结的。记得我还讲了一个故事，1943 年我在冀南救灾，从冀鲁豫根据地借了 750 万斤粮，运粮有困难，派干部带领灾民去运，开始群众叫他们是什么书记、什么队长，经过一段工作之后叫他们什么同志，又过了一段，群众就叫他们老张、老赵了，最后，便是送给他们一个绰号叫什么“老母鸡”，他们和群众的关系成了母鸡和小鸡一样。这四个阶段称呼的变化，反映了干部和群众关系的变化。历史经验证明，只有真正和群众在一起，什么困难都能克服的。我们要把这种优良传统保持下来，这是最可宝贵的东西。

我在发言中还讲了加强全局观念反对分散主义的问题。冻北的特点有四多：东西多、调出的多、困难多、同各方面的关系多。我借用成语“酒色财气”来比喻：“酒”是指粮食，“色”指工业产品的花色品种，“财”指的是物资财富，“气”指的是财大气粗的作风。东北“酒色财气”多，容易不谦虚，出分散主义。所以一定要警惕，要增强全局观念，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次发言，实际是个人参加“七千人大会”的一些感受和体会，也是帮助大家消化会议精神，并欢迎在贯彻大会精神过程中，对东北局的工作提出批评。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东北三省省委和东北局机关分别从 2 月中旬开始，按照中央规定的范围，组织了传达和讨论，并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安排了当前工作。全区听到传达的党员干部接近 47000 人。广大干部听传达后，反应十分热烈。一致认为这次会议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给全党作出了典范。特别是少奇同志的报告，对建国 12 年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

成就、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基本经验教训，作出了全面、深刻、系统的总结，使大家深受教育，提高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增强了信心。从各地传达讨论后的实际情况看，党内的民主生活开始走向正常并趋向活跃，广大干部的政治积极性有所提高。在讨论中，各地也有一些干部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意见。有的人认为，总路线表述的不够严密、完整和具体，讲的都是主观方面，缺乏科学性。认为几年来发生这么多的问题与此有关。有的说，几年来大炼钢铁，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得不偿失。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提早了，平均主义就是从这里来的。有的同志更直接了当地说，少奇同志的报告成绩谈得多，缺点错误谈得少，农业上，这几年成绩不一定是主要的，可能是次要的，不是三七开，至少是对半，也可能是倒四六。这几年发生的问题，虽然不能说是路线问题，但也不是具体政策问题。也有的人担心说，别看现在纠“左”，谁知道还会不会反右，党内“左”比右好是有历史根源

的。

这次会议的传达贯彻，不仅规模大，各地都本着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让大家畅所欲言，并允许保留个人的看法，党内民主生活是空前活跃的。在传达过程中，东北局书记处

主持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三省省委常委也都分别召开会议，进行交心，并通过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几年来的工作，研究和总结经验教训。

在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过程中，中央政治局于 2 月

下旬在少奇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后来称西楼会议。这次会议对克服当时的经济困难起了重大的作用。

会后，中央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东北局于 3 月末到 4 月初召开书记处会议，集中讨论了中央指示和陈云等同

志的讲话，并就东北地区的经济形势交换了意见，研究了贯

彻中央指示的措施。那时大家都认为中央指出的经济上正

处在一个非常时期的估计完全符合东北的实际情况。我们必须认真正视当前的困难，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各项紧急措施，力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尽最大的努力。

关于当时财政经济的困难情况，陈云同志认为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四、城市的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在物资少、钞票多的情况下，出现了相当多的投机倒把现象；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陈云同志还提出六条克服困难的措施。当时财政经济的这些困难情况，东北地区不仅无一例外，有些困难的严重程度还更为突出。

在农业上，几年来由于估产过高，征购任务过重，加上“五风”和连续两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元气受到损伤，生产力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以 1961 年和 1957 年比较，劳动力减少了 200 多万人，耕畜减少 45 万头，而现有耕畜中，瘦弱耕畜占三分之一。此外，化肥、农家肥、中小农具、优良的早熟作物种籽也大量减少，这就造成农业生产水平大幅度下降。全地区粮食产量由 1957 年的 374 亿斤降到 269 亿斤。由于征购任务过重，生产力受到损伤，造成生产下降的情况，尤以重点产粮区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特别是黑龙江省

更为严重。贯彻农业十二条和六十条之后，农村情况有所好转，但各地的情况极不平衡，不少地方生活安排不下来，缺粮地区面很大。全区的突出困难县约有 40 多个，而且都是重点产粮区。有些地区浮肿病还在发展，仅辽宁省就达 30 多万人。如果对这些困难情况认识不足，对生活安排问题解决不好，工作不深不细，措施不力，播种面积还会减少，粮食产量不但难以增长，还有低于 1961 年的危险。

从财政、金融、市场状况看，困难更加突出。东北地区职工人数多，工资总额占社会购买力的一半以上，加上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吃、穿、用的商品严重不足。如果不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增拨一些原材料，多生产一些商品，并尽可能多地调入一些商品，市场供应紧张状况势必继续发展，通货势必继续膨胀，就将更加危及工农业生产和城乡人民的经济生活。

就建设规模和工农关系来看。工业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农业所能承受的程度。1961 年工业产值虽有下降，但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仍占百分之八十三。城镇人口虽经压缩，在总人口中仍占百分之四十以上，平均一个半农村人口要供养一个城镇人口。城市的粮油和其它副食品供应非常困难。

对这些实际存在的问题，通过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特别是讨论陈云同志的讲话，大家认为，必须看透估足，绝对不可以盲目的乐观，把矛盾掩盖起来。否则，问题一但突发，就将措手不及处于被动。

为了克服东北地区当时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困难，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东北局书记处讨论认为，必须从长远着眼，从当前入手，坚决执行农、轻、重的方针，把解决吃穿用问题抓住，把农业和市场放在第一位，千方百计地增加农业和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当时我们提出要特别抓好两个环节：一个是稳住，一个是刹住。首先把农业生产稳住，在稳住的基础上，力争 1962 年有个较好的收成；其次在财政、金融、市场方面要刹住，千方百计地控制开支、少发票子，增加商品，在刹住的基础上，力争 1962 年收支平衡，在可能条件下达到略有回笼，扭转企业亏损局面。后来的实际情况证明，这两个目标基本上实现了。特别是农业方面，全地区粮食总产量达到 1479 万吨，比 1961 年增加了 202 万吨。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中央在 1961 年就发过通知。1962 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再次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当时东北局和三省省委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也都一般地作了部署。1963 年 2 月 11 日我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上重点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城市“五反”问题。毛主席在会上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河北保定地区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的经验。后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称为“四清”运动。毛主席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我当时觉得毛主席的意见是对的，决心也很大，看来社会主义教育这篇文章是应当好好地作一作了。

东北地区有的地方的社教在 1962 年冬就已经进行。辽宁省锦县县委在 1963 年 3 月将全县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向锦州市委、辽宁省委和东北局写了报告。这个县的社教运动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采取领导干部讲和群众自我教育相结合的方法，着重对群众进行阶级教育，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解决了群众中的许多思想问题，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我觉得锦县的做法很值得推广。3 月 27 白东北局转发了锦县的材料，批语中肯定了社教运动

坚持正面教育的做法。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东北局对东北地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作了进一步部署。为了取得经验，派东北局农委副主任褚凤岐同志带人到辽宁省锦县余积公社蹲点。运动搞了一段之后，各地在工作中普遍地注意了对群众进行正面教育，特别是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有的在试点中还取得了一些经验。我们几位书记认为坚持正面教育是社教运动必须坚持的重要一环。4 月 10 日，我以个人名义，给毛主席和中央写了一个报告，主要汇报了两个问题：一是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坚持正面教育、群众自我教育问题；二是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的问题。毛主席认为我的报告所讲的问题值得注意，决定转发。5 月 2 日，主席写了批语，批转了河南省委和我的报告。批语讲到我的报告时说：“宋任穷同志所讲的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指出：“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有很多的地、县、杜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1963 年 5 月 2 日，我到杭州参加毛主席召开的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和陈伯达、胡耀邦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研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讨论通过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在讨论修改这个文件过程中毛主席几次讲话反复启发我们统一对社教的认识，明确社教的要点。主席说：“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劳动这样一套。”在会上，主席还表示对我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的“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话感兴趣，这也说明主席当时还是很强调阶级斗争的。会上主席先后批示过的 20 件材料，作为这个《决定》的附件（我给主席写的报告作附件之二印发）。11 日晚主席思考社教问题一夜未睡。12 日早 5 时 40 分，主席找我们六个大区的书记去谈问题。他再三叮嘱我们不要急，注意总结经验，“不要一哄而起，不要打无把握之仗。”主席还说：只要我们注意掌握正面教育，分期分批试点，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和干部，干部要洗温水澡，要帮助干部下楼。要划清界限，有强的领导，就可以搞好。杭州会议之后，东北局于 5 月下旬召开了全体委员扩

大会议（也称三级干部会议）。会议后半段，县委书记、大企业党委书记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解决对社教的认识问题（尤其是地县两级）和是否抓住了社教的要点及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的问题。这次会议之后，各地都按毛主席的指示和《前十条》的精神，重新安排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试点工作，先后在东北地区的 26 个社、队进行了试点，三省省、地、县三级派出的工作队有 6200 多人。东北局和三省省委的一些负责同志参加了试点。我在会后也到锦县的余积公社蹲点。回想起来当时我们东北局和省委负责同志对社教都是持认真谨慎的态度，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为了交流社教试点的经验，7 月 5 日东北局在辽宁省锦州市召开了八个试点单位的经验交流会。我主持了会议，候补书记强晓初也参加了会议。在座谈会上我们强调试点单位的搞法无论是先进行阶级斗争还是先搞四清，阶级斗争要贯彻运动的始终。我们还特别强调要依靠基层组织，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提出不要把干部抛在一边，要帮助干部洗澡下楼，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实事求是，

要历史地全面地看干部。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群众的问题上，我们特别明确指出；要分清两类矛盾，运动中不要整群众。在讨论运动中若干政策时，对干部的贪污退赔问题、对盗窃投机倒把问题，强调要实事求是，注意掌握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政策。这一时期的运动虽然在指导思想上比较“左”，因处于试点阶段，大家都比较谨慎，大多数单位搞的还是比较稳的，运动没有出现大的波折。根据中央的指示，东北局于 3 月成立了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领导小组，马明方同志任组长，顾卓新同志任副组长。县以上机关和工交财贸部门相继开展了五反运动。

1963 年 9 月 6 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针对前一段试点

中有些地方发生的违反政策和简单化的偏差，会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

案）》（即《后十条》）。我们都感到《后十条》中关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的规定，与我们前一段运动中

的思想是比较合拍的。

随着运动的进展，从得到的信息中我逐渐感到，中央有些领导同志对形势和农村阶级斗争现状的估计上有了变

化。 1964 年 5 月我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已不是去年讨论《后十条》时强调团结两个 95%的那种气氛了。毛主席在会上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基层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千里。刘少奇同志说：四不清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而危险性在于上层。当

时与会同志也都同意这样的估计。都作好了城市农村社教要搞 4、5 年的思想准备。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主席和少奇同

志连续对社教运动作出指示，强调领导干部要下去蹲点，提

出四清不只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而是经济、政治、思想、组织

四个方面的问题统统要搞清。并要求省、地委集中搞一个县。

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东北地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 7 月开始全面展开。全区农村第一批进行系统社教的

有 12 个县，另 5 个公社、4 个大队。城市开展 232 个单位。

各县成立工作团，公社成立工作队。工作团有省委领导同志

任团长，东北局、省、市、县都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万人工作团。我带东北局农委、财委的部分同志到辽宁省金县三十里堡公社蹲点。马明方同志到沈阳五三厂、顾卓新同志到沈阳七二四厂蹲点，黄火青、吴德、强晓初同志也都到农村蹲点。9 月 18 日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舰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简称第二个《后十条》）。这个第二个《后十条》对形势估计更加严重，认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强调有些地区还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这个文件改变了前一个《后十条》中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明确提出对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要在扎根串连、调查研究以后，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能依靠的就不依靠，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因此，运动一开始“左”的倾向就较为突出，运动中温度不断升高。9 月 1 日以后中央连续转发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园经验》）、《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的指示》和谢富治在沈阳冶炼厂蹲点的报告等文件，这些文

件对促使运动向“左”发展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时期，东北地区的“四清”运动搞得也比较“左”，各工作队（包括我蹲点的地方）把基层干部的问题看得都很重，把干部甩在了一边。

年末，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后，中央发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虽然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当时我们对于这个提法还只是一般地理解，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倒是感到《二十三条》中要求尽早解放一批干部、关于经济退赔的规定等都很符合我们的想法。那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我们多数同志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已开始感觉到对基层干部整得过火了，整的面太大，问题看得过重。另一个是彭真同志讲话对我们的影响。当时，彭真同志在北京的干部会议上有个关于“四清”问题的讲话，调子比较温和，特别强调了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和抓紧生产斗争的问题。彭真同志讲“破坏生产运动就是破坏我们的整个事业，那非追究不可。……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同时抓紧生产，千万不可放松生产。”东北地区放了彭真同志讲话录音后产生了好的影响。（这件事，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作为对抗中央，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状进行了批判）因此《二十三条》传达后，各地开始纠正了前段运动中存在的一些“左”的做法。很短时间即解放了大多数干部。工作队和基层干部、群众思想上都觉得很满意。 1965 年 2 月我在金县工作团队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要求工作队要依靠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要把解放干部大多数作为一条方针。对犯错误干部的问题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结论要实事求是”。在政策上对经济退赔要求既不能马马虎虎，又要合情合理；关于划阶级问题，强调要严格按照中央过去的规定办。5 月，东北局根据三省省委和重点县社教工作团对农村社教运动中关于经济退赔、清理阶级成份、地主富农浮财和房屋处理、不反社员群众、团结中农、组织处理等八个问题的意见搞了个规定发到各地。我在东北局书记处会议上再次强调：抓对青少年教育的问题；强调在四清新铺开的公社“一进村就要搞三结合”，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这都反映了《二十三条》下达后在实际工作中发生的一些变化。

我在金县三十里堡蹲点八、九个月，当时化名叫张坦。我们确实坚持了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住在三十里堡公社的供销社，吃饭同职工一样排队买饭。我除经常到生产大队参加干部群众会听情况，还经常参加一些大田和果树的劳动。当时参加劳动不是摆样子，而是真干，一干就是半天，与群众混得很熟。群众同我们讲话也很随便，什么话都讲。有些群众还当面问我“你是大干部还是小干部？”，有的群众看到经常有人到我的住地汇报情况，便猜测说“肯定是个大干部”。 1965 年春我们栽种的树木，现在已经成材。

在金县“四清”期间，我们还特别强调作好地富子女的工作。富农女儿孙云杰入党很说明这个问题。孙云杰是金县亮甲店公社葛麻大队一个富农的女儿。她是大连机车厂子弟小学的教师，1962 年她响应号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她思想进步，劳动积极，表现很好，要求入党。大队党支部和工作队想发展她入党，又有些拿不准。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金县工作团团长王良同志征询我的意见。我考虑到这样做符合当时中央关于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要给出路等指示精神，当即表示同意。不久孙云杰被批准入党。“四清”结束后，她被调到县里任团县委副书记。这件事当时国内有的报纸作了报道，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后来阿尔

巴尼亚、越南等国有的青年也来信询问。现在看来，这件事做得还是对的。

这一时期的城乡四清，按中央打歼灭战的方针，中央机关派出 34 位负责同志和 2800 多名工作人员到东北地区参加城乡“四清”蹲点（其中 95%在城市蹲点）。我记得公安部谢富治、严佑民在沈阳冶炼厂，交通部孙大光和刘亚雄在大连港务局，中央监委马国瑞在辽宁金县大连湾；一机部段君毅和周子健在长春第一汽车厂，石油部康世恩和徐今强在大庆油田。从当时中央机关派出大批干部参加四清蹲点，也可以看出中央对搞好四清的决心是多么大！

金县“四清”结束前，1964 年 6 月 4 日，我同三十里堡公社党委、镇委两个新的领导班子开了个座谈会。因这天正是农历端阳节，东北局办公厅的同志把座谈记录整理为《端阳话四清》。这次座谈的话题，是从新领导班子怎样巩固和发展四清运动成果，如何做好领导工作谈起的。我鼓励他们脑子里要时时刻刻想到群众，今后要坚持“三同”；上边来人不搞吃喝招待；不要让群众称“官衔”，手脚干净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我还要求他们要有朝气，有闯劲，不要做“量不了米，也丢不了口袋”的领导。后来这篇《端阳话四清》还转发到全区各社教工作团队。

金县“四清”结束后，在金县农村政治工作会议上，发现了一个能正确对待运动的干部——衣春枝。衣春枝是金县杏树屯公社柳家大队妇代会主任。她在运动中能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即使受到误解时，也毫无怨言，不泄气。我于 1965 年 11 月 3 日，写了一篇《关于推荐衣春枝同志讲话的建议》，建议在全区已经结束和正在进行四清的各县、各企业单位，组织干部和党员学习衣春枝同志的讲话。

1964 年 3 月间，我到辽宁省盖平县（今盖县），听了该县太阳升公社何屯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铭新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的汇报。我当时感到培养接班人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能思考这个问题，并且有具体的计划和行动，确实很有政治远见。营口市委将这个大队培养接班人的做法向省委和东北局写了报告。我于 5 月 13 日就这个问题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封题为《关于农村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汇报一个有政治远见的党支部》的信。5 月 18 日毛主席将这封信连同营口市委的报告一并指示印发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我的这封信和何屯大队培养接班人的材料，后来还转发到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

东北地区第二批“四清”运动从 1965 年 7 月陆续开始。农村开展 30 个县、7 个城市郊区，另 90 个公社，派出工作队 21 万多人。这次开展的单位，多为重点产粮区、“小三线”地区和边海防县。城市开展 1950 多个单位，很多是大型骨干企业，同国防、战备有关的或准备内迁的企业以及问题较多的较大单位。第二批“四清”，根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要求军队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指示，沈阳军区抽调军区部队和代管单位共 3 万余人，分别编入各工作团队。

第二批“四清”，我到辽宁省海城县牌楼公社下房身大队蹲点化名孙云，马明方同志到辽宁省营口县官屯大队蹲点。因为有第一批试点的经验，这批运动进展较快，我们在指导上也略感从容一些。虽然总的还是按《二十三条》精神办，有些工作队开始把干部的问题看得过重，但比第一批纠正的要快一些。干部解放的快，建立领导核心比第一批抓得早。对运动中的有关问题的处理上也更强调“准”字。我在 1966 年 1 月东北局召开的“四清”工作会上，

讲话中要求：核实定案要讲究实事求是，不要怕翻案，不要追求“千字号”、“万字号”。划成份问题，对漏划的地主富农，不一定一律划回去，可划可不划的不必划，要区别对待，即使非划不可的，也只能划本人。不提倡挖金银财宝，小量的即使本人主动交出的也不要收，大量的收不收要经工作团党委批准；小开荒、自留地超过标准的，按《六十条》办，比规定超过稍多一点的不要收回，个别超出过多的，收回时要经工作团党委批准。虽然第二批四清运动总的指导思想还是很“左”的，但在具体问题的对待上比第一批略微松动灵活一些。

我们在总结第一批“四清”工作时，各地都反映存在运动和生产结合的不够紧的问题。我们研究在第二批运动中应该解决这个问题。在海城蹲点时，就这个问题我征求了海城县委书记高路宾的意见并同鞍山市委第一书记王鹤寿同志交谈过。后来听了鞍山农村社教工作团郭延俊同志的汇报，又参加了1 个公社的片会，我发表了关于揭生产斗争盖子的意见。我说在运动中群众最担心最关心的问题，一是能不能建立起一个好的领导核心，一是经过运动生产能不能上得去，因此，在揭阶级斗争盖子的基础上，要拿出一段时间，集中地揭生产斗争盖子。通过放手发动群众，学习大寨精神，以大寨为样板，揭问题。找差距，查原因，进一步激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使运动更好地落实到坚持思想革命化，开展以八字宪法为内容的农业技术改造和科学实践，改进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以及农村各项建设上来。这个问题我是想了很久的。有一次在杭州开会讨论《前十条》时，我问过毛主席，现在这样强调阶级斗争，为什么还把生产斗争放在阶级斗争的前面，生产斗争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占什么样的位置，主席说：在人类历史上阶级斗争是短暂的，生产斗争是永久的。我当时理解生产斗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忽视抓生产斗争是不对的。不久，我给顾卓新、喻屏、强晓初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三省都能在运动中增加揭生产斗争盖子的内容。东北局转发了我的信和我在海城的讲话要点，要求点上的四清单位和面上的都要开展揭生产斗争盖子的工作。我在海城看到经过揭生产斗争盖子，工作队、公社和大队干部都敢抓生产了，长远的规划也得到了落实，确实解决了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本来当时也未跳出阶级斗争的窠臼，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难逃厄运，被当作唯生产力论而横遭批判。

东北地区第二批农村“四清”运动于 1966 年 5、6 月间结束。第三批运动原定开展 29 个县，工作队于 5、6 月陆续进点。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各地的四清运动很难进行，不久工作队先后撤出。这场“四清”运动，对于解决干部中存在的不正之风和社队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整个运动，不论是贯彻《前十条》、《后十条》还是《二十三条》，都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对基层干部的总体估计上有片面性，对干部中的问题看得过重，使许多基层干部受到了错误处理。对于当时一些“左”的做法，从总的方面来讲，我个人不仅是同意的，而且是贯彻执行了的。八十年代初，我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曾对当时的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同志讲，在“四清”运动中我蹲点的几个地方，凡是搞错了或者搞过了的，都应当由我负责，请省委予以纠正。

推广大庆油田经验

1959 年石油工业部在黑龙江省萨尔图（今大庆地区）附近的松基三井打出了石油之后，经中央批准，于 1960 年 5 月开始，从全国石油系统调集 4

万多职工开始石油会战。因会战地区在松嫩平原上，所以当时称松辽石油会战。油田也称松辽油田（后根据欧阳钦同志的建议，改为大庆油田）。

大庆石油会战，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会战开始，4 万多人一下子拥到一个冰天雪地的大草原上，真是上有青天一顶，下有草原一片。没有房子住，工人们自己动手盖“干打垒”（土房子）。有时粮食、蔬菜供应不上，他们就打草籽、挖野菜，还组织职工家属种粮种菜和生产劳动保护用品，解决了职工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当时用水很缺，打井用水供不上，工人们就排成队用水桶、脸盆从几百米以外的水池子打水。一打就是几十吨，保证了钻井需要。黑龙江省委积极支持石油会战，欧阳钦同志提出了“全力以赴，全力支援”的口号，为了保证大庆地区石油会战工作，省委成立了石油领导小组，省委书记处书记强晓初任组长，哈尔滨市市长吕其恩、嫩江专署专员于杰同志任副组长，积极做好会战的保障工作。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和东北三省特别是黑龙江省的配合很密切，关系十分融洽，会战需要什么，地方就支援什么，保证了会战的顺利进行。广大石油职工，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充分发扬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战胜了重重困难，取得了会战的胜利。在整个会战中，从 1960 年 5 月会战开始至 1963 年 10 月，已探清了 800 多平方公里的储油面积，建成了年产 550 万吨规模的石油基地，建成了年炼 100 万吨原油的炼油厂，建设了相应的生产辅助设施和生活基地。

大庆石油会战，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很大的成就，是因为他们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必须坚持革命化；把高度的革命精神与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重视科研工作，认真搞群众运动，抓基层建设；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亲临前线。在会战中，注意培养和选拔年轻干部，关心职工生活。他们认真学习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形成了具有大庆特点的好作风。大庆人在会战中的好作风一直为人们所称赞。他们以解放军的“三八”作风为榜样，强调树立“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作风。“三老”就是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四严”是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是黑天和白天干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干工作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工作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干工作一个样。大庆人创造的“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作风，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也是值得倡导和发扬的。

1963 年 10 月，东北局书记处开会研究推广大庆经验。我们一致认为：大庆石油会战的经验，不仅适用于石油战线，而且具有普遍意义，是东北地区工业交通战线出现的新事物，应该在全区推广。会议决定召开大庆油田现场会议，推广大庆精神。会前，东北局派出工作组到大庆油田，与石油工业部的同志一起搞调查研究，为开好现场会作准备。10 月下旬，东北局在大庆油田召开了东北地区工业交通企业基层工作经验交流会。三省和 15 个市的工交部门及 101 个厂矿企业的领导干部共 200 多人参加了会议。石油部长余秋里和国家经委、国家计委负责同志也亲临会议。顾卓新同志代表东北局在会上讲了话。会上由会战副指挥张文彬等同志作了“关于油田会战概况”、“在油田建设中打歼灭战”、“建立基层岗位责任制”、“油田地质科学研究”、“井下作业十大技术”和“会战政治工作”等报告。阜新机械厂、辽源发电厂、齐齐哈尔华安机械厂也在会上介绍了经验。现场会结束后，东北局给中

央和毛主席写了《关于大庆油田现场会议的报告》，报告从大庆油田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做大量细致艰苦的基础工作、加强基层建设、大胆突破技术关、搞好职工生活、建设好领导班子和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总结概括了大庆石油会战的基本经验。

为了进一步推广大庆经验，1964 年 1 月东北局发出《关于切实推广大庆油田经验给各级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说：东北局决定在全区工业部门和工业交通企业中普遍地学习和推广以大庆油田为主的各项先进经验。大庆油田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农业、财贸、科学、文教部门也要认真学习和运用。1964 年初，大庆油田组织报告团到沈阳给东北局和辽宁省直属机关干部作报告，我和东北局其他领导同志会见了宋振明和王进喜（王铁人）同志。

1963 年 11 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四次会议，宣布了我国石油产品已经基本自给。这条消息振动了国人更轰动了世界。 1964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油田会战情况的报告。不久，毛主席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大庆油田这面光辉的旗帜，激励着人们的建设热情，极大地推动了各方面的工作。大庆油田也在飞速的发展着。1966 年原油产量已达 1060 万吨，比 1963 年翻了一番。今天，大庆油田已成为年产 5590 万吨原油的特大型油田。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大庆人创下的光辉业绩！大庆精神永放光芒！

在辽宁首先兴起学习雷锋运动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是党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时代英雄。在他身上，闪烁着共产党人的光辉；体现着我党历来倡导的光荣传统和作风；在他身上，焕发着时代的风采，体现着共产主义的高尚精神。他是新时代的楷模，是新中国的骄傲。

雷锋在入伍前，就曾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红旗手。1960 年 1 月，雷锋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参军后很快就入了党。他多次立功受奖。在雷锋部队所在地的抚顺，他曾担任过望花区两所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并被选为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1960 年 11 月 26 日，沈阳区军《前进报》发表了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通讯反映了雷锋从一个苦孩子成长为优秀的人民战士的历程。并配发了沈阳军区领导同志的批示，雷锋的照片及沈阳军区工程兵党委决定授予雷锋同志“模范共青团员”称号的消息。12 月，《抚顺日报》也发表了《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通讯和《雷锋日记摘抄》。雷锋的事迹包括在战胜特大洪水斗争中的功迹在地方上也得到了传播。

1962 年 2 月 19 日至 27 日，雷锋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沈阳军区首届共青团员代表会议，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会议通过了《给军区全体共青团员的一封信》，号召军区广大共青团员和青年，要以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等先进人物为榜样，掀起一个学先进，赶先进的热潮。会后，雷锋等先进模范人物组成报告团，到军区各部队巡回作报告 40 余天，雷锋的先进事迹在沈阳军区和地方上更加深入人心。

1962 年 8 月 15 日，雷锋不幸因公殉职。第三天，在雷锋生前所在部队驻地——抚顺市望花区人民委员会的大礼堂举行了公祭仪式，人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来悼念这位毛主席的好战士，我和沈阳军区的领导及抚顺市的党政领导，为雷锋敬献了花圈。抚顺市近 10 万人民自发地为雷锋送葬。

1963 年 1 月 7 日，国防部决定授予雷锋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18

日，沈阳军区党委作出《关于开展学习雷锋运动的决定》。决定要求立即在全军区部队内深入开展学习雷锋优秀品质的运动。 1 月 21 日，沈阳军区隆重举行“雷锋班”命名大会，强晓初同志代表东北局出席了大会。在大会召开之前，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题了词。我和陈锡联、赖传珠同志也题了词。我的题词是：“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在命名大会上，陈锡联宣读了国防部的批复，并把一面绣有：“雷锋班”的锦旗授予了雷锋生前所在班。杜平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号召军区部队全体同志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一个学习雷锋同志的运动，把雷锋同志好的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全部学过来，传下去。

此后，雷锋的事迹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中央及辽宁省的新闻单位对雷锋的事迹作了大量的宣传报道。自此，在辽宁兴起的学习雷锋运动，推向了全国，雷锋的高尚品质和情操激励了几代人的健康成长。

1963 年 2 月末，毛泽东同志应《中国青年》杂志的请求，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3 月 2 日，《中国青年》杂志“学习雷锋专辑”首先发表了毛主席的题词。3 月 5 日，《人民日报》和首都其他各大报，统一发表了毛主席的题词。随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相继发表。一个学习雷锋的高潮在全国迅速展开。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发表之后，3 月 6 日，沈阳军区在沈阳召开“响应毛主席号召，进一步开展学习雷锋同志活动动员大会”。马明方同志应邀出席了大会。陈锡联同志将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题词（复印件）赠与雷锋生前所在的运输连。共青团中央的代表在大会上宣读了团中央追认雷锋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决定。陈锡联讲了话。“雷锋班”的代表和部队干部和战士代表也在大会上讲了话。

为了大力宣传雷锋精神，沈阳军区和辽宁省委，还多次发出学习雷锋的指示；组织雷锋事迹展览；组织雷锋事迹报告团；整理《雷锋日记》；编写《雷锋的故事》。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雷锋、学习雷锋的活动。

遵照周恩来总理的要求,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还排演了五幕八场话剧《雷锋》。在 1963 年 6 月，剧组到北京作了汇报演出。在京期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肖华等领导同志分别观看了演出。8 月 1

日，抗敌话剧团来到中南海礼堂，为主席演出。演出结束后，主席登台同全体演员照了像。

1963 年 8 月上旬，共青团中央在沈阳召开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团委宣传部长会议，总结交流各地学雷锋的经验。这次会议带有学雷锋现场会的性质，辽宁团省委在会上介绍了开展学习雷锋运动的经验。我和黄火青同志、东北局宣传部长关山复和副部长于林同志在会议结束时看望了与会同志。我鼓励他们要深刻领会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

习”伟大号召的深远意义，认真学习雷锋的品德和风格，把学雷锋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如今，学习雷锋运动已经开展了 30 多年。虽然在一段时间里，雷锋精神遭到了一些人的歪曲和低毁，但是，雷锋精神已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心中。在雷锋精神的发祥地抚顺，学习雷锋活动 30 年坚持不懈，并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89 年，由抚顺市雷锋中学、湖南省望城县雷锋中学、雷锋班等单位联合发起的“相会在雷锋叔叔

身边”全国中学生夏令营和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学雷锋研讨会在抚顺举行。我得到他们举办这样活动的消息，十分高兴，专门为他们题了词：“全国少先队员都要以雷锋同志为榜样，像他那样爱党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祖国。”当年 11 月，

我又收到了抚顺市雷锋中学的同学写来的信。 11 月 7 日，

我给他们写了回信，“你们给我的来信收到了，谢谢同学们。

同学们多年来坚持学雷锋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很高兴。你们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愿同学们在雷锋精神鼓舞

下，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热爱劳动，艰苦朴素，尊敬师

长，团结同学，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把自己培

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一代新人，将来为

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请转达我对全体教职员工

的亲切问候。”

1990 年 4 月 22 日，我还为抚顺市雷锋中学题写了校

名。

推动“双改”、“双革”运动

职工技术协作活动，是六十年代辽宁省兴起的一项具

有强大生命力的群众生产技术活动。

1961 年 6 月，沈阳市劳动模范、沈阳气体压缩机厂工人出身的工程师吴家柱响应沈阳市委提出的战胜困难，搞好生产，以实际行动完成国家计划的号召，联合了沈阳市劳

动模范、革新能手、沈阳市拖拉机制造厂工人出身的技术员林海丰和沈阳市先进生产者、快速切削能手、沈阳高压开关

厂工人出身的技术员吴大有，开展技术革新活动。他们交流技术经验，互帮互学，研究解决各自工厂里的生产关键问题，使新的革新技术在工厂里得到了应用。

经过吴家柱、林海丰、吴大有的串联，技协队伍像“滚雪球”一样扩大，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先进生产者为骨干，有技术专长的老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参加的、自觉自愿结合起来进行经验交流、技术研究、技术协作的群众性运动。由于这一活动来自基层，反映了广大职工的要求，适应了工交生产形势的发展需要。因此，它一经出现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由最初机械行业的三个厂的三个人，很快扩展到全市重工、轻工、电业、基本建设等 5 个行业，近 600 余人。

沈阳市总工会及时发现和扶持了这项活动，帮助他们总结活动的经验。并在 1961 年 10 月召开的沈阳市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上，组成了“沈阳市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厂际经验交流和技术协作活动委员会”。从此，诞生了我国最早的职工技术协作组织。

此后，在沈阳兴起的职工技术协作活动又不断向辽宁各地扩展，旅大、鞍山、抚顺、丹东、锦州等地和沈阳铁路局，都开展了类似的群众技术活动。许多劳动模范带头搞起了技术串连，一些技术难关被攻克。辽宁省委、辽宁省总工会及时组织推广群众性的技术协作活动，由此，技协活动在辽宁省迅速普及，技协组织逐步建立，队伍不断扩大，上下形成了一个技协组织体系。开展技协活动对于推动技术革新、解决地区和企业之间的技术攻关和生产技术难题，促进技术交流和技术互助，提高职工群众的劳动技能和科学文化素

质，组织职工参加技术革新和合理化建议活动，解决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的难题，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任务都是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的。技协活动的出现和迅速发展，是党的自力更生为主建设社会主义原则的体现，是在技术问题上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黄火青同志，多次对技协工作给予了具体指导。到 1964 年，辽宁省已有 1678 个大中型工矿企业开展了技协活动，技协队伍扩大到 12 万多人，形成了 60 年代技协活动的高潮。

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辽宁省的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热情支持。1963 年 1 月国家经委的负责同志在听取了技协活动情况汇报后认为，职工技术协作活动“为充分发挥劳动模范的骨干、带头、桥梁作用，扎扎实实地开展技术革新运动，找到了很好的方法。”同年 10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同志来沈阳视察工作，我和黄火青同志陪同他接见了辽宁省和沈阳市的技协骨干 23 人。彭真同志指出：“职工群众自觉地组织起来进行技术协作的办法，同各企业直接领导下的三结合互相配合，是依靠广大职工群众，自力更生地、多快好省地提高我国技术水平的一条很好的道路。”他要求全国都来学习沈阳的经验，都搞起技术大协作。次日，新华社播发了彭真同志接见辽宁省和沈阳市技术协作积极分子的消息。消息称赞辽宁省的群众住技术协作活动已发展到全省工交、基建和财贸等行业，对提高企业生产技术水平起了很大作用。

1964 年 3 月 19 日，我在大连接见旅大市卢盛和等 27 名技协骨干时，把技协活动概括为“革新、攻关、取经、推广、提高”五项内容。“革新”，就是革新与改进技术、工艺、设备；“攻关”，就是突破生产技术中的关键或薄弱环节；“取经”，就是为博采众长而寻师访贤，向有专业特长的老工人、专家取经求教；“推广”，就是通过技术表演、现场观摩等形式交流推广先进的或适用的技术；“提高”，就是通过技术练兵比武和办班讲课等形式提高职工群众的生产素质。1965 年 7 月 5 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批转了《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市先进刀具经验交流会议的总结报告》，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对本地区、本行业的先进技术和革新成果要认真传播和推广。

群众性的职工技术协作活动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这是与技协活动的发起人吴家柱分不开的。1964 年 2 月 20 日，年仅 37 岁的省、市人大代表，省、市总工会技协主任，全国先进生产者，沈阳市劳动模范吴家柱不幸病逝。在他患病期间，我和辽宁省及沈阳市的主要领导先后到医院和他家里看望。逝世后，辽宁省、沈阳市总工会和他生前所在的沈阳压缩机厂举行了公祭活动，我们也送了花圈，以表示对这位技协活动的发起人的哀思。

职工技术协作活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而也受到了全国的瞩目，仅 1963 年 4 月到 1964 年 4 月的一年时间里，就有北京、天津、吉林等 27 个省市观摩访问团来辽宁考察，团员共达 1250 多人。在东北地区，职工技协活动迅速展开。1965 年 3 月，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市的技协组织会同有关部门联合举办了金属切削刀具经验交流会，来自各省市 52 个单位的 600 多人参加了历时 25 天的交流活动，成为我国技协史上的一次壮举。

60 年代辽宁技协活动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一活动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一些技协成员仍然坚持进行技协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技协活动又焕发了新的生机。 1978 年 10 月，中国工会九

次代表大会将技术协作活动写入大会工作报告并首次纳入《中国工会章程》。群众技术协作活动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正式确认。技协活动在新的形势下又有了很大的发展。队伍不断扩大，范围不断拓宽，同时还增加了对外交流等新的内容。

1982 年 12 月 10 日至 15 日，“ 中华全国职工技术协作委员会成立暨表彰先进大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我同彭真、习仲勋、倪志福、郝建秀等同志一起出席了大会并会见了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1986 年 5 月 23 日，为纪念技协活动兴起 25 周年，我为此写下了“ 坚持开展技协活动，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社会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功立业 ”的题词。

推广锦州发展新兴工业的经验

60 年代初，东北地区有些城市发展工业新产品、新技术搞得很有成效，尤以辽宁省锦州市最为突出。这个市从 1958 年至 1965 年以敢于创新、大胆实践的精神，生产和试制了一批当时在国内、国际具有先进水平的新产品。这些产品有的填补了我国工业上的空白，在为经济、国防建设和为尖端科学技术服务、满足社会和人民生活需要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如锦州新生电炉厂生产的我国第一套真空感应电炉、自耗炉、电子轰击炉、中频透热设备和三相工铁锌熔铁感应电炉等成套设备，就具有当时国内的先进水平。这些产品，我国一些特殊钢厂装备后，形成了高温难熔金属优质精密合金等新型材料的生产能力。1966 年在全国工交工作会议上，锦州被命名为“ 大庆式锦州新兴工业地区 ”。

锦州发展新兴工业的经验，中央有关部门和辽宁省委都很重视。1958 年国家经委派工作组到锦州调查发展新兴工业情况。薄一波同志将经委的调查报告报送毛主席和党中央。不久，中共中央转发了一波同志的信和调查报告。辽宁省委也多次派人总结锦州的经验，并及时向中央和东北局作了报告。从 60 年代起在辽宁省工业交通战线上开始推广锦州发展新兴工业的经验。

东北局很关注锦州发展新兴工业的经验。1963 年 8 月，东北局计委、经委就与辽宁有关部门对锦州的新兴工业作了考察，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还协同有关部门帮助企业解决了一些生产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965 年 9 月，我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向毛主席和小平同志汇报锦州发展新兴工业的情况。我谈到锦州新生电炉厂研制成功的真空感应电炉和电子轰击炉，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这项成果是由犯人王灿文主持搞的，主席和小平同志听了很感兴趣。主席关心地问我锦州新兴工业区有多少人？我答：有 40 万人左右。主席：40 万人口的城市也不小了！在谈到王灿文发明电子轰击炉时，主席说，应该奖励他。小平同志问：这个人还关着吗？我说已经放出来了，每个月还给 50 元工资。他说：放了就好嘛，工资还可以多加点嘛。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东北局在北京召开了书记处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讨论东北地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内特别是前三年的工作问题。在研究东北的工业生产问题时，我们一致认为：主要应以增加品种、提高质量为中心，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节约费用，增加积累。为此，我们提出：要发展新产品、新工艺，开展技术革命、设计革命和专业化协作，加强企业管理。我们当时都感到锦州等城市那种不等不靠，敢创敢闯，敢于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正是在东北地区工交战线应该提倡和发扬的。会后，我和顾卓新、强晓初同志商定，在锦州开个现场会，推广锦州市发展新兴工业的经验。会议的准备工作由顾卓新和强晓初同志负责。东北局计委、经委、科

委具体负责会议的准备工作。他们还深入到辽宁的锦州、旅大、营口、丹东、抚顺市调查发展新兴工业的情况，为会议做好准备。

1965 年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3 日，东北局在锦州市召开了东北地区发展工业新产品新技术经验交流会，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省委、各市主持工业或科学技术工作的书记和各省市计委、经委、科委主任，部分科研机关、大专院校以及几个大企业的负责干部参加了会议。国家科委副主任韩光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顾卓新、候补书记强晓初主持了会议。

这次会开得很活泼，各地代表参观了锦州的新兴工业企业，观看了新产品的展览，听取了有关的经验介绍。大家对锦州几年来所走过的土法上马，土洋结合，大胆试验，打破框框，发动群众，自力更生，科学研究和生产紧密结合的道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条多快好省地发展新产品、新技术的道路。他们的作法，体现了大庆精神。

会议期间，旅大、营口、丹东、牡丹江、吉林等城市，也都在会上介绍了发展新产品、新技术方面的经验，几年来，在锦州经验的推动下，东北地区各工业城市在发展新产品、新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果。

会后东北局将召开发展工业新产品新技术经验交流会议情况向中央做出报告。报告除总结了几年的经验之外，还研究了 1966 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展新产品新技术的任务。确定了东北工业要继续以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为中心，加强科学研究，大力发展新产品新技术，在工业和科学技术和各个方面赶超国内外先进水平。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锦州会议精神，推动东北地区的新兴工业，东北局计委、经委和科委派人到三省和哈尔滨、长春、丹东等 13 个市了解锦州会议贯彻情况。1966 年 5 月 5 日，东北局批转了东北局计委、经委、科委关于锦州会议贯彻情况的报告，要求“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加强领导，总结和交流经验，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统筹考虑，全面安排，继续努力提高老产品，发展新产品新技术。”

支援国家三线建设

在 1964 年 5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估计出发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要搞三线工业基地建设。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和中央的决定，各有关部门和地区迅速展开对三线建设的部署和行动。

在我国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研究工业战线调整时，我就感到东北的工业比重大，城市人口多、负担重，如果能将一些企业调整到内地，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因此我曾向毛主席和中央讲过这个想法。这次中央决定搞三线建设，我们是拥护的。东北地区地处沿海沿边，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比较多，因此支援三线建设的任务很重。我们书记处决定支援三线建设的工作由东北局书记处书记顾卓新同志负责，经委具体负责实施。按照国务院的具体安排，从 1964 年下半年即开始了支援三线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至 1965 年，东北地区迁住内地和正在迁住内地的企业及技术支援项目共 140 个（列入国家搬迁计划内的 66 个），调出约 8 万人左右（其中基本建设队伍 2.7 万人）。搬迁的企业，有的并入内地企业的，对内地企业起到了充实、提高或补缺作用；有的是利用内地的下马工程进行安装建设的，节省了资金，加快了建设速度；有的是新建项目。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如此工

程浩大的迁建工作，确实超出人们的预料，迁建中表现出办事的高效率，严密的组织工作和广大干部职工表现出的意气风发的精神，今天也是值得学习和发扬的。

迁建企业是一线支援三线的一种重要形式。由于各级党委决心大，各迁建单位顾大局，充分发扬了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老厂贯彻了“包迁、帮迁、包投产”的精神，加上与三线的密切协作，所以收到了投资少、建设快、投产快的效果。鞍钢第二中板厂是迁入重庆钢厂的一个机械化轧钢厂，鞍钢发扬了很高的风格，在迁厂时不仅为该厂配备了较强的领导班子，选拔了政治条件好、技术等级高的技术工人，并且对迁出的 67 个机组和 390 台电机设备进行了全面检修，检查质量都达到了技术标准。在运输中 7 千多吨设备全部完好无损。哈尔滨电表厂原计划给兰州迁入了 108 台设备，后根据迁入厂的需要多给了 4 台国内购买不到的设备。大连机床厂的液压仿型机床车间，由于领导班子和职工队伍配备的好，迁入银川长城机械厂后出色地完成了生产计划和各项任务，被宁夏回族自治区评为迁建企业的标兵。兰州电焊条厂（由哈尔滨锅炉厂迁去的一个车间）、青海第一机床厂（由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迁去的）和由吉林迁到甘肃海石湾的冶金部第十建筑公司等单位，都克服了许多困难，很好地完成了搬迁和生产任务。

1965 年 9 月，中央召开了迁建工作会议。会后，为了解迁建工作情况，协调解决搬迁中的问题，东北局派东北局经委副主任孙洪志、黑龙江省经委主任冯仲斌和辽宁省经委副主任薛泉同志等组成赴西南、西北三线访问团，到成都、重庆、西安、西宁、兰州、银川等地访问了由东北地区迁往内地的 52 个单位。对这些单位的职工和家属进行了慰问，并听取了迁入地区的中央局、省、市委负责同志对迁建工作的意见。孙洪志等同志回到沈阳后，向我和顾卓新同志作了书面汇报。我将这个汇报材料呈送给彭真、薄一波、余秋里和谷牧同志。后来东北局将东北地区迁建工作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给中央写了报告。1966 年 5 月，根据中央和国务院提出老基地老企业支援三线钢铁基地的建设的意见，辽宁省和鞍山钢铁公司还负责包建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和贵州水城钢铁厂。

在支援大三线的同时，东北局还根据中央提出的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的要求，东北地区也加强了小三线建设，三省在各自的小后方迁建了一些常规兵器的工厂。1965 年 5 月，河北、内蒙和辽宁三省区在天津召开后方基地建设会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朱理治同志主持了会议。会议具体研究了三省区后方基地的军工建设、军工配套、交通通讯、后方工业建设、粮食生产等问题。会议的纪要分别报送中央、国防工办、华北局和东北局。

三线建设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是对于改变我国内地与沿海地区工业发展的不平衡，促进西南、西北地区和全国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东北的视察

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东北地区的工作历来是十分重视的。我在东北局工作的几年时间里，少奇、总理、朱德、董老、小平、陈毅、贺龙、叶剑英、彭真、李富春、邓子恢、罗瑞卿、谭震林、陆定一、薄一波等同志，都先后来东北视察过，给东北的工作以具体的支持和指导。

周总理曾经多次来东北，除前边提到的 1961 年春节期间那次视察外，1962 年 6 月，总理和邓大姐再次来东北，视察了三省的沈阳、鞍山、铁岭、长春、吉林、延边、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等许多地区，深入到工厂、农

村，详细了解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况。总理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的领袖风范，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每到一地，总理都是十分认真地听取来自最基层的群众和干部的意见，了解他们的呼声。记得 6 月 15 日，我陪同总理到辽宁铁岭的平顶堡公社视察。在这里，总理召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邀请平顶堡公社党委书记、社长、递运所大队书记、柴河东大队书记和大队长、生产队长、社员代表参加。座谈会上，总理详细地询问了全社的人口、耕地、耕畜、粮食产量、社员生产情绪等许多方面的情况。当总理得知柴河东大队包产粮食少于递运所大队时，就问：“你们队比他们差了这样多，什么原因？”柴河东大队党支部书记申太极同志回答说：“我们队原来是富队，过去一平二调‘共产风’和‘瞎指挥’等毛病，伤害了社员的积极性，社员的思想不稳定，种地的信心不高了。”总理插话说：“‘五风、瞎指挥’不能怨你们，中央负责，我向你们检讨。”当我和辽宁省委及当地的领导同志承担责任时，总理又说：“‘五风、瞎指挥’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委，不能怨你们，上面没有‘瞎指挥’，你们就不会有‘瞎指挥’，你们的‘瞎指挥’是从上面学来的。”

总理的一席话，使在座的同志很受感动。他那勇于承担责任，谦虚谨慎的思想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那次，总理除了深入农民家庭、田间地头外，还在铁岭县召开了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和县委工作组同志参加的座谈会。当总理听到了县委关于全县农业、调整企业、精简职工、压缩商品粮供应等方面的工作后，对工作组的同志寄予了厚望，当了解到工作组的同志都来自农村后，总理亲切他说：“你们要把铁岭县的十八个公社跑遍。你们在工作中，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困难的一面。你们虽然都是从农村中来的，现在对农村工作不熟悉了，你们要一学、二帮、三提意见。一学是：学习农村工作的经验，学习大青的经验。二帮是：帮助公社看存在哪些问题，帮助公社研究和解决问题。三提意见是：对上级提意见，看哪些规定的不合适，提议改变，对公社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对县委提意见，促进县委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对上对下对同级都可提意见。工作组和县委也有对立面，但主要是县委自己决定，不能把意见强加于人。你们了解的问题，给省委、市委汇报。要作的工作是：调整、减人、减少非农业人口，减少商品粮供应。做到县委报告上说的那两句话：‘留者安心，去者满意’，从现在起，抓到秋收见效。中间你们还可以轮流回去汇报。作风要踏踏实实，不要像过去有些事那样，‘红旗一插，万事皆休’，要搞到实现”。

总理这次来，正值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起草的关于 1962 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一步大刀阔斧地调整之后，所以，总理既深入到农村，又深入到许多工厂，如鞍钢冷轧厂、第二初轧厂、沈阳一一二厂、沈阳拖拉机厂、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拖拉机厂、吉林化学工业公司、丰满发电厂、大庆油田等。在视察中，总理在各地，发表了许多关于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建规模，缩短工业战线，进一步动员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农业的指示。对东北地区的经济调整，起到了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少奇同志是 1961 年 7 月来东北视察的。7 月 17 日，我们向他汇报东北地区的工作，少奇同志有许多插话。当我们汇报有人对人民公社怀疑的问题

时，少奇同志说：“有些人有怀疑、抱怨、牢骚，讲出来好。三面红旗可以让人怀疑几年。只是要注意一下，不能利用困难来捣乱。这种人是极少数。可以怀疑，但要努力工作，团结起来克服困难。不要人家一怀疑，就不让讲话。你又说要实事求是，又不允许怀疑，不允许讲老实话，这是不对的。有人说比例失调，这也没有什么，不适应就是失调。”少奇同志还说：“问题在于采取什么态度，是幸灾乐祸别有用心，还是努力工作求其适应。要切实让人家讲话，这样党内生活就生动了，就可以讨论问题了。只要求一条：服从和执行决议，有意见可以保留。还要看三年、五年，再来作结论。有些人是要到三、五年后才能说服的。”

少奇同志特别关心资源的开发和建设，他这次到东北来，主要视察了东北的林区。他说：“一是地面长的粮食、木头等。一是地下挖的煤炭、矿石等。把这两种东西加工，就是工业，就变出了各种东西。”7 月 18 日至 8 月 10 日，少奇同志在林业部罗玉川同志和东北局喻屏同志的陪同下，在黑龙江省先后视察了大小兴安岭林区、大庆油田和一些工厂。少奇同志关于林业建设工作，发表了许多重要指示。7 月 25 日，少奇同志在伊春市委委员、市长、林业管理局局长、各林业局党委书记、局长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共讲了七个问题。第一是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尽可能满足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需要；第二是工资问题，少奇同志主张，工资要按收购价格来定；第三是恢复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第四是更新问题，少奇同志说：更新无非是两种方法：一种是人工更新，一种是天然更新。以后人工造林是不是采取包栽、包活、包成林的办法。第五是林业局的体制问题。根据当时以林业局为核算单位的情况，少奇同志建议说：“以后，是不是以林场、森林铁路、制材厂为核算单位，林业局就是总公司，林场生产木头，卖给林业局。”少奇同志主张，“基本核算单位也要四固定，像固定人员、固定设备、固定面积、固定工具。也要几定几包，不能乱调。调乱了就不能核算了。基层为单独核算单位，经营就更积极了。”第六是关于林材贮运问题。第七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少奇同志经过广泛地调查研究，结合国情实际，提出了许多改革的问题，这些思想，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少奇同志回到哈尔滨以后，又提出建立育林基金的问题，即每采伐一方，提一定的钱用来育林，记得大约是百分之一。在黑龙江，少奇同志还亲笔题写了“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尽可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

小平同志也是多次来东北视察，但时间最长的一次要算 1964 年 6 月至 8 月的这一次。从 6 月 22 日开始，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先后视察了东北地区的许多工矿企业，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6 月 22 日，小平同志一行来到沈阳，首先视察了沈阳较大的几家军工企业，参观了辽宁工业展览馆，听取了沈阳市委关于机械工业生产专业化和协作情况的汇报。 28 日，赴大连。视察了大连钢厂、大连化工厂、大连造船厂和化学物理研究所。7 月 2 日到鞍山，视察了鞍钢冷轧厂，在鞍山视察时，听取了鞍钢和鞍山市关于开展“五反”运动的汇报。7 月 5 日，我陪同小平同志一行到长春。在吉林期间，视察了长春第一汽车厂，听取了厂长的工作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同时，还视察了长春电影制片厂、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还听取了吉林省委领导同志的汇报。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小平等同志就吉林省开展“四清”、“五反”以及经济管理体制等问题作了指示。在此期间，小平同志等还到吉林市，视察了吉林化学工业公司、丰满发电厂和左家特产研究所。参观了野

生经济动物场、果树场、药草场等地。此后，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中央领导同志又视察了黑龙江省。

小平同志的这次视察，正值全面开展“四清”和“五反”运动时期。在视察过程中，小平同志强调了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一定要解决核心问题，大胆提拔新干部、年轻干部，核心有老的也要有新的。老干部要开明一些。先进的企业，要在这方面做出榜样。“核心，要政治上好，业务上好，还要参加劳动”。“不能来形式主义，要劳动就要规定岗位、时间。干部要成为普通劳动者，世世代代传下去。既是领导者，又是劳动者。这一代搞不好，就会愈走愈远。参加劳动，干部要带头。劳动制度的建设是一种基本建设，主席说的那四个字，懒、馋、占、贪，真正参加劳动就不会出了。”第二是队伍问题。首先要把这两项“基本建设”搞好，有了这两条，生产斗争、科学试验、技术革命就会出来了。

在这次视察中，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同志还强调了把分布各厂的通用车间适当集中，组织专业化生产，这样是很大的节约。小平同志还对沈阳的机械工业寄予希望，他说：“沈阳的改造，要由国家经委、计委组织进行。这里的机械工业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辽宁的机械占东北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辽宁的机械又在沈阳，这里搞好了，全国就有希望了；沈阳抓好了，全国就有基础了。”

朱德、董老和王维舟也是1964年夏季再次来东北的。在东北的一个多月时间，他们视察了东北三省的许多地区。在视察过程中，朱德同志和董老做了很多重要指示，并为阜新海州露天矿、通化葡萄酒厂、延边大学题了词。在海州露天矿视察，朱德和董老分别题写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努力”和“发奋图强，冷静促进，自力更生，鼓足干劲”的题词。在通化葡萄酒厂，朱德同志写下了“学习大庆的苦干实干精神，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争取达到最先进水平。”在延边大学，朱德同志题词：“学习毛泽东思想，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朱德同志在吉林看到靰鞡草时还说，旧社会时，靰鞡草世世代代帮了我们东北劳动人民的忙。今天在劳动人民的社会里，应该给它个位置，使我们后代看了不忘过去。

从1961年到9965年，经过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东北地区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副食品供应多年比较紧张的沈阳，到了1965年，猪肉库存爆满，号召群众吃“爱国肉”了。这个时期的经济形势，应当说是一年比一年好。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总理第一次郑重地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号召，对全国人民是很大的鼓舞。可惜的是，由于政治上“左”倾错误的逐渐发展，最终导致了全面内乱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粉碎“四人帮”以后，到1977年冬才重新出来工作。

后　记

帮助我整理回忆录的有吴宗华、马利、李清霖、冯树成、高峰、李鹰翔、刘宗波、苗杰、高清喜、杨弘、王传贤、罗怀群、邹志美、童自权等同志。同时，得到黄火青、吴德、顾卓新、喻屏、强晓初、冯纪新、李东治、姬也力、刘杰、徐深吉、高厚良、朱光同志以及解放军出版社、民主与法制社的热情帮助和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把由我署名的九篇纪念文章列在回忆录之后作为附录。刘帅、徐帅是我的老首长，其他几位都是和我共同战斗多年的老战友。这些纪念文章曾经发表过，文中记录着一部分历史资料，可以作为这本回忆录的补充。需要说明的是，纪念杨秀峰同志的文章是由我和薄一波同志合写，纪念李一氓同志的文章由我和耿飚、姬鹏飞同志合写，纪念宋时轮同志的文章由我和廖汉生、张震同志合写，纪念陈再道同志的文章由我和刘华清、陈锡联、孔庆德同志合写的。

附录：

刘伯承同志永生

“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这是1942年冬天，组织决定为刘伯承同志庆祝五十寿辰时，伯承同志致答谢词中的一句话。

四十四年后的今天，伯承同志长眠了。伯承同志一生的光荣，正是由于他不愧为一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不愧为布尔什维克的楷模。

从1935年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到全国解放后的1950年，我有幸在伯承同志直接领导下战斗和工作，受到伯承同志多方面的教益。伯承同志坚强的党性，革命的精神，高尚的情操，优秀的品德，是有口皆碑的。伯承同志的功绩和可供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这里记述其中之一二，以表达我对功高德重的伯承同志的衷心爱戴和深切怀念之情。

不可多得的将才

伯承同志十九岁从戎，青年时代就成为川中名将。1926年入党后，他的军事生涯进入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新阶段。朱总司令称他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将才。”

这里，仅简略地记述伯承同志在长征途中亲自指挥红军干部团巧渡金沙江战斗的情况。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红军逐渐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为了甩掉追击的敌军，实行北上抗日，党中央于1935年4月作出了分兵左、中、右三路，速渡金沙江的决策，并决定由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直接指挥我红军干部团从中路抢占皎平渡。伯承同志严谨周密，慎思断行。他首先，非常详细、具体地分析了各种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设想了多种可能。然后，对整个干部团的行动，从作战计划，兵力配备，组织先遣部队，寻找向导，政治动员，直到每个很小的细节，都作了果断而周密的部署。伯承同志随先遣营三营行动，一起伪装成国民党军队，星夜兼程，当天强度急行军一百六十里。伯承同志还亲自审讯敌伪人员，在调查清楚敌人的设防情况并了解到敌人已下令烧掉一切渡船之后，当机立断，命令组成先遣连，强调行军一定要机密、神速，要攻敌人之下备，猛扑江岸。当晚先遣连就占领了渡口，夺取了仅存的船只，把一个排送到江北岸，敌军还摸不着头脑，就被我军缴了枪，我军控制了渡口两岸，而无一伤亡。

第二天清晨，伯承同志到达金沙江畔时，得知左右两个渡口因船只被敌人烧掉，又无法架桥，全军都将由皎平渡渡江。伯承同志令陈赓同志按原计划率后梯队迅速夺取皎平渡以北四十里的通安州，占据高地，直接控制皎平渡口，保证掩护全军安全渡江。陈赓同志率部一到通安州，与敌军遭遇。伯承同志又令我带先遣营全部火速赶到通安州。在伯承同志的统一指挥下，一部在正面佯攻，一部从右翼包抄迂回，攻敌左侧，终于拿下了通安州。我军大部几万人，靠夺到的七只船，都从皎平渡安全地过了江。当敌人赶到金沙江南岸时，渡江船只已被我全部烧毁。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伯承同志的亲自指挥，对胜利完成巧渡金沙江的壮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政治工作的模范

善于做政治工作，把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贯串于始终，这是刘伯承同志带兵和指挥作战的又一个特点。我记得有这样两件事。

长征到达陕北后，我和伯承同志分手了一年多。1937 年 2 月，为了相机援助和接应陷于困境的西路军，中央决定由四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和二十八军及骑兵团组成援西军。伯承同志任司令员，张浩同志任政治委员。我也调到援西军政治部工作。伯承同志和张浩同志满怀对西路军同志们强烈的阶级感情，投入这项新的工作。伯承同志指示政治部，在兰州到西安的公路上沿途书写和张贴通告，写明红军的驻地，以便失散的西路军指战员能尽快找到我们。还嘱咐我们，对于历经千辛万苦陆续归队的同志们，要做到回来一个看望一个，回来一批看望一批，并嘱我们号召直属队捐赠生活用品给他们。伯承同志还同张浩同志一起到招待所看望大家，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热烈欢迎他们归队，向他们表示慰问。伯承同志讲：在西征中，数以万计的优秀指战员牺牲了，许多同志被敌人抓走了，受尽了人间的苦难和屈辱。可是，我们的同志就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然采取了各种办法进行斗争。凡是能够回来的同志，都表现了政治上的坚定性，他们敢于冒生命的危险，逃出敌人的魔掌，都是好样的，都是我们的好同志，都是党的宝贵财富，组织上都给予信任。伯承同志这一番充满阶级情意的话语，使大家深受感动，不少人流下了热泪，感到了党组织的无比温暖。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援西军奉命集中于陕西省三原地区，准备开赴抗日前线。8 月下旬，我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一二九师以四方面军为主改编而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部队改编了，指战员都要换上国民党军队的帽徽。不少同志思想不通，他们说：过去我们戴着红帽徽为穷人闹翻身，国民党军队打了我们多少年，如今却要摘下红五星，换上他们的帽徽，想不通！许多同志的思想一时扭不过来，思想工作难做。刘伯承同志亲自在大会上作动员。他说：现在大敌当前，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在大敌当前之时，我们同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表明了我们党实行国共合作，坚持进行抗日的诚意，这对促成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推动全面抗战，有很重要的意义。大家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伯承同志又说：部队改编了，只是改了个番号，改了个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没有变，我们的红心没有变。我们现在穿的是当年大革命时期北伐军穿的衣服，戴的是当年北伐军的帽徽。我们要保持红军的本质，也要继承发扬北伐军的革命精神，而且要比北伐军更好。徐向前、张浩同志也讲了话。伯承同志还深入到下面，同干部战士一起开会，促膝谈心，做说服教育工作。经过充分的政治工作，指战员们的情绪稳定了，思想慢慢通了，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抗日情绪进一步高涨，纷纷要求尽快奔赴抗日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

伯承同志做政治工作，从来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针对具体对象的不同情况，循循善诱，通情达理，态度耐心诚恳，语言生动形象，不时引用一些诙谐幽默的比喻和故事，深入浅出地把道理讲得很透彻。大家都说，伯承同志的政治工作能够做到人们的心上，使人心服口服。因此，同志们都愿意听他的报告，乐意找他谈话。

杰出的军事教育家

伯承同志又是一位杰出的、有特殊贡献的军事教育家。我军有成千上万

的指挥员包括许多高级将领，都是伯承同志的学生。

伯承同志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辛亥革命后的 1912 年，他以文武各科的优异成绩考进了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经过十个月的训练，又以各科的优异成绩毕业。南昌起义失败后，党派他到苏联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 年回国。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研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在军事理论方面学问很深。伯承同志 1932 年初到中央苏区后，就受命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长征途中，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又担任红军大学校长。他亲自主持制定教学大纲，主持编写大量军事、政治教材，还亲自登台讲课。在教学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同当时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红军学校和红军大学，都曾为各革命根据地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党政干部。

伯承同志在离开军事教育岗位，担任军事指挥员的年代里，仍然十分重视培训指战员的工作，继续为提高部队的政治、军事、文化素质付出了心血。抗日战争前，伯承同志指示援西军政治部向指战员系统讲授社会发展史常识，从猴子变人讲起，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一直讲到必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还举办支部书记和政治指导员训练班，专门讲如何在连队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这对从根本上提高同志们的政治觉悟，提高政治干部的素质及工作水平，都有很大的帮助。抗战爆发后，伯承同志戎马倥偬，率部转战华北各地，但对培训指战员的工作仍然没有丝毫的放松。抗战初期，一二九师进驻山西辽县一带，根据伯承同志的建议，办起了全师排以上干部训练班，教育大家认识新形势，适应新形势，实现思想上的大转弯。组织大家学习如何分散到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如何做群众工作等。第一期训练班开学时，伯承同志亲自到会讲了话，勉励大家认真学习。之后，又按照伯承同志的意见，训练班变成随营学校，使培训工作制度化。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人民军队的绝大多数是工农分子，他们政治觉悟高，作战勇敢，工作积极热情，但是文化水平低。伯承同志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讲：我一个眼看不见就很痛苦，没有文化就是睁眼瞎，怎么能当个好军人啊！建设一支优良的军队，没有文化是不行的。有了文化，眼睛才亮，才会成为“千眼佛”。在伯承同志的关怀和号召下，部队办起了许多扫盲班、文化班，掀起学习文化的热潮。

当时，在伯承同志身边工作的参谋和其他人员，大多是年青人，文化程度也不高，伯承同志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提高文化。他在战场上是叱咤风云的勇猛将领，对下级特别是对年青同志却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慈样长者。当他发现工作人员写了错别字或者文理不通的句子，便把有关同志请来，耐心地一字一句、一笔一划地帮助他们改正。在伯承同志的严格要求下，在他周围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文化水平都有了相当大的提高。记得还有这样一件事：解放战争期间，一位青年翻译了一部俄文的军事著作，请伯承同志校阅。伯承同志在紧张繁忙的战争年月，利用点滴空隙时间，花了很大功夫，对着原著，一字一句地进行了校正。伯承同志对青年人的帮助真是无微不至的。

全国解放后，各军兵种相继成立，我军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即为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全军都要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伯承同志请求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等职务，主动请缨去办军校。中央很快批准了他的要求，毛主席亲自给他复了信。从此，伯承同志又重新投入军事教育工作。1950 年 11 月，伯承同志主持起草了《创建军事学院的意见书》，

经周总理修改后，报经毛主席批准。不久，中央任命伯承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伯承同志受命后，亲自主持组建学院领导班子，编制训练工作大纲，建立正规的教学制度等。他在总结以往办军校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并开展广泛的军事学术研究工作，组织了联合兵种协同作战的军事演习。伯承同志为办好军事学院日夜操劳，他还亲自授课，有一次讲课就达六个小时。学员从开学时的七百多人，后来发展到三千人。学员毕业后，都成为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骨干，不少同志在抗美援朝和其他作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伯承同志为培养适应现代化战争需要的指挥员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为后来建立各军兵种指挥院校和形成完整的军事院校体系奠定了基础，从而推动了现代化革命化军队的建设。伯承同志自己有不少军事著作，《刘伯承军事文选》就是他几十年作战实践的总结，这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

赤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伯承同志是旧军人出身，但是他出污泥而不染，在他身上没有一点旧社会、旧军队的陋习。他入党后，对自己的要求更是十分严格，始终把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怀着一颗赤诚的心，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在各个革命时期，凡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分配的任务，不论任务多么艰巨，条件多么险恶，伯承同志都是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定，并且奋不顾身地去完成。即是受到错误路线排挤时，仍然坚持原则，忠贞不渝地为党的利益而斗争。他对党的方针、政策以及上级的指示。采取极其严肃的态度，总是读了又读，研究了又研究，努力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加以实现。红军长征途中，党派伯承同志到四方面军工作。当张国焘企图改变长征路线，坚持南下，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时，伯承同志和朱德等同志一起，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持斗争。 1937 年，援西军在接应失散归来的西路军指战员以后，伯承同志遵照中央的指示，领导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正确地开展了清算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伯承同志反复宣传《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坚持以教育为主，大会小会作报告，找干部个别谈话，耐心地做工作，不开批斗会，不处分人，既坚持了原则，又团结了同志，在真正解决问题的基础上统一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思想。

南京解放后，伯承同志出任军管会主任、市长。接管原国民党政府的首都，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既有公开的斗争，又有隐蔽的斗争。伯承同志日理万机，十分出色的贯彻执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并且亲自处理有关外交、统战等方面的许多重要工作。伯承同志对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革命先烈们怀有十分深厚的阶级感情，根据他的建议，南京市委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南下的同志必须先去瞻仰雨花台革命烈士遇难处。此时，雨花台处处可见先烈遗骨，同志们前去凭吊，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伯承同志作了那么大的贡献，是党和人民的功臣，可他从不居功自傲，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他这样谦虚过人的美德，感动了许多人。一位外国记者采访了伯承同志以后，称他是“世界上谦逊的人中最谦逊的人。”

现在，全党都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心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努力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刘伯承同志

光辉的一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好教材。学习伯承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努力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模范，是我们对伯承同志的最好纪念。

雄才大略德高望重

——忆向前同志在冀南的日子里

9 月初，在得知徐帅病重的消息以后，心情十分沉重。曾不断询问徐帅的病情，两次到医院看望。在那令人焦急的日日夜夜里，急切地盼望着、期待着，期待老帅能够战胜病魔，早日康复。不料，9 月 21 日清晨传来徐帅与世长辞的噩耗，我急忙赶到医院，向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向我尊敬的导师作最后的告别。在老帅的遗体前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默默地向老帅致哀。此时此刻，使人悲痛欲绝。

在缅怀徐帅，使人无限悲痛的日子里，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眼前。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却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我初次见到向前同志，是 1937 年在甘肃镇原县。此时，西路军失败，向前同志怀着坚定的信念，以顽强的意志，历经千难万险，来到镇原的援西军司令部。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等领导同志热情欢迎向前同志，向他表示亲切诚挚的慰问。当时，向前同志表现得深沉镇定，对未来的胜利充满信心。向前同志在镇原休息数日后，经云阳、西安到了延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两次在向前同志领导下工作，经常得到他的教诲和启迪。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初期一年多的时间里，向前同志亲自率部到冀南，在领导开辟和发展、巩固冀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显示出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军事战略家和政治家的胆识，非凡的组织领导和军事指挥才能。

向前同志 1938 年 5 月初率 129 师 769 团和 115 师 689 团、第五支队等部到达冀南，同行的有 129 师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同志。他遵照党中央关于“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的指示，根据 129 师的部署，到冀南统一领导和指挥这个地区的抗日斗争。从此，冀南地区凡属八路军的部队都直接听令于向前同志。

向前同志作风民主，善于团结同志。他一到冀南，顾不得休息，就听取了先期到达该地区的陈再道、李菁玉和我的汇报，对于我们到达冀南后的工作情况，对于敌伪军分布和民情地貌等等都作了详细的询问和了解，他充分肯定先期到达的挺进支队，特别是陈再道、李菁玉率领的东进纵队广泛发动群众，收编地方部队，扩大抗日武装，为打开这个地区的抗日局面，建立抗日根据地等所做的大量工作。此后，凡遇重大问题，向前同志总是同大家特别是陈再道、李菁玉、刘志坚、杨秀峰和我一起商量，共同作出决定。他坦诚地阐述自己的看法，也虚心地听取其他同志的意见。在向前同志主持下，冀南党、政、军、群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团结一致，亲密合作，形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向前同志是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

富有创见的军事战略家

向前同志来冀南以前，这个地区的抗日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面临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日伪军严重地威胁着根据地的腹心地带，不少地区还被各色地方武装、土匪和反动会道门所控制。在平沙无垠、林木稀少，无山地作依托和隐蔽的广大平原地带能否坚持和如何开展游击战争还是一个新课题，大家都没有经验，有待于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

向前同志是一位作风深入，注重实际又富有刨见的军事战略家。他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创造平原地的“人山”，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他说：平原虽然没有像山地那样多的地形上的便利，但是如何通过认真发动群众，把广大的人民群众推动到抗日战争上来，创造出平原地的“人山”，那它就是无敌的，是坚不可摧的，自然界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人山”好。怎样去创造“人山”呢？向前同志提出，党、政、军、群都要把造“人山”的工作作为政治上最主要的工作，要把争取每一个中国人、每一支武装部队到抗战的道路上来，作为我们工作的重心。又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向前同志说：“必须在人民中进行广泛的深入的教育说服、宣传组织等的艰苦工作，提高人民的民族意识与政治觉悟，使人民本身的利益，与抗日的利益联系起来，使每个人认识到要想自己不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就只有为中华民族的自卫战争而牺牲一切，为民族的生存而奋斗到底。”向前同志还提出了创造“人山”的具体办法。冀南的同志们完全拥护向前同志的上述意见，党、政、军、群各部门上下一致、齐心协力地进行发动，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日益高涨，组织起战地动员委员会等各种形式的抗日群众组织和团体，青壮年纷纷加入八路军，抗日军民之间的关系亲如鱼水，创造“人山”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向前同志关于在平原地创造“人山”的思想和实践，是具体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范例，它不仅对冀南有直接的指导作用，也为全党提供了坚持和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重要经验。

威震敌阻的军事统帅

当时，日军的铁蹄已踏进冀南，冀南腹地的一部分县城被日军占领。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广大抗日军民的士气，向前同志一到冀南便提出在威县、临清、平乡一线打击敌军的计划。在他的统一指挥下，1938 年 5 月 10 日发起威县战斗，毙敌数百人，并分兵向东、南展开，先后收复临清、夏津、高唐、永年、成安、肥乡、广平等县，日军驻临清之高桥部队和驻威县之清水部队都仓皇弃城逃窜。至此，冀南腹地已力我所控制，冀南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向前同志当时声望很高，在收复大片失地后更是声名大震，许多知名人士如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聊城专员范筑先、临清专员韩多峰、直南专员丁树本等，都慕名专程前来拜见。向前同志亲切会见了他们，遵照中央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向他们分析全国的抗日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对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团结争取工作。以后，这些人大多同我们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有的成为著名的爱国抗日将领。

1938 年 11 月和 1939 年初，日寇两次分 4 路和 11 路对我冀南革命根据地进行“扫荡”，妄图消灭我抗日武装，实现所谓“由点、线的占领，扩展为面的占领”。日寇对根据地人民残酷摧残、血腥屠杀，对我妇女、儿童的兽行尤为残忍。在向前同志指挥下，我冀南领导机关主动撤离南宫，转入农村，主力部队化整为零，机动灵活地分路打击敌人，并开展大规模的破路运动，以隐蔽自己，迟滞和阻止敌快速部队的行动。我军在各地地方武装配合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取得了两次反“扫荡”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图谋。

严格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

抗日战争初期，冀南各色武装众多，他们巧立番号，独 树旗帜，自封司令，局面十分混乱。推动这些旧武装走上抗日的道路，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向前同志十分讲究政策和策略。他总结了前一段东进纵队等成功地收编、改造大量旧武装的经验，并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四条基本方针：“凡属不愿投降，不甘为日寇驱使，而愿意同我们共同抗日及自愿参加我军共同抗战者，我们应一律欢迎并予以下列的保证：一、与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同等待遇，一视同仁。二、不缴枪。三、不改编，保持其原有的干部与编制，如因战争环境和提高战斗力，而在组织上必须适当的调整时，亦应先经过其同意，而不应出以勉强。四、帮助其进步。”我们按照这四条基本方针继续进行工作，结果进展顺利，在不长的时间里，有大小数十股武装二十余县的民团、保安队编入了八路军的队伍，东进纵队进一步得到扩大。在打击有汉奸暗中操纵、专事破坏抗日活动的会门组织六离会时，向前同志再一次指示我们要严格掌握好政策。他说：打六离会不能像打日本侵略者那样，因为六离会的人大多是本地的百姓，有被逼的，有受骗的，他们的亲戚朋友都是我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打死一个得罪一家，就会削弱抗日的力量。所以，我们的方针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武力把他们镇住就行了，多做反正的工作，多做瓦解的工作。我们进行的政治攻势十分有效，绝大多数信徒洗手为民，主动交出武器，揭发为首者的罪行。我们镇压了极少数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争取了绝大多数群众，六离会顷刻瓦解。可见，向前同志既是一位威震敌胆的军事统帅，也是一位足智多谋，严格而又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向前同志在同奉命担任河北省主席的鹿钟麟等人进行反磨擦的斗争中，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团结了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

抓紧冀南地区抗日政权的建设，是向前同志在冀南工作时的又一重要贡献。按照向前同志提出的办法，建立抗日政权同收编各色武装同时进行，即解决一个县的武装，便派人进去当抗日县长，建立起县的抗日政权和以县大队为建制的抗日武装。在冀南多数县抗日政权建立的基础上，于 1938 年 8 月成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杨秀峰同志任主任，我任副主任，使冀南抗日政权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向前同志在冀南一年多的时间里，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头痛，但他以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责任感，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作出了许多正确的决策，妥善地处理了许多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在 1938 年夏季，志坚同志派任东进纵队政治委员，我又染病数十日，向前同志的工作更加繁重。向前同志在冀南时，是该革命根据地的统帅，对开辟、发展、巩固根据地实行了坚强的全面领导，发挥了特有的作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38 年下半年，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先后亲临冀南指导工作，做了许多重要的指示，向前同志同伯承、小平同志一起推动和加快了冀南地区的抗日斗争。

1939 年 6 月，向前同志遵照党中央的决定，去山东工作。我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送别了向前同志。我在向前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一年多，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终生。

党中央对向前同志的光辉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徐向前元帅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那伟大的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他为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他那崇高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永远留在我们心中。向前同志永垂不朽！

共产党员的楷模杨秀峰同志

杨秀峰同志早年投身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

伟大的共产主义英勇奋斗了半个多世纪，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献给了党和人民。他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知识分子党员的杰出代表。我们和秀峰同志共同战斗多年，他的卓著功绩和高风亮节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心中。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敬重的心情，缅怀他的往事，深切悼念这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

投笔从戎，从大学教授到游击队司令员

秀峰同志出身于河北省迁安县杨团堡村一个“世代书香”之家。早在青年时代，就开始从事新文化的启蒙活动，继后又参加了“五·四”、“五·卅”等伟大的革命运动，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29 年赴法国留学，翌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 年回国后，他在河北法商学院、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等校任教，以大学教授的公开身分，从事革命活动。他把课堂作为阵地，向青年学生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指出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他讲的课很受爱国学生的欢迎，常常是教室里坐满了学生，窗外也站满了听众。他积极参加著名的“一二·九”青年爱国运动，同广大青年学生战斗在一起，深受青年学生的爱戴和崇敬，被誉为“红色教授”。

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北方局给秀峰同志的主要任务是在北平、天津文化教育界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文化教育界的上层人士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6 年 1 月，他和许德珩、张申府等知名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第一次宣言》中揭露了国民党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丧失东三省，断送热河，又将拱手让出整个华北等丧权辱国的卖国行径，愤怒斥责国民党政府镇压爱国青年学生的罪行，热情赞颂爱国学生“愿意以赤血洗白刃，而为民族的先驱，为救国的斗士”，号召“全国文化界火速起来，促进全国民众的抗敌救亡运动”，“抵抗敌人的侵略，救护我们的国家，收复我们的失地”。

秀峰同志是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时该会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他们采用多种形式，把在社会上有名望的大学教授和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在一起，组织集会和撰写文章，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国民党对敌妥协投降的反动面目。国民党反动当局网罗右派势力对北平文化界救国会进行围剿。此时，国民党反动御用文人陶希圣发表文章，无端攻击“西班牙人民阵线”、进而大肆攻击诬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秀峰同志临危不惧，挺身而出，于 1937 年 5 月在《北平晨报》上发表《致陶希圣的公开信》，痛斥陶希圣的谬论，一针见血地指出，陶的文章和行为是效颦日本侵略者，为敌张目，是制造民族分裂的“最好典型”，从而揭露了陶希圣之流的丑恶嘴脸。秀峰同志在少奇、彭真、林枫同志的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在华北文化教育界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任务。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口头上宣布抗日，实际上部队纷纷南逃。平津之间的汉好和亲日派分子气焰嚣张，到处散布民族失败主义。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总动员等十大救国纲领，号召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秀峰同志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投笔从戎，率领一批平津爱国青年奔赴抗日烽火第一线，到冀西开辟抗日革命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很快组织起一支有几千人参加的冀西抗日游击队，秀峰同志担任司令员。从

此，他投入了开展敌后游击战，开辟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一位颇有名望的大学教授，毅然由繁华的大城市转入艰苦的农村，由幽静的书斋、课堂走上硝烟弥漫的抗敌战场，由一个文人、学者到拿起枪杆指挥部队战斗，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转折！这充分表现了秀峰同志坚决服从党的需要，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自觉地为党的事业而献身的革命精神。这一革命壮举，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模范执行党的政策，为发展和巩固根据地作出重要贡献

秀峰同志是冀西、冀南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他模范执行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冀西革命根据地，冀南行政公署，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功绩卓著。

“七七”事变后，我一二九师根据党中央关于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于 1937 年底和 1938 年初先后派出东进纵队和骑兵团开进冀南。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发动与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开展游击战争，收复失地，建立抗日政权和团体，取得重大胜利。1938 年 8 月，成立了冀南行政公署。

1938 年 5 月，秀峰同志奉党的指示，以冀西民军司令的身分，借募集棉花、棉衣为名来到冀南。当时，秀峰同志利用国民党正在网罗知名人士，扩大势力之机，取得了“国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民训处冀西民训特派员”的合法职务和河北省政府委员的公开身分。为便于进行统战工作，党决定由他担任冀南行署主任。

行署成立不久，蒋介石委派的冀察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就借机寻事，与我争夺地盘。1938 年 11 月，秀峰同志外出组织反扫荡斗争，那位省政府主席以行署主任“不知去向”为借口，公然宣布取消我冀南行署，进而提出撤换县长，解散所有的抗日人民团体。他的属下更进一步提出“驱逐八路”的反动口号。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石友三、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也不断寻衅，制造摩擦。秀峰同志面对这种复杂情况，在当时驻冀南的我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同志的直接指导下，坚持党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当面警告那位省主席：“行署是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抗日的，你无权撤销，你撤销了它，老百姓就要起来反对你。”又说：“民众抗日打开了那么大的局面，怎么可以把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打鬼子的团体解散呢？”在我一二九师的军事压力和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下，终于挫败了顽固派的阴谋，那位省主席溜走了。国民党顽固派不甘心失败，又委派庞炳勋接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秀峰同志在冀南参议会上提出著名的“拥朱拒庞”议案，要求任命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朱德同志为河北省政府主席。这个议案，得到冀南各界人士的普遍响应，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拥朱拒庞”斗争。

秀峰同志经常到石友三、张荫梧部驻地做工作。他在同石友三等人进行不妥协斗争的同时，还以渊博的知识和很高的文化素养，谈古喻今，纵论当时的形势，对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规劝他们停止摩擦，一致对外，全力抗日。他给石友三的一封亲笔信中引用了《易经》中的一句话：“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正告石友三要站稳脚跟，顾全抗日大局，当心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根基而自取灭亡。秀峰同志既坚持党的原则，又视对象和时机，十

分注意策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使争取工作做得有声有色，表现了相当高的斗争艺术，连那些顽固派也不得不表示钦佩。

为了广泛动员社会各阶层参加抗战，秀峰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结合冀南地区的实际，领导行署制定了公平负担，减租减息，优待抗属，保护工商业，取消苛捐杂税，救济灾民难民等一系列重要措施。冀南的公平负责采取累进法，即每个除一亩半地不计负担外，超过一至三亩者每亩计一亩二分，以上类推，直至超过十八亩以上者每亩计两亩，既减轻了少地农民的负担，也防止了乱摊派的做法。秀峰同志经常深入各地检查贯彻落实情况。一次，他在检查中发现有的农民负担“不公平”，立即予以纠正。实行这些措施，既保护了根据地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利益，又兼顾到各阶层的利益，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对调动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和根据地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秀峰同志十分重视和善于团结、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抗战。冀南教育界的著名人士有不少就是在秀峰同志的直接帮助下积极投身抗日的。通过他们又团结、吸引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抗日队伍。为了训练知识分子和为根据地培养干部，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于 1938 年 8 月成立以秀峰同志为院长的抗战学院。他亲自讲授辩证唯物论。学院办了两期，每期三个月，共训练了 2，700 余人。学员多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毕业后充实到根据地党、政、军和群众团体各部门，成为抗日的骨干力量。

秀峰同志为了做好后勤保障工作，配合八路军前方作战，倾注了许多心血，在领导群众破路，拆城拆寨拆堡，空舍清野，征集救国公粮，动员军装鞋袜，组织自卫队等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绩。部队打到哪里，后勤保障工作就跟到哪里。 1939 年 2 月，行署颁布破路训令，发动群众和军队把所有大车路一律挖成深沟，掘出之土培于沟上两岸，既能阻挠敌人机动车辆的窜犯，又便于我军民利用深沟与敌周旋，开展游击战争，群众称之为平原地区的“人造山川”。仅 7 月间冀南就破坏敌人苦心经营的汽车路达 21，900 公里，对我坚持敌后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秀峰同志严格贯彻毛主席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提出的各项指示。在根据地政府的人员分配上坚持“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大体上各占三分之一。在精兵简政方面，他作出了突出成绩。由他主持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采取坚决措施，裁减人员 48%，节省经费 46%。1942 年延安《解放日报》载文赞扬“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认真、周密、彻底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取得了边区精兵简政的经验，足供各根据地借镜和效法。”毛主席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也称赞“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

秀峰同志执行党的政策，一贯坚决果断，雷厉风行，严格认真，一丝不苟，事先有布置，事后有检查，并且时时处处以自己的表率作用带动工作人员共同贯彻执行，使党的政策很快变成广大群众的实践。

克己奉公，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
疾恶如仇，对犯罪分子执法如山

秀峰同志一生清正廉洁，克己奉公，时刻关心群众疾苦，一心一意做人民公仆。他的高尚品德，一直为大家公认，受到交口称赞。在抗日战争最艰难困苦的年代里，秀峰同志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和根据地的干部一起

节衣缩食，一再降低生活津贴标准。行署成立前，县级工作人员每月津贴为5至20元。行署成立后，降为5元。1939年7月1日，行署根据当时群众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又再降为4元、3元、2元三级津贴制。一次，有一位工作人员抱怨吃不饱饭。秀峰同志对大家说：“这位同志的抱怨是不对的。现在不是吃饱吃不饱的问题，而是俄死饿不死的问题，群众和我们一样苦。只要饿不死，还有一口气，就要抗战到底。”当时已经40多岁的秀峰同志身体力行，不要任何额外照顾，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常常和行署干部一起，蹲在风沙迷漫的露天地里就餐。秀峰同志不但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也严格要求家里人和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搞特殊。1942年，他的儿子由敌占区接到太行山根据地。孩子生日那天，工作人员设法找了二斤面，包了一顿素饺子。秀峰同志检查工作回来，见到儿子非常高兴。吃饭时工作人员端来饺子，他马上问：“今天食堂都吃饺子吗？”他听说不是，要工作人员立即把饺子端走。他家里人解释说：“今天是孩子的生日，就让他吃了吧！”秀峰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我身为负责干部，自己作出的规定自己不执行，家里的人都说不服，怎能说服群众？”最后，还是把饺子送给伤病员吃了。秀峰同志对干部诚恳热情，平易近人，凡是要求干部做到的，他都首先自己做到。在战争环境里，干部每天早晨出操。秀峰同志不论工作多么繁忙，甚至通宵达旦工作，也坚持同干部一起出操。他的身体瘦弱，但行军时，经常把马让给别人骑，自己总是习惯地背着手，从容不迫地走在队伍前面，一走就是几十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那沉着坚定的步伐像一股无形的力量，激励着大家前进。秀峰同志事事处处以身作则，和他共同生活、共同战斗的同志们无不被他的崇高理想和高尚品德所深深感动，赞誉他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是共产党员的楷模。

秀峰同志以解民于倒悬的革命精神，在发动群众救灾方面，工作做得很出色。抗日战争进行了八年，晋冀鲁豫地区竟有4年遭到水、旱、蝗灾。 1942年和1943年发生全区性的大灾荒。秀峰同志积极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使救灾度荒与发展生产密切结合起来，发动军民灭虫、抢种、开荒、纺线、发展运输等等。经过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战胜了灾荒。1949年下半年，河北省遭受了罕见的特大水灾。新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秀峰同志心急如焚，立即深入灾区，察看灾情，慰问灾民，发动和组织群众生产自救。这时秀峰同志已年过半百，依然保持着当年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他视察灾区，经常坐马车，搭乘拉煤便车，或者步行，有一次坐“冰床子”（当地群众又叫扒犁）赶路。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跑了天津、唐山、沧县三个专区的17个县，100多个重灾村。灾区人民吃什么，他吃什么，从不特殊。这年的春节，他是在滦南、丰南一带同重灾区人民一起渡过的。1950年，河北灾情刚刚缓和，秀峰同志又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到皖北救灾。总理当面对他说，毛主席已两次点名要你到皖北去救灾。秀峰同志二话没说，立即奔赴皖北救灾第一线，又一次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全国解放后，秀峰同志非常怀念在战争年代曾经生死与共的老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1950年冬至1951年春，他怀着对老区人民的深厚情谊，到河北省的涉县、阜平和遵化、迁西等老根据地，走家串户，慰问那里的群众。他把了解到的情况，向党中央写了报告，毛主席非常重视。少奇同志还给秀峰同志打电话，称赞他做得好。国务院为河北老区人民拨了一笔专款和大批衣物，华北局的领导同志也表扬秀峰同志抓得对。以后，中央组织了几个慰问团分别到老革

命根据地进行慰问，并委派秀峰同志担任北方慰问团的副团长。他又一次到太行山区、冀南等革命根据地慰问。老区人民对中央的热情关怀非常感动。

秀峰同志对人民群众一贯无限热爱，而对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疾恶如仇。在他担任冀南行署主任的时侯，有一个食堂管理员多次贪污大家微薄的生活津贴，有一个马夫偷卖马料，经过多次批评教育，仍不悔改。秀峰同志十分气愤地说，在我们这样困难的时候，为了抗战，一粒粮食都是宝贵的。他们不顾革命胜败、民族存亡，贪污枉法，是革命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必须严加惩处。经行署研究，严办了这两个败类。全国解放前夕，秀峰同志担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华北人民监察院院长的时候，有两位领导干部，违反党的纪律，损害人民利益，造成很坏的影响，秀峰同志坚持党的原则，讲真理不讲面子，坚决撤了他们的职。

秀峰同志一贯秉公办事，不徇私情，执法如山。1950 年，他担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时，曾听亲属反映，他的一个侄子参加过地主还乡团，罪恶严重，民愤很大。他立即派人到冀东调查，查实后亲笔批准枪决。三十多年过去了，秀峰同志大义灭亲的高尚品德，至今还在群众中传诵。

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崇高的革命晚节

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谈到秀峰同志时说："‘文官不要钱，武臣不怕死’，他兼而有之。”这样高度的评价，秀峰同志是当之无愧的。他毕生视钱财如粪土，置生死于度外，完全是抱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投身革命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位外国进步记者对秀峰同志的革命献身精神表示不理解，说“这位瘦弱的知识分子曾经周游过欧洲，曾经是北京颇有名气的历史教授，如今像游方僧人似地在山区里奔波，从驴背上向那些不识字的、疑虑重重的农民群众施政。这位皮肤白皙、细声细气、举止文雅的教授

……他明明会一无所得而大有所失，为什么却要在中年之

时投身共产主义事业呢？”秀峰同志的回答是：“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不必来这里。”对

秀峰同志来讲，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他终

生不渝的实践。无论是在异国他乡的飘泊，还是革命环境转折的考验；无论是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的身居要职；也无论是王明错误路线的高压，还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秀峰同志的共产主义信念忠贞不移，他把一生的心血完全融化于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事业之中。

秀峰同志在法国留学期间，冒着时刻被捕的危险，参加领导留法学生和华侨的反帝同盟组织，创办了《工人》等革命秘密刊物，翻印了旅欧总支部的机关报《赤光》，积极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领导了留法学生和华侨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集会游行。 1932 年 2 月，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帝国主义的打击丝毫没有动摇秀峰同志的革命意志。

1932 年 3 月，在共产国际的协助下，秀峰同志到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他和林铁等同志为维护党的团结，同王明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斗争。这时，王明迫害陈郁同志，威胁秀峰等同志说：“谁同情陈郁，和他站在一起，就停止谁学习，送工厂做工！”秀峰等同志没有被王明的威胁吓倒，在一次学生支部会上，严词驳斥了王明的诬陷，他拒呼“王明万岁”的口号，高呼“共

产党万岁”。王明恼羞成怒，很快就设法把秀峰同志流放到一个矿去做工。做工时，发生了一次意外事故，秀峰同志的一只手被炸伤致残。

建国以后，秀峰同志担任过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高级领导职务。他虽然年事日高，但革命精神不衰，始终忠心耿耿、孜孜不倦地为党工作，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秀峰同志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叛徒”、“国民党”，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的革命信念不变，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斗争。

到了暮年，秀峰同志保持了崇高的革命晚节。1980 年 9 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恳切提出不要选他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1982 年 9 月，在

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秀峰同志给胡耀邦同志写信，再三请求辞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不要把他列入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按制度离休。他的信得到中央批准，印发代表大会，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称赞。秀峰同志带头拥护和支持党的干部制度的改革，模范执行中央关于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决定，为老干部树立了榜样。秀峰同志在生命垂危的时候，想到的仍然是党的建设、人民的事业，再三叮嘱在他去世后一不开追悼会；二不留骨灰；三把他的遗体献给医学事业。在他弥留之际，还十分关心整党工作，断断续续地说：“一定要把党整好。”

当前，根据十二届二中全会关于整党的决定，自上而下的整党已经开始。秀峰同志这样一位一身正气、对党忠诚、品德高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学习的光辉榜样。我们大家都要争取做一个像秀峰同志那样的优秀共产党员，努力把党整顿好，把各级组织建设好。这是对杨秀峰同志的最好纪念。

痛悼老战友程子华同志

3 月 30 日下午，我去探望病中的子华同志。子华的夫人张惠同志告诉我，程老 3 天前因早期肺炎住进医院，再次并发心肌梗塞，病情危急，医院正尽全力抢救。我听后至为不安，默默地企盼子华能够闯过这一险关，早日康复。不幸，当天晚上子华竟溘然长逝。子华是一位有 65 年党龄的老党员，功勋卓著，品德高尚，是我将近 60 年的老战友。这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猝亡，令我痛惜不已、夜不能眠。

子华 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7 年参加广州起义，之后参加保卫我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海陆丰的战斗。1929 年底，子华成功地组织领导了著名的大冶兵暴，当时党中央的刊物称誉这次兵暴为“模范兵变第一声”，在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特授予子华二等红星奖章。1932 年初，我和子华初次共事。此时，我们一起被派到宁都暴动后成立的红五军团，担任团、师的领导职务。 1933 年，子华任红五军团主力师十四师师长，我任另一主力师十三师的政委。我们并肩作战，共同参加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后，子华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率红 25 军从鄂豫皖出发进行长征，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到达陕北后，子华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红军的东征和西征。红军时期，子华参加和领导了许多重要战斗，他英勇善战、指挥有方，是我军一位屡建

战功的著名高级将领。

抗日战争时期，子华任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同黄敬、吕正操等同志一起，领导冀中广大军民，为创建冀中根据地、开展平原游击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1944 年，总政治部曾赞誉“冀中在人民武装的建设上，在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之开展上，曾经获得了伟大的建树，成为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模范，……成为敌后平原抗日斗争的一面光荣旗帜”。当时，我在与冀中毗邻的冀南根据地。冀中的斗争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1940 年底，子华和我奉命统一指挥冀中、冀南和冀鲁豫的部队，向不断制造磨擦、暗中勾结日寇、残害抗日军民、破坏抗日政权的国民党顽固派石友三部进行讨伐。子华认真贯彻执行 129 师关于讨逆战斗的一系列指示，机智果敢地指挥各部队协同作战，沉重打击了顽军，取得了讨伐石友三斗争的胜利。

抗战胜利后，子华担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北平和平解放后，担任北京警备司令兼政委。1949 年 4 月，子华率四野十三兵团南下，解放安阳和新乡等地。

不久，中央决定调子华到地方工作。他是解放后首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和省政府主席。1950 年 10 月以后他调到中央，先后担任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部长，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民政部部长等重要职务。子华是我国经济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他在工作中坚持从实际出发，重视调查研究，作风深入细致、朴实无华，善于解剖麻雀、总结经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子华退到二线之后，仍继续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始终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做了很多力所能及的工作。

60 多年来，子华对党和人民耿耿忠心，无私地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在整个革命生涯中，他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一切听从党的安排，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对工作尽心尽职，兢兢业业，极端负责，一丝不苟。他严以律已，平易近人，从不居功自傲。对待同志谦逊诚恳，宽厚大度。他廉洁奉公，克勤克俭。他尊重同志，善于团结同志，不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都能与大家很好地合作共事。这位令人敬仰的老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以及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建立的卓著功勋，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子华在他的回忆录的前言中写道：“我认为，在人的一生中，不免要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能够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是值得自豪和自慰的。”子华以他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我愿以子华的这句话与大家共勉，并以此作为对子华的纪念。

坚毅坦荡博学求实
——纪念老战友李一氓同志

数月前，令人崇敬的老共产党人李一氓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一氓同志投身革命事业 65 个春秋。他是我们党内已为数不多的大革命前入党的者同志之一。他从事过地下工作、军队工作、保卫工作、政权建设工作、宣传教育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和外事工作，是一位具有百折不挠、襟怀坦荡、博学多才、实事求是这样特色的老共产党人。他数十年如一日，不断地探索新事物，开阔新视野，提出新见解，总是紧跟时代前进。他以自强不息、无私无畏的坚定步伐，走完了作为一位彻底唯物主义者的一生。

一氓同志是我们的亲密的老战友。他的逝世，使我们不胜悲痛。他的业绩，值得纪念；他的品格，值得学习。

信念坚定百折不挠

一氓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他历经革命胜利和失败的考验，在艰苦的征程中，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对共产主义事业忠贞不渝，并为之付出了全部精力。

他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鼓舞和《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的熏陶下，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国共合作时期，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他在上海读书，是一个政治上异常活跃的大学生。投笔从戎后，直接参加了 1926 年、1927 年的大革命和南昌起义。由于他政治上坚定和颇有才华，在北伐时即先后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在南昌起义中任参谋团秘书长。他没有被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大屠杀和南昌起义的失败所吓倒，在党的安排下，又秘密去上海从事更艰险的地下保卫工作，同时做文化工作。当时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常常坐在由他开着的小汽车里面开会。他曾将从苏联归国不久的赵毅敏（当时叫刘馄）当作弟弟，赵一曼（当时叫李一超，又名李坤泰，后来在东北抗日战场壮烈牺牲）当作妹妹，加上自己的家属，组成一个临时家庭，掩护以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名义召集的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个时期，他巧妙地同敌人周旋，为转移、保存党的重要力量做出了贡献。

1932 年李一氓同志奉命去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长。在几次反“围剿”中，一氓同志历尽千辛万苦，为巩固中央革命根据地做出了优异成绩。他于 1962 年重访瑞金后写的一首五律诗《叶坪老樟树》，抒发了他对当年斗争生活的缅怀：“屋后百年樟，盘虬散木香。随枝系战马，纵笔听寒蛩。别久如亲故，感怀益劲苍。重来绵水老，难以纪流光。”

在长征路上，一氓同志主要从事政治工作，先后任特种营教导员、总政宣传部宣传科长。瑞金时的红军大学等四所红军学校在长征中曾改称干部团，团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李一氓同志与徐特立、董必武、成仿吾、冯雪峰等同志一起，担任干部团上级干部队政治教员。一、四方面军汇合后，恢复红军大学，原干部团易名，任穷仍当政委，一氓继续任教。一氓同志对张国焘分裂党的活动，态度鲜明，批判坚决。他在长征途中，始终保持革命豪情和必胜信念。这充分体现在他于 1936 年写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纪实文章之中（收入 50 年代出版的《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这篇长文还为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撰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提供了翔实的基础材料。

一氓同志到达陕北后，工作流动性大，他不知疲倦，忘我工作。他先后担任由李富春等同志任书记的陕甘省委、陕甘宁省委、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期间，经常远途跋涉，特别是有一段时间作为省委代表专管宁夏东北地区，成天骑马奔波，为筹集粮食、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等工作而不遗余力。

1937 年杭日战争爆发后，一氓同志受党的委派，协助叶挺同志组建新四军，并担任新四军秘书长。皖南事变并未使他的斗志稍减。他脱出重围后，历经艰险，奔桂林，转香港，过上海，回到苏北新四军军部。 1942 年后相继担任淮海和苏北区党委副书记、行署主任等职务。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先后担任苏北区党委书记、苏皖边区政府主席。这个时期他风华正茂，政绩卓著，鹏飞与他接触的机会较多。淮海地区广大人民至今仍深深怀念着曾经为

他们作出无私奉献的老领导李一氓同志。

新中国诞生以后，40 年来李一氓同志将他的智慧和经验主要用于外事工作，1950 年曾被任命为准备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团长为张闻天）。此后，无论是任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还是任驻缅甸大使和国务院外办副主任，都表现了他勇于开拓的特点。国家旅游局最初就是一氓同志倡议，经中央和国务院批准而设立的。“ 文革 ”期间一氓同志受“ 四人帮 ”残酷迫害，被关押达 6 年之久，他进行了不屈的斗争。恢复工作之后在中联部的 8 年，他犹如获得第二次青春，壮心不已，同中联部其他领导同志密切配合，切实依靠广大干部，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求实的科学态度，深入调查研究，为发展我党同世界各国政党的关系做了大量工作，起了重要作用。他德高望重，从中国国际交流协会成立时起，便一直被推选为会长。他在 1982 年退居二线之后，鉴于他具有难得的博学多才，中央委以领导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重任，他则不顾 80 岁高龄，为此倾注了极大心血，做出了卓越贡献，开拓了弘扬民族文化的新局面。他的逝世，是古籍整理工作方面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

一氓同志百折不挠、勇于进取的精神，贯穿着他的一生。

顾全大局襟怀坦荡

一氓同志的最大特色，是胸怀坦荡。他顾全大局，能上能下；敢于负责，又善于纳谏；疾恶如仇，待同志则十分宽厚；作事大胆果断，又能认错改错；为人刚直不阿，处事公允廉洁，从不宣扬自己，不摆老资格，却时时记着他人的功劳。一氓同志的这些高尚品德，有许许多多的事例。

从一氓同志的简历可知，他虽然是一位资历很深的老同志，但是职务上上下下变动是很多的。对于组织上的安排，他总是欣然接受，从无怨言，小平、陈毅同志曾经称赞他“ 很开明 ”，“ 不计较个人 ”。他在瑞金时期已身负国家保卫局部长的要职，而在长征途中则一度担任由团中央、妇联、工会和一些老同志组成的特种连指导员。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担任过苏皖边区政府主席，不两年又去担任旅大区党委副书记。新中国成立之后，职务变动也较多，但他总是愉快地在不同岗位上竭力奉献，做出成绩。

与一氓同志一道工作的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他敢于负责，颇有气魄。对上，他能直言不讳，不说违心话，勇于直接把自己的见解报告中央。对工作，雷厉风行，从不拖拉，而且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这是基于对情况有深入的了解和对党的托付毫不苟且。同时，他又一点也不专横，非常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包括资历比他浅得多、年龄比他轻得多的同志的哪怕一孔之见。大家称赞他从善如流，公道正派，可敬可亲，把他看作是一位既严格又宽厚的长者。与一氓同志共事，同志们总觉得工作起来痛快，思想受到启迪，问题解决及时，自己也得到提高。

一氓同志是真正做到疾恶如仇的。他当年对张国焘是这样，对“ 四人帮 ”也是这样，他常常以幽默的讽刺鞭挞敌人。他在被“ 四人帮 ”关押期间，要他以自传形式写交代材料，规定了 3 个条件。第一条就是不准“ 丑表功 ”。他诙谐他说，“ 既然是受审查写的自传，这自然就是‘ 供词 ’。供词是供认你有什么罪、你有什么错，当然不是要你供你有什么功，你有什么劳。所以它的第一条不准是有它的道理的。 ”一氓同志还对在“ 四人帮 ”淫威之下攀诬同志的人，予以应有的谴责；对于在历史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同志，敢于声张正义。

一氓同志对于同志，对于战友，对于为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的人，怀有极为深厚的感情。在他临终前不久完成的长达 30 万字的回忆录中，无一处自我炫耀，但又借各种场合，以动人的笔触，高度赞扬那些他所熟悉的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贡献的同志们。他将自己 1934 年 1 月 7 日为纪念钱壮飞烈士以邓发名义写的、至今镌刻在瑞金纪念塔上的热情悲壮的赞诗，恭敬地抄录其中。这里不妨再举一件事。1948 年夏天，胡愈之同志经过大连准备去河北平山找党中央。一氓同志同他谈起战争形势。胡愈之从军事形势和人心向背诸因素分析，认为解放战争胜利不需要两年，大概再有一年就行了。一氓同志听后“大为欣喜”，建议他“一定要把这个看法告诉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后来毛泽东同志在 1948 年 11 月 14 日以新华社评论名义发表的《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使用了这样的说法：“原来预计，从 1946 年 7 月起，大约需要 5 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至于在全国一切地方消灭反动势力，完成人民解放，则尚需较多的时间。”李一氓同志认为，毛泽东同志作出这样振奋全国人心的科学预言，包括他吸收了胡愈之同志的意见。他称赞胡愈之同志对党的贡献。

一氓同志平日不苟言笑，但待人平易可亲，颇有风趣。许多职级不等的同志向他要毛笔字条幅，他总是欣然挥毫相赠。他的正直廉洁，传为美谈。他生前将自己多年收集、珍藏的古字画，捐献给国家。他对子女要求极其严格，没有一个搞过特殊化，至今都是普通一员。一氓同志对弄虚作假、以权谋私、“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从来是鄙视、抵制的。

一氓同志心胸坦荡，回忆录中对于自己在皖南事变时的教训，多次作自我批评，态度磊落。他作为见证人，无私无畏地澄清了“四人帮”采用移花接木手法所制造的所谓“伍豪”事件，为粉碎“四人帮”反对周总理这一罪恶阴谋立了大功。

一氓同志在他朴实无华的回忆录中，却把自己的整个革命历程说成“是很平庸的”。这是过谦之词。但这也再次证明了他严于律己的美德。

治学严谨学识渊博

一氓同志年轻时便以党内、军内的才子著称。在他一生活动中，就文化领域而论，涉及过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和诗歌的翻译、古典诗词创作和校注、文学和书法艺术著述以及京剧、词典、版画、碑帖等方面的评论。古典诗词造诣尤深。他还就国际问题、哲学问题、历史问题、党建问题和经济问题写过不少专文。早在 1939 年《抗敌报》上发表的长篇论文《漫谈苏联红军向波兰进军》，立论正确，见解新颖，当时对于澄清思想认识曾起过重要影响。直至晚年，他还不断地对当代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潜心研究，并带领同志们写过一批很有分量的调研报告，他在建国后已经和即将出版的专著有《一氓题跋》、《花间集校》、《存在集》、《诗集》、《续存在集》等。他早期主编过杂志《流沙》和《巴尔底山》，间世的译著有《马克思恩格斯合传》、《马克思论文选译》、《新俄诗选》等等。他的许多著述，尚待整理出版。作为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一氓同志有其特色。

他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在戎马倥偬和公务繁忙之余，他从不间断地学习。他能随遇而学，孜孜不倦。在陕甘工作期间，他对毛泽东主席用浅近文言写的《致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的公开信》的遣词用句、谋篇布局非常欣赏，读了一遍又一遍。到了鄜县，自然而然地想

到杜甫的《月夜》诗句：“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并加考证。去瓦窑堡过延长，便联系沈括《梦溪笔谈》中的“鄜延境内有石油”，对石油旧称“脂水”又作一番查考。开辟工作去宁夏，对当地野草根甘草成为中药的由来，加以研究。在皖南期间，新四军军部迁到歙县的岩寺，又想起明朝李日华《礼白岳记》关于岩寺的记载，有所抒怀。去到苏北，乘分配工作前之空隙，精读《资本论》。在苏皖边区，开始搜集字画、瓷器，偶获刻有“小松所得”字样的笔筒，系黄小松遗物，爱不释手，相伴终身。

一氓同志勤于笔耕，直到晚年，仍保持自己动手查阅资料、撰写文章的习惯。他思想锐敏，才华横溢，有着惊人的记忆力，都是同这样勤奋分不开的。1981 年，他曾亲自主持将外国出版的数十本含有反华内容的书摘编成册，并在青岛休息时写了一篇气度恢宏、以理服人的前言。他年事已高，视力减弱，那些手迹仍苍劲浑厚，显出颇深的书法功底。他的著述，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文字清新活泼，不落俗套，自成风格。古籍专家们赞仰他“学问可佩，为人严谨，言之有物，精彩难行”。

这里想起一件往事。1943 年秋冬，他在苏北淮海地区主持工作时，为了丰富文化生活，曾亲自组织一个京剧团。演出多彩多姿，十分活跃，颇受党政军民各界欢迎。一氓同志本人还将当时在延安作为整风学习文献的郭沫若同志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改编成京戏《九宫山》连场公演，作为整风学习的一种辅助形式，曾轰动一时。

一氓同志非常尊重知识、尊重专家，注意培养人才。这是一贯性的，而在古籍小组和中联部工作期间更有突出表现。他在领导古籍小组的工作中，对专家学者十分尊敬，极为重视他们的意见，并为发挥老专家的作用竭力创造各种条件，因而他本人也受到专家学者们的钦佩和景仰。他还为培养专门古籍人才作了规划，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在中联部工作的几年里，他注重德才兼备，知人善任，妥善安排中年干部，积极扶持年轻干部，并提议拟定了培训干部以提高政治业务素质以及从高校选拔优秀毕业生的长期安排。他还热烈响应中央号召，及时主动退居二线，为中联部领导班子新老交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像一氓同志这样，既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又是一位阅历丰富、博古通今的学者，这在我们党内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知识分子。

实事求是与时代并进

一氓同志是一位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武装起来、富于哲理的人，是一位勤于思考、紧跟时代前进的人。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同时又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他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看问题能由表及里，认清本质，大处着眼，抓住关键。因此，直到耄耋之年，他始终保持思想活跃而不僵化。能够经常提出新鲜问题和精辟见解而不因循守旧。

这种情形，在他认识时代，分析历史，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方面都有鲜明的表现。

他从哲学的高度，赞扬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他说，“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这个原则，还是有根据的。否定前者，正是为后者开辟道路，使新的事物前进，并且要求在前进的过程中，不断地克服干扰和障碍，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停滞、因循、复古是消极的。奋发、改革、前进是辉煌的。”又说，“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存在，

总得要求发展，要求前进，要求变革。”这一番话，反映了一氓同志的现实感和时代精神是很强的。一氓同志在一次理论务虚会上，以书面形式系统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坚决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而发表的宏论，许多同志记忆犹新。

一氓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和处理国际关系和世界共运中的重大问题，更有建树。1978 年他率领代表团到南斯拉夫作实地考察，排除历史上形成的偏见，为实现中南两党关系正常化进行了重要的准备，随后又在中央领导下为完成这种正常化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在他主持日常工作期间，中联部向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包括辩证地认识意识形态问题与时代发展的关系，将其放在适当的位置加以正确对待，坚持求同存异和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等原则，从而打开了我党同包括社会党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党关系的新局面。

陈云同志提出，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在这方面，一氓同志作出了榜样。求实坚定信念，无私方能无畏。这也正是数十年来一氓同志保持言必行、行必果的大胆泼辣作风之源泉所在。

一氓同志的彻底革命精神，最后集中地体现在他如何对待自己生后而留下的感人肺腑的遗言之中：“我的后事从简。只称一个老共产党人，不要任何其他称谓。不开告别会和追悼会。火化后我的骨灰撒在淮阴平原的大地上。”李一氓同志的彻底唯物主义的宽广胸怀、共产主义者的高尚情操和一个老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将作为我们党和人民的巨大精神财富而永存。

悼念陈再道同志

陈再道同志与世长辞了。我军这位杰出的战将，以卓著的战功、坚强的党性、磊落的人格，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

悼念逝者本来就是哀痛的，何况又是这样一位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战友。我们和陈再道同志相识在红军时期的艰难岁月，和他一起经历过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解放战争的金戈铁马，以及和平年代的忧患奋进，深知他的逝世对我们党我们军队是多么重大的损失。

在我们人民军队的辉煌战史上，陈再道同志的英勇善战是出名的。毛泽东同志说他是“一员战将”，陈毅同志盛赞“再道之勇”。而这“一员战将”，这“再道之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革命战争烈火锻造出来的。

陈再道同志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使他一心向往革命事业。1926 年，他 17 岁时就参加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大革命失败以后，面对浓重的白色恐怖和反动派的屠刀，陈再道同志不但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勇猛地参加了 1927 年 9 月大别山南麓的秋收暴动，并于同年 11 月参加了著名的黄（安）麻（城）起义。起义遭到敌人的血腥镇压，有人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生怕自己脑壳搬家，悄悄离开了队伍，甚至投敌叛变，成了叛徒。可陈再道同志怀着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与仅存的一部分起义人员毅然奔向黄肢县木兰山地区，坚持武装斗争，是著名的木兰山七十二名游击英雄战士之一。1928 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随红四方面军拼杀于鄂豫皖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斗争，驰骋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等战役中。他和他指挥的部队，攻空山坝，保万源城，渡嘉陵江，三过雪山草地，历经无数恶仗、大仗。由于他骁勇善战，忠诚于党的事业，几年间，从班长、徘长、连长、营长、团长到师长、军长，成长为我军早期的优秀指挥员。

陈再道同志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表现。1937 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陈再道同志由军长改任 129 师 386 旅副旅长。同年 10 月，按照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他率领仅有 5 个连队组成的东进纵队，由太行山区根据地奔赴冀南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冀南地区处于平汉、津浦两大铁路经过的地方，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可这里是一片大平原，要在此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比在山地困难得多。同时，这个地区不仅有日本侵略军，有被日军收编的伪军，还有上匪、会道门、游杂武装。他们各霸一方，到处烧杀掳掠，社会情况复杂，秩序混乱，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陈再道同志紧紧依靠地方党的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我军很快在冀南站稳了脚跟。不久，成立了冀南军区，刘、邓首长又任命陈再道同志为军区司令员，并派宋任穷同志到冀南军区任政治委员。经过他们短短几个月的努力，协助冀甫地方党组织建立了二十几个县的抗日政权，地方武装由 500 多人发展到 1 万多人，东进纵队也由原来的 5 个连队发展到 3 个团， 1938 年 5

月，129 师副师长徐向前同志来到冀南。在徐向前同志的直接领导下，陈再道同志指挥东进纵队四处征战，积极打击日军，严惩汉奸，向敌人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伪组织，建立抗日政权和群众团体，使冀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到 1938 年 6 月，东进纵队 3 个团发展到 7000 人，还建立了 8 个支队和一个独立团，共 2 万余人。冀南根据地的开创、巩固和扩大，不仅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有力地支援了延安和太行等根据地，而且为后来参加“百团大战”，粉碎敌人的多次“扫荡”、“清剿”和“铁壁合围”，打下了良好基础，最终迎来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

我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我军指挥员都是党指挥下的忠诚战士。陈再道同志的一生，自觉地坚定地听党的话，对党赤胆忠心，党叫他于什么，他就干什么，党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他的工作经常调动，他都愉快地听从组织决定。解放战争时期，陈再道同志先后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二纵司令员、中原野战军二纵司令员等职，在刘、邓首长的领导下，他率部激战上党、邯郸，出击陇海路、定陶、巨野、羊山集，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转战桐柏、江汉地区，决战淮海战场……在这些战役战斗中，他始终听从党的指挥，以军事家的全局眼光和广阔胸襟，积极率部完成本部队担负的任务，主动协同配合友邻部队作战。二纵主力在鄄城战斗中，担负攻坚战斗任务很重，当六纵在打任庄的时候，苗庄的敌人来援，给六纵造成困难。陈再道等二纵领导同志发现这一敌情，未等上级命令，就立即机断行事，主动调所属五旅去打苗庄，使六纵顺利完成了战斗任务。1948 年我军进入全面反攻作战，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过去多以纵队为作战单位的方式已不适应新的形势，于是改变为以兵团或集团为单位作战，不论是围歼战或阻击战，多是以两三个纵队为一个集团，往往根据部队所处位置与作战任务来确定指挥关系。比如 1948 年 4 月，野战军决定由二纵和华野十纵为一个集团作战，由十纵宋时轮同志指挥。后来为了配合粟裕兵团西进，上级又命令由陈赓来指挥二纵、四纵和华野十纵以及桐柏军区主力。不久二纵配合华野部队进行淮海作战，上级又决定中野的一、二、三纵队为一个集团，统一由三纵司令员陈锡联同志指挥。无论指挥关系怎么变动，作为二纵司令员的陈再道同志，总是从全局出发，自觉服从指挥，协同友邻部队，共

同完成任务。他曾说：“整个中原战场是一盘棋，在中原地区的两大野战部队和各军区部队都要在这盘棋上活动，达到高度集中统一，特别是在大兵团集体行动时更是如此。指挥员必须胸怀全局，服从大局，否则，就不可能和敌人在中原决战。”陈再道同志在听党的话、维护我军集中统一的指挥方面，确实堪称楷模。

陈再道同志虽然一直担任军事指挥员，但他一贯关心政治工作，重视部队的思想建设。在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并且拖住了国民党三十几个旅以后，部队根据中央军委和野战军的部署，利用大规模反攻的间隙，进行了整党和整军，开展“三查”、“三整”和“三大民主”活动。陈再道同志亲自深入部队了解思想情况，有的放矢地解决了有些基层干部对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以及担心开展民主以后，部队不好管理等等思想问题。经过发扬民主，密切了官兵关系，部队生龙活虎，一片欢腾，为转入战略大反攻作了很好的思想动员和准备。陈再道同志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与他共事的人不管来自兄弟部队，还是来自地方，他都赤诚相见、密切合作。有一段时间，他当纵队司令员，晋冀豫边区省委书记李青玉同志当政委。他对李青玉同志很尊重，凡事都一起商量，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东进纵队不长时间就打开了局面。许多老战友谈到他，都称赞再道同志胸襟宽大，好相处，好共事。有不同意见，他会争得面红耳赤，但从不往心里去，事情过去了，又和好如初。他爱护干部，爱护战士，尊重地方同志，关心群众疾苦。他工作过的地方，上下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都比较好。

陈再道同志杰出的战将品质和风格，在和平时期也放射出绚丽的光彩。建国之后，他长期担任我军的重要领导职务，不论在什么岗位上，他总是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为加强部队建设和民兵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六十年代，他在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时，发现培养了“硬骨头六连”等典型，为推动和平时期部队的全面建设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当林彪搞“突出政治”一套，有人要批判管训练的一位军区领导时，他挺身而出，在大会小会上说：“不要动不动就整人。抓训练，是我们党委集体定的，要说有责任，首先由我司令员负。”当有人向他搜集彭德怀同志的反面材料时，他大声痛斥：“我说彭老总是大好人，他做的好事你怎么不往本子上记？”在军委的讨论会上，他同样敢于对林彪的话提出不同意见。他就是这样旗帜鲜明地敢于批评，敢于斗争，敢于抵制错误的东西，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所谓“七·二〇事件”，对陈再道同志进行了恶毒诬陷和残酷迫害。面对强大压力，他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地与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气节，一个浑身挣挣铁骨的战将本色。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晚年的陈再道同志，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的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1972 年，他重新工作时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冒着重新被打倒的危险，不知疲倦地下部队，上灾区，搞训练，抓廉政。粉碎“四人帮”后，他已近七十高龄。在担任铁道兵司令员期间，他还像当年战争年代指挥打仗深入前线一样，到南疆铁路、青藏铁路等铁道兵所在的各艰苦地区检查考察工作。从吴八老岛到金沙江畔，从长城脚下到巴山汉水，从南疆边境到唐古拉山巅，都留下了他不辞辛苦的足迹。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再道同志坚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为铁道兵部队的建设和祖国的铁路建设勤勤恳恳地工作

着。即使不担任部队的领导工作了，还是时时关心军队建设和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他病重住院，我们和中央领导同志到医院去看望他时，他一面为十四大的胜利召开而高兴，同时向我们倾吐他对部队建设的看法，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他所了解到的农村情况，希望抓紧解决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的还是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多么可歌可敬的战将啊！

陈再道同志永远离开我们了，他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他坚决听党的话，对党赤胆忠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英勇顽强，不畏强暴，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优良作风；他坚持原则，团结同志，关心部队，热爱群众，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高贵品德，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我们常青的事业中！

亲爱的老战友，陈再道同志安息吧！

党的忠诚战士
我军的卓越将领
——悼宋时轮同志

惊闻时轮同志逝世，我们心情万分沉痛。在几十年革命斗争生活中，我们分别同他共过事，并建立了真诚的革命友情，他的许多宝贵品德与才干，深深地铭记在我们心中。时轮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一生忠诚党的事业，无论遇到任何艰难曲折，都矢志不渝。他既是一位功勋卓著的战将，又是一位军事教育、军事科研工作的卓越领导者，对革命战争和我军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谨以此文，表达对他的悼念之情。

一

时轮同志毕生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坚定地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即使身处逆境，也坚贞不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时轮同志青少年时代，即十分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腐朽统治，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并因此而被学校当局开除。为了继续从事革命事业，他毅然投笔从戎，1926 年初，进入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决心走武装救国的道路。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 年 1 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时轮同志被捕入狱。在一年多的铁窗生活中，他团结狱中难友，在党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受了种种考验。 1928 年出狱后，他辗转香港、上海，多方寻找党组织，没有找到。遂于 1929 年返回湖南家乡，在浏阳、醴陵和江西萍乡地区组织起了一支 30 余人的游击队，打白匪，杀土豪，开展游击活动，后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回到党的怀抱，便立即投入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在长期、复杂、曲折的战争锤炼下，他从一个青年军人成长为一名能征善战的高级将领。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适应形势的需要，1946 年 1 月，时轮同志出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国共产党方面执行处处长，积极协助中共代表叶剑英同志与美国和国民党方面的军事代表进行谈判斗争，以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违反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阴谋。美、蒋代表认为宋时轮是一位很利害而又难对付的对手，国民党曾唆使特务图谋暗杀他，乘他上街时向他打黑枪。

时轮同志在历史上几次身处逆境，他都能泰然处之，正确对待。十年动

乱期间，他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被立案审查，残酷批斗，待遇由大军区级降为团级，并被

强行劳动改造。但他始终坚持原则，毫不屈服，表现了共产党人的一身正气。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1972 年 10 月，时轮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他同政治委员粟裕同志一起，带领全院同志坚决肃清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影响，竭力抵制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稳定军事科学院的局面。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坚定不移地拥护和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开展军事科研工作，并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怀疑、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思潮，率先深入研究和积极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先后发表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军胜利的指南》、《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等重要论文和专著，主持编辑出版了《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并由他提议和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军第一次毛泽东军事思想学术讨论会，坚定地捍卫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地位。

二

时轮同志在战争年代，从游击队的领导人到大兵团指挥员，身经百战，参加和指挥过许多次驰名中外的战役，充分表现了他指挥作战的才能，为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过中央红军第 35 军参谋长、第 21 军参谋长兼第 61 师师长、四方面军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二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以及红军的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又先后出任红军第 30 军和第 28 军军长，参加了红一方面军的东征作战、西征作战和三大主力会师后的山城堡战役、援西军行动等。抗日战争爆发后，时轮同志任八路军第 120 师第 358 旅第 716 团团长，率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同日军作战。1937 年 9 月，他率部组成雁北支队，北越长城，挺进雁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938 年 5 月，雁北支队奉命同晋察冀军区邓华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 4 纵队，时轮同志任司令员、邓华同志任政委，挺进冀东，开创了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解放战争期间，时轮同志历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 10 纵队司令员、第 9 兵团司令员，率部南征北战，驰骋疆场，参加了朝阳集、泰安、老河口、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重要战役，表现了出色的指挥才能。

在 1948 年夏豫东战役中，时轮同志率华东野战军第 10 纵队进到上蔡地区，协同中原野战军一部，阻击由平汉路东侧北进的胡班兵团，血战 6 昼夜，保障了开封之战的胜利。接着进占杞县，指挥部队在桃林岗、小河一线构筑防御阵地。敌以两个师的兵力向桃林岗阵地发起攻击，时轮同志指挥部队顽强阻击，激战 7 昼夜，歼敌 5000 余人，使骄横慓悍的邱清泉部眼睁睁地看着 10 多公里以外的区兵团被歼而无可奈何。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时轮同志指挥第 7、第 10、第 11 三个纵队，阻击徐州东援之敌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保障主力围歼碾庄圩地区的黄百韬兵团。敌在坦克、飞机支援下拼死猛攻，时轮同志指挥部队沉着应战，坚守阵地，血战十昼夜，圆满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1949 年 2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统一整编，时轮同志任第 3 野战军第 9 兵团司令员，率部南下，与第 7 兵团组成中突击集团，参加渡江战役。4 月 20 日晚，中突击集团首先发起渡江，顺利突破敌之江防。沿江之敌纷纷向南溃逃。尔后，时轮同志率领主力日行百里，昼夜兼程向东疾进，与第 10

兵团封闭了敌南逃通路，经两昼夜激战，将逃敌五个军全歼于郎溪、广德地区。

紧接着，时轮同志第 9 兵团指挥 5 个军，会同第 10 兵团在粟裕同志统一指挥下发起上海战役。中共中央和华东局要求力争完整地占领上海，尤其要避免使市区遭到炮火破坏。时轮同志根据上级意图和要求，先以两个军迅速楔入高行、高桥，会同在浦西作战的第 10 兵团，压迫市区的敌人向北收缩。尔后又指挥另三个军进入市区，强渡苏州河，会同第 10 兵团歼灭了吴淞以南的敌军主力，圆满地实现了既完整占领上海，又有效地歼灭了敌人主力的战役目的。

新中国建立后，1950 年 6 月美国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中国人民组织志愿军进行了闻名中外的抗美援朝战争。11 月初，时轮同志被任命为志愿军第 9 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率部赴朝作战，立下了新的战功。

第 9 兵团入朝后，第一仗就独立担负朝鲜东线作战，在长津湖地区求歼美国海军陆战第 1 师。美陆战第 1 师，是美军历史较长、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而当时我军装备很落后，仓促入朝，防寒装备很差，11 月的长津湖地区，最低气温达—30℃左右。但时轮同志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和志愿军司令部的命令，按时发起战役，反击开始的当夜，即将美陆战第 1 师全部和美第 7 师一部分割包围于长津湖地区。苦战 13 昼夜，毙伤俘敌 1.39 万余人，给美军该两师以歼灭性打击，迫使残余美军撤至三八线以南地区。这一仗，打出了国威、军威。

1951 年春，时轮同志率部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后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参加指挥了 1951 年夏秋季防御作战和 1952 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直至 1952 年 7 月奉调回国，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

时轮同志一贯坚持从严治军的原则，重视以毛泽东军事思想武装指战员，重视部队的训练，重视实战经验的总结。他带部队、办学校、搞科研，都突出一个“严”字，严格管理，严格要求，严谨治学。

在解放战争中，时轮同志任华东野战军第 10 纵队司令员达两年之久，对这支由地方武装改为野战部队的建设，花费了大量心血。在时轮等同志的带领下，第 10 纵队在解放战争中，成长为一支思想好、作风硬、纪律严、能攻善守的华野主力部队之一。

1952 年夏，时轮同志从朝鲜前线回国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以教学为中心的办校方针，强调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注意总结我军的作战经验。他从严治校，严格要求，严格训练，树立起良好的学风和校风，为我军培养出一批深受部队欢迎的中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

他在军事科学院工作期间，为发展和繁荣我国军事科学，作出了卓越贡献。退居二线以后，直至弥留之际，他仍然十分关心我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经常找一些同志座谈研究。

时轮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建设，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正当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满怀豪情地为我国我军的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进的时候，时轮同志与世长辞了。但是，他坚强的革命精神，艰苦朴素、勤奋好学、廉洁奉公、从严治军的作风，将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

学习。

痛悼我的挚友杨勇同志

当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向杨勇同志遗体告别的时候，林彬同志对我说：“你又失去了一位知心朋友。”是的，病魔无情地夺走了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位驰骋沙场、战功卓著的良将，也夺走了我的一位患难与共、情同手足的挚友。

我认识杨勇同志是在 1934 年，当时我在中央直属干部团任政委，他是红三军团中一名优秀的团政委，我们一起跋涉千山万水，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我初次和杨勇同志共事，是在抗日战争后期。 1944 年 5 月，冀南和冀鲁豫两区合并成立新的冀鲁豫军区，我和杨勇同志一起在军区工作。我们朝夕相处，并肩战斗，在抗击日寇的战火中同生死、共患难，度过多少个难忘的日日夜夜。 1949 年，我们又一起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指挥下，挺进大西南。杨勇同志率二野五兵团西取贵州，陈赓同志和我率二野四兵团南下云南。全国解放后，我们先后奉调北京，虽然不在一个单位工作，但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结下的革命情谊，经常互相看望，促膝谈心。

杨勇同志是我党我军久经考验的优秀领导人，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崇高的思想品德。他坚定、坦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既能坚持原则又能团结同志的领导艺术，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杨勇同志胸怀开阔，性格爽朗，对党的事业具有坚定的信念，是一位坚强的乐观主义者。不论平时还是战时，也不论是在顺利的环境里还是在艰难的逆境中，他总是乐呵呵的。他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时时鼓舞着周围的同志，给人以无形的力量。直到癌症晚期，身体极其衰弱的时候，他仍然保持着这种革命的气质。去年 11 月，我到医院探望他。在谈话中，他同往常一样乐呵呵地对我说：“医生讲，我还有两个月的时间，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我还有一个月。”说话的神情完全不像一位垂危的病人。他谈完病情之后，就同我谈起工作问题，讲了他对工作的一些意见，他念念不忘的是党的事业，特别是军队建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杨勇同志表现得如此但然自若，把个人的生死完全置之度外，真不愧是一个铁骨挣挣的硬汉子，一个坚定的、大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一走出病房，泪水便夺眶而出。

杨勇同志是一位原则性很强的领导人，他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从不含糊、迁就，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同时，他又很尊重同志，能够虚心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他待人宽厚，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哪怕是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甚至反对过他的同志，他都能合作共事。随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杨勇同志的工作时有调动，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岗位，他都能够正确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几十年来，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杨勇同志和其他同志有过不团结的现象。既能坚持党的原则，又能广泛团结同志，这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品质和领导才能。杨勇同志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杨勇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英勇奋斗，鞠躬尽瘁，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一生，赢得了广大军民的爱戴和崇敬。正当党需要杨勇同志担任更加重要的领导职务时，他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他那坦荡乐观的音容笑貌，已经深深铭刻在我的心中，他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悼任童同志

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里，我和任重同志都在冀南地区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经常同住一间屋，有时还同睡一铺炕，是亲密无间的战友。3 月 16 日，在外地惊悉任重突然离我们而去，悲痛之极。1938 年，中央派任重从延安到冀南，担任冀南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任重抗日热情十分高涨，朝气蓬勃，长于宣传鼓动，又能写文章，在他的主持下，团结和依靠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抗日群众，冀南地区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搞得很有起色。不久，先后调任冀甫五地委和四地委的书记，兼任冀南军区五分区和四分区的政治委员。之后，又任冀南区党委常委、冀甫行署副主任。在斗争最残酷的时期，为了保存力量，调出了大批干部，冀南的领导班子只留下区党委常委任重、朱光和我，以及军区参谋长王蕴瑞四人，对党、政、军、群实行一元化领导。任重在发动和领导广大群众打击敌人，粉碎日寇扫荡，加强根据地党的建设，反对国民党顽固派，以及生产自救、战胜灾荒等斗争中都作出重要的贡献，在冀南的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当时，任重已是一位优秀的年轻领导干部，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

人之一。

（一）

冀南是一片辖 30 多个县的大平原。我们过去只有在山

地打游击的经验，在平原地区能不能发展和坚持游击战争，

怎样才能立足生根，大家都心里没有底。一二九师的领导同

志及时地提出了创造“ 人山 ”的战略思想，指出把广大的人

民群众动员到抗日战线上来，造成游击队的“ 人山 ”，不管什

么样的“ 山 ”，也没有这样的“ 山 ”好。冀南区党委和冀南军区对此作了统一部署。任重平易近人，会做群众工作。他深入群众，联系群众，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短时

间内，在他主持工作的地区，群众迅速发动起来，各县、区、村都建立起了群众的抗日武装，男女老幼都被分别组织到战地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委会）、抗日农会、抗日妇女救国会、抗日工会、青年抗日先锋队、抗日儿童团等团体里，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按照冀南军区的统一部署，任重还积极组织和带领群众挖地沟，沟深三尺，宽五尺，可以走大车，既限制和迟滞日军的行动，又便于我军民隐蔽、转移和伏击敌人，任重为建立冀南的“ 人山 ”，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为对付敌人反复对我根据地进行的合围“ 扫荡 ”，1942 年下半年后冀南军区决定各军分区开始向敌占区挺进。此时任四分区政治委员的任重率部队到威县、广宗交界地区，团结和依靠群众，积极打击敌人。任重身先士卒，1943 年 3 月在一次战斗中右大腿中弹负伤，仍不顾休息，坚持战斗，大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任重曾一度任冀南五地委书记，这个地区情况尤其复杂，赵云祥等国民党顽固派活动猖獗，任重遵照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坚决打击日寇的同时，有理有利有节地同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工作做得很出色。在斗争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组织一部分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大力加强对伪军和伪组织的工作，集中打击敌人，任重在这方面也倾注了大量心血。

（二）

1943 年，冀南出现了几十年未遇的大旱灾，持续 8 个月之久。之后又接连下了 7 天 7 夜的大雨，沥涝成灾，许多村庄变成一片汪洋。有的地区蝗虫遍野，遮天蔽日，庄稼几乎全被蝗虫吞吃。加上霍乱流行，许多人得了浮肿

病。一时间，冀南平原房倒屋塌，杂草丛生，满目荒凉。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任重在四地委按照中央、一二九师和冀南区党委提出的生产自救、战胜灾荒的指示，号召党政军民紧密团结，在反封锁打击敌人的同时，坚决同灾荒作斗争，咬紧牙关，艰苦奋斗，渡过难关，并及时地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如向地主借粮，给群众贷粮、贷棉、贷款，发动群众搞运输，以物换粮，组织生产互助组，组织群众挖井，补种蔓菁等晚秋作物。任重亲自同群众一起下地抢种，拉犁拉耙。在任重等人的带动下，该地区掀起了群众性的生产自救运动。由于

措施得力，经过军民的共同努力，任重领导的地区在不长的时间里，群众不但基本上解决了自身的吃穿问题，还挤出一部分粮食布匹交给抗日政府和八路军。四地委充分发动群众的经验，受到了冀南区党委的表彰。1943 年这可怕的灾荒，终于被我们战胜了。

（三）

在整风运动后期，由于受到康生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曾一度掀起了所谓的“抢救运动”，使一批好同志受到毫无根据的怀疑。任重、王蕴瑞等同志此时也受到委屈。任重被怀疑为托派。冀南区党委的许多领导同志都不相信这种无稽之谈，认为一位一贯坚决抗日的领导同志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事。冀南的前方区党委仍对任重完全信任，我们一如既往地同他亲密共事，无丝毫芥蒂。在任重受怀疑的情况下，黄敬同志坚决要他去担任冀甫和冀鲁豫合并成立的平原分局的宣传部长，未果。任重同志胸怀坦荡，坦然地接受党的审查，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并坚信组织上一定会把事情搞清楚。任重到延安不久，他的问题就得到甄别，组织上做出了正确的结论。他很快返回冀南，继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同任重在一个地区共同战斗了将近 8 年。当时，他还不到 30 岁，但是已在复杂斗争的实践中得到了磨炼，是一位德才兼备的优秀领导干部。

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始终保持着党的优良作风，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他突然地走了，令我们痛惜不已。我们大家都要学习任重。让我们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更加努力地建设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作为对任重的纪念。